

与天下共醒

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葛兆光 吴思等口述
李怀宇采写

中
华
书
局



序

我有幸生于1976年，回首自己的成长岁月，正亲历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高科技设备的涌现，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梁启超在20世纪之初断言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在近三十多年得到了惊心动魄的印证。中国一步步地开放，已融入世界浩浩荡荡的潮流。历史并没有终结，而是出现了无数让东西方都感到棘手的新问题。中国正走向现代化，随之而来的仿佛是后现代的迷思。天下巨变，谁与共醒？

翻开国史长卷，1976年确是重要的一页，此后的中国正用巨笔书写全新篇章。当老一辈掸去历史的灰尘，试图找回政治运动中荒废的青春，新一代正如饥似渴地汲取现代文明的甘泉，希望接过五四时代民主科学的火炬。在思想碰撞中，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被一次次地探讨，知识人的眼光不只投向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也远瞻世界的经验与变革。在文化交流中，让人常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之叹。

十年前，我发愿在华人世界遍访心仪的知识人，有时感觉就像和时间在赛跑，遥望前辈渐行渐远的背影，我更觉义不容辞。近年我则将眼光更多地投注于1976年后成就的一代。身处大变局中，我常感迷惘，甚至为世间不平事而感到痛苦和无助。尽管我对未来充满乐观，但对现实的种种迷思，使我不停地向学有所成的知识人请教，希望在多元的答卷中找到无限的可能。

2009年夏天，友人带我到台北紫藤庐，指点一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我至今未解其中味，但心灵上有一股莫名的震撼。天下如此变幻，苍生如此奔波，我依然不甘心地提起笔来，但愿能寻得醒世良方。

李怀宇序于悠然居

2015年2月

目 录

葛兆光：重新思考“世界之中国” /1

周振鹤：求真是学术的生命 /33

钟叔河：期待中国走向世界 /53

朱 正：我是唯恐天下不治 /69

许纪霖：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89

邓晓芒：哲学就是生活 /111

王学泰：中国历史上有独特的江湖文化 /135

吴 思：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潜规则里 /157

张良皋：向往文艺复兴的时代 /179

章汝璈：字再小也有大气象 /199

董 健：思考当代知识者的命运 /217

黄天骢：文章中冷暖自知 /239

郑 重：在业余兴趣中探寻艺术天地 /257

李 辉：用宽容之心追寻人物与思想 /275

骆玉明：好的文学作品是对“人”提出问题 /299

陆建德：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有一点自卑情结 /317

陈 来：国学研究的视野要面对全世界 /337

尤西林：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危机与重建 /353

杨小彦：视觉时代的探索者与实践者 /367

曹锦清：对社会复杂性心存高度的敬畏 /393



葛兆光

重新思考“世界之中国”

葛兆光

1950年生于上海。在贵州初中毕业以后，曾经在苗族山区插队。198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江苏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1992年起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2007年起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著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禅思想史》、《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等。

葛兆光先生的办公室挂着余英时先生的两幅字，一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的贺诗“文史英才聚一堂，国魂未远重召唤”，另一幅则录1978年故国之行的旧作送给戴燕、葛兆光夫妇：“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早年读书太勤，用眼过度，如今葛兆光的左眼近乎失明，看书主要靠右眼。葛兆光自认读书是一个“野狐禅”：到处乱读，知识很杂。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基本上都是摘资料，没有私密性的东西。他分析同代的学者中，很多人都有所谓“两支笔”：一支写学术著作，一支写公共评论。他也写了不少书评，“中国的特点是书评往往借题发挥，其实是在表达社会、政治关怀。比如我写陈寅恪的那篇文章看起来是书评，实际上是在借陈寅恪说事”。而他感慨现在的大学制度慢慢催生一批趋向于专业而不关怀社会的人，“既是专业知识分子，又是公共知识分子”才是他心中理想的状态。

1978年春天，在贵州边远小城的葛兆光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风驰电掣地跑回家，和父母一起拆看，从来喜怒不形于色的母亲，竟失态大笑。这一年，葛兆光已经二十八岁。此前的十年里，他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不

是在砖瓦厂做砖瓦，就是在农药厂熬肥皂。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改变了葛兆光的命运。

在上世纪80年代，葛兆光先是研究中国史学史，考证古典文献，然后致力研究禅宗、道教与中国文化，后结集成《禅宗与中国文化》和《道教与中国文化》二书。在此基础上，葛兆光又费了近十年之功，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两卷。21世纪初，葛兆光将眼光投向“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等大问题，在2011年出版了《宅兹中国》一书。他说：“我这三十年，前十年研究禅宗、道教，中间十年做思想史，后十年做跟东亚和中国有关的东西。”

90年代中，葛兆光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察觉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从1868年明治以后逐渐兴起，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一段辉煌的时期，也留下很多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他说：“不要忘了任何学术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和形成话题，都跟政治相关。明治时期对中国的研究，显然既有和欧洲东方学竞争的取向，发展了具有现代性意味的东洋学术，又带有一种在亚洲成为霸主和领袖的政治背景，跟当时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有直接相关性。这使得日本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所谓‘东洋学’的传统，也包括了中国学在内。这个传统一方面结合了东西方对中国研究的长处，同时又跟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和政治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成为当时日本学术界一个强大的主流。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到了中国‘文革’以后，日本的中国学逐渐变

成一门技术性的外国学问，跟国家命运和国民关怀有点距离了。”葛兆光认为，已故的沟口雄三教授，在日本学者里是少数抱有大关怀的人。“我的理解，沟口是想把日本中国学从现在比较衰落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提出了几个口号，一个就是要从亚洲出发去思考，如果把中国放在亚洲，因为日本也在亚洲，互相之间产生的关联，就使中国学涉及日本，这样，与日本相关的中国学就有了活力。另外，沟口强调中国研究要防止拿欧洲尺度来看，当然，他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同时他又落入欧洲中心主义。”而葛兆光《宅兹中国》中最早的篇章，便是与日本学者的论辩而引发的，他所批评的日本学者中，也包括了沟口雄三。

沟口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有一次，余英时先生到日本访问，沟口雄三要请余先生吃饭，自己先去饭馆试菜，试好了，过几天再请余先生。余先生说的这个故事，葛兆光也有同感，他说：“我也很喜欢沟口先生，但我把个人友谊和他的理论方法是分开的。沟口先生是一个很好的人，这是他能够成为学界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品质，人要‘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要让人家觉得亲切，而不是倨傲，才能当领袖。有时候诚恳也是一种利器，我想，沟口先生是真正的诚恳，这种诚恳使得他成为日本中国学界领袖式的人物，大家愿意跟他在一起，这就帮助他的理论和方法能够让大家所接受。”

近年来，每年葛兆光有一两个月客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余英时先生时相论学。余先生有言，“我对政治

只有遥远的兴趣”，但这不妨碍他有中国情怀。葛兆光也说，“我不会和政治近身肉搏，那不是我的特长”，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政治关怀。在视野所及的学术界，葛兆光看到：“在美国，学术和政治离得很远，所以在学术上专业化、规范化和技术化相对比较厉害。但中国是学术与政治始终分不开。我想，中国知识分子传统还是很厉害，道统对政统，总是希望有所制约；当思想不能够自由表达，就要通过学术来表达，那么，学术背后的政治关怀当然就很厉害。在学术尤其是在历史领域中，思想史是最容易涵纳政治关怀的。”

在《宅兹中国》中，葛兆光强调有一个历史中国，有一个政治中国，还有一个文化中国。文化中国就像余英时先生的名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葛兆光专门请人刻了一方“无处非中”的印章送给余先生。“这句话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地球是圆的，没有哪里不是‘中’。艾儒略当年写《职方外纪》，恐怕就是为了破除中国人认为自己总在天下中央，别人都是四夷的观念。在一个球面上，可不是哪里都是‘中’吗？‘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跟‘无处非中’意思好像可以相通，也合乎‘世界公民’的看法，世界主义的文化立场和身处某个国家的生活现状，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其实，余先生最爱中国，所以才有《情怀中国》这样的书名。我经常讲，最深切的爱国情怀，有时反而常常在外国。”

坐看学界云起云落，葛兆光不免有一点悲观。他说：“欧美学术争论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激烈争论到最后，大

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可我们这儿学术争鸣好像是一个反常现象。自由争鸣的环境是很多人一起辩论，却并不影响到生死存亡。可是，现在的制度使得学术辩论有点儿像生死存亡或者是争一块大饼，因为大家都像是在一个大锅盖下面，大家纷纷试图找到自己存活的地方。如果说自由的学术争鸣，首先，舆论环境和学术环境应该是自由的，可是，现在有些话总是要曲里拐弯或者含蓄隐晦地说，而且，更可怕的是，有些大声说的话是说给上位的人听的，有些大声说的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还有些小声说的话，倒是说给本土的人听的，所以，声音就不太一样。”不久前，葛兆光写了一篇文章叫《人文学科拿什么来自我拯救？》。

李怀宇：陈平原先生跟你是同一年进大学，他曾谈过一个学术上“隔代遗传”的问题：“80年代的我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30年代的学术传统。”你当时在北大有没有这种感觉？

葛兆光：我跟他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我想，平原兄大概有这样一个判断：由于我们直接上面的这一代在新中国以后受教育，他们的知识、学术理念和政治立场，可能有一些我们不太认同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更尊重和追随更上面那一代，就是隔代的那一茬。但是，这可能是后来不断反思的后见之明。实际上，当我们1978年春天到北大的时候，直接接触的老师就是我们上一代的，比如说，金开诚先生、裘锡圭先生、严绍溥先生、张广达先生。这

些人跟我们接触很密切，所以不能说我们就真的跳过了这一代。从学术史意义上来说，所谓“隔代遗传”实际上不是一个历史过程，而是在不断地反思以后，觉得我们可能精神气质、学术立场上，跟更上面的那一代更加亲近，而不太像五六十年代受教育的这一批人，他们可能受到意识形态化的教育，在屡次政治运动冲击以后，学术积累不够深厚，他们不是那么能影响我们的学术和思想。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跟他们接触还是很密切。我们跟上面的一代其实还是有很多能够相通的地方的。比如，我们比较能理解他们在政治运动中不断地受到影响，多多少少在观念上不够开放，学术积累上确实不够深厚。比起更早的一代，比如说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里面还有像周祖谟先生、邓广铭先生、阴法鲁先生，我还见过游国恩先生、魏建功先生，可能从学术上会有更亲近的感觉。但是，五六十年代出来的这一批人，跟我们有更密切的接触，不可能马上越过那一代。有些老师跟我们的关系很好，而且至今还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像张广达先生，他是教我们中国通史的。我们也很尊重他们。

李怀宇：张广达先生在这一辈的学者中是非常突出的。

葛兆光：他比较突出的，就是一些不突出的，现在看起来比较平庸的人，关键也是要去理解他的那个处境。

李怀宇：最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面。

葛兆光：对。说老实话，三折腾五折腾，像烙饼一样，他有什么时间去积累？而且他从整个大学以后受到的影响以及做学问的模式，都受到那种社论式的思想和文风影响，

写出来的东西当然就不怎么样。这一代人是悲剧，从个人来讲他们都是很好的人。而且，特别要提到的是，当我们进大学的时候，他们这一代人因为“文革”十年里面没有机会跟学生接触，反而在那个时候对教学投入的精力很大，所以跟我们接触很多。

李怀宇：投入的精力很大的原因之一，就好像要把自己的青春补回来？

葛兆光：他们说，我们十年都没有学生，更没有好的学生。碰到77、78级我们这一批学生的时候，他们特别高兴也特别上心。

李怀宇：恢复高考的头几届，因为那么久没有大学招生了，有些人年龄还比较大。现在回想起来，那几届是不是后来成才的人比较多？

葛兆光：所谓人才集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人才是多，另外一方面是机遇很好，可是，我更愿意强调这是时势造成的。我们直接前面的那一代，因为受到很大的政治影响，他们没有很大的学术成就，而且他们的论著有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不太可能在学术上提出话题，引领方向，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占了便宜，好像前面是开阔地，一出头马上就能站在前沿了，这是一个时代机遇，咱们得承认“时势比人强”。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当然十年积累了这么多人，可能人才是多一点。可是，这些人天然的缺陷很多，因为十年没有受过好好的教育，可能基础未必很好，像我只读到初中就考大学了，到后来需要恶补，那个恶补有时候就很实用主义，加上年纪大了，英文、日文都

学得不太好。那个时代应该说是畸形的时代，着急起来什么都写。看起来一下子东西很多，但是在学术积累上未见得就很强。

李怀宇：原来没有受过正常的教育，有下乡、劳动的阅历。从学术上来讲，你觉得人生的阅历重要，还是正常的教育重要？

葛兆光：这是一个很不好说的话题。有很多人都会跟我讲，你从1966到1978年这十二年都是在社会上飘荡，你有很多社会阅历，这对你后来学历史、人文这些东西有很大帮助。这个话听听好像有道理，但我是有疑问的。第一，因为你刚好学了需要阅历和经验的历史，所以社会阅历就有一些用处。第二，谁愿意拿出十二年时间，尤其是青春年华去换这点人生经验？第三，这个阅历和经验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其实还很难说。77、78级这两届学生，我认为有极好的，但可能也有极坏的。你想，如果他把这些人生经验和社会体验嫁接到了另外一面，万一他做起坏事来，也是经验丰富，可以做得很绝的。阅历和经验并不都是加分的。再说，如果学数学、物理、化学，也许宁可希望这十年不要浪费，去受正规的学业训练。只能说，学人文的，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可能是有用的，尤其是学历史的，让他能够更好地对已经消失的历史重新进行想象、体验和判断。

李怀宇：你在大学的时候，对文学的兴趣多一点，还是对历史的兴趣多一点？

葛兆光：因为我学的专业叫古典文献专业，所以没

有文史的分别，实际上是文学和历史同时都在做。我的本科论文和研究生论文都是跟历史有关的，而且我读书的时候，老师最早让我细读的是《史记》。当然，那时候学生都有文学理想和文学爱好，再加上在古典文献专业，我还作为助教承担过一门课叫“古代文学要籍介绍”，是跟文学有关的，这促使我非常努力地去读古代的文学文献。所以，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就跟老师金开诚合作写了一本书，叫《历代诗文要籍详解》，后来再版的时候改名叫《古代诗文集叙录》，有五十多万字。

李怀宇：中国传统是文史不分家。

葛兆光：对。我个人的兴趣还是偏重历史。我在大学和硕士期间的主要兴趣是中国史学史，所以那时我发表的文章大都是史学的。大学期间最早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是讲东晋西晋时候的历史学文章，不过，在《文学遗产》也发表过文学的论文。

李怀宇：写《中国思想史》这样大部头的著作之前，你做了很多的积累？

葛兆光：因为我最早做过禅宗，后来又做过道教，所以，有人认为我既然做了佛教史、道教史，对写《中国思想史》很有用。因为过去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大概处理佛教和道教的部分会比较困难，比如说，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里面，佛教、道教比较弱，胡适就在英文书评中批评过这一点。因为佛教、道教是中国思想史里面比较难以处理的。所以，我在写作两卷本思想史之前，一直在准备资料。

李怀宇：你的《中国思想史》有什么特色？

葛兆光：我不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如果让我自己评价的话，第一，我是“破”较多而“立”还不够。之前的很多《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模式。这些模式有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有西洋哲学史的框架带来的模式问题，也有资料上陈旧的问题。那么，我的思想史，至少改变了过去固定的思想史模式。第二，我自认为文献做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我是文献专业出身，又比较看重扩大思想史的范围，所以我在《中国思想史》里面用了别的思想史和哲学史里不用的一些东西。第三，我的思想史有一套较新的写作方法，包括像章节的设置、选材。当然，《中国思想史》提出了很多问题，至于这些问题解决没解决，我自己不敢说，也许我提出的理想也没有做到，但是，我的作用可能是把原来固定的东西打散了。本来是很平静的领域，“吹皱一池春水”是我的作用。说老实话，在我之前的思想史、哲学史，既定模式是非常强的。历史是一个被既定的脉络，就像一个辫子，过去的辫子就是这样，你拧紧了，大家都只好反复梳这一根辫子。现在，我把它打回披头散发的状况，再重新编辫子，就是重新脉络化，你就可以按照你的理解来重新写。所以，我的作用就是想为以后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去掉脉络化，去掉熟悉化。

李怀宇：中国画往往是陈陈相因，老师的技法，徒弟不断地传承。很多中国思想史的写法也都是陈陈相因？

葛兆光：是。从最早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到

最晚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你可以看得出选的人、选的书大概差不多，它们评价的高、低也都差不多，主脉络也都差不多。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从隋代的王通到中唐的韩愈，这中间的思想史，除了佛教以外没有其他的，为什么会这样？到宋代，从“宋初三先生”到程颐、程颢、张载、周敦颐、朱熹、陆九渊、陈亮，大概就是这个脉络，为什么会这样？可是事实上，我们想一想就能够打破这个固定模式，比如说“宋初三先生”好像是宋代思想史的开端，可是不对呀，他们活动的时候，宋王朝已经成立八十年了，那前八十年就没思想吗？其实，这只是一个儒家叙事的脉络，难道只有这些人加上王安石，别人都不带思想，就他们几个人有思想吗？你看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当他把朱熹还原到历史语境中之后，那个历史就丰富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那个原本拧得很紧的辫子解开，先变成原生态的披头散发状态，那么，后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史理解，梳它五个辫子或者是梳它六个辫子，或者梳两个辫子，这就好办了。可是，要是这个辫子不解开，永远就只能限制在里面。

李怀宇：中国思想史上，要解决佛教的问题，恐怕是非常复杂的。

葛兆光：佛教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老师对我们讲，两个东西你不要去搞：一个是佛学，一个是《红楼梦》。当然，说《红楼梦》是开玩笑，因为红学一搞就从《红楼梦》搞到曹雪芹，从曹雪

芹搞到曹雪芹他爸、他爷爷，有人画漫画就讽刺，那是数曹雪芹的头发有几根，搞来搞去，越搞越乱，无底洞。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无底洞，佛学是非常难的。我经常声明，我不是做佛教的，我只是做佛教史，而且只是做佛教史里面跟中国有关的禅宗史。因为真要做佛教，马上就碰到很多问题。比如说，佛教是由印度通过中亚传来的，成为世界性宗教，那它有各种活语言和死语言的问题。佛教有藏传佛教，有东传的日本佛教，有朝鲜佛教，有南传佛教，复杂得不得了。而且，佛教义理细密得不得了，佛教论述非常繁琐复杂，那是一个专门知识领域。但是，我只是涉及跟中国有关的，主要是禅宗，而且禅宗也只涉及它的历史，甚至不很着重谈义理。这样就好一点儿，以前俞大维讲，陈寅恪对佛教思想根本没有兴趣，但并不妨碍他做佛教历史。我也一样。

李怀宇：在美国华人学界，现在我们能想到的杰出人物，好像都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像余英时先生、张灏先生都是很突出的。

葛兆光：这里面有一些历史原因。余英时先生、张灏先生、林毓生先生，他们三位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在台湾掀起过非常大的思想波澜。余英时先生当年写讨论“反智论”的文章，就在台湾轰动得不得了，这是因为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解严，他从学术出发，辐射到政治，实际上那是一个有强大暗示性的学术表达。在那个时代给台湾的思想世界带来了一个很大冲击，不只是思想史，是给整个思想界都带来了很大冲击。所以，台湾后

来包括史语所在内，有好多学者追随这几位先生，形成了一个思想史研究的潮流。包括黄进兴、王汎森等等，他们都是跟着余英时、林毓生、张灏等先生走的。如果说，那时候思想史研究不是带有一种用余先生的话说是“对政治远距离的关怀”，影响力不会那么大。当然，这跟几位先生的个人魅力、文章风格、思考的深刻程度都有关系。这使得很多人聚焦在思想史上，所以，你在美国华人学界会比较突出地看到余先生、张先生、林先生等人的成就。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放开眼界来看，美国的华人学者里面还有一些很出色的学者，不完全是做思想史的。就以最近去世的何炳棣先生来说，不管何先生政治立场如何，学界对他的学术成就还是很佩服的。他做社会史、经济史，把社会科学引入历史，在欧美第一流刊物上发表，在西方入室操戈，很了不起。他到了老年才说要研究思想史，也许是因为他很讨厌新儒家，要对他们猛批一通，颠覆他们的思想史叙述，所以才说晚年做思想史是“画龙点睛”。当然，华人学者在美国研究中国思想史取得的成就大，也是因为洋人学者都尽量避免做特别大的题目，所以，很少有人能够对整体的中国思想史或者一个大时代的中国思想史，有这么大的判断。可是话说回来，西方学者像列文森、史华慈、葛瑞汉，他们也做思想史，也有精彩的论述。后来不再重视思想史的变化，是跟美国中国学界潮流变化有关的，很长时间里面，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占了美国学术界主流，思想史反而比较难做。所以，思想史研究领域华人学者比较能够引领风骚，特别是在中文

学术世界产生影响，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李怀宇：你觉得思想史难做的关键是在什么地方？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难做，不仅是因为处理的材料非常广泛，而且要用穿透纸背的方法去分析材料，要看到史料背后的动机、观念，这些东西可能不是在字面上找到。在阅读和理解中国文献材料的时候，华人学者肯定有一定优势。另外，思想史处理的时段要比较长，做一个小小的个案，作为典范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不够。如果做长时段或者说大范围的东西，一般西方学者受到非常严格的西式学术训练，不会贸然处理这些东西。现在西方学者做的东西越来越具体，所以，很少有人像余英时先生那样，“从尧到毛”，通代都弄下来。整体说来，西方对思想史的兴趣确实已经过去了，西方思想史研究衰落得很厉害。但是在中国，因为思想史跟当代的思想政治关怀还有密切联系，所以它仍然兴盛而且有影响力。我2010年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客座的时候，在那里讲的第一个题目，就是思想史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现在还很重要，而在西方已经不重要。在西方，新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都比思想史热闹，但是在中国，思想史还是很重要。

李怀宇：你认为跟政治的关系使得中国思想史显得重要？

葛兆光：当然。跟政治关怀，跟中国人习惯把一切问题的根源归结到思想文化是有关系的。中国人不赞成老讨论那个“器”，当然要讨论那个“道”才行。所以，林毓生先生有一个判断就是：中国人习惯把所有问题的症结，

都归结到思想文化。这就是中国人特别关心“体”是什么、“用”是什么，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体”是很重要的，“体”就是“道”。什么是道呢？思想就是道。

李怀宇：在《宅兹中国》里，你写的问题看起来非常宏大，但是用了很多具体的案例来分析这些问题，当初的思想起源是什么？

葛兆光：写《宅兹中国》有一些原因，我写《中国思想史》到最后一章叫作《1895年的中国》。

李怀宇：张灏先生认为1895年很重要，是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关键年份。

葛兆光：我跟张灏先生的意见完全一样。我们都认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关键年头，并不在1840年，而是在1895年。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观念被真正触动，觉得不变不行，而且非大变不可，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不是被英国、法国这些西方“列强”打败，而是被日本这个过去的“岛夷”打败，中国才会被真正触动。从这个时候起，中国被拖入一个更大的世界里面，中国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中国。我本来的计划里面，是准备要写第三卷的，第三卷里写1895到1989年。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的“20世纪”，20世纪提前在1895年开始，提前在1989年结束，这是一个完整的时段。后来发现没法写，资料太多，我也没这个能力。因为我的专业毕竟是偏向古代的，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但是，写到第二卷最后的时候，我在欧洲访问，在那里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当中国1895年不得不进入亚洲、进入世界，已经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自我完整的天下帝

国，那么，这个时候，中国怎样反过来重新界定自己？中国的疆域、民族、国家的定位到底应该怎么样？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20世纪的中国，有三个思想潮流是很重要的，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当然还有一个是也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这几个主义在互相角力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怎么样重新建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怎么样融入世界，并跟世界平等相处？由于传统中国有一个朝贡圈的历史，因此还有怎么样重新跟周边妥善相处的问题。所以，重新界定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一直觉得中国这个国家是非常特殊的，它跟欧洲不一样。欧洲那些国家是14、15世纪以后逐渐形成语言、民族、文化重叠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从秦汉的时候就是一个国家，可是这国家变来变去，一会大，一会小，到了清代甚至把满、蒙、回、藏、苗都给整编进来了，就形成一个非常特别的庞大的共同体。这共同体怎么样包容不同民族，怎么样界定自己是有限国家而不是无限帝国，这些问题很复杂。所以，我写完《中国思想史》以后，觉得没有能力去处理第三卷了，我就开始看一些跟中国有关的周边的文献，像日本、朝鲜的东西，看着看着就产生了一些想法，包括我们现在提倡的“从周边看中国”。从2001年到现在，我一直在琢磨所谓亚洲或者东亚的一些问题。这就是我写《宅兹中国》的一个背景。特别是，我觉得现代中国仍然是天下帝国和现代国家在观念上纠缠在一起的国家，也就是说，在有限的国家范围，却又有无限帝国的梦想，

一会好像是世界中心了，一会好像觉得世界有一个美国老大帝国也蛮不高兴的。这些问题除了现在政治学的解释以外，有没有一个思想和历史的解释？中国现在困境很多，周边在12、13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在意识上自尊，自我中心化，所以日本、朝鲜和越南等都和我们面和心不和，开始瓦解我们这个想象的“天下”。到了明代，更远的西洋人来了，中国被抛进一个新的大世界里面，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也是一个大困难。到了清代，藏、回、蒙、满、苗、彝都在中国里面，认同问题怎么办，文化怎么样共处，多民族国家怎样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在过去欧洲人的观念里面，多民族是不可能成为国家的，认同建立不起来呀，比如说，比利时北边是讲弗莱芒语就是荷兰语的，南边是讲法语的，东边还有一小块讲德语的，于是，关于认同和国家问题就闹得不可开交。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里面，要从传统帝国转型为现代国家，确实是挺麻烦的事情。所以，国家、疆域、民族、文化认同很重要，我写《宅兹中国》，想从历史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有很多人的想法是想当然的，中国就是中国，甚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然所辖那么宽，那么，自古以来这些地方都应该是中国领土，各个民族自古以来就归入中华民族。可是，现在我们面临很多问题，包括南海问题、东海钓鱼岛问题、东北（高句丽）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等。现实的这些问题，在我看来也是历史问题。因为我是做历史的，我只有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别的我不管。我把历史讲清楚，然后怎么办，再

由别人来说。这就是余英时先生讲的“遥远的关怀”，而不是我说的“近身肉搏”。《宅兹中国》是我十年来陆续写的，里面包括跟日本学者的论战。日本人认为，有一个“亚洲”或者“东亚”，可以建立一个文化共同体，我们国内有些人也跟着瞎起哄，好像亚洲共同体或者东亚共同体，可以跟欧洲共同体、跟西方世界并峙或对抗，好像我们东亚可以把欧洲作为“他者”。《宅兹中国》这本书尽管现在国外也很注意，但是说老实话，我还是写给国内人看的，包括我对海外一些中国学论著的评价，其实更重要的，都是针对国内学界的。

李怀宇：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提出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中国在晚清经历了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用现代话说是全球化的浪潮，对天朝上国的心理打击也好、影响也好，产生的变局会不会越来越大？

葛兆光：梁启超说的那个三阶段，他是指中国不断地被放在更大的世界里面。其实，梁启超这个讲法比较有现代性，他是说，中国过去是一个封闭的中国，慢慢地，要跟亚洲的国家打交道，所以是亚洲的中国，最后，一定要开放面向全世界，是世界的中国。我觉得，梁启超这个说法大体上没有错，但也可以反过来说，从观念史的角度，中国人在古代是“世界的中国”，它认为自己就是世界，我就是天下；到了宋元以后，才慢慢意识到周边还有这么多地方，才慢慢地变成“亚洲的中国”；到了现在，应该了解“中国之中国”，就是说它是一个有限的（多）民族

国家。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对不对？近三十年来，很抱歉我非常不喜欢用“崛起”这个词，我更愿意说，中国在不断地“膨胀”，刺激得有些人观念也膨胀了，就觉得中国现在也应该成为世界里的大中国，这跟梁启超的意思是不同的。很多人提出，当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就应该拿出大国的东西来。这个说法表面上看来是有理的，但很容易背后隐藏着一个很强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现在有些人提倡“天下主义”，想重新把过去的“天下体系”端出来。有些学界朋友说，现在全球化的世界体系是在美国主导下的世界体系，所以要提倡传统中国的“天下体系”，可是，天下体系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中心的，这中心就是我天朝，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天下主义表面上看是世界主义，实际上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它有可能把旧资源拿出来，重新包装成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也有人认为，中国现在了不得了，所以应该拿出影响世界的价值观，要弄形象工程搞文化输出，这和政府满世界到处建孔子学院很合拍。其实，当一个文化是好东西的时候，它自然会走出去，问题是要拿得出好的文化。我很不喜欢提“大国”这个词，中国内部问题很多，所以，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建造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多）民族国家，不要急于在世界上膨胀；先把自己现代的、民主的、有限的国民国家搞好，让人民对这个国家有信心。何况我们内部的满、蒙、回、藏、苗，还有一个台湾到底怎么处理，都需要思考，对不对？现在连自己的事情还没处理好，如果迅速地膨胀，很容易被人联想像大秦帝国，或

者像一个蒙元帝国。所以，我不赞成去简单地提“天下主义”，中国是应该有中国独特的文化和价值，但现阶段，还是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弄好点再说。现在的中国，无论是政府也好，学界也好，传统帝国时代的天下观念还存在，就是这个帝国或者说文化共同体是没有边界的，还是希望能够蔓延膨胀开来，还是希望能够仍然是老大帝国，总是觉得有限的民族国家好像不怎么过瘾，这是一种受压迫受欺负之后的反弹。当然，在文化上我们都认同中国文化，但我不赞成简单地把文化认同跟政治认同重叠起来。我一再强调政府不是国家，国家不是祖国。政府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常常假借国家的名义，让人们无条件拥护。按照以前的看法，有人到美国成为美国公民，那么他就不爱国。可是，你看到很多入了美国籍、入了欧洲国籍的人，一旦中国跟外国发生什么纠纷，包括体育比赛，他还是站在中国立场上的。而且，当他们觉得自己在异文化的压力下，常常更凸显自己的文化立场，所以，我看那些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好像比我们在国内的人还要厉害。国家只是一个现实的合法的疆域空间，不要简单地把它当作文化意义上的祖国，祖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文化概念。所以，以前有句名言说，流亡的人有可能没有国家，但是也可能有两个祖国。我写《宅兹中国》就提醒说，不要简单地把政府当国家，把国家当祖国。

李怀宇：在明代，传教士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提出“无处非中”，是否超前于那个时代？

葛兆光：16世纪甚至更早，实际上不少中国人知道

地球是一个球形了，这跟回回人、西洋人的知识传入中国有关系。到了晚明，利玛窦根据欧洲人的世界地图，在中国绘制了第一幅现代的世界地图。到了清代，大家也都更加清楚世界图像，连《四库全书》都收了新式的世界地图。大家都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中国没那么大，中国也不一定就在中间。当然西洋传教士像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还是把中国画在中间的。利玛窦日记里面也提到，我把它画在中间，让中国人不要生气。如果按照欧洲的画法，欧洲应该是在中间，亚洲和美洲各在一边。但利玛窦为了让中国皇帝和官员、士大夫接受，就把中国画中间。这就是传教士的适应策略。当然，那时候也有中国士大夫反感，你把中国那纵横万里的地方，就画那么一点点，是胡说八道。但也有很多人接受了新知识新观念，艾儒略写《职方外纪》的时候，像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这些人已经接受了。到了清代，除了像杨光先那种人以外，其实有很多人也都接受了。

李怀宇：但是好像历史进程非常缓慢，后来的天朝上国有许多人依然相信自己就在世界的中心。

葛兆光：历史又不是个机器，也不可能要它那么快。尤其是知识虽然变化快，观念变化是很慢的，所以，我在思想史里面一再强调观念变化与知识进展不同，有可能很慢。这个我们接受法国年鉴学派的说法，法国年鉴学派认为，皇帝、王朝的变更是短时段，经济、社会、政治的变化是中时段，自然、环境、地理的变化是长时段，非常缓慢。我稍微把它改一下，思想史上也有长时段，也有中时

段，也有短时段。有的时代，知识更新变化可能很快，精英思想的变化也可能很快，但是，观念尤其是一般思想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

李怀宇：黄进兴先生的博士论文写《18世纪中国的哲学、考据学和政治：李绂和清代陆王学派》，他说：李绂是清代陆王学派最重要的人，但没有人做，很隐讳，是一个次要的思想家；因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个大时代的气候。因为第一流的思想家、学者往往超越那个时代，走在前面，要谈朱熹、王阳明反映了当时的什么，很难。但李绂更能反映当时学术的气氛。

葛兆光：天才总是超越时代的。可是天才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或者说是最能够影响一般人思想的。所以，我的思想史里面被人抨击最多的是要写一般知识、思想的信仰和世界。我经常开玩笑说，你要了解现在的中国，别找我们这些大学里的人，一定是大众喜欢看的、报摊上畅销的娱乐、八卦杂志，那才是社会主流。

那么，精英思想怎样才能变成大众思想呢？它一定是通过三个途径。第一个是制度化。宋代程颐、程颢、朱熹是精英，他们的思想要通过皇帝颁发诏令，通过科举考试，然后变成制度，才能变成一般人的想法。如果没有宋理宗以后一直到明太祖的制度化，宋代儒家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生活世界的主流，那么深入人心，成为被一般人接受的价值观。第二个是常识化。要变成常识，就要通过教育，私塾、学校、书院、太学，加上考试。从小要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这么

一念，大家就都慢慢接受了，说人性都是善的。《三字经》读完了，《千字文》读完了，就要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慢慢地，耳濡目染，一般的民众都接受了，变成常识了，日用而不知就是常识，那就变成“与生俱来”的东西，这时候，精英思想才真正地落实到民众生活。第三个是风俗化。比如说祠堂里面去祭祀跪拜，左昭右穆，男内女外，按照辈分，祭祀恭敬祖先，墓地怎么样安排，年节要拜拜，慢慢变成风俗，风俗里的观念就渐渐渗透人心。通过这三个途径，精英的思想才能变成民众的思想。所以，我觉得黄进兴讲的是对的，宋代朱熹是天才，明代王阳明也是天才，但是不能完全把思想史说成是精英的，这些人是思想史，别人就不是思想史。除了精英的思想史以外，还有一般的缓缓流动的思想，但那是大潮流。写现在的社会思想，也要看到什么是时尚，其实时尚也是一个大潮流，只不过时尚潮流是乱的，思想潮流是可以找到脉络的。比如说，你写现代思想史，要是了解微博是写不出来的。

李怀宇：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后，有很多新的媒体出现，电视、手机、网络快速发展，学术史、思想史会不会成为越来越小众的东西？

葛兆光：学术研究历来都是小众的。我不相信我们写的这些东西会有多少人看，肯定比不过六六的《蜗居》，一个电视剧满大街人都知道。姚晨的微博，据说几个大报都抵不过。学术肯定是小众的，但是小众的东西，如果有对这个社会的关怀，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转化作思想资源

来用的。所以，我一直觉得，专业学者不必断然拒绝媒体或者新传媒工具，我也不反对有些学者能上电视去宣讲。只是担心，现在中国传媒的意识形态性、强迫性太厉害，会扭曲一些东西；何况媒体又有市场化的一面，它可能会借着“喜闻乐见”的旗号把学术庸俗化。学术通俗化和学术庸俗化是两回事，学术通俗化是学术用通俗方式传达给更多的人，使它成为思想的一种基础和来源；学术庸俗化是为了迎合读者或听众，把学术变成买椟还珠的珠，为取悦大众而成为娱乐。我觉得，一方面要怪我们学者不会通俗地讲学术，但另一方面，你也要警惕这个市场太可怕。你看于丹讲《论语》的书卖五六百万本，可是李零的《丧家狗》讲《论语》在学术上好太多了，也不过几万本。

李怀宇：现在有所谓专业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分别，事实上，中国读书人自古都是关怀天下、议论天下，界线没有分得那么清楚。现在这种分法是不是受到学术体制的影响？

葛兆光：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所谓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性现象。现在的学科划分更细了，越来越技术化、专业化，使得一部分人为了谋生，学术作为一个职业，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可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对社会上各种事情发言。理想状况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但都有余英时先生所说的“遥远的兴趣”。最好的状态是既能区分专业研究和公共话题，同时又能够用专业研究支持公共话题的公信力。我对公共知识分子都很尊重，但问题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公信力和讲话的权威性从

哪里来？如果你不是教授，如果你不是一个有专业的人，为什么人家要相信你的话？所以我想，理想的状况是两者都要结合，但两者又有理性的界线。当你谈论专业的时候，不要把那些外面的东西掺进去，但是你要能够用你的专业来支持公共话题，那是最好不过。

李怀宇：我印象非常深的是金耀基先生的《海德堡语丝》里写到韦伯，说韦伯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热性的政治世界，一个是冷性的学术世界。他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对学术之真诚与承诺，一个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的绝望的呼吁。

葛兆光：如果是一个正常、开放的舆论环境，一个学者有能力两边都做。像美国的乔姆斯基，是MIT的教授，是极好的语言学家，也是一个积极的公共领域发言者。但是，在中国就有一个麻烦，因为中国的社会问题比较多，社会话题需要人去讲，所以一个人一旦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以后，很难安下心来再做自己的专业，也很难选择可以讲的话题。我现在看到我们的很多朋友，好像都很难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专业研究，而且，他的专业研究好像跟公共话题有点脱节。我觉得两者还是有关联比较好，这样，你说话的可信度就更高一点。

李怀宇：但是慢慢地，好像中国学界很多人都有这种界线，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葛兆光：现在中国的舆论环境是这样的，压力很大。一个人一旦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发言，所有的人都要求他不断地发言：医患关系你也得讲，税收问题你也得讲，治安

问题你也得讲。我们看，有多少人什么都懂啊？可一旦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报社、电视台会着急忙慌地对他进行访问，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你对那个问题怎么看？我也曾碰到这种事情，我就说，这个问题我不懂。比如说，你要我讲税收问题，我就真不懂。经济现在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这个问题我也不懂，因为我不能凭感觉，我拿不出证据来。所以，我希望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有自己的专业背景在支持他的公共话题，而专业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应该有对公共话题的关切能力。现在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太公共了，有些专业知识分子又太专业了。这个是在象牙塔里，那个是在广场上，为什么象牙塔里的人不能伸出头去看看广场，广场的人为什么不能够静下心来回到象牙塔去坐一坐呢？所以，有时候我真佩服余英时先生，他那么大年纪，一旦要研究学术，就坐在那里进入思考和写作，定力好极了。可是，他也经常发言，谈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甚至政治问题。我跟他聊天，就觉得他的重心当然是在学术研究，可是像他那样在这么多关注目光下的学者，仍然能静下心来坐在树林里深思和写作，这是真了不起的。可是，我们很多朋友一旦破门而出，就不再回到那门里头去了，好像学术生涯就到此为止了。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成天在广场，所以还是借着学术研究说两句话，比较好一点。

李怀宇：从求学至今，你所经历的时代，是不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

葛兆光：我是1950年生的，“文革”的时候我已经

成人了，已经十六岁了。这六十多年，我当过知青，当过工人，也当过学生和教师，走过很多地方，也到过不少国家，看到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变得非常快。在眼花缭乱的变化中间，我的所见所闻、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对我理解中国现状来说非常重要。比如说，如果有人要说“文革”还有可取的地方，我绝不会接受的，这是因为我在“文革”那十年里面，经历过很可怕的岁月，从很多历史资料里面，我也认识到那个时代是很可怕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活生生地跟自己的生活经验脱节，把那一段原本是亲历的历史变成一个抽象的文本，会说“文革”时代人人平等，道不拾遗，夜不闭户，那我绝不能赞成。又比如说，我也经历过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整个中国的变化，确实，市场化速度加快了，带来很多问题。但我绝不会认为问题都要归咎于这个市场化进程，不会认为全球化就是一个坏东西，因为我们能体会到中国的变化，改革、开放、全球化，你不能够完全否定变化的意义。现在时髦的是，对全球化、现代性进行批判，好像万恶之源就在这里，那我不赞成，因为我亲历历史，见过沧桑。我理解全球化带来很多新问题，但我要强调全球化也是一个文明过程，尽管它会损伤文化遗存，但你必须得接受它，在接受适应中，小心翼翼地保护特别的文化传统。所以，对于历史的理解，我们在这时代有很多经验，我们不可能隔断或者舍弃这个经验，这种经验很重要。比如我跟美国学者讨论当代中国，美国学者因为远离中国，这六十年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些资料、一些文献而已，跟

我们的看法就会有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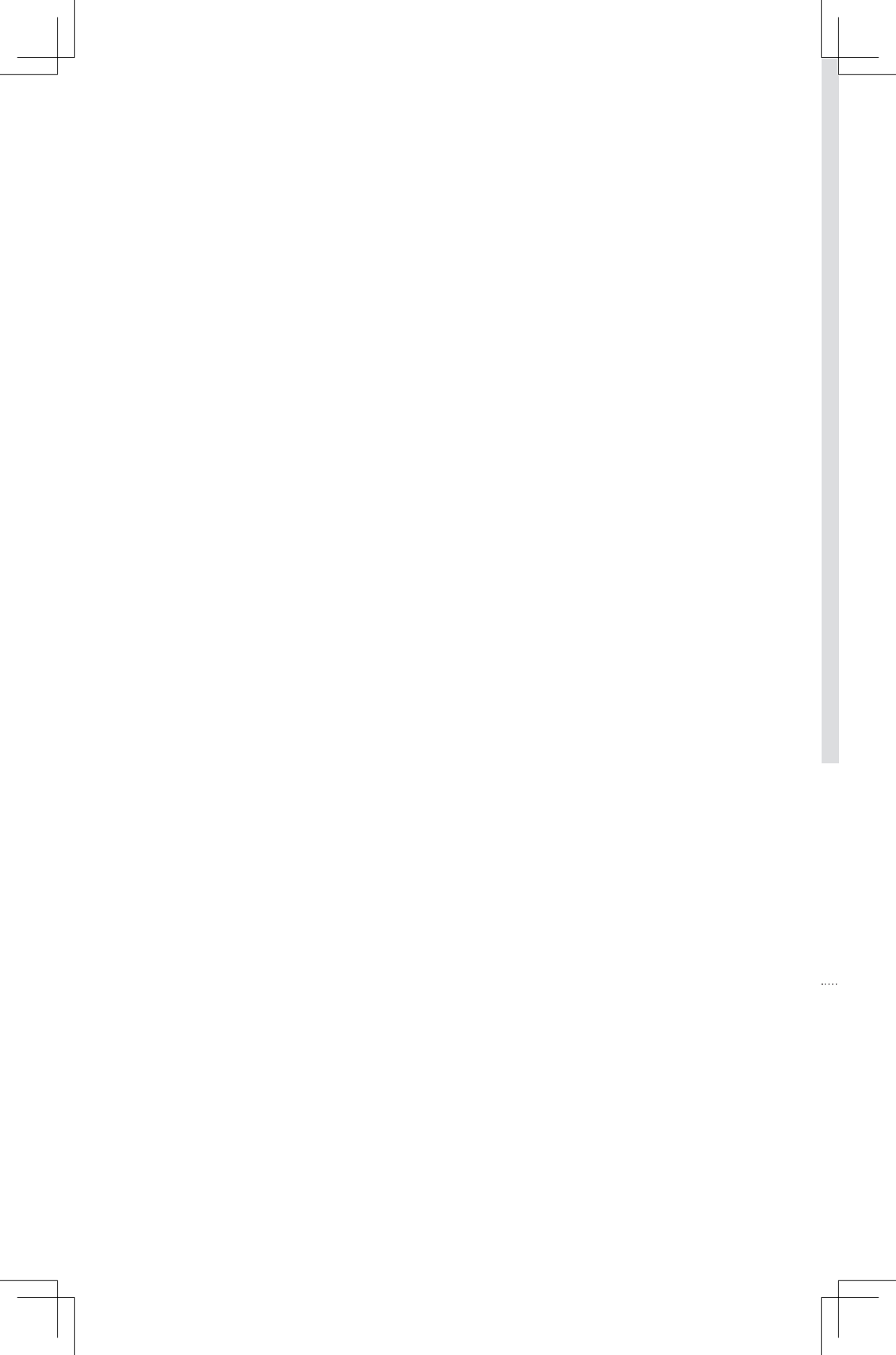
李怀宇：这种亲身经历会不会投注到你自己的研究里面？

葛兆光：肯定会有，即使再理性也避免不了。比如说，我在苗族地区生活过，我对少数民族有自己的了解。我在贵州生活了十七年，那个地方不是中心，改土归流虽然很久了，但文化与中原相比仍然有特别的地方，所以我对民族、边缘、特殊性会有关心。我对边缘的关心也会带到我的研究里面。我对主流文化传统的修正性叙述，也跟我长期在边缘生活有关。举个例子吧，我们现在研究思想史的人，很多人都强调儒家这个脉络，儒家变成了中国思想史的绝对主流，可是我不会这样看，一方面缘于我对佛教、道教做过研究，另一方面缘于我在贵州苗族地区生活过很长时间。我知道，儒家传统并不是笼罩一切的。高行健写《灵山》，把边缘的、民族的、佛教、道教的东西写进去，重新展示一个另类中国文化图像，我很能理解他的想法。

李怀宇：学者如果身处在变动的大时代，将切身经历甚至是切肤之痛写入自己的研究里面，往往另有一番深刻的见解。我最近在看萨义德的回忆录《格格不入》，他远离自己的祖国，到了美国就有所谓“格格不入”的感觉，他在美国独特的心灵体验，使得他的研究跟别人的论述会有不同。

葛兆光：当然，萨义德是巴勒斯坦人。他有一个想象的历史中的祖国，有一个现实的非常艰难的巴勒斯坦国，

但是他又生活在支持犹太人的美国，还在主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他的心灵中当然有很多纠缠的问题。所以，他的《东方主义》这本书，实际上跟他个人的处境、个人的关怀都有很大关系。如果他不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可能不会意识到那种强势文化对异文化的塑造、扭曲和想象是多么厉害。同样的道理，现在好几个中国人熟悉的后现代理论家，都来自印度、伊朗，比如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这种经验使他们特别容易亲近后殖民理论，跟他们的经验、跟他们对“根”的想象有很大关系。个人经验当然会带到学术里面去，所以，我从来不说人文学术是人文科学，而是说人文学科，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是有各自立场、有文化背景、有观察角度的。尽管我们强调应该有普遍共识，有世界性的共同知识，应该有一个共通的学术尺度和价值标准，彼此能够沟通，但是，我们也不否认这种个别经验有时候是很有用的，正是因为众声喧哗，才能够很好地构成一个人文学术世界。





周振鶴

求真是学术的生命

周振鹤

1941年生于厦门。1958至1963年就读于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矿冶系；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著有《方言与中国文化》（合著）、《西汉政区地理》、《体国经野之道》、《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长水声闻》、《随无涯之旅》、《余事若觉》、《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等，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等。

周振鹤教授有几万册藏书。他有一套房子不住人，专门放书，在复旦大学的研究室也是到处都放着书。“读书是一种过日子的方式，就跟我喜欢买书是一种行为艺术一样。”他说，“很多人说：你这些书看得完吗？其实书是肯定看不完的，但是你看着喜欢，就想买，买了即使看一点都是好的，以后你可能想起其他事，用心查这些东西，就会记得在哪一本书看到过，再拿来对照一下。一个人一辈子如果不读书，好像生活不完整一样。一天二十四小时过去，要吃饭、睡觉、工作，还得有其他的消遣，读书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到现在还是喜欢读纸质的书，电子版的书只用来查，不用来读。读书是好玩的事，做学问也是，你要不觉得好玩，就没劲了。”

1941年，周振鹤在厦门鼓浪屿出生。他的母亲是厦门人，父亲是无锡人。在中学时，周振鹤每天上午上完课，下午的课很少，中午在学校里吃完饭就把作业做完，到一点多钟就玩去了，或者捧着一本小说看。到中学结束时，他已将中外的重要古典名著都差不多看了。周振鹤说：“中学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现在的中学生没有时间看书，不停在做那些没完没了的题目，并不是为了提升智力，而是为了竞争，为了考进好的学校。所以中国的学生

跟外国的学生是相反的，外国的高中可能很轻松，到大学是拼命的。中国高中是拼命的，到大学里头就睡觉。我觉得这种教育完全是颠倒的。”

1958年，周振鹤参加高考时，正值反右之后，父亲已被划为右派，而且成分不好，因此只能被录取在比较艰苦的矿冶系采矿专业（实际上是采煤专业）。当时并不依高考成绩定录取，而是根据所毕业中学上报的适宜录取（其中还分宜录取机密专业或一般专业分档）、不宜录取的学生名单来决定取舍。其时又逢“大跃进”，福建省历来是输出考生到全国重点大学的生源大省，但当年却留住了许多考生，准备开办一所工科大学。学生招了，但学校还没有影子，所以将这些学生寄读于厦门大学。此前，周振鹤一直对建筑感兴趣，觉得好的建筑就跟好的乐曲一样，能够让人荡气回肠。在厦门大学读了一年半后，矿冶系合并新办的福州大学，他就到福州大学又读了三年半。厦门大学有好几位老师给周振鹤留下深刻的印象：物理学的老师很幽默，到学期结束时说：大家可以对我的课提提意见，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包括老师脖子很长也可以说。有一次周振鹤到图书馆去借书，看到这位物理老师在借外文书，一看却是马克·吐温的原版小说。又有一位俄文老师原来是教英文的，周振鹤到他家去拜访过，看到他家里有一整套第十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便问老师希腊文明史上犬儒学派是什么意思。老师就把《大英百科全书》拿一册下来，边看边将答案告诉了周振鹤。这些小事都让他印象极为深刻。在厦大，他的基础课学得很扎实，高等数学、普

通物理、普通化学的老师都是很强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在理科基础知识方面受益匪浅。

1963年，周振鹤在福州大学毕业，先在湖南马田煤矿待了八年，后到岳阳地区煤矿待了七年。整整十五年里，周振鹤碰到过很多矿难，抬过好几次死人出井，也献过好几次血，因为他的血型是AB型，比较少，需要这个血型就常找他。其实在煤矿里，周振鹤保持了中学与大学时的兴趣，热衷于文史读物，漫无目的地看过许多书。他对外语尤感兴趣，不满足于学校单一的俄语教学，就自学英语和日语。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他可能一辈子就在矿山里做助理工程师，再升工程师，或许有可能做到高级工程师，最后退休赋闲。在岳阳地区煤矿，知识青年招工进来了一位女青年，给周振鹤画工程图，后来两人结婚了。

周振鹤度过了人生当中相对没有亮点的十五年。“工程上有问题的时候找我去解决，没有问题时我没有多少事情可以做，创造性的工作并不多。我觉得对这种生活好像不满足，人到这个世界上一辈子好像也不能白过，总要做一点什么事。先后在两个煤矿里一共待了十五年，证明做不出什么事来，就只能过过日子而已。”1978年，大约是4月份的某一天，三十七岁的周振鹤和太太到一个粮店去买米，看到桌子上的报纸登有关于招考研究生年龄放宽到四十岁的消息，一下子动心了。太太非常支持他去报考。他的父亲经历过反右运动，觉得考文科有点危险，而历史地理专业带有一点自然科学的性质，又是文史类，又跟政治远离，建议他挑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当然，最关

键的还有一点，就是报考这个专业需要考试的专业课是中国通史、中国地理与古汉语，这三门于他有较大的胜算，否则以一个多月的备考时间肯定无法与他人竞争。

周振鹤准备报考时，矿上领导怕他走后没有人来填这个萝卜坑，不让他报考。直到报名的最后期限到了，周振鹤想出一句话：“我是念工科的人，去考文史也未必考得过。”领导听了觉得有道理，终于盖章、签字，岳阳地区的报名截止期已经超过两天了，幸亏招生办还没有把情况汇总到长沙去，报上了名。考完以后，周振鹤一直没有接到复试通知。正感无望之时，突然来了复旦大学的通知，矿上领导悟到大势已去，这个周某人可能会跑掉了，只好赶快打报告要上面再派一个技术人员来。

那一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招的硕士生中，葛剑雄连大学都没有读过，周振鹤则是非专业出身，后来两人都成为谭其骧最早的两个博士生。周振鹤回忆：“现在三十七岁都要当正教授了，我三十七岁才读研究生，回想起来蛮可笑的。但那是一个转折点，以后的读书的方向，就转到历史地理来了。”1986年，周振鹤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游汝杰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出版，首次提出文化语言学的概念，并涉及中日欧语言接触问题。1987年，周振鹤的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出版，正式使用“政区地理”这个概念。近年，周振鹤很大的精力花在修订、主编十三卷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他的老师谭其骧曾编出一套《中国历史地图集》，但是只有图，没有文字说明。他希望将历史上中国行政区划用文字、表格跟地图的

形式充分地表现出来。

周振鹤以历史地理为专业，但兴趣广泛，阅读和研究涉及许多专业。他喜欢旅行、收集地图，对外语与汉学研究也有很大的兴趣。他说：“外文懂得多一点，知道的世界就大一点，好像多开了一扇窗子，对外面的世界就看得更全面一点。西方也好、日本也好，都对中国的文化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所以，我觉得外国人怎么理解中国的学问，很有意思。语言不一样，文字不一样，学术的路径也不一样，整个文化都不一样，他们怎么理解中国文化？因为最终文化是最大的课题。”

李怀宇：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以前听说过谭其骧先生吗？

周振鹤：既没有听说过谭其骧先生，也不知道历史地理是什么专业，不知道是历史还是地理，根本毫无认识。因为我是念工科出身的，纯粹是为了改变现状而考试，我不愿再当这个助理工程师，希望改变一下。当时也没有想到北方人的一句话：“树挪死，人挪活。”结果考试的成绩是葛剑雄跟我两个成绩最好。笔试完以后面试，谭其骧先生是在龙华医院给我们面试的。因为他中了风住院，要面试我们，那我们就要到医院去。我大概面试成绩是最好的，他最满意。

李怀宇：谭其骧先生教书什么样？

周振鹤：谭先生教书其实不像我们现在给博士生那样很正规地上课，所以我不建议对博士生跟对本科生一样的

方式上课，博士生是应该跟老师讨论问题的。学生自己看书，然后有问题提出来跟老师一个礼拜讨论一次。本科生才要正规上课，硕士生都应该以讨论班为主。博士应该能够跟老师一起解决问题。现在的博士生还要上呆板的课，所以我觉得这不大合适。谭先生觉得我们是讨论问题的学生，所以他不拘一格的想法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我们不问文理科，即使从计算机系、化学系转来的学生都接受，基础知识不够，没有关系，可以补的。但是你的聪明不够，那我们就不好接受。因为历史地理真的是需要聪明度比较高的人，光是死记硬背没有用，脑子要活一点。这有点理科性质，历史材料不够，反映在空间架构上，有些东西就要用逻辑思维来建构。我的《西汉政区地理》很多就是用逻辑推理来弥补，因为历史上断掉的链条很多，你要把它接起来，又没有史料，只能根据现有史料进行弥补，以后如果出土的史料有了，你可以再给它改进充实提高。现在很多出土材料，又可以改进我的《西汉政区地理》，但整个框架当时是按逻辑推理推出来的。

逻辑推理很重要。我们历史地理招生就是欢迎理科的人来考，因为理科有很多学生非常聪明。谭先生年轻的时候就转了几个系，到第三个系才是历史系，因为他有兴趣爱好，所以学校应该允许有人转系。我们现在有好些学生念了计算机，本科毕业来考我们的研究生。

李怀宇：何兆武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读了四个系。

周振鹤：是。谭先生是念了三个系。自由选择专业可以使学生受到真正合适的训练，而且符合他的学术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动力。你要没有兴趣，学术就做不好。为了这碗饭才去做研究，没有意思，你必须好奇。致用有时候都不能促进学术的研究，致用是为了一时的用处，拼命去做研究，这样也能出一点成绩，尤其是工科方面，需要是发明之母。但是有时候如果不计功利，而是纯粹从学术的发展去做研究的话，往往到后来有很大的用处。学术方面摆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求真、存实，而不是致用。你如果老是把致用作为最先考虑的动机，对学术发展是不利的。做一个东西，你首先想到有没有用，那这个学术做不好。你首先要想到就是求真存实，这样的学术才能做得好。

李怀宇：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科自来有没有传统？

周振鹤：专门的历史地理没有传统，上世纪30年代以后才形成的这个学科。顾颉刚先生跟他的几位学生，像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这些人努力，慢慢就使这门学科成型了，他们是开山者。但是过去也有一些传统，比如说《汉书·地理志》讲西汉的地理，也追索到汉代以前的地理。现代，如果只研究当前的地理就是地理学，但是追溯到历史时期，要想知道历史时期黄河的河道跟现在的河道有什么差异，这就是历史地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治理黄河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古代治理黄河泛滥、缺口、改道，就要了解黄河是怎样变迁的。实际生活当中，一定会碰到历史地理问题的。但是一直没有形成一门专门学科，要到30年代以后，慢慢就形成一个历史地理学科。过去传统的只是沿革地理。沿是不

变，革是变化。疆域政区的变化，秦朝、汉朝、唐朝的疆域有伸有缩，是变迁的。行政区划也是变迁的，比如说秦代分三十六郡，到汉代分一百零三个郡国，行政区划是有变迁的。过去就已注意到疆域怎么变化，行政区划怎么变化，还有人口数量也有增减，人口分布也有稀密的地域差异。但是到30年代以后才上升到了科学，因为西方有historical geography这个学科名称，顾颉刚先生跟谭其骧先生一起编《禹贡》半月刊，英文名字就用了historical geography，就是历史地理。

到现在历史地理这个学科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相对完善了，但还是在不断完善过程中。中国历史地理可能在世界历史地理当中现在有一席之地了，研究成果很多。但是跟外国的历史地理理论、研究对象方面相比，并不见得完全一致。因为历史地理就是在国外也不像历史学那样是一个古老的学科，历史学当然在东方、西方都是很古老的，那么历史地理相对要比历史学新一些。研究地理，如果不看历史时期的地理变化，对现在的地理研究也不会研究得很透彻。我们国家的历史地理的从业人员，当然还是数量少。复旦有一个单位，是谭其骧先生带头；北大有一个单位，是侯仁之先生带头；陕西师大是史念海先生带头。但是学科前景是很好的，只是我们现在还不是非常重视。

李怀宇：顾颉刚先生提出古史辨运动，推翻了原来一些历史的定论，当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周振鹤：我觉得顾颉刚先生闻名了以后，他过去提的

那些东西不一定全都正确，但是他的历史作用是永远存在的，是抹杀不了的。因为当时提出了古史辨运动，实际上就把对历史的认识再往前推进。尽信书等于无书，人是要有怀疑精神的，搞学术没有怀疑精神怎么搞，所以应当于不疑处有疑，这是正常的。疑错了都没关系，不疑倒是有关系。疑错了，别人还可以给你纠正；总是因循前人的说法，那么学术怎么进步呢？所以，我觉得古史辨运动推动了历史学前进，现在有人认为它的某些怀疑有问题，但即使如此，古史辨运动也仍然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李怀宇：顾颉刚跟鲁迅的论辩是怎么回事？

周振鹤：鲁迅嘲讽了他一下吧。顾颉刚的意思是“禹”字中间是一个虫字的结构，他说大禹原来也是一条虫，不是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人物。这个思路也是疑古的中心思想，主张中国古史是层累形成的，说上古的尧舜禹是不存在的。这叫尧舜抹杀论。日本人也有提出来，所以有人说他这个概念是抄日本人的。不管他是不是抄日本人的，他在中国掀起一个疑古的运动，对解放思想是有好处的。

李怀宇：鲁迅对顾颉刚的嘲讽，有什么影响？

周振鹤：鲁迅也是有学问的人，他说要是这样，你是姓顾，应该叫你乌头先生。凡是被鲁迅嘲笑过的人，更不要说骂过，在解放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只有一个人——李四光例外，李四光也是被鲁迅嘲笑过的，我注意到这个人没有受到影响。凡是被鲁迅点过名字的，解放后都不大好过，因为毛是对鲁迅的这种批判精神很欣赏的。

李怀宇：顾颉刚与傅斯年的关系也很微妙。

周振鹤：两个人都是胡适的学生兼朋友，亦师亦友的关系。但傅与顾有点亦敌亦友的味道。傅斯年说顾：看来你都要做学术界的王了，如何如何。在他们前面，像梁启超那些人，都是很了不起的人。他们学术上又能做得非常好，但是一天麻将都还要搓几圈，梁启超曾说唯有读书才能忘记麻将，唯有麻将才能忘记读书。他给人家写序，把序写成了一本书，只有梁启超那样的人才有这样的本事，那种人都是不世出的人。像顾先生也是这样的人，每天不知道要做多少事，要回多少信，看多少书，做多少读书笔记；还要见很多学生，要上课，自己写著作。不知道他们一天的时间怎么安排的，都是厉害得不得了的人。

李怀宇：在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领域里，几个杰出的人物像谭其骧先生、史念海先生、侯仁之先生都是顾颉刚先生的门生。

周振鹤：对于培养人才，顾先生做了很大的贡献。像童书业先生也是没有念过什么大学的，也被提携了，变成大学者。童书业先生是很聪明的人，什么方面都可以谈论一下，历史地理也能谈一下，美术方面也能谈。这都是顾先生不拘一格提拔的人才，所以这些人都很佩服顾先生，当然学术上也跟顾先生有商榷。

李怀宇：傅斯年开创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传统，对历史地理研究又有什么影响？

周振鹤：他们好像并没有像谭先生、侯先生、史先生那样的历史地理。傅斯年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动手动脚找东西，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他

主要是提倡这样的史学风气。历史本来就是无用之用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凸显的是科学性质。我觉得傅斯年是要把历史当科学来弄。过去历史学总是被看成人文的东西，不看成科学的东西，傅斯年可能是受科学主义的影响。

李怀宇：傅斯年与顾颉刚非常有意思，都有开创性的研究，后来一个去了台湾，一个留在大陆。如果有人好好去研究两人的关系，也会是有意思的事。

周振鹤：傅斯年研究已经蛮多了，尤其王汎森专门搞傅斯年研究，写了一些书。我觉得对顾颉刚先生的研究倒是还不够，稍微偏向表面一些，不像王汎森对傅斯年研究那么深。把傅斯年跟顾颉刚放在大背景下来进行对比研究，还是有人提到，但是专门的研究还是不多。

李怀宇：你在写完博士论文以后，学术兴趣是不是慢慢从历史地理扩展开去了？

周振鹤：对，可能是跟我的个性有关，我的个性就是见异思迁，见猎心喜，这是我最大的毛病。我一看到有新鲜东西就要去关心一下。学问跟学问之间其实有联系，有的人就是做一个窄而深的学问，怕其他学问来影响这个窄而深的学问，所以不敢看非专业以外的书。这一点我不大以为然，我觉得一个人的知识面要拓得尽量宽，专业的那一点才能开拓得深。就像建一座大楼，地基挖得很深，大楼才能建得高。我本来就不是历史地理专业出身的，是野狐禅，所以我也不大怕人家说：你这个根本非正统，你越轨了，你捞过界了。所以，我在做历史地理的时候，就

注意到了语言跟文化之间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研究一种学问，不要画地为牢，必须要旁涉其他的学问，再来反观自己的学科。学问之道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希望能够在专的基础上尽量地左顾右盼，要有一定程度的宽阔视野。

李怀宇：现在有所谓专家与通才之辩，这个时代专家越来越多了，通才越来越少了。

周振鹤：过去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比如物理学家只懂物理，要他去讲数学、化学可能就不够专了。专门家只讲他那一方面是专的，要他讲其他方面，可能就会讲出错的东西。博识家多浅，门门都懂得一点，但不会很深，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只有那么长，所以做学问不能泛滥无所归，贪多嚼不烂。但是，也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太乏味，这样的人生不多彩。知道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可能对你的本门学科的深化、细化都有好处。所以我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也很感兴趣。

李怀宇：是不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疆域的问题很敏感？

周振鹤：古代有一句话叫“在德不在险”。战国的時候，魏国君主说这个地方地势很好，可以据险固守。吴起就说“在德不在险”，一个国家能够守得好主要在于道德水平高，国家就能维持得住，不是在于山川险要，用武力来防守。清朝的雍正时期，越南趁着划界偷偷地多占一点，官员汇报上去说，应该给越南一点惩罚，雍正皇帝说：算了，它多占一点就多占一点，天下这么大也不在乎

那一点。不过当代世界对于领土、领海与领空的态度都是一样的——“神圣不可侵犯”，寸土必争，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李怀宇：你说历史是无用之用，但是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观念就是读史是为了鉴今的。

周振鹤：因为中国讲究经世致用，什么东西都要有用才去做它。这个经世致用的传统当然好，会促进国家发展，要是什么东西都不去想到利用，这个社会怎么会发展呢？但是如果强调过头，什么都要有用，那么科学是不会发展的。中国近代科学不能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太讲究经世致用了，因为好多学问的研究，一开始是看不出有什么用的，像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有什么用？恐怕目前还没有实际的用途。但是那样的题目做出来是人类智慧能够达到高峰的表现，至于它以后有没有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人类有这样的智慧，就要去解决那样的难题，这体现人为万物之灵的本质。希腊人过去研究学问不求有用无用，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就要去探究它。无论是技术方面的科学、人文方面的科学、自然方面的科学，都要去探究它。但是中国人一开始就要从用处开始，没有用处的事情绝对不做。这会影响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

李怀宇：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方正先生写了《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主要是回应李约瑟的问题。

周振鹤：对，他认为李约瑟这个问题是一个伪命题。实际上中国的发展道路跟西方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所以问

中国为何不出现近代科学，这个是从西方的立场来发问。

李怀宇：从历史地理这个学科来讲，研究历史地理对现代区域划分或者地理的变化有没有什么意义？

周振鹤：还是有点借鉴的意义。比如说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迁，从秦统一天下以后，行政区划经过两千年的变迁，这里有没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哪一种有利一些，哪一种不利一些。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政府也是利益主体，实际上政府也变成一种经济人。照道理讲，政府是没有自己利益的，只有老百姓才有利益，具体的人才有利。政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是老百姓选举出来为自己服务的一个机构，政府本身是没有利益的，利益是在老百姓身上。但是实际上现在政府变成一种经济人了，也有利益追求的，所以行政区等同于一个经济区了。在西方一些国家，行政区划不是那么重要，划完就划完了，不改变了。我们每年都要改变，没有哪一年不改变的。那么，这个行政区划为什么要变迁呢？就是因为经济的主导权在政府手中，政府是在这个区域里头管经济的，过了这个行政区划界线就管不到了。西方一些国家的经济是开放型的，不是受行政区划限制的，不要说行政区划，跨国公司都有了。欧盟很多国家的关税壁垒都要打破，所以就不大可能出现行政区域经济这种现象，他们行政区是行政区，经济区是经济区。但是我们行政区跟经济区是一致的。

李怀宇：你为什么对汉学感兴趣？

周振鹤：对汉学感兴趣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读

外文，但是我们又没有机会读，我们初中读了一年多一点英文以后就取消外文课了。我虽然喜欢，但也没辙。到高一就开始读俄文。我对俄文也很感兴趣，现在俄文大体上还能够用一点。后来自己学英文，然后我对日语也很感兴趣，因为日语有很多汉字，我当时觉得很好玩。小时候看到一本书，上面写“台湾”两个字，我就想借来看，图书馆员觉得我这个小孩子怎么看得懂，就跟我大声讲：这是日文的！这件事我记忆很深，我就想一定要学日文。明明封面写着汉字“台湾”，为什么他不借给我看，后来就自己学日文。后来又补学英文，所以现在马马虎虎，这三种文字都勉强能用一下。

我最感兴趣的是人跟人之间不同的文化怎么能够沟通，怎么样能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中国的学术发展两三千年，自己有一套路数，西方也发展了这么长的时间，也有一套路数。我们怎么理解西方，西方可能感兴趣，西方人怎么理解我们，我也很感兴趣。所以，汉学就是一种途径。实际上，从16世纪以来很多西方国家跟中国接触了，他们就会保留下来很多文献，记载跟中国的文化交流、语言接触的东西。比如西班牙语跟闽南话的对照，那些东西都是以手稿的形式存在，没有印出来的。如果你懂得古代的西班牙语，就可能会对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理解更深刻一些。小语种在中国比较弱，中国人懂得最多的是英语，对小语种研究比较弱。所以我希望像德语文献、意大利语文献、葡萄牙语文献能够有人深入地研究。开一句玩笑，如果有

人肯下功夫，只要做，就能成名。因为从16世纪以来，积累下来的西文文献还有很多没有被译成中文，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传教士积累下来的一些东西。现在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人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但是要有一种献身精神，年轻人最好，又懂外语，且不想利用这个外语去快快赚钱，而是想在学术上有一点成就，投身到学术去。但这样的人是少数，我们也不能要求太多的人。只要一步一步来，就可以把很多空白都填满。因为中外文化交流里有很多空白。这样，不但是汉学研究，对中外文化关系学的研究也会有一个新的局面。我近几年都努力在做这些东西，比如主编两套书，一套是《晚清来华传教士传记丛书》，一套是《晚清来华外交官传记丛书》。我开玩笑说：要是有人懂小语种，一做就会出名，因为资料太多了。

李怀宇：中国自认是天朝上国，但是像汉代和唐代这两个时代，心态比较开放？

周振鹤：凡是一个国家强大、自信心强，心态就开放。国家不强大、自信心弱，就不可能开放，就老是封闭的。范文澜过去有个比喻：你吃牛肉，不会担心你会变成牛，长出牛角来，你会吸收营养，你身体会发育得更好。汉唐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是强国，一点都不担心被人化过去。闭关锁国的时候就是担心被人化过去。大国时代也会有自大的心态，像乾隆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乾隆对自己国家不了解，但他对世界肯定不了解，他不知道西方已经在崛起，英国已经在崛起了。英国从17世纪的光荣革命到18世纪一百多年，已经开始要进入工业化了，一个新兴的国

家已经出来了。乾隆不了解，人家要来自由贸易，他不肯，他说天朝大国无所不有。实际上要了解世界了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可能对中国的发展就有利一些，清朝也许后来就不是那样落后。这是我的臆想。

李怀宇：历史中加入人的设想也是很好玩的。

周振鹤：对。我写过一篇文章《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如果齐国统一天下跟秦国统一天下会不一样，因为齐国跟秦国文化差别太大，它是一个政治上比较分权的社会，是比较重视工商的社会，是思想比较开放的社会，宗教也比较分散，不是高度集中的社会。它的五个方面都跟秦国不一样，所以假如齐能统一天下，中国可能会有另外一条路。这是一种历史的假想吧。有一段时间秦的主要对手就是齐，秦要称帝的时候，还不敢自己称，就跟齐国说：我们都称帝吧，我叫西帝，你叫东帝。齐不肯，后来秦自己称帝了，但不久就取消了。

李怀宇：你研究了历史之后，发现文化最需要研究？

周振鹤：所有的东西都归结到文化上。当然，文化现在在被用滥了，包括厕所文化都在用，但实际上我们探究的就是一种文化问题，不是西方那种后现代的文化研究。因为从地理上来看，好像文化的地域差异很明显，东方跟西方地域不一样，当然有心同理同的方面，也有行为方式上表现差异很大的方面。比如说，中国人宗教观念不强，我始终不赞同儒家是儒教。道教都不是很完善的宗教，更不要说儒教。我觉得儒家主要是一种学术，有一种让人家感觉像宗教一样的东西，但并不是宗教。现在宗教在西方有

时已经变成一种似有若无的东西，很多人已经知道上帝不一定存在，但却是一种心灵寄托。

亨廷顿讲的“文明的冲突”，一开始我们是非常排斥的，现在好像也不能够完全排斥。实际上，不同的文明或者不同的文化之间，有时候会产生互相不能理解的部分。尤其是20世纪以来宗教的复兴又使得文化的差异不是变小，而是变大。不但不同宗教之间矛盾加深，而且同一个宗教里头，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也是加深的。当然亨廷顿讲的那些东西，从根本上可能很多人不同意，但是现在跟他那本书刚出版的时候相比，好像不同意、激烈反对的声音不是那么厉害了。所以，不同文化之间要怎样达到互相理解、互相信任，这有一条很长的道路要走。文化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我们把历史上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地研究，对今后的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的处理是有好处的，这其实是更大范围的问题。我们过去最常强调的话是“求同存异”，但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我以为更应该强调的是“和而不同”。应该正视各种文明之间的“不同”，不必一定要求同，而是要在不同的背景下求“和”，这是不同文明相处的最高智慧。“和而不同”的理念两千多年前就由孔老夫子提出来了，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至今值得我们深思。



钟叔河

期待中国走向世界

钟叔河

1931年生，湖南平江人。编辑、学者、散文作家。著有《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笼中鸟集》、《小西门集》、《念楼学短》、《书前书后》等，编有《走向世界丛书》、《周作人散文全集》、《知堂书话》等。

钟叔河先生家住二十楼，名为“念楼”，即“廿楼”之谐音。念楼中挂有沈从文、钱锺书、黄苗子、黄永玉、丰一吟、沈鹏的书法。闲谈中，我提起在香港采访过罗孚和鲍耀明先生，钟先生说 he 认识罗孚就是通过鲍耀明介绍的，曾托出版社寄赠《周作人散文全集》给鲍、罗二位。

“罗孚先生最近还送了我一帧梁漱溟1948年写给他的条幅，托人带到我家里。他那时候不叫罗孚，叫罗承勋。”他想让我看这条幅，在书房中寻找却未找到。

几天后，钟先生告知条幅找到了，请我再去念楼。但见条幅挂于客厅：“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卅七年元旦写杜诗为承勋乡兄之属。梁漱溟。”同座欣赏这幅书法的是钟先生的老朋友朱正先生。

同为爱书人，钟叔河和朱正的命运有点相似。1949年参加工作，任职《新湖南报》，1957年划为右派，1970年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钟叔河说：“有人曾经两次约我一起去自杀，一次是1957年；一次就是‘文革’之后，被捕入狱以前。他觉得厌倦了，不想活了。我跟我老婆都是右派，我有句话是跟自己老婆讲的：‘饭还是要吃的，书还是要读的，要我们死我们是不

得死的，我们得坚持活下去。’”

1979年，钟叔河平反出狱，由朱正介绍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编辑《走向世界丛书》，影响深远。关于“走向世界”，钟叔河回忆：“他们原来提出的书名，我都不满意。后来我想出一个形象的题目。中国原来文化对别国也有辐射力，东亚文化圈基本是汉字文化圈。但是，后来中国闭关自守了。我们要走向世界，走向外部世界。”

朱正以研究鲁迅闻名，钟叔河则以编辑周作人作品著称。作为出版家，钟叔河力争出版的周作人作品集和曾国藩全集曾轰动一时，当时周作人与曾国藩都是有争议的人物。1986年，钟叔河为重印周作人著作撰写广告：“人归人，文归文。”1989年，钟叔河将《曾国藩与弟书》与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相提并论，但他指出：“现代化无须熟读《离骚》，当然也无须熟读曾国藩家书，因为它决不能指引我们走向明天的世界。”

退休后，钟叔河写作颇勤，著作不断，不时接受媒体采访。他笑道：“采访很多，对我有害，别人会以为我喜欢作秀，其实我从来就是个有话就说的人罢了。”对当下正在大搞“湖南精神”，钟叔河自有看法：“湖南有湖南精神，广东有广东精神，北京也有北京精神，那还得了。一个地方的特点和性格，怎么能概括为几句话呢？这不过是一部闹剧。如果说‘敢为天下先’是湖南的精神，广东就不为天下先啊？如果说‘先忧后乐’是湖南精神，广东人就不先忧后乐了？简直是开玩笑。作为知识分子如果有一点价值的话，就首先必须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不

会是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好比你是一个广东的知识分子，我是一个湖南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回事。屈原也不是湖南精神的代表，屈原在湖南只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贾谊也是成年以后才到湖南，死也不是死在湖南，生也不生在湖南。杜甫最后一段生命在湖南，远远不如他在四川。现在把他们附会为湖南精神，都是开玩笑，没什么意思。”

钟叔河现在想写自传，至于能不能完成，他说自己也不知道：“八十多岁的人，说死就死了。有些朋友头天还在扯淡，第二天就死了。那倒还是幸福的，因为没有受什么折磨。”然而，和一些后辈的接触，让他颇有感慨：

“我不乐观的就是现在的在校大学生，这一点很使我失望。他们很少像80年代的大学生、更早30年代的大学生，或者五四年代的青年。那时候的人都很年轻，胡适才二十多岁，现在在校大学生都是他们那个年龄。现在有热血，有理想的人越来越少。人们在有意无意地引导他们只去追求物质生活和求偶的欲望。”

聊起文坛，钟叔河表示不喜欢跟别人打笔墨仗：“我也劝过朱正先生，跟别人论战的文章可以少写，自己写自己的文章就好了，何必浪费精力和时间，这有必要吗？这一般都是意气之争，没有必要。”

而对中国的未来，钟叔河和朱正同抱乐观。钟叔河说：“走向世界是一个过程，走向的世界就是全球文明的时代。中古的世界是划分为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都是独自发展起来的，当然文化之间有接触、有交流，但是基本

是作为不同的地区独立发展的。进入近代以后，世界的特点就是全球文明，一个地球，一个世界。如果全国人民真正接受了普世价值，中国的问题就好办了。我的要求并不高，就是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走向世界是追求共同的世界。你们都应该看到走向世界的曙光，我就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了。但是，我对于这个前景还是乐观的。”

李怀宇：你为什么对周作人这么感兴趣？

钟叔河：我喜欢他的文章。很小就看他的文章，在1945年以前，我只能从我哥哥战前的国文读本上看到，抗战以后周作人的文章就不选了。抗战开始，父亲把我一个人送回湘北老家，老家的书都是线装书，白话文的书就是我哥哥的初中国文读本，我就这样接受周作人。那时候，我连哥哥的历史读本、地理读本、生物读本都读。抗战胜利，我读高中，语文程度也提高了一些。那时候也不再新印周作人的书了，但是老的书在旧书店还是有，发现了就买来读，慢慢喜欢上他的文章。我认为他的文章除了美以外，还有真和善。真就是知识，关于人生和大自然的知识。善就是能启发你去追求知识。像《故乡的野菜》，作为散文，似乎还没有叶圣陶那么轻灵，但是它能引起你思索。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经得看，它有思想高度，有文化内涵，能够满足我的求知欲、我的要求读书明理的期望。他的文章和别人的不同。我喜欢周作人，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最本质的原因就是这一点。

严格来说，周作人的大部分文章都不是文学散文，而是一种文化随笔，包含了很多社会文化史、科学史、文明史的材料，能够使人对人生、对世界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看法。他很重视这一点。另外，他还很重视写文章要合乎情理，合乎常识。他说，世界上很多反文化的东西、反民主的东西，往往都是违背科学、违背常识的，也是不合情理的。旧中国是一个专制的中国，鲁迅和周作人都对它采取不调和的批判的态度。对于旧的文化，他们是最彻底的批判者，这一点鲁迅和周作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周作人和我的思想是合拍的，我认同他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观点。我认为，前一代人在认识的深度上来讲，还很少有人超过周氏兄弟。当代的学者有些新的观念，会些新的名词，讲的很多话可能比周作人新一些，但实际上没有达到他的认识水平。因为后来人对于旧中国和旧文化的认识并不深刻，所以他们的批判不可能到位，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

李怀宇：你怎么看1937年周作人留在北平的这种行为？

钟叔河：那时日本侵占中国，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是被动挨打的。周作人没有跟国民党退到西南大后方去，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很多人劝他南下，他却没有南下，这应该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系。鲁迅死后，左联一派的人不依不饶地批评他。不仅批评他，也批评所有的“京派”文人，就是非左联的人。左翼的文艺青年对周作人采取敌视的态度，他对这些人也是反感的。当然，左派的文人也并不完全等于重庆政府，但对于重庆政府，对于国民

党，周作人也从来没有好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周作人在北京应该是属于进步的一方面，他在《晨报副刊》上写的文章，他在北大“出入《新潮》中”，对当时的北洋军阀统治者如张作霖、段祺瑞以及他们的御用文人章士钊之流，一直都采取批判、不认同的态度。开始周氏兄弟没有闹翻，两兄弟闹翻以后，还是在一条战线上。

北洋军阀杀掉李大钊，那时候周作人也完全站在同情李大钊的立场上。左联周扬来管文艺以后，鲁迅对他也是有意见的，而左联对周作人则更加不依不饶。周作人也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要来“领导”文艺，他们自己的“文艺”却根本不行。左联批判梁实秋、沈从文，梁沈他们倒还有文学作品，至今仍然存在；他们也从不说周作人不好，包括冰心和巴金都是承认周作人的。所以，那时候周作人不可能跑到蒋介石的统治之下去，也不可能到延安去。再加上他的家累负担比较重，老婆是日本人，周建人遗弃的那个日本老婆就是周作人老婆的妹妹，也在他家里，要他养着。鲁迅的前妻朱安和母亲住在一起，虽然鲁迅是寄钱回去养家的，但是母亲需要人照料啊，不光是钱就解决问题的。抗战开始时鲁迅已经死了，许广平不到北京去，住在上海租界里，老太太和嫂子还是要周作人管。一家子人，老人、小孩、妇女，只有周作人一个成年男人，不容易逃难。

再说逃难，开头大家也不知道抗战只有八年，不会知道八年以后就会回来。在沦陷区要不要办教育呢？政府走了，军队走了，人民还在，北京有几百万市民。举个例

子，如果我是一个剃头匠，在北平剃头，或者我是一个开店的人，靠做面条或者蒸馒头为生，我的房子就是我的生产资料，我能够到重庆去吗？我去那儿，谁给我房子呢？剃头匠在北京，反正谁来了还得剃头。但是，我这个剃头匠有一个儿子，他要不要进小学呢？小学生能够到延安或者到重庆去进学校吗？还是只能就近上小学。那么还是要人办教育，读了小学读中学，读了中学读大学。所以，我认为抗战时期留在北京、南京办教育的人，教书的人，俞平伯、钱仲联他们，是没有多大罪过的。有很多重要领导人，当时不也是在沦陷区读的中学、大学吗？张爱玲当时也是个学生，不也留在上海，写文章发表文章吗？她的成就不也是中国文学成就吗？关于周作人，蒋梦麟讲过：当时周还是北大指定的留平四教授之一，这四个教授是学校委任他们留在北平管理学校的校产，蒋梦麟后来给他证明了。但周作人自己不愿意走是一个事实，并不是他要走，蒋梦麟强要他在这里坚持。但蒋梦麟毕竟也认可了学校要留人照料。当然，后来周作人当督办，就不是一般地办教育了，那是做官了，而且是大官。他自己的解释就在他写给周恩来的那封信里面，这与他在文章中一贯表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他是个读书人，他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努力读懂并且诠释中国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他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以自己的认识来影响周围的人，努力推动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只要他在那里做这些事情，他就觉得对得起中国人，对民族和人民尽了责任。我相信他的这个说辞，我并不认为周作人是为了做官去跟日本人

合作的。

另外，当时周作人也很可能认为蒋介石会打不赢日本人，但是中国多几亿人，日本人不可能亡中国的种。北魏也好，辽金也好，元朝也好，清朝也好，都是异族统治，汉文化还是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再生力和保守性是很强的。我经常说“保守”这个词有两面性，不完全是贬义。它能够保守，说明它能够保持自己的本位文化。金朝、元朝、清朝都是汉族人做亡国奴的时代，但是金朝、元朝尤其是清朝，汉文化还是大大地发展了。相反的，金、元还融化在汉文化里面。东亚文化还是以汉字文化为中心。周作人认为政权并不完全等于国家，国家也并不完全等于人民，更不完全等于种族。周作人可能会以为：中华民国的政权可以亡，中国文化则不能亡，也不会亡。

中国人论历史人物，凡是这个人主张对外打仗、不妥协的就是好人，主张对外和平妥协的，就是卖国，就是不好。比如李鸿章，就是汉奸的代名词。如果李鸿章不办外交，由支持义和团的人去办外交，会是什么结果呢？没有李鸿章，不订和约，中国只有吃更大的亏，结果只能是割更多的地、赔更多的款。在一个世界上不能只讲打，列宁为什么要订《布列斯特和约》呢？苏联和日本也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日本承认外蒙古，苏联承认满洲国。王造时他们当时向斯大林写了抗议信，这就是王造时后来被划为右派的重要原因。

过去一直说蒋介石卖国，其实蒋不仅抗日，他对美国还是坚持独立性的。蒋介石在美国人面前比如说史迪威，

他坚持不要的：你把史迪威调走，我不要这个参谋长，你不要来干涉我中国的事。蒋介石在美国人面前的独立性，比汪精卫在日本人面前的独立性要大，比王明、博古在苏联人面前的独立性也要大。

李怀宇：现在对曾国藩的评价也跟以前完全两样了。

钟叔河：到现在慢慢地有另外一种偏向，完全肯定曾国藩，我认为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曾国藩毕竟不能够使我们现代化。曾国藩的政治经验，特别是对传统政治里面的谋略和权术的运用，确实是一种遗产。他有很高明的处世哲学，怎么样教育儿子，怎么样练字、读书，这些经验都是可取的。但曾国藩毕竟是过去了的人物，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周作人却是个现代知识分子，他也是最早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之一，毛泽东去拜访他，就是想了解他到日本去考察新村的经验，想拿到长沙河西新民学会来实行。

李怀宇：曾国藩是不是对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产生过影响？

钟叔河：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承认曾国藩是自己的老师，毛泽东亲笔写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承认他自己对于近代的人，只崇拜一个曾国藩。他把曾国藩和孙中山、袁世凯、章太炎都做了比较。蒋介石也是这样，崇拜曾国藩。

李怀宇：为什么有一个说法是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钟叔河：这是后来的说法。当官就要看《曾国藩》，

经商就要看《胡雪岩》，看两本小说。这种说法充分暴露了如今官场和商场的文化之低，甚至比晚清时的官场和商场还低，低到了不可以道里计的程度。

曾国藩是集中了中国专制时期的为官之道，他对于官吏的政治权术了解得很透。我有个比方，马基雅维里不是写了本书叫《君王论》嘛，我觉得曾国藩写的可以叫《将相篇》，正好可以和《君王论》作为兄弟书。马基雅维里讲的是君王的统治之道，曾国藩讲的是将相的驾驭之术。曾国藩跟他弟弟写的那些信尤其是赤裸裸的，跟弟弟讲话不需要什么避讳，讲得露骨，属于私房话。研究旧时代中国的官僚文化和政治哲学，这些很有价值。曾国藩是中国崩坏前的“最后的巨人”，却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领袖。中国要现代化，用不着读曾国藩；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却非要看曾国藩的书不可。

李怀宇：你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感兴趣的？

钟叔河：我如果不感兴趣，就不会有《走向世界丛书》。但我虽感兴趣，对现代化问题的钻研仍然是有限的。我的职业是一个编辑，你知道编辑也好，记者也好，是没有办法很“专”的。比如你今天来做一个专题，你要写湖南的曾国藩和毛泽东，你明天可能又要搞另外一个专题，你不能一辈子研究毛泽东，研究曾国藩。我编完曾国藩又要编周作人，这是两个不同的课题。我不可能像学者专门研究曾国藩，搞他一辈子，不可能那么专心。所以我的学识是有限的，最怕别人吹嘘。

李怀宇：中国在晚清以来，特别是1919年以后，很多知识分子都提出中国得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不管是向欧美学习还是向苏联学习。但深入到社会里观察，为什么国人的传统思想还是根深蒂固？

钟叔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传统中国几千年的影响深入骨髓，遗传因子不易改变。即使是对传统持批判态度的人，即使是我，骨子里流的也是祖父的血，中国人的血。我们看的小说，读的诗词，看的戏剧都是旧的东西。这几千年的影响不是几十年的影响能够轻易取代的。第二个原因就是 we 后来又搞了一个“以俄为师”，这是孙中山的一个错误。因为沙俄本是东方专制主义和拜占庭宗教神秘主义的杂种，列宁、斯大林也并不真信西方来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到列宁、斯大林已东方化了。文艺复兴、航海大发现、产业革命以后，世界文明进步的重心移到了西欧，马克思、恩格斯也产生在西欧。孙中山被军阀整得没有办法，病急乱投医，被苏联那些野心家利用了，孙中山也想利用他们，他原来是靠日本（任何革命都要靠外援的），后来又想靠苏联，与虎谋皮有什么好结果呢？集体农庄、人民公社，“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社会和文化、人民的生活，完全和现代化背道而驰，不仅没有进天堂，反而变本加厉地将专制时代里落后的、反动的一面发扬到极致，将传统文化好的东西大加摧残。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包含有自由民主的东西，虽然不是主流，却还是有的，弄到后来则一点也没有了。民主自由这些名词也是翻译来的，最初将民选的总统翻译为“民主”，它是相对

于“君主”而言的，后来才翻译为总统，实际上，总统是明清两朝给武官的一个职别。自由一词则古已有之，有个皇帝特爱搞女人，天天要换新鲜，皇后想管一管，他勃然大怒，曰：“朕贵为天子，不得自由？”这意思和现在的意思不同。但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是有过政治自由和文化自由的。古代文人相当自由，除了异族统治的康雍乾三朝，写什么文章，是没有人来找你算账的，写小说不会查禁的，《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都有讽刺的成分。先秦时期，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秦汉时期有廷议，李斯可以建议焚书，淳于越也可以建议“师古”。一直到清朝，慈禧太后也是允许发表不同政见的，李鸿章主张要签和约，你可以反对，甚至可以公开请朝廷“斩李鸿章之头以谢天下”，不负法律责任；而平时宣扬杀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宣扬杀人，雇一个杀手去杀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讲杀李鸿章以谢天下，可以不负法律责任，因为那是政治上的主张。康有为公车上书，他提出来中国要变法，要学日本变法，快变还可以重振，慢变则可以缓亡，不变就必亡。他可以危言耸听，可以上书皇帝，这就是言论自由的传统，民主的传统。

李怀宇：胡适晚年在美国用英文作演讲，就指出中国的传统里面也有自由、民主这些观念。

钟叔河：胡适和康有为都是伟大的思想者，却都没能成为成功的政治家，这是中国的不幸。我们远没有康有为那样的气魄，更没有胡适那样的学养，但总还希望能有人

继起，引导大家多思索一些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要认真地、深层次地解决中国的问题，的确要很好地清理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尤其是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历史。要很好地回忆总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接受经验教训，才可以少犯错误。比如“文革”打死了人，都应该追究，使其负法律责任，该判刑的判刑，该判死刑的判死刑，以后才会少几个杀人凶手。如今中国的很多事情是暗箱作业，如果让公开报道，道听途说自然就收敛了。为什么老是不公开真相，让整个世界猜测呢？比如这个物体，我看到是这一面，你看到是那一面，必须是多维的空间，才能看到这个物体的全貌；如果只一方面解读，只允许一个人发言，只有官方能够说，其他人不准说，那怎么行呢？要允许大家公开地发表意见，公开地竞争。任何东西公开了、透明了就不会出大问题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化。



朱 正

我是唯恐天下不治

朱 正

1931年生于湖南长沙。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1956年出版了《鲁迅传略》，后来在冯雪峰、孙用诸先生的鼓励与帮助下撰写了《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订正了许广平等人回忆录中的史实错误。此外还著有《鲁迅传》（即《一个人的呐喊》）、《鲁迅的人脉》、《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重读鲁迅》（与邵燕祥合著）、《从苏联到俄罗斯》（与蓝英年合著）等。

朱正先生的住所有两个单元，到处都是书。他估计家藏大约一万本书吧，笑道：“如果我现在一本书也不买，到死也读不完这架子上的书。恐怕五十年才能看完。”架上十三经、二十四史都有，但这些对于他来说都只是工具书。“比方说想找一个人的传记或一件事，我会去查一下，但是要我从《史记》一直通读到《清史稿》，我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意图了。”

朱正一生和书结缘。1949年，他和钟叔河一起考进了《新湖南报》和新华分社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随后在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做编辑。他以鲁迅研究作为业余爱好，后来出版了多本研究鲁迅的著作。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段经历成为他后来写出《1957年的夏季》的原动力。右派改正以后，他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做编辑。退休后，仍以读书写书为乐。

近人著作中，朱正所藏的梁启超、胡适、鲁迅、周作人作品都是全集。读得最熟的是《鲁迅全集》，并有各种版本。朱正说：“我是以鲁迅的粉丝开始的，现在还是他的粉丝，但是我不完全是盲目的粉丝了，他好的地方我很佩服，但是他走过的弯路，我还是给读者指出来。”他在《重读鲁迅》中就指出了鲁迅的一些败笔，他在这书的后

记里说：这也是七十多岁的评论者评论四五十岁作家的文字，至少，我的阅历和经验应该说总要比他多一点。鲁迅有些文章，像《我们不再受骗了》就说错了，不是我们比鲁迅高明，是当年鲁迅没能看到苏联解密的档案。

朱正也看周作人的文章。以文学成就而言，他认为周氏兄弟可以相提并论。“周作人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作家，但是周作人没写过小说，他的散文成就很高。晚年周作人写的东西主要是讲鲁迅的一些史料，别的散文就没有了。我后来觉得重要的不是他的文采，而是他的见解。周作人对中国历史也是看得很深的，这不能否定。只是当汉奸这件事是没法原谅的。”

关于周作人，朱正推荐舒芜写的《周作人概观》。说到舒芜，他说：“舒芜是个受害者、不幸者。周扬、冯雪峰、胡风之间斗争很激烈，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都左。舒芜事先是完全没有预料到后果有这么严重，要是真正能够预料到，或是预料到一半，他也不敢提到有这样的信件。但是已经错了，要他怎么办？聂绀弩对他也感到惋惜。当时舒芜批判胡风，如果用‘趋炎附势’来说他，很难听，但换一个说法，说舒芜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党中央要批判胡风，舒芜就批判胡风，就提供材料，就是这么回事。聂绀弩也是这么说：一架天平，一边是胡风，一边是毛公，哪一边重？我看就是毛公这边重。不是舒芜一个人做这种选择，当时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都是这样选择。当时大家都写了文章，老舍、巴金、冯雪峰，谁不写？”

朱正读过一些今人写的旧体诗，曾为黄苗子、杨宪益、邵燕祥合集的《三家诗》写过序。他认为五四以后的旧体诗，郁达夫写得好，“曾因醉酒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是传世名句。聂绀弩更是怪杰。“聂绀弩的诗别人是不能学的，那是一个流派的代表，而且是一个顶峰。后来学聂绀弩的人，没有一个达到聂绀弩的成就。我很喜欢聂绀弩的诗，他的诗的第一个注释本是我做的。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对于旧体诗这种形式贬得很低。我也觉得旧体诗比新诗要容易作，因为旧体诗有个现成的格律在那里，只要能掌握平仄韵脚这些，很容易写。新诗还要创造一个形式。”

当说到黄苗子晚年牵涉到“告密”一事的时候，朱正表示，他对此事不太清楚。冯亦代到章伯钧家做卧底，这事倒是确实的，有他自己写的日记《悔余目录》为证。章诒和看了《悔余目录》这书，可是看得不太仔细，她把冯亦代讲的他一个工作对象刘某，和一个领导他的刘同志，当作一个人了。朱正说：“我写过一篇讲冯亦代的文章，我自以为没有做很过分的谴责，冯亦代倒是很清醒的，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他把自己定位为在第一线战斗的保卫工作者。茅盾有一部小说《腐蚀》，假托是抗战期间一个女特务的日记。当时我看了觉得很难受，看冯亦代这本书就更难受，它不是虚构的小说，是真实的日记。”

现在，朱正每天看看书，玩玩电脑。原来他是“电脑盲”，最近女儿的单位处理一批报废的电脑，四百元一台，她就买了一台给爸爸。他觉得好玩，一下就学起来了。

朱正近来看的多是右派分子写的回忆录。“现在我研究的一个大课题就是那一场反右派斗争。”他费了多年工夫修订《1957年的夏季》。“我感到自己并没有闲着，还是希望对历史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尽管我的力量很小，但是，我还是做了一些什么。所以，我就把这本书修订完了，我到上帝那里去就可以交代了。我一个八十多岁的人，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如果有生之年，我还能够看到相关档案的解密的话，大概还会做一点增补。但是更正我想是不会有，因为我自信档案不能改变我的判断，只能证实我的判断。如果看不到档案的解密，那就只能让它这样留给后世的读者去批评了。”

李怀宇：李慎之先生晚年有一句话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你研究鲁迅，也看胡适的作品，如何评价李慎之这个说法？

朱正：“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这句话有一半是对的。假设把鲁迅跟胡适作为两个对立面来看的话，鲁迅管了这一半，胡适管了那一半。其实他们两个人共同的东西是很多的，周策纵还引了他和胡适的一次谈话，中国在批判胡风的时候，胡适讲，要是鲁迅在的话，也都要批判的。但是很多朋友说，如果鲁迅活下来的话，胡风就是鲁迅分子了，就不会有什么胡风分子。假如鲁迅在，胡风还不够资格作为一个派别的领袖，鲁迅不在了，他就成了这个派别的领袖，降了一个档次。胡适还是把鲁迅看成自己的知己的，鲁迅死了之后，苏雪林骂鲁迅，胡适说，你骂

的是不对的。还有，许广平当时想出版《鲁迅全集》，胡适也是帮了一点忙的。以胡适的明智，他当然能够看到，鲁迅对自己后来是很不友好了。但是，胡适是主张宽容的人，他对人还是有基本的评价。如果不站在左翼的立场上，鲁迅只是20世纪一个很重要的作家、思想家，一个派别的重要领袖和代表者。如果说，鲁迅和胡适是左右两翼的两个代表人物的话，他们共同管理了20世纪：我带我的一部分人，你带你的一部分人。

梁实秋的档次比胡适要低。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在拥护左翼的人看起来，觉得鲁迅的文章痛快淋漓，论战大获全胜。如果不是站在左翼的立场上，就会觉得梁实秋的论文也不无道理。当时论战的双方都以为是自己获胜了，梁实秋绝对没有认为自己在论战中失败了。

胡适和鲁迅没有直接论战，但是鲁迅后来写了几篇文章批判胡适。他们都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是上海总会的执行委员，胡适是北平分会的会长，后来弄到不欢而散，开除胡适出会。鲁迅是支持开除胡适的，鲁迅当时发了两篇文章：《王道诗话》、《“光明所到……”》。鲁迅用他的名字发表的《王道诗话》，实际上是瞿秋白写的。我写过一篇文章《重读〈王道诗话〉》，把这篇文章分析了一下，指出这文章里面讲的事情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他们也是有共同的地方。比如说有一篇鲁迅的文章收在《且介亭杂文》里，1934年写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当时这篇文章很多人喜欢引用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

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认为这是鲁迅写得最好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是他读了《大公报》的一篇社论《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写的。因为那篇社论说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鲁迅的文章就是批判这篇社论。正好，胡适看了这篇社论，也不满，写了一篇《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的文章，正面反驳这篇社论，有一些观点跟鲁迅是一样的，批判“中国人失掉自信力”这一观点。鲁迅只是讲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胡适就讲，最近多少年来，好像辛亥革命一直讲到共产运动，他把这些为共产党牺牲的人都作为中国人应该赞美的。鲁迅还不敢写这些，胡适写了。当然这跟胡适的身份有关，他有资格写，他写了别人不能奈何他。

如果把胡适和鲁迅作为对立面来看，一个管20世纪，一个管21世纪，我觉得不太准确。再说21世纪已经过去十二年了，剩下八十八年。剩下的八十八年是不是就是胡适的世纪？胡适是1962年去世的，到今年五十年了，他的版权保护到2012年12月31日为止。2013年1月1日起，胡适的著作权就成为全社会的公共财产，谁要印他的书都不再付稿费了。这个版权保护结束以后，胡适的著作在中国会有一个比较大量的流传和发行，当然会有更多的影响。不过在这八十八年中间，是不是会出新的思想家、新的文坛领袖？说不清，我想恐怕也不要太悲观：只有古人才了不起，后人没有出息。我觉得在今后的八十八年中，恐怕

还是会出新的思想领袖、思想明星。假设今年出生的话，四十年以后就可以成为思想界的领袖了。胡适自己成才也很早，发表东西也很早。21世纪，胡适的东西受到的限制少了，版权的限制也没有了，会有大的流传，这是肯定的。

但是胡适是不是就管了21世纪，21世纪鲁迅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我也不这样看。李慎之讲过，王元化讲过，鲁迅在后期受了瞿秋白这些党内人士的影响，受了他们的误导。我觉得这个讲法是有道理的，我们看鲁迅《热风》、《坟》这些早期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非常深刻、非常精彩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这些文章写得真好。到了后期，王元化讲得很具体，说从《二心集》开始，就是从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开始，搞左翼运动以后，他就成了一个政治人物，他考虑的思想等等完全就带有一种派别的，所谓的党性立场。尽管他不是党员，他实际上完全是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鲁迅有毛病的杂文都出现在后期，他前期没有什么有毛病的杂文。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正要来清理一下的话，鲁迅后期的很多杂文都是没有必要保留的，只有一种价值，就是作为一种研究资料，能看到鲁迅受了误导。从我现在看到的一些东西来看，胡适好像在这方面的毛病要少得多。

李怀宇：如果做一个历史的假设，鲁迅像周作人活得那么长，1937年抗战爆发，鲁迅会怎么样？

朱正：我倒认为鲁迅不会做汉奸。日本占领上海了，他在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当然这个孤岛就不存在了。现在我们重新假设，在那以后，鲁迅恐怕也不会

做汉奸。第一，鲁迅没有日本太太，周作人有个日本太太。第二，他还活着的时候，有人骂他汉奸，他就非常愤怒地反驳过：如果我真是汉奸，他们就会怎么怎么了。假如真正面临要做汉奸的抉择，他这个人的固执、脾气，尽管我看到鲁迅有种种缺点，但他还是有骨气的，还是硬骨头的，他是不会做汉奸的。

李怀宇：1957年呢？

朱 正：1957年，毛泽东讲的：那就看他怎么样，如果他还要写文章，就把他关起来。实际上他并没有提供两个可能的选择。因为鲁迅是一个作家，他不再写作还是作家吗？鲁迅是一个不断批判现实的杂文家，如果他对现实不再批判了，他还是鲁迅吗？

李怀宇：1957年是不是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关键一年？

朱 正：我写过一本讲1957年的书《1957年的夏季》。反右派斗争不是打击了多少人的问题，是打击了一个方向的问题。1957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发生的。第一，一个拥有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的人，不会愿意放弃或者缩小这种权力的。当他有可能保留这些权力的时候，他不会放弃的。第二，当时知识分子也没有力量要求他这样做。当时知识分子最热衷政治的代表人物，恐怕应该算是罗隆基，还加上章乃器，档次低一点的还有储安平。这些人，最初搞中国民主同盟，希望成为国民党、共产党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力量，知识分子的大党，事实上这个党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力量。我说：“你不是一种

力量的时候，就不要希望别人把你当成一种力量来尊重。”到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终于受到毁灭性的一击。

李怀宇：1976年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的变化是天翻地覆。青年学者周保松就说：我们这三十年的转变，真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比鸦片战争的年代更根本，我们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时代，社会基本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语言都在发生根本变化。

朱 正：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就是1976年死的。他死了，“文革”才结束。有人说那是中国大变动的前夜，我说不，是大变动的中间或者开端。有些改变是一个进步。这些东西要慢慢来，不要着急。我觉得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心急弄坏的。比方说，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他们都是忧国忧民，希望中国改善，体制变好。严复有一封信，就说他们太心急，慈禧太后那么老了，光绪皇帝还这么年轻，你等一等，等慈禧死了，不就是你干这事的时机吗？你这么心急干什么？到了晚清，特别是慈禧跟光绪死了，到了宣统时代，不就慢慢有些新政策出来了吗？假如是没有辛亥革命，那就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君主不好，但是立宪还是好的。现在是没有君主，但是也没有立宪。所以，我觉得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心急弄坏的。黎澍（即黎乃涵，《辛亥革命与袁世凯》的作者）晚年跟我说过一句话：今后如果能够不革命，我希望最好不要再革命了。我也这样看，我觉得不必再革命了。我把孙中山的遗嘱改几个字：“革命自会成功，同志无须努力。”

李怀宇：胡适曾经说过，要一点一滴的改革，一尺一寸的进步。

朱 正：恐怕这样才是比较符合事实，代价也最小。一场动乱来了，一定有一些自私自利的人趁这个机会来扩大自己的权和利。这些人都是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实际上就是为他自己、为他这个集团谋私利。我们一点一滴地弄，这些人的活动空间就小一些，我们就是不要给这些人留下活动的空间。

李怀宇：你在1976年以前，有没有想象到中国改变得这么天翻地覆？

朱 正：当时没有想过。当时我自己比喻自己，像坐在一叶孤舟上，在大海上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靠到岸边。但是有一点，我知道这个局面一定会改变，对于这一点我是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但是，哪一天改变是无法预料的。我也没有想到我能够活到八十多岁。现在的这个局面也不会是永恒的，还在继续变。未来的变化我是否能看到，这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我遇到过一个挑剔的人问我：你想看到什么？这很容易回答：我希望看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

李怀宇：胡适在五四的时候，就希望五四会成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访问白先勇时，白先勇希望中国的21世纪出现一个新的文艺复兴的时代。

朱 正：21世纪还有八十八年，八十八年中间可以发生多少事啊。苏联从十月革命到解体才七十四年，八十八年比七十四年还要多，假如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苏联，不

要到世纪末就可以解体。所以我说，对于现在的世界你不要悲观，要乐观一点，也不要心急，要来的是一定会来，我是一点都不心急。

李怀宇：新时代会不会出现像胡适和鲁迅那样领军的人物？

朱 正：可能出现吧，中国这么多人口，出一个胡适、一个鲁迅不可能吗？

李怀宇：但是近三十年好像没有出现什么中心人物？

朱 正：这三十年好像没有出现影响能够跟他们相比的思想家，甚至就是像我们这些年很大的思想家，像顾准、像李慎之，再放宽一点，像王元化这些人，实际上，恐怕也很难跟胡适比。其实，假设鲁迅不为政治所利用的话，他就不会被捧得这么高，他的影响是不是还有这么大？那也会是一个问题。胡适后来也是被政治利用了。

李怀宇：像顾准、李慎之、王元化等人的影响也是局限在某一个层面上，好像这个时代变成了歌星、影星、体育明星等影响更大一点，这些人的粉丝比读书人的粉丝多得多。

朱 正：就是，现在还有多少人读书，这是一个问题。我自己写书，感觉好像在尽自己的心做一点事，我希望能够对历史做一点微薄的贡献。但是，事实上起的作用不大，如果有谁看了我的书，说：你说得对。我心里想：他原来就有这个想法，并不是因为他受了我的影响才这么看的。如果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就说：你又发表荒谬言论了，你唯恐天下不乱。其实，我哪里是唯恐天下不乱，

我是唯恐天下不治。

李怀宇：你现在回忆录看得很多，觉得回忆录靠得住吗？

朱 正：回忆录有些靠得住，有些靠不住，你可以拿史料对证看。一家之言，你也很难判断他是对还是不对，你把相关的材料一看，就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了。许广平写了《鲁迅回忆录》，我写的是《鲁迅回忆录正误》，专门纠正她的错误，那也是考证出来的。

李怀宇：跟回忆录有关的书，像口述自传、访谈录、日记都可以互相参考？

朱 正：日记恐怕最可靠。访谈录这些东西，有些人口音不一样，有一次有一个地方登我的访谈录，我一看，有些我不是这么说的，大概那个人听不懂我的湖南话。日记至少是每天记每天的事情，没有伪造的必要。伪造通常是以后发现这个说法不好，他当时写的不会知道以后会有什么发展。

李怀宇：胡适的日记呢？

朱 正：胡适日记大概是真的。胡适日记不全，缺很多。

李怀宇：赵元任的日记听说要出版了。胡适和赵元任这两个老朋友开玩笑，赵元任就跟他说：你的日记是写给别人看的，我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

朱 正：鲁迅的日记是给自己看的。胡适的日记恐怕也是给自己看的。不过他也出版过《胡适留学日记》，那是当时就出版的。

李怀宇：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里讲：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他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为文学开生路。西方很多个人传记都写得非常精彩，反而中国传记文学的传统让胡适这么感慨。当然，我觉得《史记》就是很重要的传记文学。

朱 正：《史记》重点还是在文学上，你把它当成文学看恐怕更好。文章写得真漂亮。当时那些历史事实是不是就那么回事呢？有些是事实，有些恐怕也有歧义。

李怀宇：中国近现代传记文学的重要作品好像不是很多。

朱 正：好像不多。有些文章，像瞿秋白被俘以后写的《多余的话》，那是可以算上的。还有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写的《告全党同志书》，讲他跟共产国际的交往，那可以算是传记文学中的作品。

李怀宇：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引起很多争论。苏雪林不是写了一本《犹大之吻》痛骂他吗？

朱 正：苏雪林偏见太深，以她自己的观点为标准：是我所是，非我所非。

李怀宇：你为什么对反右派的事情这么感兴趣？

朱 正：我自己是右派分子。我写这本书是我当右派的第一天起就在想：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是《人民日报》反右派社论的题目，我也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右派，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是右派？我后来想来想去就写了一本书。

李怀宇：根据的史料来源有哪些？

朱 正：我写这本书，初版用的材料就是当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的一些材料，依据毛泽东、李维汉、薄一波等人的著作，全部是公开的材料，任何人只要是愿意都不难找到的。我用的就是这些材料，也以此自豪。我很惭愧，没有一条独家的资料，我的本领就是能够用当年正式发表的这些材料还原历史的真相。

现在我修订《1957年的夏季》，增加了很多别人不容易看到的材料了。一方面，我那本书出版了以后，很多划为右派的人，就把我看成他的朋友了，把他自己出的书都寄到我这儿来，所以我收到很多右派分子寄来的书。有些书是正式出版的，有些书是自费印的，有些书是拿到港台去印的，所以这些材料成为我增补的重要来源，我能够增加很多具体的案例来说明问题。而且还有一个重要来源，是香港中文大学出了宋永毅主编的《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光碟，有我过去没有看到的材料，包括一些官方文件、新华社内参。有些材料蛮好的，我补充进去了，所以我已经补充到七十多万字了。过去我全部用公开的材料，现在增补了一些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李怀宇：回到1957年之前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的确很好。

朱 正：这是一个比较带有一点自由化倾向的口号。苏共二十大对中共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一方面，自由化的倾向对中共有影响，中共八大的一些文件实

际上是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影响的。但是，也有另一方面的影响，就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现在看来这个批评是非常不到位的。毛泽东对批判斯大林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毛泽东本人也不喜欢斯大林，斯大林对他并不重视，限制也很多，当时也很感到委屈。但是这么一批判斯大林，他也感到很危险，因为他知道，他在中共已经是斯大林那个地位了，如果斯大林是可以批评或者死后可以批评的，那他自己怎么样呢？二十大在中国造成的影响，还是比较温和比较平静的，在东欧造成的影响就要激烈得多了，出现了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所以，毛泽东就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匈牙利事件是不是可能在中国发生呢？他说我们要采取整风的办法，把匈牙利事件分解到各个单位里去。后来我们看的印在《毛选》里面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修改了的。关于这个“百家争鸣”，在1956年，就是毛泽东刚提出百家争鸣的时候，罗隆基在人代会上的发言，他拿乐队的演出作比方，其实一个乐队只能算一家的。所以他讲的百家争鸣，只是表示他完全愿意在共产党的指挥之下来活动。所以，罗隆基一点反党的想法都没有。

李怀宇：中国历史上，凡是在大一统的时代，不可能有百家争鸣，反而是春秋战国、南北朝、清末民初出现了百家争鸣。

朱 正：大一统当然不可能百家争鸣。所以清末民初那个时间段真是好。当时就是袁世凯都有走法治的想法，他要称帝，年号不是叫“洪宪”吗？这表示他是要做个立

宪的皇帝，这个年号，也说明了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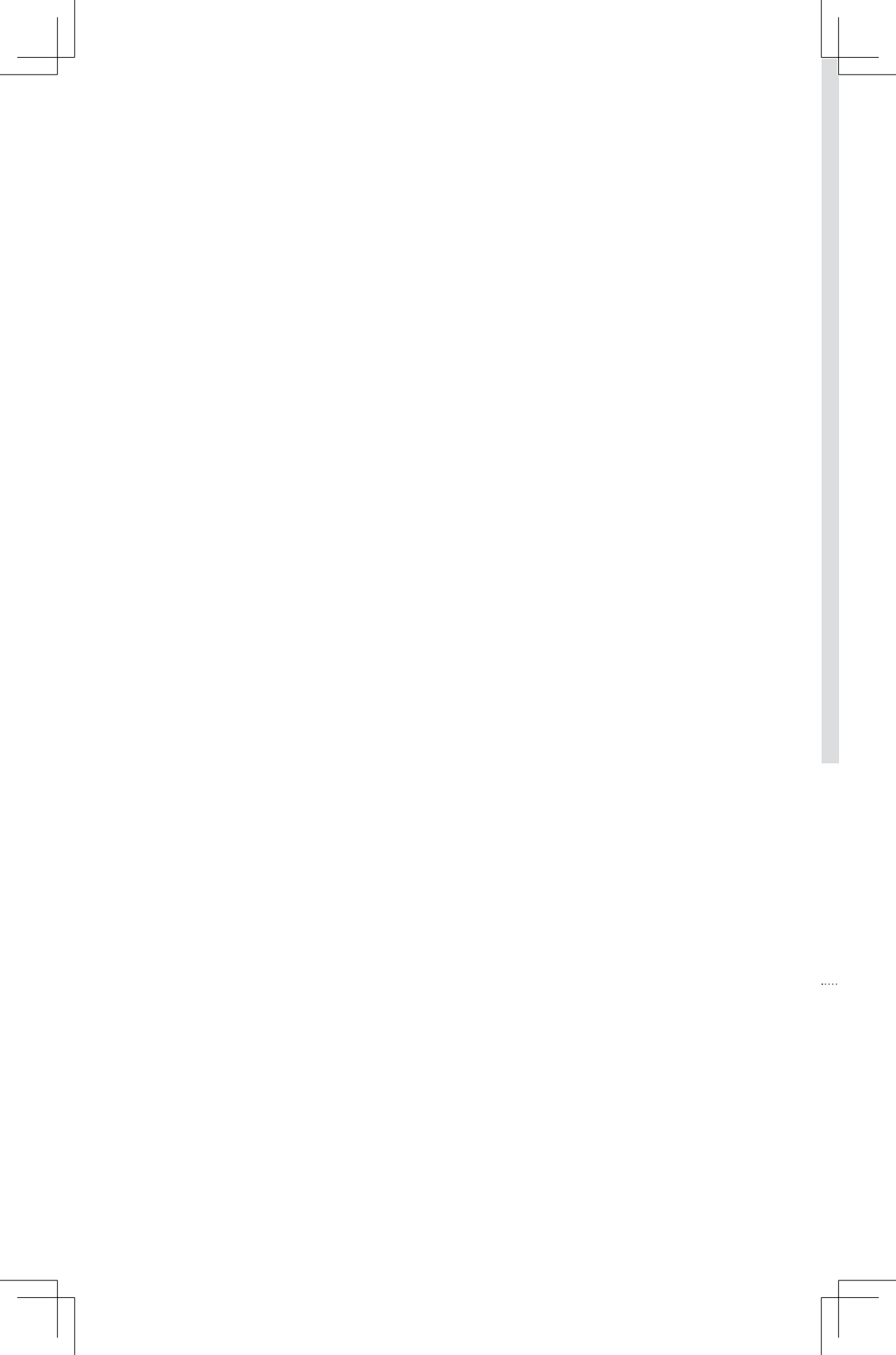
李怀宇：中国还有没有可能出现百家争鸣的时代？

朱 正：中国社会总在不断地进步之中，只要权力不要这么集中。我觉得只要把地位摆对，所谓政府是服务性质的，要从统治的变成服务的。假如能做到这样，那么，百家争鸣是有可能出现的。任何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独到的观点，但是现在往往把不同于主流的观点看作一种颠覆国家的意图，真是太看得起这些人了，他们哪有这个能耐颠覆国家？

李怀宇：你研究反右的历史，想对后世有什么启发？

朱 正：我们现在读《明史》，或者《宋史》、《后汉书》，目的是把史实真相保留下来。反右这段历史太近了，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开始宣布到年底，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事实上，可以追溯到中共成立，或者近一点也可以说到30年代罗隆基他们对国民党争人权，一直延续到1989年，这几十年历史都和这事情有关。反右之后就是“大跃进”，没有反右派斗争就没有“大跃进”。反右把一些能够发现问题、能够提反对意见的人都打下去了，于是什么都可以做，“大跃进”就发生了。没有反右派斗争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反右派斗争给“文化大革命”准备了理论，还准备了干部。反右派斗争当中批判的一些右派言论：独立审判，是右派言论；引进外资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经济，是右派言论；领导干部应该懂得自己的专业，是右派言论。这全部是颠倒是非嘛！把对的进行批判，提倡的是错误的，中国能够走向现代化、法制

化、民主化的道路吗？这是中国的大倒退。所以，反右派斗争是个重要的课题，谁要弄通中国当代的历史，就得研究反右派斗争。懂得了反右派斗争，也就懂得了中国的当代史，这是史学家很好的切入口。如果写一个“文化大革命史”，我说这个题目太大了，一个人的经历不一定能做得了，我个人的经历也不行。但是反右派斗争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是史学家最好的题目。





许纪霖

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许纪霖

1957年出生于上海。1975年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南汇的东海农场任图书管理员。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1982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考取华师大政教系研究生，攻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无穷的困惑》、《暧昧的怀旧》、《另一种启蒙》、《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等。

我坐了两个小时车到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和许纪霖先生谈了两个小时，再坐两个小时车回上海市区。摇摇晃晃的车程中，脑海竟闪烁着许纪霖笔下大时代中知识人的形象。而对许纪霖影响至深的王元化先生和张灏先生，我都有幸采访，不免心生感慨。

许纪霖回忆上世纪80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光，对理想主义依然充满深情。他在1996年以史铁生为例写了《另一种理想主义》一文，后来成了他的一本自选集的书名。他很欣赏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那种西西弗斯的精神，支持着我的后理想主义，人生是荒谬的，但是人的意义是战胜这种荒谬。不同的时代，我会迷恋不同的思想家，我迷恋过罗尔斯，也迷恋过哈贝马斯。但是精神上，我受加缪的影响最大，他很平和，有一种地中海式的阳光。”

从80年代开始，许纪霖关注知识人的精神世界。近年他研究较多的是思想史：“因为内心在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大的问题太多了，所以我不得不回应、思考这些时代的大问题，做得比较多的是思想史。但我真正的想法还是要回到历史，把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精神世界能够做出来。我不希望做成史诗性的多卷本，像别尔嘉耶夫写《俄

罗斯思想》这本很薄的书，却勾勒了整个19世纪俄罗斯思想，这是我向往的。但是要做好这个东西很难，需要更多地积累人生的感悟，它又和年龄有关。最重要是不要着急，听从内心的召唤去做，不要有功利的念头。”

在90年代后期，许纪霖多次到台湾进行学术交流。他觉得在台湾就好像回到想象中的民国。他说：“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小地方有这么多优秀的学者，做出这么辉煌的成绩。这让我们汗颜。北大的遗风现在在北大找不到了，台大还有。这是一种风气，在台湾没有中断。我们被政治运动给断了，老先生曾经一度挣扎，在80年代恢复，结果1994年市场经济一来，又断了。”对很多人看到台湾电视上政客与流氓在打架，许纪霖认为：“了解一个地方不能看电视，电视具有欺骗性，几十个人的游行，可以在镜头里面夸张成好像有几万人。如果仅仅看电视，会觉得台湾乱得不得了，但是实际上所谓的乱也就是政界而已，他们的社会还是很安宁，社会和政治已经分离了。”

2011年，许纪霖到高雄开会，因为他很喜欢电影《海角七号》，特意去恒春半岛旅行。当许纪霖正在等从恒春回高雄的大巴时，一个黑车司机过来招揽生意，许纪霖说：“谢谢，不要。”过了一会，来了一辆大巴，黑车司机说：“你们要坐的就是这趟车，不要错过。”许纪霖听了很感动：“我们拒绝了他的车，但他好像对乡里乡亲一样，主动地告诉我们，这是他为人善良的本能。我很难想象在大陆会碰上这种事，一般拉生意的巴不得你错过了这趟车，下趟车要过一个小时才来，于是他的生意就做成

了。但台湾民众却有一种从民国遗留下来的淳朴传统。”
而对于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许纪霖相信会互相影响：

“我们相信中国人是可以搞民主的。只要制度改变了，国民性就会慢慢发生改变。老蒋、小蒋的威权时代伤害了很多，但是老百姓的风气没有被破坏掉。这种文化能够支撑今天的台湾。制度改革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风气、文化。”

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许纪霖深有体会。以前他只喜欢读书，甚至是一个书痴，并不喜欢东走西走，后来他发现，仅仅读书得到的知识是间接的，到现场以后有一个强烈的感官冲击。“那种冲击是任何知识不能替代的，哪怕看电影、现场直播都不能替代，它有一种氛围，我们称之为一种场，所以现场感是最重要的。”911事件发生时，许纪霖身临其境在美国，现场感促使他深思。“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911当中死去的大部分都是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这是一场人类的悲剧，不是美国的悲剧。后来我到911现场，看到的是一个个人名。纽约消防队半军覆没，死去的人一张张照片放在那里，给我很大的震撼，那是活生生的人。我最欣赏哈贝马斯的那一句话：‘911触动了世俗社会的一根宗教神经。’我们都以为世俗社会来了，物质丰富了，人民都不再关心内心的终极关怀、宗教的问题。恰恰是911提示着人类：我们过于忽视宗教、人的精神的问题，这是亨廷顿说的文明冲突，也在提示着我们要正视文明的问题。”

许纪霖认为中国从1895年以后的一个多世纪，正经

历着一个大时代。研究民国时期的人才辈出，许纪霖说：“同时代人通常看不清楚同时代人，要由下一代人来评说。但是现在是寥若晨星，不可能像民国那样群星璀璨。能够成才，不仅靠自己的天才，还要靠氛围，要有个风气。今天风气坏掉了，天才也被埋没了。所以，第一要改变制度，第二要改变风气，天才自然而然就会成群结队地来。”而对自己亲历的时代，许纪霖感慨：“我们这代人真的很幸运，见证了太多的历史。我1957年出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1989年、90年代，这几个时代变化实在太太，我们竟然成为一个大时代的见证人，甚至后面成为大时代的参与者。一个人活得长有什么意思，如果这个时代很平庸，即使活一百岁，我也觉得很无聊。我活到现在，觉得很满足，经历了一个太大的时代。每隔十年就会有让人想象不到的变化，这让我觉得一生很值。如果我退休以后，做研究不如年轻人了，我一定会写回忆录，把我对亲历的时代的一些事件和我的一些看法写下来。”

李怀宇：在80年代初期，中国校园里弥漫着理想主义？

许纪霖：当代中国有两个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一个是王元化，一个是李慎之。讲到王元化先生，我认为，一个人年轻时读的书塑造了一生的人格。王元化先生是19世纪之子，因为他年轻时读的是19世纪欧洲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充满着人道主义的关怀，所以他一生注重人的尊严。

我是1978年“文革”以后第一届通过高考入学的大学生。我们这一届学生，班级里按照年龄排的话，我是倒数第七，大部分都是老三届、红卫兵这一代人，我是红小兵。所以，像我们年轻时读的书都是红色的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就是像塑造我们人格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这些所谓革命的英雄。另外一部分倒是资产阶级的，像19世纪的俄国文学，比如说我们特别迷恋十二月党人，男孩子又特别希望娶到一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因为十二月党人被镇压、流放到西伯利亚后，他们的妻子都是一些贵族少妇，为了忠贞的爱情，跟着丈夫去了西伯利亚。哇，我们觉得真的跟女神一样，这才是我们崇拜的。还有一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罗曼·罗兰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一本影响了两代人的书，因为它描写的是19世纪法国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也是充满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文革”前的大学生都读过这本书，都深受感染。我们那时候也读这些东西，在这一点来说，我们的精神谱系和革命的精神谱系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进入了大学以后那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内容变了，不再是为共产主义，而是开始为祖国的强盛、改革开放、自由民主。但是那种精神气质是一致的，所以整个校园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氛围。

李怀宇：有些老先生说现在大学的理想主义已经越来越稀薄了，是现实主义盛行的时代，他们倒是很怀念以前理想主义的时代。

许纪霖：我也很怀念。我理想中的大学就是生机勃勃

的，不是用李零教授的话说成为养鸡场。如今的学生最关心的都是个人的前途，忧虑多些。不要以为我们那时候前途很灿烂光明，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特别是我是上海人，上海人要离开上海是觉得很难的，很多人就是因为怕离开上海，虽然他们的水准很高，但是不考大学。而我们考进大学以后，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有一个很大的现实可能就是分配到外地去，那时候是国家分配到哪儿就去哪儿。教育部来指标，四川三个，陕西五个，组织上派到谁就是谁。我们那一届华东师范大学招的全部是上海人，“文革”当中到外地去的知青回来了，这批人肯定是不能再到外地去的，该到外地去的就是我们这帮年轻的没有成家的学生。如果按照今天的话，我们从大一入学就要愁死了，没前途，到外地去。外地对于上海人而言简直就是像地狱啊，因为上海那时候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像天堂一样的地方。我们个人前途不是那么美妙，但是我们那时候的整个氛围非常好，谁太早地考虑个人的事，谁就被人看不起，就显得特庸俗。大家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拼命地读书，谈理想，谈知识，关心国家的前途。我们也搞过竞争的人民代表选举，公共生活很丰富，但是私人生活倒是很单调。现在是倒过来了，私人生活很丰富，娱乐、恋爱，各种各样。我们那时候没那么丰富，但是大学有独特的校园生活。我觉得和80年代比，现在是一个大倒退。

华东师范大学在中山校区，丽娃河畔。新来的党委书记施平，他当年是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曾经领导过浙大的一二·九运动。老蒋还专门回浙大，因为浙江是他的

老本营，老蒋竟然还和施平这个学生领袖当面对话。因为施平是老干部，“文革”以后复出，他到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当了党委书记，他就是一个非常有理想、有情怀的人。他让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非常有理想情怀，丽娃河淤泥本来说让民工来挖，施平说：不要！让大学生锻炼，去挑河泥，把水抽干。挖河泥是很辛苦的工作，我是下过乡的，还承受得起。我们有些没下过乡的同学，整惨了。结果挖下来，要给学生补贴，贴的钱超过给民工的钱。但是这个理想主义的书记觉得这是给学生最好的教育。

1982年的国庆节，在共青团操场，新党委书记夫妻带头让男男女女学生跳集体舞，现在学生对集体舞觉得很老土。1982年，男生和女生之间还是有一条界线的，那个时候领导是思想解放，风纪开放是走在整个学校前面的。后来我们学校一些冤假错案的平反，比如说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是大右派，在复旦待得不愉快，党委书记把他引进到华东师范大学，重用一些右派，让他们担任一些重要的教学研究岗位。我们当时出了一个英雄就是王申酉，比张志新还厉害，张志新只觉得毛主席反刘少奇是不对的。王申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认识到毛泽东是一套农业社会主义的路线，“四人帮”粉碎以后在华国锋时代枪毙了，因为说他反毛主席。那当然是个大冤案，也是这个书记花了很长时间，最后由中共中央决定，隆重地为王申酉召开一个平反大会。华东师范大学有非常好的思想解放氛围，每天各种各样的讲座不断。

李怀宇：那时候的老先生还在，你听谁的课印象比

较深？

许纪霖：我在政教系，系主任是冯契先生，是大哲学家金岳霖的弟子，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徐怀启是中国研究欧洲基督教史的第一人，他是何光沪的老师的老师。何光沪的老师是赵复三先生，原来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赵复三先生的老师就是徐怀启先生。徐怀启先生也给我们上课，讲西方基督教史。中文系、历史系有很多名家，我们那个时候就去蹭课。老先生那时候还在，我们还是很幸运，能够接上跳过那段，接上了老先生的传统。我说的老先生是说1949年以前培养出来的。我开玩笑说：年轻人永远有一种“弑父情结”，对自己的老师都看不起，试图要打倒他，然后通过打倒他、超越他，来证明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但是通常会崇拜祖父，特别是曾祖父。因为祖父和曾祖父已经去世了，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也不成为前进当中的绊脚石。所以，我们今天很能想象民国，民国范儿就是一种对祖父的想象，把自己和祖父那代联系起来。所以，我觉得很幸运，80年代有这样一个氛围。后来对我个人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是陈旭麓先生，一个是王元化先生。他们两个对我有直接的影响，他们也都是从民国走过来的。

李怀宇：思想界所谓的“南王北李”这个说法，到底有什么出处吗？

许纪霖：“南王北李”是民间的一种说法，无论是李慎之先生还是王元化先生都不大愿意认可这个说法。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里，这两位实

际上是标志性人物，所以称为“南王北李”。

李怀宇：他们两个人后来私交怎么样？

许纪霖：他们两个都是启蒙的领袖，但是他们对启蒙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王元化更重理性，他觉得中国不仅需要坚守启蒙还要反思启蒙，而这种反思启蒙是理性的，要充分地意识到启蒙当中的负面，它的阴暗性，然后来发展启蒙。而李慎之先生更多地看到启蒙当中的正面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两位老先生，王元化像清代的戴震，义理与考据并重，更强调知识、学理的意义。而李慎之更像王阳明，注重要道德实践，要说真话。我称之为“道相同路相异”。两个人是不同的人格，我和王先生接触更多一点，李先生毕竟在北京，但每次到北京我也会去看他，我同样对他有很高的尊重。两位先生都有各自的魅力。

李怀宇：你在《读书》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研究黄远生的，当时为什么对这样一个记者出身的人感兴趣？

许纪霖：我毕业留校，组织上分配我去研究中国民主党派。我对民主党派历史没啥兴趣，我反而对民主党派中的大知识分子有兴趣，所以后来我就转而去阅读民国时代的大知识分子的史料、生平、思想。研究黄远生纯属偶然，这不是我研究的对象，是很偶然读到了《远生遗著》，也很偶然看到他竟然写了一篇《忏悔录》。巴金《随想录》里面讲了要说真话，巴金很真诚地忏悔，所以我发现黄远生竟然写了《忏悔录》，这不就是中国的《忏悔录》吗？巴金之前，中国人也有像卢梭式的《忏悔录》，这让我很感兴趣。那个时候对知识分子也有很多感

受，因为“文革”当中有太多的人被迫害，就跪下了。等到“文革”结束以后，很多人站起来说：我控诉，都是别人不对。很少有人想想自己是否成为黑暗的帮凶，缺乏这种忏悔。所以，巴金当时是大家都很敬佩的老人，《随想录》里面有一种忏悔之心。我就觉得黄远生那时候就已经在忏悔自己，所以有感而发，这是我研究的一个副产品。但是恐怕我写的文章刚好契合了80年代，这篇文章如果今天发表的话，我相信没有反响，因为现在知识分子不再思考“我忏悔”，都是“我要”：我要什么或者控诉什么，都是体制不好，自己都是好的，都是被迫的。但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是真诚地忏悔，在反思。那个时候我都不认识《读书》的任何人，虽然是《读书》的读者，自己投稿过去，没想到他们就用了，而且一发不可收，后来就成为《读书》的作者。

李怀宇：扬之水的《〈读书〉十年》日记，记她在上海的这一部分里面，好几处还写到你。

许纪霖：这里面我只是参加了几次活动而已。后来陆灏约我写一篇《〈读书〉十年》的评论，我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也是短的随笔，我讲了那个时候的《读书》。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有一个启蒙阵营。虽然那个时候争得也很厉害，但是还有点赤诚相见的味道，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分裂了。随着思想的分裂，现在都是一个个的山头，所以《读书》也好，《二十一世纪》杂志也好，那个时候被认为是公共刊物，容纳不同的声音。现在知识分子完全分裂了，各自有各自的刊物，有自

己的阵地，有自己的人马，所以今天再要恢复到过去的辉煌，吸纳社会各种不同声音的刊物已经很困难了。

李怀宇：我访问过范用和沈昌文二位先生，他们讲那时候的《读书》，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时候《读书》的主编都是没有什么文凭出身的，不是大学教授，他们可以把《读书》办得雅俗共赏。而现在刊物上一些大块文章，没有多少人愿意看了。

许纪霖：这也和90年代中期的变化有关，就是知识分子回到了学术体制。过去知识分子一批人在体制里面，还有一批人完全不在学术体制里面，三教九流都有。三联书店从范用先生到沈昌文先生到董秀玉，简直是个奇迹；吴彬、赵丽雅都没有学历的，但是他们去编《读书》，有很高的造诣，他们知道知识的公共性，知道怎么面对公众来表达。现在知识分子都在体制里，都是写学术论文出身的，文章都没有光彩、灵气，太多的是工匠气。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

李怀宇：时代转变以后，你还保持着理想主义吗？

许纪霖：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对理想、未来没有那么有信心，后来我们成为一些后理想主义者。所谓后理想主义者，就是我们不把理想看作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我们追求的不是它的目的本身，而是这个过程，我们不再把理想的最后实现作为我们的目标，而注重的是它在实现理想、追求理想过程当中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西西弗斯精神”。这当中有一种命运的荒谬感，但是依然试图像西西弗斯一样能够超越荒谬，能够像西西弗斯那样去努力。

所以，我从史铁生身上看到这种东西，他从个人的情怀各方面都展现了一种后理想主义。这种东西和上一辈的红卫兵的理想主义是很不一样的，我在写史铁生的《另一种理想主义》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李怀宇：你什么时候觉得研究思想史或者研究近代历史，要以一个个人的个案来作分析？

许纪霖：我过去是一个文学青年。第一志愿是中文系，阴差阳错没有被录取，但是一直有文学的梦。我们中文系的大家钱谷融先生的话是“文学就是人学”。所以我也一直很关心人的命运，虽然后来我研究的都是和历史有关的，但是我一直关心的是历史当中人的命运。我后来做知识分子研究，一开始就从个案做起，关心一个一个的人。人是复杂的，我特别喜欢展现人性中的复杂性，我不大喜欢那种太简单的东西：说英雄是英雄，魔鬼是魔鬼。这是给小孩子讲的故事。好人坏人，人是具有神魔二元性的，既有神性的一面，也有魔性的一面。所以，我觉得一个具体的人就是具有神魔二元性：有理想、有冲动，同时很怯懦、很世俗。但正是这样，更体现出人格的完整性。我研究过很多人物，包括黄炎培、黄远生、张君勱、胡适、傅斯年等等，从这些民国的人物身上看到了我们的影子，有时候我是用自己、用我们这代人的困境去想象那代人的困境。实际上，隔了一个时代，困境感是相似的。我后来发现，好像这些东西写了三十年，竟然还没过时，竟然还有人要看。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印了一万多册，竟然全部脱销，最近刚刚出版了增

订本，说明这些人性深处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

李怀宇：时代背景不一样，但是人性恐怕一千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许纪霖：所以，我还是蛮喜欢做个案。到今天我也觉得有时候做个案非常得心应手，做起来是非常熟练。

李怀宇：现在很多人怀念民国范儿，你怎么看？

许纪霖：民国范儿，当然我说是一段神话，但它有真实的成分，并非完全虚构。现在民国范儿之所以被传奇化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怀旧也是一种批判，是一种对未来的展望。乌托邦是一种批判，回到三代也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这都是对现实的一种否定。中国人特别喜欢通过怀旧的方式回到三代，所以现在的民国热也是一种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说绝无来由，无中生有，的确也有所本。民国也有很多黑暗，但是民国曾经有的光明是我们现在不曾有的。我很欣赏去年中央电视台拍的八集电视片——《梁思成 林徽因》，史诗般地把民国最优秀的那代知识分子展现出来。有些人注重的是他们的一些外在的贵族的东西，这些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内在的精神，这种东西今天已经缺失了。革命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是浮躁、激进，充满着戾气。这个世俗社会又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平庸、功利、小家子气，但是缺少的是那种民国范儿，就是那种雍容大度、心平气和、追求进步又很温和，身上有贵族气，对民众有同情心、不亢不卑，那的确是一种范儿。现在还看得到这种人物吗？很少了。

李怀宇：不过，我常常觉得历史里面有很多幻象，现

在民国范儿里面有太多理想和想象的成分，如同我们现在看《世说新语》，觉得六朝人物很风流潇洒，但读正史会发现，很多风流潇洒的人物也有很齷齪的一面。

许纪霖：一个时代永远有齷齪的人物，也有高风亮节的人物，所以我们从来不以一个时代的低标准来衡量一个时代。因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这些肮脏、平庸的小人，没有一个时代那么纯洁。但是一个时代伟大不伟大就看它的精英，它能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英雄豪杰、正人君子，那是代表一个时代的高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低度，但是，每个时代的高度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评价标准。第二个标准，我称之为风气。每个时代都有坏人，但不是每个时代的坏人都能当道，都能神气活现的。所以一个好的时代，哪怕是坏人都不得不伪装成君子，哪怕他是伪君子；因为他知道君子才受人尊重，小人是不受尊重的，所以他即使是小人，表面还要伪装成君子，这叫伪君子。一个好的时代，是君子当道的时代，正派人当道的时代。一个坏的时代，小人当道，风气很坏，而且小人都趾高气扬，以小人为荣。所以，从这点来说，民国的坏人，也和今天一样坏，但是，民国曾经有过的君子今天已经稀有了。民国的风气，今天已经荡然无存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和民国的差别。今天有些左派很虚伪，明明把儿子、老婆送到美国去，还口口声声说要反美，现在这种人太多了。

李怀宇：在911事件之后，你对新天下主义或者世界主义思考比较深？

许纪霖：说实话，要回到少年时代，我们受到的教育

不要以为是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是受到世界主义的教育。那时候毛主席一直教导我们，只有最后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毛泽东既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所以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要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被解放。虽然这有点荒谬，但我们这代人永远不以中华的崛起为满足，我们永远关怀着世界的命运、人类的命运，这是我们这代人根深蒂固的情结，这个情结与儒家的天下主义一脉相承。所以我现在特别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谓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是个文明大国，文明意味着什么？文明是天下，是全人类的普世关怀，只有小国才整天念念唠唠地说：这是我们的特殊性，这是我们的国情。中国天生就是一个大国，按照中国的人口、地域、文明的历史和人类其他国家的期待，它需要有天下的眼光。在这个意义上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要把中国的价值放在世界的高度来衡量。过去的儒家讲天下，是指儒家文明为标准的天下，现在要有一种“新天下主义”，意味着普世文明是新的天下。不要以为欧洲人、美国人才代表普世文明，今天的普世文明不是哪家可以垄断，而是由不同的国家、民族，通过对话和竞争共同参与和建构。以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应该积极地加入到普世文明的建构当中。中国要对人类有特殊的贡献，这个贡献不仅是世界工厂，Made in China，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真正的贡献是成为世界的思想工厂，我们对世界普世文明有自己的贡献，这才叫大贡献。所以，我这两年一直讲，中国现在只是富强的崛起，还没有到文明的崛起，文明的

崛起就意味着中国有一套价值观以及相应的建制，这套价值观和建制不是建立在与当今世界上的普世文明对抗的基础上，而是与普世文明能够接轨的，但同时又能对普世文明作出自己贡献的。也就是说，要将中国的特殊文化和特殊道路提升到普世文明的高度，一方面将普遍性内化为我们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将我们的特殊性当中发展出新的普遍性，这才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世界使命。

李怀宇：1901年，梁启超就提出，上世史是中国之中国，中世史是亚洲之中国，近世史是世界之中国。当年视野之开阔让人不得不感佩。

许纪霖：中国既然是一个大国，所做的事情就不能仅仅限于中国特色、中国国情，要以普世文明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儒家从来都是以普世主义的眼光来思考，那是一种人类的智慧，而不仅是民族的智慧。

李怀宇：我们从外部来看，美国的学术界像史华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研究中国的思想史，或者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有没有一些新的眼光可以启发我们现在的学术思考？

许纪霖：张灏先生一直说，美国人都把史华慈看小了，以为他是一个中国问题的专家，实际上史华慈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大家。他最早是研究欧洲文明，偶然的才会才转向研究东亚中国文明，所以他对中国文明的研究有比较文明的眼光，他对中国文明的很多思考也是放在世界文明的意义上来评估的。很有趣的，很多人去寻找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不同的地方，史华慈更多地来看东西方文明相似

的地方。他始终是一个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既不是一个特殊的西方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特殊的东方主义者。为什么中国在文化上走不到世界的巅峰，最大的问题是，近代以后，民族主义出现了，这个眼界越来越小，眼界小是因为胸怀小，老是看到眼皮底下中国这些事情，不能再像古人那样放在世界的眼光里面来看中国。如果你能够从人类，从普遍人性，从全球的目光来思考问题的话，那就会获得其他民族和宗教传统的文化人的共鸣。

李怀宇：你2001年去哈佛大学，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看法会不会慢慢有些变化？

许纪霖：哈佛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大学，什么样的声音都有，什么样的学者都有，哈佛真的可以被称为世界学术的麦加圣地。如果是哈佛研究中国的学者，他们是很了解中国的；但是非中国研究的学者，之前不怎么关心中国，2008年之后越来越重视中国。十年前整个世界还在唱衰中国，觉得中国总有一天要崩溃。但十年以后又倒过来了，到处是唱盛中国，老外比国人对中国的未来要乐观。然而，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还是比不上印度的学者。这里边有很多的因素，一个是语言的隔阂问题。第二是我们的胸怀太狭窄，我们无法在人类普遍层次上思考问题，通常只是考虑中国的问题。

李怀宇：你的研究里面，跟张灏先生研究近代史有很多碰撞或者交流的地方，张灏先生特别强调“幽暗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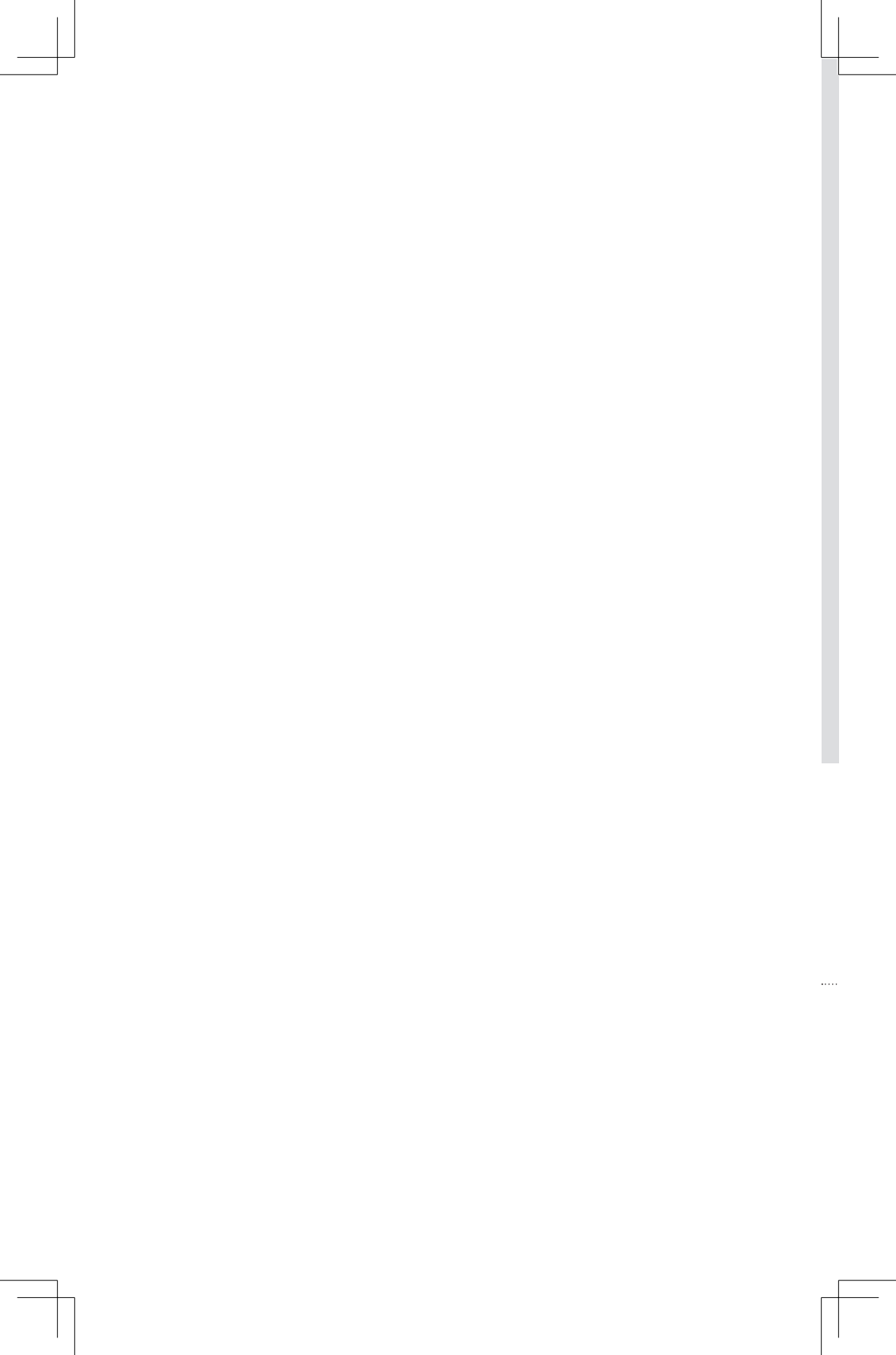
许纪霖：如果说在人格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元化先生，那么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张灏先生。张灏先生受到史

华慈先生很大的影响，也是得其真传的弟子。我对史华慈先生所代表的问题导向的思想史研究传统充满敬意，心向往之。待我去哈佛的时候，史华慈先生刚刚过世，但我从张灏先生那里看到他的影子、思考的方式，对复杂性的思考，对人的幽暗意识的思考，对历史当中多歧性的思考。张灏先生提出的很多命题，比如幽暗意识、双重权威、两种秩序的危机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命题。中国学者喜欢做开天辟地的研究，觉得什么东西都没受到人家启发，注释都是一手文献，什么思想都是他首家独创的。实际上，好的研究一定受到了前辈和同代人的启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代一代地积累智慧，最后慢慢攀登到某个高峰。做研究是要有些家法的，你认同哪一个家法，就按照这个家法做下去，同时又把其他一些传统结合进来，有继承又有变异，这就叫创新。这几年，我们国家老是提倡创新，但创新的前提一定是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又发展传统才能真正地创新。1957年张奚若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我们今天在重复当年的狂妄和无知。

李怀宇：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你认为新天下主义的思想在今天能否发扬光大？

许纪霖：我觉得近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胸怀小了。天下主义的胸怀开始消解，就关注眼皮底下的一点点地盘。中国现在走向了世界，但是精神世界在萎缩。年轻一代人学问做得很精致，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比老一代人做得要精致。但是越来越陷入雕虫小技，背后缺乏大关怀、

大视野。如果这批人就是未来的精英的话，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格局很小的国家。一帮眼界狭窄的技术官僚，再加上一批同样崇尚技术的工匠来治理一个大国。这还算是文明大国吗？这是我很忧虑的。如今的学生接受的教育从小学、中学时代格局就很小，应试教育尤为如此，完全工具化、实用化，这是一个时代的病症。中国文明可能就会在这种小格局的功利主义氛围之中慢慢萎缩，精神死亡。死亡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文化了，照样有消费主义文化、有网络文化、有乐乐呵呵的文化，但是这些文化背后已经没有文明，没有那种超越的关怀，没有深刻的人类意识。这些我们过去引以为豪的轴心文明，没有了。所以，王元化先生晚年非常悲观的，他说到了21世纪可能就是一个文明死亡的时代。他痛心疾首地说，一想到人类文明将亡在我们这代人，就悲从中来。元化先生的苦楚与陈寅恪当年的痛苦有一脉相承之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曾经如此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写道：“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乐名遂。”虽然时代在变化，文化也在变化，但作为从古老文明走来的一代人，总是觉得若有所失，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邓晓芒

哲学就是生活

邓晓芒

1948年生，湖南长沙人。初中毕业后当过十年知青、五年民工和搬运工，1979年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长期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2009年转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康德哲学诸问题》、《人之镜》、《灵魂之旅》等，译著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

邓晓芒长期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2009年12月改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至今仍住在武汉大学的教师住宅区里。环顾当今学界，他感慨中国学者的使命意识太差：“大部分中国学者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在国内学术界排名第几，在哪个领域有没有话语权，开会的时候抢不抢得到话筒，都关心话语权的问题。话语就是权力，所以基本上都在争权夺利，学术政治化，学者一个个像政客一样。我们这些人被边缘化了，我也不在中心。”

邓晓芒的父母是革命干部，妹妹邓小华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残雪。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致使邓晓芒1964年初中毕业后无法读高中，从此在僻远的乡村干农活。他在乡下转了几个地方，一共当了十年知青。病退回城后当民工，修马路，打地基。

虽然失学，邓晓芒有意识地自学，找到一些流落到社会上的书，潜心攻读。他说：“我有时候甚至觉得这是一种优势，因为避开了很多不必要的教育，把用于那些教育的精力节约下来了。体力劳动就是锻炼身体，闲下来我就看书。”当时马列的书到处都有，邓晓芒就钻研马列。邓晓芒对黑格尔的书读得比较认真，后来又接触到康德的书，做了很多笔记、眉批，觉得哲学能解决很多思想问题。

恢复高考之后，邓晓芒觉得自己在哲学方面下的功夫最多，决定报考哲学研究生。1978年考研，他考中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但是他父母的右派问题还没解决，政审没有通过。1979年，他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成为西哲名师陈修斋和杨祖陶的研究生。邓晓芒以初中学历直接考上研究生的例子在同代人中并非少数，当年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态唐翼明、易中天等人也有相似的求学经历。

在武汉大学，邓晓芒看小说、写评论，对哲学的兴趣则渐渐专注于康德和黑格尔。他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主要谈美学：“我觉得康德美学跟我的审美观非常接近，就从这里进入到康德哲学，进入到德国古典哲学。”

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思想争论的热潮。邓晓芒自称是“旁观者”，但旁观者清：“李泽厚他们争论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些问题，我们都插不上嘴。但是我觉得很荒唐，原先我们被所谓的黑格尔压得透不过气了，就觉得康德的不可知论好像还开放一些。其实他们都是大哲学家，德国人从来没有人说：我们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反正读哲学系，这些都是经典。”

邓晓芒1978年在水电安装公司搞搬运的时候，曾给李泽厚写过一封一万八千字的信，批评他以前的一篇美学文章，李很客气地给他回了信。后来两人还见过面。邓晓芒说：“李泽厚在80年代影响很大。他的书都是经典，都是案头书。《批判哲学的批判》讲康德哲学，哲学系学生都要看的。中文系的和搞美学的都必看《美的历程》。我

对《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有很多批判，但是也承认：虽然有一点意识形态，但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难得的。李泽厚的文风影响了一大批人。”而对90年代以后的李泽厚，邓晓芒认为他的影响越来越小：“现在大家信息渠道越来越多了，以前就只有他一个窗口，后来大家都能自己获取信息了，所以他的作用就不太明显了。再加上，他还没有完全脱离那个时代给他打下的烙印，他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理
解已经定型了。当然后来他也想改，年纪大了，恐怕还受一些局限。90年代以后各种各样的美学都出来了，把他撇在一边，也不跟他争。我和易中天倒是还想恢复实践美学，但是认为李泽厚的思路不行，要来个彻底的改造。”

1982年，邓晓芒从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刘道玉在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倡导学术自由开放的风气。邓晓芒觉得虽然当年的经济非常贫乏，但大家心情都特别舒畅，有紧迫感，要抓紧时间干出点大事来，都有一种使命感。当时武汉大学的年轻教师住在集体宿舍——所谓的“筒子楼”，每一家门口都有一个蜂窝煤炉，一炒菜，房子里乌烟瘴气。小孩子还在中间跑，有的还骑辆三轮车在中间拐来拐去，很吓人。

邓晓芒和杨小凯都住在筒子楼，有时在路上办事碰到，顺便聊一聊；偶尔来一个客人，就坐在一起谈谈，正式聊天并不多，但是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邓晓芒回忆：“杨小凯当时醉心于数量经济学，他数学学得很好，在牢里面跟一些数学家、科学家关在一起，又跟他们学英语，英语也不错。他的眼光就要比我们开放得多了，美国

的现代经济学家他都熟悉。我跟他讨论过一次，就是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到底过时了没有，他认为是完全过时了，在凯恩斯以后就过时了。我觉得好像还不能那么说。因为隔了行，他学经济，我搞哲学，有时对不上话，但目标是共通的，就是要把我们国家各方面都补起来。我们欠下的太多，在思想文化方面，拼命在自己的道路上努力。后来邹至庄教授来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经济学教授推荐了杨小凯。邹至庄非常欣赏他，就把他搞到普林斯顿去读博士。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过杨小凯，可惜他早走了，不然的话完全有可能得奖。”

易中天也是邓晓芒的“筒子楼友”，家里曾发生过煤气中毒。邓晓芒说：“冬天冷，室内烧煤取暖，窗子都闭着，第二天大家就头疼。我们都发生过，没有那么严重，就觉得头疼，晚上窗子关紧了，要留一点缝。有时候不行了就要送医院。如果完全中毒的话，就必死了。”邓晓芒的父亲有一个老同事在厦门大学当教授，想调他过去当助手。邓晓芒也对厦门大学的海边风景充满了向往，易中天知道他想去厦大，也起了心，说：我们俩一起去。刘道玉校长得知消息后，亲自到邓晓芒家里做工作：厦门大学哪能跟武汉大学相比啊。结果，邓晓芒和易中天都没走成。到了90年代，易中天因夫人不适应武汉的气候，决心转去厦门大学，而那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已不是刘道玉了。

多年来，邓晓芒专攻德国哲学，也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致力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面对当下学界的后现代趋

势，邓晓芒说：“后现代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糟糕的，可以说后现代让中国那些不愿思考的学者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不用看康德，也不用看黑格尔，我只要看后现代就够了。他们身上的担子就轻了，这是很不应该的。人家是那样过来的，你那个教育都没受过，连小学都没读，就去发明永动机，那怎么可能呢？现在这些人就是在发明永动机，以为后现代就是永动机。”

李怀宇：晚清民初，西方的哲学通过翻译等各种渠道进入到中国，对中国原来的哲学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邓晓芒：肯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光有差异，而且整个是颠倒的。所以我认为中西两大文化在目前这个地球上互为倒影的。西方从希腊开始，到今天的美国一脉相承。中国从三皇五帝到如今，一直没变，包括“文革”，乃至今天改革开放，都没变。闹得轰轰烈烈，好像也天翻地覆了，其实还没变。西方发展出语言、语法、逻辑、社会制度、体制、思维方式、规范化，朝这个方向发展。中国发展了一下，又退回去了，我们最好是不要语言，回到天、回到自然。所以整个中国文化是在语言的基础上往回走的，西方的方向是往前走的，是把它形成制度。到今天，西方的制度好，是因为西方重视语言，重视语法。中国人不重视，觉得语言之前的东西像内心的体验，感觉、情感最重要，那些东西是不可言说的。西方哲学家当然也有这种倾向，认为不可言说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们毕竟把可以言说的东西规范化

了。这是走了两条相反的路。

李怀宇：我们追溯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不是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邓晓芒：胡适的作用主要是打开眼界。原来中国式学问的做法是三皇五帝、盘古开天地到如今一步步讲过来，胡适是有原则的，凡是传说、神话这些不可信的东西一概不取。他截断众流，从有文字记载的正史、信史开始，强调有一种客观性。不要动不动就是道统，从三皇五帝讲起，那就不是学问，那是意识形态，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讲道统。

李怀宇：中国的道统里好像有一个“帝王师”的情结，像冯友兰的经历就反映了一代读书人典型的心路历程。

邓晓芒：典型的，很值得研究。冯友兰、郭沫若这些人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当时显得多么地激进、多么地革命、多么地坚强、多么地独立，骨子里都有软肋。要把这个东西分析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很少能反思到这个层面，唯独一个例外就是鲁迅。那些人在狂热的时候，鲁迅非常冷静地看出来这些革命者一旦掌了权，我们都没法活了。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的人，像储安平就看出来了。鲁迅是最早看出来的：别看他们现在反专制、反迫害、反独裁，反得多么厉害，他们一旦上台，照样如此。

李怀宇：鲁迅可能有切肤之痛，他跟左联那些人的关系并没有搞好。

邓晓芒：他体会出他们的那种霸道，那种唯我独“左”，那种意识形态的僵化，觉得那是很可怕的，没有人性、没有人情味。

李怀宇：后来像胡风、周扬、冯雪峰之间的这些关系，暴风骤雨中就显露出人性深处的幽暗一面？

邓晓芒：对，胡风他们也不是无辜的。尤其像舒芜这些人，当时都各人自保，也要了不少阴谋，他们跟王实味可能还不一样，王实味是太傻，书呆子一个。胡风他们还是有政治头脑的，就是懂政治。但是没有周扬那样懂，还是太书生气。胡风想玩点政治，哪玩得过那些政客呢？

李怀宇：中国哲学里有做“帝王师”的传统，在西方哲学里，像康德、黑格尔，他们比较专心做学问，好像没有做“帝王师”的想法。

邓晓芒：对，这是他们的传统。像亚里士多德是“太傅”，是亚历山大的老师，十三岁就教他，一直到成年。亚历山大征服世界，亚里士多德不去，他不是诸葛亮，他从来不去辅佐帝王干什么。他反过来要帝王为他服务：你打到哪个地方，把哪个地方的奇珍异兽、植物标本给我带来做研究。亚历山大老老实实在地派人千里迢迢从印度、波斯把那些没见过的植物和动物标本送到雅典来，给他的老师做研究。亚里士多德比亚历山大高多了，他是跟神打交道，一个帝王算什么。康德、黑格尔也是在跟神打交道，才不管当时流行什么样的政策。

黑格尔后来是普鲁士专制政府的辩护士，他要论证普鲁士政府是上帝绝对精神的实现。当然黑格尔有一点帝王

师的想法，但是他的前提首先是，整个理论就是这样建立起来、发展出来的。他理想中的其实是立宪君主制，而不是专制君主制，跟英国的立宪君主制相当接近的。所以他也不是完全无条件地为现行政治辩护，他提出现行政治的一个模式，要照这个模式去做就符合绝对精神。

李怀宇：是不是经济独立或者生活比较宽裕，哲学家就会从容一点？

邓晓芒：他们也不宽裕，像康德成天上那么多课，他每上一次课学生就交给他一点学费。康德长期没有工资，他是编外讲师，有学生来听就有收入，没人来听就没有收入，所以康德一辈子连婚都没有结。人家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他说没条件。等到他有条件了，他又不想结婚，老了。这完全是一种观念、思维模式的问题：作为一个学者，这一生应该怎么样过。

李怀宇：在上世纪80年代，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对中国的哲学影响有多大？

邓晓芒：应该说表面上的影响很大。因为它跟马列夹在一起，大家公认它是马列主义的来源。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太浓，但是理解非常表面。我们现在再去对他们加以研究，绝对不是炒冷饭。我甚至觉得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我们原先的理解太潦草，真正要把握它，那是非常深厚的东西。而这种深厚的程度，恐怕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看得出来，德国人都还不一定看得出来。因为我们是旁观者，跟我们的文化相比，觉得它确实了不得。德国人也已经麻木了，没搞出新东西来。德国哲学最近几十年非常沉

闷，没有新东西。但是他们自家的东西，并不见得就搞得很透。当年温德尔班有一句话：能够真正理解黑格尔的人已经死光了。

我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我去过两次德国，上次我到黑格尔读书的地方，相当于他的故居了。黑格尔纪念馆的门口有一个大招牌，上面写着黑格尔的语录：“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说不好啊，黑格尔从来没有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他是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哲学界有争论的，恩格斯专门为此发表过看法，现实的不一定是存在的，存在的不一定是现实的，做过辨析的。德国人在黑格尔的纪念馆门口怎么贴出这样的招牌？我回来把黑格尔的德文全集从头至尾搜了一遍，没发现这句话。德国《康德哲学》的主编来武大讲学，我陪他吃饭的时候就问了他这个问题，我说：这句话是不是有误？他说：是的，黑格尔不是那样说的，应该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我说那不可思议，在德国本土、在黑格尔的故乡，而且是在黑格尔纪念馆的门口，贴出了不是黑格尔说的话，下面注明是黑格尔说的，这怎么可能。他说：“你是对的，我下次去跟那个博物馆的人说：有一个中国的学者指出来你们这个是错的。”可见德国人对自己的传统，不见得就吃得很透。

李怀宇：反而他们在中国落地生根？

邓晓芒：有影响吧，也没有生根。马克思主义都被老百姓抛弃了，都不在乎它了、不管它了。学术界都认为那是老古董，所以它没有生根。说不要，就可以不要的，没有

人有任何惋惜，包括对黑格尔、康德也是如此。90年代，我的一个博士生的一篇博士论文写黑格尔，写得非常棒，我推荐他出版，出版社说：现在还出黑格尔的书？现在黑格尔过时了，没人看黑格尔的书了。我们这里就是一阵风，这些被热炒的人都没有生根。

李怀宇：我看金耀基先生写的《海德堡语丝》，在海德堡大学，金先生研究韦伯，发现德国古典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非常严谨。德国人好像做事都是一丝不苟，非常严谨，这种精神跟他们的哲学研究也有关系？

邓晓芒：是。他们的语言就是这样的，德语跟英语、法语都不太一样。我原来学过俄语，俄语是非常烦的。德语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也相当严谨，一板一眼，逻辑性非常强。所以我学德语，差不多就是学哲学那种思维方式。

李怀宇：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有没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邓晓芒：表面的相通有很多。但是凡是相通的地方只要深入一点看，就会发现貌合神离。比如说中国的天跟西方的上帝，说起来很相通。王阳明的心性、心学，跟基督教的上帝在我心中很相近。表面上说出来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造就出来的人就完全不同呢？就是因为实际上还是不一样。天理在我心中，这是因为天理本身就是很世俗化的，不是彼岸的东西，所以当然在我心中，我就是个俗人，我就是个老百姓。西方的上帝在我心中，它是一种启示，要通过一种冥冥中的启示，上帝还在彼岸，还是有彼岸性，不是说我为所欲为我就代表上帝了，那绝对不可能的。两者是在似与非似之间，看起来相同，但是又不

同，这就有可比性。所以我总是力图首先去寻找相同的地方，然后从中看出相异的地方，这样的比较就会有收获。

李怀宇：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德国学界对中国哲学的了解到底怎么样？

邓晓芒：很不了解。这是两个极端对立的、相反的、相互颠倒的文化。德国人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免不了要从他的那个角度出发，所以他的很多解释往往是貌合神离的。不光是德国人，包括美国人、西方人都是，我看西方的汉学家很多解释都非常可笑。开始看觉得他很了不得，这个学者竟然熟悉中国那么多古籍，比我们还熟悉。但是你一听他的解释就会发现还是隔了一大层，就像练中国武术、太极的那些西方人，总觉得他是做出来的那个动作。

李怀宇：钱锺书的英文很好，他讲“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你是怎么理解他的这种看法？

邓晓芒：钱锺书当然学问了得，他什么都知道。他有些闪光的分析我是非常赞同的，有些亮点他也是说得很精彩的，但是总体框架是不对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等于我们都是人，都是从原始社会过来的，都是地球上的人类，都有语言，都会使用工具，这说了等于没说。怎么样来解释我们这么不同？要用一个普遍的原则来解释西方人、中国人为什么从同样的起点出发，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才能说清楚。当然可以拉扯很多中国人跟西方人的说法，德国人的说法、法国人的说法，放在一起一比，好像很相像，但是不能到此为止，要能在相像中间看出骨子里

的不同。他这方面有些功夫做得好，但是很多都是做得不够的。他才华横溢，他自己大概也陶醉于其中：我什么都知道。

李怀宇：哲学可以指导生活吗？

邓晓芒：哲学不是指导生活，我觉得哲学就是生活。我有一篇讲演就是“哲学与生活”，或者“哲学与生命”。哲学是活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学出来的那不是哲学，那只是哲学知识。哲学史上的知识有很多，有很多哲学命题的知识，像逻辑学，要划为哲学的话，只是一些技巧性的东西。真正的哲学是活出来的，一定要拿命去活。像康德、黑格尔都是拿命去活的，他们都是几十年当家庭教师，受尽了人间冷暖的拨弄。黑格尔是很典型的，大学毕业，拿到博士学位，然而没工作，就到乡村里面去当家庭教师，教一个贵族的儿子。康德也是多年当家庭教师，后来好不容易做到编外讲师，就在那里苦苦地写啊，研究啊，写了很多东西都没有发表。他自己不拿出来，他觉得火候未到，就放在箱子里。现在我们把它找出来，把他未发表的手稿拿出来印，可以看出他在成名之前有多少东西是没有发表的，他就在考虑这些问题。黑格尔最开始是考虑宗教问题、信仰的问题，这都是活命的问题。所以哲学跟生活绝对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

李怀宇：他们的生活经历投射到他们的研究里就有一种关怀。

邓晓芒：他们很多人都明白说出来了，康德有一段话说得很全，他自述：我原来是想当一个学者、当一个科

学家，后来是卢梭教育了我，他让我懂得了我的学问如果不能给一般的大众提供帮助，那我就还不如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不如一个洗衣工、一个裁缝。他说是卢梭让他懂得了，学问是用来为人世间的、为生活的。

每个人都有哲学，人跟动物不同就在于人有世界观：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干吗？就算他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但是有时候他可以意识到。比如说小学生，你要他天天做作业，他就会有反抗，为什么会有反抗呢？他不耐烦，觉得人不应该这样，人家都在外面玩，为什么我要在家里做作业？家长说：你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为将来出人头地，你要考上大学。我为什么一定要考上大学？但是在教育的管制之下，他的这些想法都被压制了。我是因为很早就下农村了，没人管，就让它生长起来了。

李怀宇：有这种切身的体会，写出来会更加深刻一点？中国的哲学里有没有这种传统？

邓晓芒：当然，更加生动一些。中国哲学应该就是这种日常生活的传统。所以，中国的哲学是最适合教给小孩子的，当然也适合于老人，在这里没有什么区别。像儒家，我们说从娃娃抓起，《三字经》、《论语》、《孟子》要小孩去背，不要以为他们完全不懂，当然那些古文他们不懂，但是你如果跟他讲道理，他会觉得非常自然：人是要爱自己的父母啊，你不爱自己的父母你还爱谁呢？然后一步步地讲：你爱父母就要爱国家啊，孝是忠的根本啊。这都很顺理成章的，小孩子都能懂。老庄就适合于老人：你在世上拼搏了一辈子，到老了的时候就要想，这些有什么

意思呢，我们还不如回归自然，回归自然就是回归儿童，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多好。所以，老庄、佛教、禅宗比较适合于老人读。它都是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这些都是生活哲学。

西方的哲学因为重视语言、逻辑，要有推理，比较适合青年人读。青春期是西方哲学叫作“启蒙”的时期。所以，西方的哲学都是在青春期开始，十五六岁的时候爆发出对哲学的向往。这也是生活的哲学，当然更强调青年和成人的特点，是开拓生活的哲学。

李怀宇：除了对哲学、美学的兴趣，你的兴趣一直都很广泛？

邓晓芒：我历来兴趣都比较广泛，现在心力比较集中一点，很多东西我都有意识地克制了。比如看小说，我现在没时间看；文学评论，我现在也很少有机会去写。我已经快六十五岁了，我想剩下的时间不多，我要干几件事情出来。我的兴趣是要干中国人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

《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的名著，有六十万字，我要把它一句一句地解读出来。这在中国没有人能做。大致说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怎么样，很多人都能说，但是拿出一句话来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人有这个本事。当然我的解读也不是绝对权威，也许有的理会错了，但是毕竟我把它贯通了。这个事外国人也不做，外国人在中世纪有人做过这样的工作，像托马斯·阿奎那，他解读亚里士多德二十万字的《形而上学》，解读出近两百万字来。我现在也在做那种工作，比如说：这句话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

分讲什么意思，第二个部分讲什么意思，第三个部分讲什么意思，总的讲又是什么意思；其中用的某个词出现了几次，第一次什么意义，第二次什么意义，等等。要做这样细致的解读工作，排除我们中国人读西方经典的那种恐惧感。

我们过来的人都知道，拿着康德的书有一种恐惧感，完全不懂。虽然翻译过来了，全都是汉字，语法也是通的，但就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要把这种恐惧感打消：你听我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接下来一句又是什么意思，你跟着我来读。我想这个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中国传统的学问，有的是这样的：为《易经》做《易传》，为《毛诗》做《毛诗序》，甚至每一个字都加以解释。中国学问历来有这个传统，但是我们现在把它丢掉了。这种工作太笨，尤其不适合于对付西方的经典。中国经典没有很长的句子，也没有很大的文本。西方经典这么大本，动不动几十万字，太累；而且都是思辨性很强的，要吃透了它才能做这种工作。

我已经做了一本《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当然还没有完成。有人提出来这个不是全本，只是其中一部分。我是按照选读本《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来做的。黑格尔这次是全本，每一个字都要解读。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想把康德的句读补上。

我还想要做我自己的一个哲学。这些都是对他们的解释，对他们的解释当然也不是完全客观的解释，我有自己的体会，我通过我的体会去解释他们。现在我要做一本我

自己的哲学。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

李怀宇：除了做研究以外，你还有公共的一面，为什么对中国当代文学有深切的批评？

邓晓芒：我写了一本《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分析了十几个作家。我还是力图从一种文化转型的眼光来透视这些作家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作品，他们写这些作品背后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模式是怎么样的。我总结出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回归，以前叫寻根文学。什么是寻根，一个是大自然，一个是儿童，一个是文盲，没有文化的，人的最低生存境界。中国90年代文学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寻根，回到远古，回到古朴、朴素，远离城市。当然本世纪的文学又有一些变化，我接触不多，我感觉已经不完全是寻根，感觉本世纪的文学基本是散了，有点像后现代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完全凭感觉了。90年代是有理念的，每个作家都想要表达什么东西。现在的作家没有想要表达什么东西，就是凭一种才气。特别是网络文学出现以后，基本上就是凭一种临时爆发出来的才情、敏感、调侃，没有一点正经，满不在乎。当然王朔也满不在乎，但是王朔是很沉痛的。你别看他满不在乎，他背后有很深的东西，我对王朔非常看好。当然人家说他痞子文学，他表现出来确实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后面有东西。他也能写很纯情的文学。90年代以后，他已经写完了。但是他偶尔发表对中国当代的看法，非常深刻，他是看透了。

李怀宇：近十年来你还有没有看文学作品？

邓晓芒：基本上没看。一个是没有时间，再一个是不想看，因为文学已经碎片化。像莫言，我那本书里面写了他的《丰乳肥臀》，我觉得写得很好，后来我给莫言寄了这本书。莫言回了一封信，说：你对我的评论非常击中要害，你猜中了我的玄机。包括心理分析，他为什么要写那个东西，他就是那样想的。他说：我最近又有一本更好的，我寄给你。然后他把小说《酒国》寄过来。他自己觉得《酒国》比《丰乳肥臀》要好，我看了以后很失望。我觉得已经碎片化，没有一个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在一个空的理念之下，完全是魔幻加才气。当然作家都有一定的才气，完全凭着丰富的联想、搞怪、魔幻（魔幻现实主义就是搞怪），讲一些闻所未闻的东西来吸引眼球，这就没意思了。

李怀宇：贾平凹呢？

邓晓芒：贾平凹后来也没有什么东西了，他也是搞怪。他本来有本土的底子，商州那一带的民风、民气很熟悉，但是完全这样按原本讲，他又不甘心。他要在那里穿插一些魔幻，穿插一些传说、故事，有点像《白鹿原》的那种奇异的东西。当然中国也有志怪传统，鲁迅当年对中国的志怪小说也很欣赏。他们现在就搞这些东西，但这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了吸引眼球。人都有好奇心：怎么会这样，是不是冥冥之中还是有一些什么东西在起一种作用？我觉得没多大意思。中国现在处在赤裸裸、触目惊心的社会状态中，你搞这个还不如老实地反映现实好一点。或者你就另外开辟一条路，总要有路；现在没路了，

就是一点才气，才气完了就完了。我也评了贾平凹的《废都》，他对风土民情的了解、体验，那是没话说的。但是他经常掺杂知识分子的那种梦幻，甚至是性幻想。《废都》完全是性幻想，有点看三级片、成人片的感觉。

李怀宇：对当下还比较活跃的这些作家，有没有稍微留意过谁？

邓晓芒：没有，我后来就比较失望了。当下他们都没有一条路可走，都是各显神通。现在异军突起的是网络文学。我一般不看网络文学，但是有一次看了一篇，觉得写得非常不错，还是现实主义的路。中国这么一个时代，不搞现实主义，搞什么呢？搞其他的都是装饰，都没用。当然现实主义也有不同层次，有外在现实，也有心灵的现实。

李怀宇：这个时代变化非常快，而且现在生活里面稀奇古怪的太多了。

邓晓芒：各种冲突，观念的冲突、内心冲突、人际关系的冲突、家庭解体……能写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人们都瞧不起这些，觉得写这些东西太掉格，非要搞些高深莫测的东西。中国作家不老实，写作不是为不吐不快，而是成为搏出位的一种手段，这就搞不出东西来。

李怀宇：你从读研究生到现在一直都在高校里面，从70年代末恢复高考，到现在三十多年的时间，中国高校的高速发展，恐怕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难以想象的。你亲历其中，想必感触良多？

邓晓芒：对。我觉得这不是在办教育，是在办意识形

态，所以能搞成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规模，如果说办教育的话，绝对搞不了这么大的规模。动不动就来盖大房子，圈一大片地，把整个城市都包围在校区之内。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正常的，都是官学，这不是办教育。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过，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结出这么个怪胎。

李怀宇：这么快的发展，能否真正培养出人才？

邓晓芒：规模越大，质量越下降，容易培养出来一批狂热分子、“愤青”，没有自己的头脑，就是一种既定的东西在灵魂里面发酵。

李怀宇：你跟学生接触，新一代人对哲学有兴趣吗？

邓晓芒：有啊。中国虽然高校扩招，应该说负面因素大于正面因素，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把各种人网罗进来以后，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基础。有些人被排除在高校之外，但是你把他拉进来，他就有一个基础，各种各样的人就可以接受教育。像我的课堂上有很多都不是学哲学的，有的学理工的，有的学财会的，各种各样的，而且还有一些外校的，他们就有机会来听课。而且本来不知道哲学为何物，听了以后，突然对哲学感兴趣了，这种人还不少。当然哲学这个东西，你要让很多人都感兴趣，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常的，哲学就是少数人感兴趣。问题就是这些感兴趣的人，能理解到什么程度，他们将来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这个就很难说。但是有一个基础，就是有一批人感兴趣，这里头才能产生出人才。如果周围都没有，那就很难。反正我在高校每一次讲课、讲座人都非常多，感兴趣的很多。能看得出来他们多少听懂了一些，而且欣赏

的人也有。我讲的那些内容很多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年轻人就喜欢听一些闻所未闻的东西。老生常谈，他才不去呢，而是要听一些异见。所以，有些学生在讲座以后也跟我说：我十几年的教育，被你一个晚上的讲座全部摧毁了。我说：这是好事，一个人一辈子必须要有一次，把自己以前所受的教育全部颠倒过来检查一遍。这是我的一个宗旨，经常在课堂上、讲座里面谈到的反思。你以为是你的观点，其实根本不是你的，人家放进你的脑子里去的，你要反思。

李怀宇：三十几年来天翻地覆大变动的时代，中国能产生哲学家吗？

邓晓芒：应该可以，这就是一个产生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时代。但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出来，我想一来跟几十年来的教育有关，没有自由思考的习惯。再一个，跟我们传统文化肯定也有关系，我们传统文化在哲学方面基本上都是解读前人的观点，而没有人来创造自己的观点，没人离经叛道。西方的哲学那么多大哲，都是离经叛道的，像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都是批判前人来创建自己的观点。中国首先抱定一个观念：我是儒家的，也有批判，就批其他的，批道家，批杨朱，批墨子，但是有一个前提，我是儒家的，我是道统、正统。没有说我开辟天地，我批我的老师，我就成了道统。所以中国虽然处在一个应该出大哲学家的时代，但是没有出。文学可能更有希望一些，哲学基本上没有希望。

李怀宇：未来呢？

邓晓芒：未来就很难预料了，因为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传统的东西有影响，但是不是绝对的？我们也可以吸收西方的传统，也可以成为具有独立创造精神的人类的一分子，也可以开风气之先。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就可能成功。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根本不可能成功。

李怀宇：全球化的时代，像经济学、政治学发展得非常快，研究哲学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小众、精英？

邓晓芒：现在是有相反的趋势，就是哲学家越来越关注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越来越关注生活的问题。所谓后现代就是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力图解构以往的象牙之塔，把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主体主义解构，要融化在现实生活之中，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传统和规律，这些都要打破。甚至哲学都不应该有，像海德格尔、德里达都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他们说：我是思想家，不是哲学家，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人的处境，人如何生活。所以他们反倒跟现实结合得越来越紧。最近几十年来基本上不再有哲学家了，西方都是思想家。哈贝马斯也算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他越来越不像哲学家，像一个政治学家。有的像经济学家，有的像文化学家，有的像美学家、艺术评论家，都是这样一些人。谈以往的那种哲学话题的人不再有了，现在谁还谈存在和非存在的问题？后现代以来的新趋势，自然就把那些架空了，为什么说理解黑格尔的那一代人已经死光了，就是把那些东西都推得远远的了。我们现在把哲学降到人间，把它变成一种思想，不要再讲哲学，我们就谈

思想。海德格尔就谈诗歌，思想和诗歌是一回事；谈艺术，这是现代的趋势。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哲学本身远离了人间、远离了世俗，实际上是世俗把哲学推得远远的。当然，这些人都是受过哲学训练的，都是看过康德、黑格尔的著作，而且读得很透的。海德格尔大量地注释康德和黑格尔，德里达也大量地诠释黑格尔，他们都是有哲学的。但是他们自己搞懂了以后，就把哲学放到一边，来专门谈思想问题，谈日常生活的问题。我们没有他们那种训练，直接拿过他们的话题，免不了像小孩子接大人的腔。



王学泰

中国历史上有独特的江湖文化

王学泰

1942年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华夏饮食文化》、《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中国饮食文化史》、《发现另一个中国》、《“水浒”识小录》、《监狱琐记》等。

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余英时的“士文化”、吴思的“潜规则”，曾被学界中人称为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三大发现。王学泰的著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有深刻的研究，如今他对“游民”有所反思，改称为“江湖人”。

回顾人生历程，王学泰自认坎坷，他著有《坎坷半生唯嗜书》。“我1978年平反，从监狱里出来已经三十六岁了。一算，正是坎坷半生。”他曾在监狱里面待了三年半，后来以《监狱琐记》回忆狱中酸甜苦辣。“我主要是写人生和现实生活的荒诞，不愿意写太多的痛苦。监狱里能没痛苦吗？民国初年招狱卒，其公布的条件是：第一，道德方面得要有好的操守；第二，长得像个样子；第三，要有一定的家业。最后一条非常重要，因为看守对于犯人是‘合法伤害权’的，当时主持狱政的人设想，如果做看守的人纯粹是为了谋生，就可以借职务之便以谋取钱财。在监狱生活中我接触到许多底层社会人，对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意识有所了解，这有助于理解《水浒传》，因为这部小说中也写了不少底层社会人。”

在《“水浒”识小录》一书中，王学泰以独特的视角读《水浒传》，觉得研究《水浒传》比研究《红楼梦》

更重要。他说：“我所有研究的东西都有现实生活中的感受。鲁迅说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读《水浒》和《三国》？因为社会上有水浒气和三国气的缘故。我和何满子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并请教他什么是‘水浒气’、‘三国气’，他说这是指整个社会的黑暗面。我认为‘三国气’和‘水浒气’更多的是指痞子气、流氓气和游民气，就是指一切都是暴力说了算。现实生活当中，我接触过这样一些人，也经历过这些事。”王学泰相信只有公民社会才是中国的出路。“一提到公民社会有些人首先想到的是一些公民社团组织，如非政府组织、私人志愿者组织、慈善团体、社区组织、宗教组织、环保组织、专业协会等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广大民众是否具有基本的公民素质，公民社会是由具有基本公民素质的人们组成的。如果民众不具备基本公民素质，哪怕社会上充斥着各种‘社团组织’及‘非政府组织’，也不一定是公民社会。公民素质的基础是公民自觉。公民自觉不只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更多的是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并从中培育公德心，从而建立起全新的社会秩序。从公民社会的组成来看，每个人应该是合格的公民；从它的规范治理来说，应该是法治社会；从它的组成人员的权利角度来看，应该是个民主社会。这才是正常社会。不走老路也好，不走邪路也好，还能想象出一个比这个更正常的社会吗？我觉得所谓的要走正路就是建立一个公民社会、法治社会、民主社会。我们岁数大了，希望将来子孙生活在一个平静的社会中。中国过去很长时期的社会发展还没走上正轨，所谓‘正轨’就是恢复正常

的社会生活。《水浒传》反映的是天下大乱的时代，这在皇权专制社会是不可避免的，那时是一治一乱，长治久安只是一个幻想。现代文明社会，人们更应理性，懂得自己的最大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哪里，政治运作中文明博弈逐渐地会被全社会接受，因此持久的暴力和大动乱也许会避免。但世态是社会合力演变的结果，佛家讲究‘业’，恩格斯讲究‘各种合力’，有的事真是不可思议，也是个人难以把握的。”

王学泰兴趣广泛，著作博杂。他研究中国诗歌，写过《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他还对幽默感兴趣，写过《幽默中的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如果我有空余时间，明年写一本《中国笑话史》。我对笑话的流传、中国人为什么笑非常有兴趣，因为从笑话中也能探索人性的问题。柏拉图说笑是一种不高尚的感情。笑话人家有小小的倒霉之类，像下大雪老头老太太滑一个跟头，人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笑，第二反应才是过去把人家拉起来。没经过大脑的生理反应肯定就是笑。当然大的灾难不可能笑，因为恐怖控制了一切。对人有小小的不幸可能会笑，因为别人的不幸反衬了自己的优越。笑话许多根于歧视。中国人的歧视无处不在：官员歧视老百姓，老百姓也歧视官员；城里人歧视乡下人，乡下人也歧视城里人；有学问的歧视没学问的，没学问的也笑话有学问的。从笑话中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但现在人很难笑起来了。最能点燃中国人笑点的：一个是‘性’，一个是‘政治’。”

近来，王学泰喜欢读日记，现在读《顾颉刚日记》。

他有不少发现：“从早期可以看出文人学者的生活，真是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他既能搞学问，又能搞社会关系，扩大自己和自己的学术观点的影响，跟坐冷板凳的书呆子不同。顾颉刚脑筋特活，文笔特快，收入也特好。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今天在这教书，明天在那教书，三天两头遛弯儿。这儿也请他，那儿也请他。《顾颉刚日记》中记得最多的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写信，每天要写十几封信，给俞平伯、叶圣陶那些老同学、老朋友，不说天天有信吧，但是三五天他就要写一封信。另外一件事就是吃饭，一天最多的时候有三四个饭局，也跟现在一些特红的人似的，这是文人习俗。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事情就是他和谭惕吾（中国第一名女右派）的私人关系。”

读史阅世后，王学泰感觉中国就在历史轮回当中。“可能这与我们老读史书有关。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历史终结’，我们小时候虽然没这词（其实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就是历史的终结，旧社会是‘历史’，新社会才是‘时间’），但我早就有历史终结的概念。我上初中时就想：这才几年就建成社会主义了，再几年就实现共产主义，天下大同了，全国人民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历史终结了，今后也没有朝代了。以前的阶级社会不过是人类社会短短的序幕而已。”王学泰的新作名为《我们向历史要什么》，他却说：“我们从历史学什么也没学到，只得到一点安慰。现在我老了，才知道不要笑话古人，现代人未必比古人聪明。我所有的研究都不免带有我个人情绪化的色彩，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笔下风起云涌，晚年生活则平淡如水。王学泰写过《中国饮食文化史》，有人把他当作美食家。如今他的妻子吃全素，他也跟着吃素。他说：“我吃得特简单，现在还以素食为主，一天就吃一顿饭。早上起来吃了一个花卷，一碗豆腐脑，晚上有可能吃个苹果就睡觉了。我并不是美食家，也更不敢像苏东坡以‘老饕’自居。”

李怀宇：你研究了《水浒传》中的人物出身，《“水浒”识小录》对梁山人物的身份有新的思考，推翻了学界的一些传统看法？

王学泰：梁山中，一类是游民，另外一类就是社会边缘人。社会边缘人中，有一种是政策上造成的社会边缘人。比如说本来军官应该属于国家的栋梁，但是在宋代实行的是重文轻武的政策，对于军官，尤其是士兵出身的军官，特别歧视。所以说《水浒传》中这种军官特别多，没有高级军官，都是中下级的军官，大的也不过团练或一个州的兵马提辖。

李怀宇：像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呢？

王学泰：八十万禁军教头是兵头将尾，你听着非常大，实际上是非常小的一个职务。八十万禁军就跟现在说二百万解放军差不多。如有人声称他是“二百万解放军教练”，您细一打听，不过是位上士，只是在两百万解放军中教他那个班或者他那个排的军事课。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是听着名声挺大，就跟我所说的那位教练一样。林冲的故事产生很晚，有人甚至推测它产生于明代，甚至有人认为这

是太监刘瑾的故事中的一个折射，讲刘瑾跟他下属的关系。

李怀宇：另外一种社会边缘人有什么特点？

王学泰：另外一种社会边缘人就是所谓的吏胥。负责文案的叫吏，衙门里头负责跑腿的、捉拿案犯的缉捕人员叫胥，这种吏胥在《水浒传》中特别多，宋江就是负责县政文案的吏。有人说宋江是宋代小官吏，这不准确。宋代及宋代以后，官与吏是分开的，吏一般转不了官，吏从宋代之后就是吏（元代除外），永远做不了官。中国古代本来是贵族君子才能做官，老百姓是小人，就是民。但中国古代的社会流动又不是特别死，周代是身份社会，只有贵族身份才能做官，但统治者在这个僵硬的制度上开了一个小口，管子说农夫中“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孟子也说“庶人在官者”就是吏，他们主管官府中的具体事务。这种吏在宋代以前是能做官的，汉代有些宰相就是吏人出身，如公孙弘、张汤、倪宽……车载斗量。到了科举制度产生，特别是到宋代科举制度完善之后，庶人能够参加科举考试，能够通过考试转化成为士人，于是由吏而官的道路逐渐被堵死了。宋太宗时取消吏人做士，原因是他们心术坏，衙门里很多事的具体操作者都是吏，他们干坏事、干脏事，比如向老百姓盘剥、收租之类。宋太宗认为他们老干那些事儿，心术全都坏了，这种人是不能做官的。因为从儒学出发，做官的特别是决定大政的官员要有仁心，因此古代统治者选官的时候很注重心术。他为什么认为士人能做官？因为士人脱离了具体的干脏活的场所，尽管不做这些统治就维持不下去，但是作为统治者，他也

看不起具体的操作者，跟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

李怀宇：“游民”这个概念你有没有做些修正？

王学泰：修正，不断地修正，最近我用“江湖人”比较多。我把“游民”用成“江湖人”。为什么呢？第一，因为游民史很长，从先秦就开始有游民，但游民群体的形成是在宋代，我论述游民意识也是从宋代开始的。为什么我认为宋代才形成游民群体？跟政治现实、城市制度变化等一系列的原因有关。我论述游民思想时是着眼于群体化了的游民的思想。而游民的群体化是闯荡江湖完成的，因此宋代以后较为成熟、生存能力特强的游民群体不妨称之为“江湖人”。第二，游民所组成的“江湖”也首见于宋代，我所分析的一系列的游民意识与游民文化也是宋代江湖艺人首次展布的。通过江湖艺人中说话人所演播的“朴刀杆棒”、“发迹变泰”的故事，我们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套与主流社会大相径庭的价值与思想。

江湖人是一种群体、一种社会。宋代游民与其前代游民不同，前代游民旋生旋灭，他们或是流浪到一块尚未开垦的土地去做小农，或是在流浪生活中丧失生命。如汉代的陈胜、吴广也是游民，他们给人种地干活，没有固定的职业，也没见他们有家、孩子、父母。当然可能历史记载比较简略，但可以看到那会儿游民大多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他们一度揭竿而起，担负了反秦首义大任，不久死难。到了宋代之后，城市发达了，游民逐渐以群体方式出现。而且我说游民意识最初通过文字记载能够流传下来的就是通俗小说，而这些通俗小说就是江湖艺人创作的。江

湖艺人把游民意识、游民思想加以系统化记载下来，并书面化了。

有时候我也用“底层人”来称呼游民，这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实际，在沦入社会底层之后，闯荡江湖是他们的首选。我觉得不管用江湖人也好，用底层人也好，用游民也好，只要生活在中国社会中，都会对这一阶层有所了解、有所理解，关键是用一个什么恰切的概念来指称。有的游民生活非常好，他们也并不一定就在底层。

李怀宇：“江湖”这个词在中国可以溯源到什么时候？

王学泰：“江湖”这两个字合到一起先秦就有，《庄子》里就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那个江湖就指的是江河湖海。当然张远山整理和解读《庄子》时说，庄子心目中江湖就有一种在野的反抗力量。我觉得有时候阐释过度了，但是“江湖”这个概念出现了，这是不容置疑的。江湖长期是作为在野人士聚居的地方，从而成为“在野”的象征，这也是在先秦出现的。“身在江海，心怀魏阙”，这里的“江海”，也就是江湖，江海江湖差不多。身在江湖，就是在野，心里头还怀念着朝廷，魏阙指的是朝廷。后世遂用“江湖”、“江海”、“湖海”指称文人士大夫隐居的地方。《岳阳楼记》里讲士大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士大夫为什么要居住于江湖？江湖僻静，没有朝廷内为名为利的纷争，没有那么多阴谋诡计，比较平和。他们厌倦了朝中的斗争，或者觉得自己的理想没法实现，就回到江湖之上。

这是士大夫的江湖。

但还有一种江湖，就是游民江湖。《水浒传》中，林冲走到沧州道，想喝点酒，到酒馆去。结果店主都没卖给他，说我们附近有一位叫柴大官人的，犯人来了他都要给点银两。林冲就很奇怪：他是个什么人啊？店主介绍：他就是江湖上称作“小旋风”的柴进。柴进是贵族，他要跟官府、主流社会的人相往来，他写拜帖的时候绝不会写上“小旋风柴进”。他要写上自己的名讳、身份、家族，“小旋风”只属于江湖上对他的称呼。这就是说江湖有这么一个群体，跟主流社会不同，他们对人有一种称呼、评价，虽然是个绰号，但实际上寄托着这个群体对这个人的理解、评价。武松跟菜园子张青、孙二娘打完之后，互相谅解了，一块儿吃喝，他们说起江湖上的事儿。旁边押送武松的两个公差吓得不得了，武松还安慰这两个人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无非是说点江湖上的事儿。《水浒传》中的公差什么坏事不敢干？什么丑恶没见过？但他们听到都感到害怕，这说明江湖有一种更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这种江湖绝不是士大夫的江湖，绝不是安静的、摆脱了争名夺利是是非非的江湖，这种江湖是充满阴谋诡计、刀光剑影的江湖。这种江湖就是游民的江湖，江湖人的江湖，底层人士的江湖。这种江湖非得要“闯”不成，古代“走”指的是疾走、大步快走，也是闯的意思。所以走江湖、闯江湖都说明江湖的性质。

李怀宇：武侠小说看得多吗？

王学泰：我初中的时候看得多。因为我在师大附中上

学，离琉璃厂很近。北师大附中就在和平门大街上，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那儿再靠南一点就是琉璃厂。琉璃厂有各种书店，有租赁武侠小说的。我上课那地儿是在老的北师大附中校区，离琉璃厂二百米都不到。那时候租好几本武侠小说看半天，一分钱一本。初中的时候看了两年，好像初三就不太喜欢看了，初三喜欢看诗词了。上高中兴趣又变了，老跑北京图书馆了。

李怀宇：后来的新派武侠小说你有没有看过？

王学泰：80年代看过，我在从事研究，写《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时候还看过。很奇怪，我小时候看得津津有味武侠小说，就是那种旧式武侠小说，现在看不下去了。有时候一天也看不了一本，觉得味同嚼蜡。金庸小说，我初看时觉得还行。读金庸的小说，我老看他的政治倾向。我觉得他写的几乎不是武侠小说，而是写反右、“文革”、“大跃进”的事。我觉得几乎都是影射内地现实的。最早的《书剑恩仇录》里写红花会，本来应是以天地会为原型写的。但他写的完全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也不是历史上的天地会，他写的是士大夫心目中的天地会。我看过很多清朝官方审讯天地会的档案，一看叫“张破脸狗”，这名字哪像《书剑恩仇录》里那么文质彬彬的名字？破脸狗可能是外号，他姓张，可能没正经名字，反正官员的审讯记录就是“张破脸狗”，张破脸狗在答的时候就说：小子怎么样。《书剑恩仇录》写的红花会有多高雅，陈家洛还跟乾隆谈天说地、谈诗论文。实际上天地会到了乾隆时期，就是一个游民组织。天地会成立之时可能跟反清民族

斗争有点关系，但到后来，这个组织在长达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也不断演变，到了乾隆年间无论从人员构成还是从生存方式上，完全是个游民组织了。底层人谋求生活，在江湖上行走，总想找到依靠。一个人到了社会上，其感觉就是一粒沙。长期的宗法社会造成了宗法人个性萎缩，个人很难形成一种独立、成熟的性格，老想依靠更强大的东西，他们老呼喊一种组织作为自己的依靠。

李怀宇：这样的社会背景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

王学泰：我的《“水浒”识小录》中写到招安，招安到底是什么？梁山上有人“反招安”，为什么要反招安？反招安的梁山好汉并非是与朝廷誓不两立，而是这些人只认梁山这个团体。他是一个游民，进入梁山这个团体了，只有在这个团体中他才如鱼得水，才是最幸福的。他不知道到了另外一个社会环境中怎么生活，甚至不会生活。事实也是这样，让李逵单独到一个县里头做官，他怎么能做？梁山对于入伙好汉的要求，不在于他是否有文化，他敢杀人、能杀人就是合格的好汉。而在主流社会中，像李逵这样的梁山好汉，如果没有同伴带领，都不太会做一个普通的社会人。这种具有反社会的特质与能力的人，在《水浒传》中被写得神气活现，并赢得许多评论家的赞美，那是因为评论家们根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你碰上他，你会怎样对他？如果你没有打算把他当作喽啰和枪使的用心（戴宗、宋江都是把李逵视为喽啰的），你会跟他做朋友、互相往来吗？他连基本礼数都不懂，跟丛林中的原始人似的。当然《水浒传》中有的好汉

反对招安是害怕招安之后的不良后果，有的人认为宋江关于招安的思考过于简单化，操作过于草率。像鲁智深这样的老江湖，他知道各种人的性格，不像宋江把人想得那么好。但是反招安的人大多还是出于对梁山这个群体依赖性太强，不知道换一个社会环境如何生存下去。我的《“水浒”识小录》用了两三万字来写回归问题，实际上我觉得社会底层人，特别是触犯过法律，或者是触犯过社会基本规则的人，想回归主流社会真是难。所以，如果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些失足的人，或者在某种环境下发生问题的人，再要走向主流社会就非常困难。我特别提到，一个是做过娼妓、卖过淫的；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强盗”，与统治阶级对着干的。曾经反对过统治阶级，现在不反了，成不成？咱们现在说有一些右派是错划，那会儿谁说他是错划啊？都认为他是正划。现在全控制社会已经解体了，所以现在的人不太在乎这些问题了。

我写《“水浒”识小录》时又想到过去的一些事，解放初的妓女改造也是很艰辛的。有本小说叫《红尘》（霍达著），改编成电影也不错。妓女嫁给一个车夫，本来特别好。但1959年“向党交心”，她突然说自己做过妓女。本来那胡同的人都特羡慕他们夫妻俩的生活，虽然没孩子，但夫妻生活特别甜蜜。到假期了，他们出去玩，她丈夫蹬着车，她坐着车，招摇过市，招来许多羡慕的目光。但知道她当过妓女后，这一下整个完了，从“羡慕”、“忌妒”一下子变成“恨”了。后来再搞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更甭说了。“文化大革命”来了，只要跟主

流社会大多数人不同的，都被批斗，那会儿整这些人：“地、富、反、坏、右”，还有“敌、宪（当过宪兵）、伪（日本时期做过事）、警、巫、尼、僧、道、娼、特（特务）、叛、走（走资派）”。做过和尚的，做过老道的，做过巫婆的，当过尼姑的，当过妓女的，尤其当过妓女的，倒没怎么整，而是社会上没人理她了。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女性，就希望能融入这个社会，但没人理她，真的是辛酸。你就看到那么一个小人物的无助。其中有个细节令我久久不忘。粉碎“四人帮”之后，逐步落实政策，在每落实一个政策时往往在电视上放与之有点关系的电影，那时电视上演了日本电影《望乡》（写日本妓女悲惨生活的），她很兴奋，感到党要给她们妓女落实政策了。

李怀宇：从《水浒传》到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什么会长久不衰，有很庞大的读者群？

王学泰：中国人心里很多地方不健康，缺少独立自主精神。中国人为什么老好抱团呢？我经常说，抱团一块儿是为了内斗，而且在内斗的时候国人往往要给自己一个正义的名头，比如“为了某某”，以突出自己斗争的公义性。

《水浒传》、武侠小说等都是教人怎么进行内斗的。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水浒传》里的豪强地主压迫了梁山好汉没有呢？没有，大都是借某个偶然的故事，造成了两方的敌对，双方大开杀戒。比如三打祝家庄，他们说祝家庄上写的是要踏平水泊梁山，擒拿晁盖，敢与梁山为敌，因而必须消灭之。其实祝家庄并没有起兵替朝廷讨伐

梁山，他们之所以打出与梁山作对的旗帜，无非是借以控制本庄的老百姓，把本村的百姓军事化，从而乖乖地接受祝家老太爷的统治与盘剥。这些梁山也是心知肚明，他们之所以打祝家庄无非是看上祝家庄的财富粮食。非法的江湖人是不事生产的，他们获取财富的方式，文的是坑蒙拐骗，武的是打劫抢掠。合法的江湖人也不事生产，他们博取衣食的方法就是服务业，比如算命、说书等，不直接从事生产。

江湖是非主流的，它寄生在主流社会上。像《水浒传》这种打打杀杀、处心积虑把对方弄倒的故事能够激发人们很大的兴趣，这就跟武侠小说类似。武侠小说也是打打杀杀，也是教人用什么招数，或者是用计策、智力、暴力，或者是在智术、暴力之上罩上一层正义感等，来呈现给读者。读者看了“于我心有戚戚焉”，实际人性隐秘的深处都有一种非法获取的冲动。当然生活在一个特别和平的环境里，社会比较和谐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还喜欢读《水浒传》和武侠小说这一类东西，我弄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人们在心中有所冲动、有点意难平的时候，再读到这些书，阅读兴趣会增大，也会呼唤像宋江那种人物。宋江这个人物所包含的社会内容远远超越了《水浒传》中所写的宋江。传统社会里对宋江评价极高，叫他“宋大哥”，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希望多一些宋大哥。宋大哥是民间社会的领袖人物，大哥是江湖领袖。成龙就说：“大哥并不一定岁数大，比我岁数大的也管我叫大哥，董特首都管我叫大哥。”他是演艺圈的老大，是江湖人的头，所

以人们管他叫大哥，他自己可能没意识到这一点。

李怀宇：江湖人的出现有什么文化土壤？

王学泰：脱离了主流社会之后，没有一定归属的人，会逐渐成为江湖人。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意思就是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就变成了江湖人。第一，江湖本身是集权社会的控制能力逐渐衰减之后产生的。在皇权专制统治严酷，宗法社会完整时没有江湖。皇权专制的控制力松懈、宗法网络日渐解体，游民遂由主流社会析出。游民多了，在谋生的活动与奋斗中除了被淘汰的以外，其他的日渐成熟，成为江湖人。所谓江湖就是有江湖人活动与奋斗的地方。

江湖人本身自外于主流社会，主流社会也不认同他们。江湖人与主流社会的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大多是不同的，两种人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常说的“市场经济”其实只是人们正常的交往方式。人们的交往方式只能有两种，一种是市场方式，我想要你的东西，用我的东西与你交换，这是文明的方式；另一种是丛林方式，就是去抢，这是野蛮的方式。江湖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就信仰这种方式，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比如你要做梁山好汉，必须去做一单买卖、抢一笔财富、杀一个人，这叫作“投名状”。有时也为这种抢劫设计一个“正义的理由”用以消除自己的心理障碍（这种障碍是受主流社会浸染形成的）和邀集同伙。比如智取生辰纲中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的财富是不义之财，甚至会豁出命去保卫自己的财富。

李怀宇：马幼垣先生研究《水浒传》，你有没有留意？

王学泰：我知道这个人，他的书我也看过。他比较着重版本的研究，他有一些意见我也采纳。我出过一本书叫《水浒·江湖》，也采纳了他的一些意见。他原来是研究海军史的。他说更多兴趣还是在海军方面，反正挺博学的一个人。他比较偏重于版本的形成，这的确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中国的小说都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过去对小说不重视，中国四大名著的形成过程都不是很清晰，版本研究就是为了弄清作者的写作目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水浒传》是明代写定的，但这个故事原型在南宋初年就有了。先是在瓦子中的说书场里演说，后来大约也有简单的文字记载出现；在北方，金元两代江湖艺人也通过曲艺（如“诸宫调”）和杂剧等形式演绎宋江及其团伙的故事。到了明代，底层文人把前代流传的宋江及其团伙的故事加以综合写成《水浒传》。南宋、金、元都演绎宋江的故事，但是其主旨有很大不同，或者各有其不同的时代精神，这在《水浒传》中都有反映。比如“忠义”这个主题主要是反映南宋宋江的故事，忠义是南宋意识形态的主流，是南宋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的确，面临北方那么强大、那么彪悍的金人，南方的文士是软弱的，每天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正是忠义把南方统治阶级与民众联合在一起，增加了社会的凝聚力，使得南宋的半壁江山支持了一百多年。尽管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不过是北宋末年活跃在北方的一个抢劫集团的传奇，反映了江湖豪客的冒险生涯，南宋的说书艺人把它与忠义嫁接起

来，宋江等人物不仅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而且受到欢迎和称道，甚至被尊为“盗之圣者”。到了元代的《水浒》杂剧就不见了“忠义”，因为在异族统治下，民众不认同“忠义”。元代《水浒》戏强调的是“替天行道”，所谓的“替天行道”很简单，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流传至今的《水浒》戏能确定是元代作品的有六出，几乎都跟平反冤假错案有关系，都是梁山泊好汉下山，遇到被官府冤屈的人，梁山好汉为他们排忧解难、申冤报仇。元代不仅有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社会问题，而且长期没有法律，吏治腐败。许多衙门的第一把手（达鲁花赤）是不认汉字的蒙古人或色目人，他们糊涂颟顸、唯利是图，老百姓称之为“有日无天”。于是，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梁山好汉为他们伸张正义、替天行道。“替天行道”这个词在南宋留存的宋江故事中没有出现过。

李怀宇：你研究江湖文化，有没有看过美国的西部牛仔片、枪战片？他们有没有和中国江湖文化相通的地方？

王学泰：中国形成江湖这样的群体，除了有游民之外，还因为中国是宗法社会。中国宗法社会中的人性格不成熟，个性是萎缩的，所以才会造成他们向主流社会抗争的精神不够。但一成为江湖人，敢于向主流社会抗争了，也会向宗法社会索取了。但是西方很多人是面对上帝的，没有宗法社会这一环节，他们的个性发展比中国人健康。用孔子的一句话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就是个性发展不成熟的人格。与一个人相处，这个人对他亲近点儿，他就会“不孙”，不讲究

礼貌了；远一点儿，他就会“怨”。这是不完整、不成熟的人格，它是在长期的宗法制下形成的。我们过度地注重团体生活，作为动物的自主能力萎缩了。

作为人类来说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作为生物体的个性存在，他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人，他要跟其他人打交道，要融入一定的社会群体当中。这两个方面偏重任何一面，人都是不完整的。我认为国人在两方面协调得比较好的不多，大部分人都是过度依赖群体。美国不是宗法社会，所以他们强调个人的自我奋斗。而我们恰恰缺少这一点，包括江湖也不是个人的自我奋斗。江湖要“闯”，但闯江湖最后得要归属到一个圈子里去。江湖上很少有独行侠。《笑傲江湖》不就想树立一个独行侠形象吗？结果是不可能的。

李怀宇：你觉得文坛算不算一种江湖？

王学泰：某种程度上算。因为江湖本身是自外于主流社会的，我不同意把什么都叫作江湖。说它有“江湖气”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说的那种风气、那些事、那些风格特色，大家都感到不陌生。大家把不合规则的规则都称作“江湖规则”。

李怀宇：研究历史，能从历史中得到经验吗？

王学泰：很难正确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主政者很难。比如遇到问题，疏导比堵塞好，这简单的道理谁都懂，但是为什么事情来了还是堵呢？谁也不去疏导呢？因为疏导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那要十年八年才能见效，现在等不及。堵马上就见效，一锹土马上水就不流了。

我们处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短浅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问题。短浅利益是底层社会和最高层社会很难摆脱的噩梦。底层社会的人们没钱，吃了早饭还不知道晚饭到哪里去吃。对于这种生活状态的人，要他设计远大理想，就不实际；主政者也是如此，他们往往摆脱不了眼前问题的影响，因为他们面临的永远都是极其现实的问题，要当下解决，甚至认为这些问题弄不好会危及全局，所以先解决。谁都很少说长远利益，一说长远利益就让人觉得迂阔。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知识人为什么能想到比较长远的利益呢？因为第一，他有饭吃，吃饭不太发愁；第二，实际操作参与得少；第三，如果他不搅在具体利益中，就比较超脱；第四，他多读了些书，比较理性。但知识人一强调长远利益，往往会受到底层的嫉恨和上层的打压，两头不讨好。实际上，再说通俗点，长远利益、短浅利益就是繁殖和生存的矛盾。生存就是短浅利益，繁殖就是长远利益。其他生物是大自然给它们设计好了，螳螂交配之后，母的就把公的吃了，增加营养，再生产第二代，那是通过杀死丈夫来构筑长远利益，是大自然设计好的。唯有人类是自我选择，选择长远利益还是短浅利益？人类在选择中，虽然大家都说应该选长远利益，但往往都会选择短浅利益。因此，历史上的悲剧一个接着一个。正像杜牧所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李怀宇：是不是人性里面的很多东西长期以来都没有

太大的变化？

王学泰：对，底层人面临着经济问题、社会困境，最高层主政者也面临着许多现实层面与操作层面的问题。人们总结过往与中外，都想采取最优，所谓结合各种社会形态的优点，其实哪有那么好的事？最后的结局，往往是结合了缺点。陈寅恪早就说过，南北朝的时候老想结合华夷两族的优点，最后结合的都是两族的缺点。最近三十几年发展很快，我们都是跟着走过来的，谁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中国人穷怕了，没饭吃怕了，三十年的极左政策把中国人的手脚都捆起来了，弄得经济凋敝、没吃没喝，突然一“松绑”，许可老百姓自己找饭吃、找钱赚了，一下子几亿中国人在挣钱找饭吃的道路上“迅跑”。这样所迸发出的生产力是不可估量的。这种过快的发展有些畸形、不太正常，是饿了很久的那批人突然爆发，现在这批人已经灯枯油尽了，下一代的中国人，或者说作为独生子女一代的中国人会如何发展就很难说了。



吴 思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潜规则里

吴 思

1957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任《农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1996年起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副社长。2009年担任《炎黄春秋》杂志法人代表。著有《潜规则》、《血酬定律》等。

吴思曾任《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彼时，每周一、三、五上午通常到杂志社坐班，其他时间多在家里读书写作，他的《潜规则》、《血酬定律》已成名著。在编辑与作家之间，吴思更喜欢写作，但事实上用了更多的精力在办《炎黄春秋》。在他背后支持的是杜导正等八九十岁的老先生。杜导正现在还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他的一群老朋友则是杂志的顾问，不时开研讨会，关心天下。

1978年，吴思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他原以为中文系是培养作家的，谁知入校不久，老师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是培养文学批评人才的。吴思觉得还不如去新闻系，到底是培养记者的，而记者跟作家就差一步。于是他想往新闻系调。新闻系的党总支书记跟吴思的父亲是旧同事，她劝吴思：别到新闻系来，想当记者，毕业以后到报社当就得了，新闻系学的东西不如中文系多。吴思这才打消了念头，毕业以后当记者倒很顺畅，觉得父执当年的劝告是正确的：如果学新闻，很大程度上是一门手艺，写消息、写通讯、做标题，迅速就能上手。但是上手虽然快，又缺点别的专业知识，可惜了。

在读书时代，吴思最崇拜的记者是刘宾雁。“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他到大学来演讲，全场爆满，站不下了，要

站到窗台上。那时候，我们觉得记者的榜样就是刘宾雁。现在回过头来看，像他当时最轰动的《人妖之间》，写的是一个煤建公司的经理，他把人写成妖。现在作为一个新闻作品来看，是非太强，法官的意识太强，道德谴责太重。我看那个人，要是现在，是不是够得上犯罪都难说，可是最后被枪毙了。”

吴思也读过法拉奇的作品。当我们聊起法拉奇问基辛格“如果我把手枪对准你的太阳穴，命令你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你选择谁”那个问题时，吴思若有所思地说：“你试过吗？按照这种方法问过吗？我们什么时候有机会试一次，本身就说明进步了。”而对中国记者在三十几岁以后多转向编辑的现象，吴思大感可惜：“其实深度采访，肯定是年龄越大越好，能问得出问题来。有些老记者，他的气势、他的资历、他的年龄在那儿，他可以问一些敏感或有深度的问题。记者要是只当狗仔队，那的确不能太老。”

吴思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苏东坡，更接近历史。毕业后干新闻，在写现实的时候不断遇到麻烦，便开始研究历史。他甚至发现半年也不一定能采访出来的东西，只需要花一两个月在历史中探求，往往有所收获，于是渐渐陷到历史里，终于独创了“潜规则”、“血酬定律”等概念。

在现实生活里，吴思不时会遇上“潜规则”。他认为在中国做媒体的特色就是摸索真实的言论边界，这个边界跟宪法宣布的边界不一样，跟行政法规宣布的也不一样。每个人，每件事，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尺度，复杂丰

富，构成了这个领域的潜规则体系。他观察中国媒体近年的变化：“我们现在得到消息的精度、广度、深度跟十年前根本没法比。这是言论空间跟信息传播手段进步的结果。”而网络对传统的纸质媒体的影响，吴思说：“像我们《炎黄春秋》的读者通常年龄偏大，他们上网少，习惯传统的阅读方式。至少在我们可见的几年之内还看不到衰落迹象。”

回顾华文世界的报业史，余纪忠的《中国时报》与王惕吾的《联合报》相激相荡的时代，依然让人荡气回肠。而蒋经国晚年开放党禁报禁后出现的多元时代，至今仍值得深思。吴思说：“中国媒体前赴后继，死一个人，后面踩着上，换一个人上来还是这么一个气氛，靠尸体铺路也能把圈子撑大点，这是拼命换来的。在中国，能够走得远一点的媒体，或者有后台，或者有体制优势，或者就是前仆后继不怕死；凭借这些过人之处，事实上制造出几个特区，其他成不了气候的都被掐死了，这几个特区就显得比较扎眼。将来没有特区了，大家都一视同仁。原来那些特区的风头全都没了，那就进入一个新的战国时代，再一统江山，有几个大的报系分掉市场。我估计未来的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今，吴思正在研究“大赦”的历史。有幸亲历大变动时代，吴思对改革有独特的思考：“人性就是趋利避害，借助这种趋利避害的人性，设计一种激励机制，形成一种利益交换，用安全换制度。如果这样搞政治体制改革，让各方面的收益大于成本，前景应该更乐观。”

李怀宇：你当记者的时候，到下面采访发现了“潜规则”的现象？

吴 思：对。我在《潜规则》的前言部分写了，化肥的分配规则是一套，都是书面的规定，实际上并不是这么运行的。反正这个东西要表达出来，另有一套东西，而且那套东西不是瞎闹，谁能批条子，谁的条子管用，能批多少，全是有规矩的。这套规矩，纯粹从化肥分配的结果来看，比如一万吨下去了，最后有多少吨是正式按照规则走的，多少是按潜规则走的，都能计算出百分比来。我就发现，至少在化肥分配问题上，潜规则的作用更大。当时没这个词，用的词是“内部章程”。

李怀宇：什么时候冒出“潜规则”这个词？

吴 思：大概1996、1997年，那会儿开始认真读历史了，读《明史》，就想从“内部章程”这个角度看看，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之下，明朝真实运作的规则是什么。有了这样的意识，就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东西，到处都是现实怎么运作的史料。以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时候，我就想找个词，拿几个词组合：“内部章程”、“规则”、“灰色章程”、“灰色规则”、“内部规则”，不知道怎么加个“潜”字，就觉得这个组合最好：“潜规则”。这个组合一出现，就觉得就是它了。

李怀宇：这个词以后会写入历史的。现在变成娱乐圈里“潜规则”这个词用得最多。

吴 思：对，描述导演跟女演员的关系，而且当动词来用，谁把谁潜了。

李怀宇：你做新闻的时候读到历史，为什么对明史特别感兴趣？

吴 思：明史简单。首先离我们近，太远的不行，先秦的就那么点东西，肯定不够；往后，比如《史记》里记载的那些东西，支持材料也不多了，至少你想看谁的日记、谁的书信，很少了。清代倒有的是日记、书信，大量的，麻烦的是没完没了，多得看不过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冒出一个东西来，别人有话说：你以前没看到，你说的不对，另有史料。清代还有一个异族统治的因素，我们现在没有异族统治因素。想了解现实，离现在最近的社会结构就是明朝。

明朝的历史是朱元璋创始的，在那之前，元朝垮了，很多东西都要再创，模仿大唐律来制定大明律，如何取舍，可以找到制定规则的初衷。制定规则的时候，他觉得不够劲，再来一个大诰，像毛主席语录似的，起法律作用。朱元璋会解释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也能看到这些立法实际的失效。

总之，没有异族统治的因素，史料不多不少，够你用，但又不至于无穷无尽永远看不完，那就是明史。而且明前期，跟毛泽东时代的近似程度非常高。朱元璋的统治方式，怎么处理贪官污吏，比如发动群众监督官员，把有问题的官员发配到他的老家去劳改，看起来就跟五七干校似的，非常容易联想起毛泽东时代那些一轮轮的运动，干部下放、五七干校。那些事我都经历过，看了那些就觉得在眼前似的，看到的是很熟悉的事。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明史就变得很有吸引力。

李怀宇：像吴晗、范文澜的研究，你留意得多吗？

吴 思：吴晗写的《朱元璋传》，看明史的人都得看的，我看了。范文澜的那些书，我在上中学的时候，读《中国通史》就是读他的，一本一本地读，好像每个朝代怎么写我都能背下来了，像拉抽屉似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全是那个路子写的。我后来没再看，不知道现在看有什么感觉，当时就觉得不好看，而且觉得这些好像谁都能写，就把遇到的史料，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往里装就行了，每个朝代这么一理，就下来了；然后再加上一个阶级分析，再加一个生产力、生产关系，地主和农民的斗争。觉得千篇一律，既不好看，又牵强。

李怀宇：黄仁宇为了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花了七年的时间进行研究。他利用两年半的时间，把《明实录》一百三十三册从头读到尾，还做笔记，慢慢地把整个明代的财政税收问题搞清楚。在此基础上，他写《万历十五年》，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后来《万历十五年》在中国流行，你初读的时候有没有石破天惊的感觉？

吴 思：我是1986年看的。那个时代的人对历史书的期待就是范文澜的那个写法，没有见过好看的历史书。我是偶然听到我们报社的一个编辑说，《万历十五年》挺好看的。我听她推荐得特别认真，就买了一本，一看，果然好看。我就向我的大学同学推荐，把书借给她了，她就不还了，她也借人了。一般人一看就觉得大吃一惊：还能

这么写历史！我们心目中的历史书不是这么写的。看了以后，耳目一新：历史还能这么写？有那种开窍的感觉，对历史的感觉一下子好起来了。

李怀宇：不过黄仁宇在美国非常不得意，一生可以说是郁郁不得志。

吴 思：他的书如果现在引进来，我估计影响肯定比不上那个时代，他具有开创的功能。不管是他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还是《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那几本书现在进来也被淹没，跳不出来。《万历十五年》如果现在引进来，会成为受欢迎的书，但是不会有当年那种地位，人们已经见多识广了。

李怀宇：你在《潜规则》里很多是以明史作为基础，很多案例是用明代的历史来分析，但是其实很多都关注到当下。是不是有这种意识？

吴 思：是。《潜规则》里面具体的那些东西，淘汰清官、清官堕落，像这些事，现在官场上还是这套东西。我们现在有这些东西，一看历史原来就有，而且人家表达得很清楚，一下子把现实的纵深拉到几百年前去了。有了这几百年的纵深作为根底，我就敢写了。那么，到底是写明史，还是写现在呢？这其实是没有分别的，是打通了的，都是一个模型，一种规律。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因为要了解现实，才开始挖这个时代的根子，到底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确实很难说，全都混作一谈了。

李怀宇：你在现实生活里面碰到的潜规则多不多？

吴 思：比如说当编辑记者，我1986年在《农民日报》

当群工部副主任。那一年我就是专门处理来信，有时候接待上访。那时候报社经常有上访的，看读者来信，好多信其实都是上访信。处理那一年的上访，看了一年的读者来信，看到的估计都是现在信访局看到的那些事。到处都是冤假错案，都是那种“我就这么办了，你怎么着？你告我去啊”。对老百姓来说，被人欺负是无可奈何的，告的成本极高，告下来的概率很低。一年看到的基本是这些，民和官之间的那种关系，老百姓的无可奈何。报社编辑一般也爱莫能助。读者来信引出的调查，极个别也能搞几个，一看这事有点新闻价值，值得一说，下去查查，基本也都是这么回事。我有一年基本就耗在这里，耗在中国社会潜规则引发的各种东西里面。

李怀宇：你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挫折或困难？

吴 思：咱们当编辑记者的，都知道我们面前的真实规则是什么。宪法怎么写都清楚，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我们也清楚，我们整天都生活在这些冲突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潜规则里。

李怀宇：后来你写了《血酬定律》，在西方有没有这种计算方法？

吴 思：血酬定律就是算人命，算暴力掠夺的成本和收益，而且付出的成本以人命为单位计算。这类计算，我没有见过其他学者的研究，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不过，我从血酬定律的角度解释中国历史的一些制度变迁，伴随着多方面的利害计算，这方面有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

有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叫奥尔森，以中国土匪为例，也是讨论并计算与暴力有关的利益分配。而且他在分析暴力的时候谈到一些重要的概念，我觉得这些概念都很好。例如“共容利益”，就是暴力集团，土匪或者军阀与老百姓之间存在一部分共同利益，他叫“共容利益”。比如兔子不吃窝边草，不抢附近的民众，附近的民众也给他通风报信，那里就有“共容利益”。奥尔森有一本书《权力与繁荣》，讨论暴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看了之后，感觉我走得比他远。首先，暴力掠夺的收益应该有个名称，就好像工人打工的收益叫工资，地主出租土地的收入叫地租，资本投资的收益叫利润或者利息。研究这些问题，写地租论、资本论，或者是工资论，总得给它起个名字，我就可以叫它“血酬论”。首先得有血酬这个概念，然后，进入这个概念，深入研究各种内部关系，再进一步研究这个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发现固定的逻辑关系，找到规律，再用这个逻辑去解释各种历史变迁，解释中国的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之间的关系，解释暴力集团内部的关系。我看奥尔森的感觉就是，我们的方向一致，但我比他走得远点。

李怀宇：是不是中国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实在是连绵不绝，太多了？

吴 思：是啊。你翻开历史，梁启超说过，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相斫书。满篇都是战争，公开的或暗藏的暴力竞争。

李怀宇：在1949到1976年之间，有不少案例可以作为

血酬定律活生生的例子？

吴 思：是。不管是土改，还是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基本都是以暴力为最终的威慑，推动制度变化，或者强行改变制度。面对基本上没有反抗能力的个人，我们把暴力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我把这种暴力决定制度的道理，称为元规则，即决定规则的规则。元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李怀宇：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有没有走出这个圈？

吴 思：“文革”结束的标志就是粉碎“四人帮”，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后来，我们看到改革开放的决策者，也是可以指挥枪的那些人。开放到哪儿，或者改革到哪儿，这个边界是怎么选定的？比如说，最有利于党的领导，可不见得最有利于农民的发家致富。如果农民的发家致富跟加强党的领导是一致的，那就开放到那儿。如果再往前走一步，就损害党的领导了，虽然有利于农民的发家致富，但是仍然停下来。决策者始终是暴力最强者，依然是“元规则”起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各种制度变迁、规则变化、改革，都是规则的调整，背后都在遵循这个规律。我们始终在这种元规则的支配之下，在这个意义上，一直没走出来。

但是现在跟三十年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三十年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降。当年毛泽东也知道大包干能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理想，比吃饱饭更高的

理想——建设共产主义，他还想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他明确地说：我们要走群众路线，但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农民要自由，我们要社会主义。为什么不给农民自由？因为这跟共产主义理想是矛盾的。毛泽东去世之后，到了改革开放，这么强烈的意识形态追求消失了，当国际共运领袖的追求也消失了。核心目标，最大的价值，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转换成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应的，一些经济自由可以放开了，我们也看到了自由的一系列的扩展，农民、工人、商人、资本家有了自由，而自由就是规则边界的调整。最高的决策者，或者统治集团认为，这样的调整不仅符合农民的利益，也符合统治集团的利益，这是他们的共容利益。改革开放前跟改革开放之后，最重大的变化，摆在第一位的，就是最高价值的变化，由这个变化导致了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的变化。元规则仍然在发挥作用，对权力最有利的变化发生了，各种调整就发生了。但元规则仍然是决定规则的规则，最根本的规则。

李怀宇：在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之外，你还创造了许多新词？

吴 思：我也没细数过，有几十个吧。比较大的词是“官家主义”。秦以来的社会，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百代都行秦政制。我们现在行的是秦制，郡县制。秦“废封建、立郡县”，封建制已经给废掉了。可是我们的教科书说，秦汉一直到晚清，中国都是封建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是教科书上的标

准表述。但是这个表述无法跟古汉语接轨，古人不会认这个账：早就废封建了。用这个概念去跟欧洲翻译的封建主义接轨，人家也不会认这个账。西欧的封建，还有日本的封建，都是许多世袭贵族，许多独立王国，上面架着一个大王。不是像中国这样大一统，每一个地区和部门的干部都是上面任命的，就像上市公司一样，皇帝当董事长，聘一个CEO当宰相，再聘一堆MBA，进士、举人当知县知府，除了皇帝之外，都不许世袭。考试选拔，代理人几年一换，官家主义很像一个上市公司的结构。封建主义更像是商会的结构：一堆小老板，推举一个大家服气的老板当会长，但是这个会长只有自己的公司，不能把别人的公司变成自己的公司。就像英国国王一样，有他自己的一个地盘，其他的贵族有贵族的地盘，你要征人家的税，要征得人家的同意，不同意可能引发战争，英国的大宪章就规定了这样的关系。中国不像商会制度，更像上市公司制度，打天下坐江山的那些人当股东，封王封侯，每年按股分红。董事长杯酒释兵权，不让这些股东干涉公司事务，公司的事单请一批人来打理，封建贵族退居二线，这时候就不能叫封建主义了。如果封建贵族在一线，当着小老板，那叫封建主义。到了郡县制，当家做主的，主义的，已经是官家集团，所以叫官家主义。

“官家”在古汉语里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指的是皇帝，《水浒》里的赵官家说的就是皇帝。第二层意思是衙门，路是官家的，叫官道，树是官家的，叫官树。公家和官家是同义词。第三层意思是，官家是对官员个人的尊

称。古汉语里官家就是指皇帝、衙门、（官员）个人。这三者在中国古代都可以“主义”：主，当家做主，立法定规；义，就是那套规则，正义的那些观念由他们来规定。皇帝去主义，立法定规，就是王法。衙门立法定规就是部门法规、地方法规。官员个人立法定规，大体就是潜规则。这么一个结构就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管用的那套规则体系：王法管用；地方法规、部门法规、各项土政策管用；官员个人的潜规则也管用。这三个主体之间还互相争夺地盘，皇帝强了能把这两个压缩，能反腐败；衙门强了，能把皇帝架空，政令不出中南海；官员能力强了，不仅能让政令不出中南海，还能掏空各级衙门。但是，这三者不管怎么勾心斗角，立法定规的都属于官家这个集团。所以我就把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为官家主义社会。

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比较贴切的命名，比封建主义好多了，比专制主义也好。李慎之先生推广的一个说法叫“皇权专制主义”。“皇权专制主义”比专制主义贴切，比封建主义也准确，但是有一个问题，单说皇权专制主义，就是我们讲到的王法，那部门法规、地方法规呢？政令不出中南海，中南海之外谁在主义？还有潜规则，谁在主义？所以，仅仅说“皇权专制主义”也不贴切。比较贴切的说法就是官家主义。

李怀宇：你最近在研究什么？

吴 思：最近正研究“大赦”的历史。皇帝登基，大赦天下。有时候特赦，有各种各样的“赦”，赦免各种罪。中国历史上的各种赦免实际上都是利益交换。比如说，秦

朝记载的唯一一次赦免就是陈胜吴广反了，起义军造反，过了潼关，直逼咸阳，皇帝怎么办？军队全都出去了，或者被击溃了，反正不在咸阳。于是就大赦，赦骊山修秦皇陵的刑徒，全都免罪，发给武器，上战场打仗。弄来几十万人，章邯带着他们打，一战而胜。秦朝记载的唯一一次大赦就是这样的利益交换。赦免人家的罪，换来去打仗卖命。后来的赦就多了，到了汉以后，几乎一两年一次，但实质都是在交换。有的时候跟天交换，有的时候跟人交换，有的时候跟罪犯交换，有的时候跟造反起义的交换，核心都是利益交换。

我们现在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推动力量在哪儿。人家都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与虎谋皮，你让既得利益者，尤其是贪官污吏搞政治体制改革，办得到吗？那不就等于让他们自杀吗？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搞不下去。但是倒过来想，如果能把贪官污吏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搞政治体制改革，那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容易得多。怎么能够调动贪官污吏的积极性？需要一次重大的利益交换。你来搞政治体制改革，搞民主法治，把你自己的权力献出来，但是可以交换来一个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最缺的已经不是钱了，如果是贪官污吏的话，最缺的是安全。那就用安全来换。他们那么多钱了，也该退休了，给他们一个机会，把钱洗白了，换取他们支持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就是一次大规模的利益交换吗？这就伴随着大赦。当然，不能光赦贪官污吏，连各种冤假错案一概大赦，大赦是针对所有人的，以前的事既往不咎。一旦有这样的激励，贪官

污吏会怎么做？对他们来说，早改成一天，他就早安定一天。要不然总是一个心病。所以，这是一个强大的动力。

大赦合理吗？它的正当性如何？为此就得去找中国历史上的经验。但是仅仅找中国历史上的经验说服力不够，人家已经不觉得中国的传统经验有合法性，封建社会或者说皇权专制主义社会、官家主义社会，并不是我们可以理直气壮模仿的。那其他的转型国家是怎么处理历史问题的？那些贪官污吏，或者各种背上其他罪的人，他们受到追究了吗？

转型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官方主导转型，改革；一种是民间主导转型，推翻过去，替代；还有就是上下商量着来，民间和官方的力量都很强，比如像波兰那样，团结工会、政府都强，既不是改革，也不是替代，居中状态，改替。凡是改革都没有追究，都没有清算；凡是替代都有追究，既然推翻了你，就得算算过去的老账。所以，如果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就等于完成了一次大赦，改革成功不会再有历史清算。如果我们明确认识到这一点，知道这样的交换在中国历史上，在外国历史上，在转型社会中，是不断发生的，是重复出现的，那我们就可以主动利用这种交换关系，事前就把它拿出来作为悬赏，与其等转型完了再赦免，不如现在就用赦免激励转型。这样，就会把以前看作不可逾越的抵抗力量，与虎谋皮的那只虎，一下子变成了改革的推动力量。我想介绍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就关注大赦方面的历史。

李怀宇：接下来写书有什么计划？

吴 思：关注大赦之前，我看的是各个王朝的兴衰史，尤其是崩溃史，一个个地全过一遍。还没过完，就给这个“大赦”岔开了。等“大赦”这篇文章写完了，再回过头去接着看王朝的崩溃史。看完这个打算研究私盐。这些都是干了一半的事。但是我干这些事之前，还可能被其他事岔开。

李怀宇：史料都是看哪方面的居多？

吴 思：比如说“大赦”，先看《文献通考》。看完《文献通考》之后，再看清人写的《六典通考》，看与刑部有关的各种史料的汇编。看完这两本，我发现晚清的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当过刑部的头，有四大本《历代刑法考》，其中有几百页是“大赦考”，比前两本完整细致多了。看完沈先生的考证以后，再看一些原始的赦书，中国有关大赦的史料大体就了解了。然后就可以动手写了。外国的情况也看了一些。看的过程中做大量的笔记，什么事情重复出现，你就可以猜测，提出一个假说，这是不是一个规律啊？最后能写出什么东西不知道，先把那些史料过一遍。

李怀宇：晚清出现了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发展有没有一种独特的规律，能够独立于全球化浪潮之外？

吴 思：中国已经卷进去了，现在全球化介入多深。经济上已经结合得这么紧了；宪法本身是西方的东西，宪法我们早立了；政党也是，我们穿的衣服也是，我们用的语言也吸收了大量西方词汇，我们没有独立于全球化的浪潮。

李怀宇：潜规则、血酬定律，适用于中国以外吗？

吴 思：我没认真研究过，但是有时候看俄罗斯的历史，看赫尔岑写的《往事与随想》，19世纪的那些事，感觉俄国也是遍地潜规则，甚至比中国的明清还要野蛮，还要赤裸裸。看1789年之前的法国史，法国的贪官污吏怎么敲诈勒索，到处拦路收费，看起来跟中国的明清也差不多。可能这不是民族的差距，而是制度的特征。法国是官僚帝国，俄罗斯也是官僚帝国，中国是一个比它们都要成熟得多的官僚帝国。可能在官僚帝国，或者官家主义的体制之下，潜规则都是常见的，都是官员作为代理人自己谋利的那套规则体系。要是看美国当代电影，涉及军队系统、政府系统，也有潜规则。但是，以一百分为标准的话，中国的潜规则能管七十分的作用，人家那里的潜规则似乎范围小得多，烈度也低得多，可能只管七八分的作用。这只是粗浅的感觉，我没做过这方面的调查。

李怀宇：如果从历史发展来讲，你认为中国这三十年的变化，算不算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吴 思：看从哪个角度来说。要是说中国的经济，一下子从一个农业社会变成一个工商业社会，改革开放前工业和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大概持平，现在农业占GDP不过10%，90%的财富是由工商业创造的。过去我们一直说80%、90%的人口是农民，现在的城市化，城市居住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农民。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在这个意义上，那肯定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化”，或者说有史以来没有的大变化。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说，你说

中国的书面语言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化”，恐怕就不行了。我们知道那是白话文运动出现后，文言文都取消了，民国的时候变化就完成了。如果从政治结构的角度看，官家主义的核心结构还没有完成转型，秦汉以来的两千年大变局尚未完成。

李怀宇：中国农村社会有没有产生巨大的变化？

吴 思：2004年之前，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交的各项税费加起来不能超过农民收入的5%。1998、1999年那一段，我们到农村去调查，一户一户地问，一笔一笔地算账，实际上农民真正交的各种税费，加起来大概在20%—25%之间。也就是说，名义上5%的税费，实际上的税费是它的四到五倍。在这个意义上，农民生活的潜规则的强度比正式规则的强度要高四到五倍。那时候农民就生活在潜规则的支配之下。从90年代中期之后，官员和农民的矛盾激化，遍地干柴，点火就着。同时，征收各种税费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农民反抗越来越激烈。2004年取消了农业税。其实农业税本身没多少，但是一取消，再取消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尤其是特产税，就像个筐似的，什么都能往里装，都能说是特产，这些东西一刀切，不许收了，基层的官员干部就没有借口到农民那里要钱。这种一刀切的政策一出来，潜规则所依附的正式规则就消失了，搭车收费找不到借口了，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一扫而空。后来，又增加了很多补贴，农民种地不但不交税，还给补贴。如果说还有潜规则的话，可能跟这个国家掏钱补贴有点关系。比如说，这个补贴补到哪去了，是不是干部多拿了，是不是干

部给他的亲戚多分了？在这个意义上还有潜规则，可是这个强度跟以前就大不一样了。我觉得2004年之后，农民活得跟过去比判若两人，像个主人了：你欺负不了我，我不理你那一套，你能怎么着我。所以，2004年取消农业税是一大变。

李怀宇：你觉得在民主社会，潜规则会不会越来越少？

吴 思：我觉得会。只要把最基本的官和民的关系调整过来，让在潜规则中受害的那一群人更有成本更低的反抗方式，就能让潜规则大规模下降。现在的潜规则，欺负老百姓的，一旦老百姓很容易反抗了，像农村的乱收苛捐杂税、敲诈勒索，如果有了真正的人民代表，农民给自己的代表打个电话，像台湾那样，“议员”就兴致勃勃地带着一帮记者找上门去。这是得选票出名的好机会，有这么多“议员”和媒体瞪大了眼睛在寻找出名的机会，这潜规则还能存在多久？

李怀宇：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没有可能尽快地推动政治制度改革？

吴 思：这种说法是一种西方曾经流行的理论，就是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或者宪政民主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转型的可能性就越大。比如人均GDP到多少就该转型了，或者是中产阶级在多少收入水平之上，哪群人达到多大比例，就该转型了。就是经济的重要性，或者识字率多少，读书人多少，大学毕业生多少，都有一堆这样的指标。但是这些东西，一项一项地验

证起来，到所有转型或者没转型的国家验证一下，总能发现反例。人均几千美元、上万美元的也不转，有没有？产油国家多了去。才一两百美元的转不转？印度才多少，早就转了。所以，一说人均GDP、中产阶级比例，你说一个例子，就有人能给你找一个反例，这还怎么论证？后来就有人发现了一种反证的方式。反证的方式就是，你要说民主、宪政怎么会产生，不如说专制怎么会倒台。专制总会倒台，它很容易倒台，脆弱。它倒台之后建立一个新的，很大的概率就是一个民主政权。专制倒台再建一个专制的，也有可能，但是更大的可能是一个民主的。

李怀宇：研究了这么久中国历史之后，你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吴 思：如果以三十年为限，肯定很乐观。三十年，一代人的时间，你看过去三十年，发生多大变化，未来三十年，当然很乐观。你要说十年怎么样很难说，三十年很容易说。我偏于乐观，时间越长越乐观。



张良皋

向往文艺复兴的时代

张良皋 (1923—2015)

湖北汉阳人。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武汉市建筑设计院工作。1982年被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初创的建筑系礼聘为教授。曾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长期从事鄂西土家族建筑的研究、保护与利用及中国干栏建筑综合研究。在《武陵土家》、《老房子：土家吊脚楼》、《匠学七说》、《巴史别观》等著作中，对土家建筑和土家文化进行了精妙的诠释，指出土家的巴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曾与李玉祥合作，出版专著《老房子：土家吊脚楼》，并主编《中国民族建筑——湖北卷》等。

张良皋先生在华中科技大学时每天依然著述。他的同事说：“张教授比退休前更忙了。”那时，张良皋中气十足地说：“我现在还不能死，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做！”他有一本研究“蒿排”的著作即将完成，而对巴文化的兴趣正浓。谈笑间，有一位老朋友打电话给他，他马上介绍中央台最近有一部电视纪录片《远方的家》，讲神秘北纬三十度。放下电话后，他解释：“众多的文化诞生，包括中国、印度、波斯、巴比伦、埃及，都在这条线上，可是有些文化后来都继续不下去了。唯一能够传承下来的是中国。北纬三十度线六次穿过长江。这没有什么神秘，在中国可以找到答案：因为这是暖温带和寒温带交界的地方。古人类是从猴子变的，猴子都是热带动物，在热带产生以后往北走，走到北纬三十度附近不能再往前了，生理、心理上都承受不了，这是文化的止步线。所以在这条线上出现文化停留：有些文化能够得到发展，有些就不一定。”

在1944年，张良皋是中央大学建筑系二年级的学生，毅然从军，加入到抗日军队中，成为抗战翻译员。在重庆翻译员班毕业典礼上，蒋介石将他的名字错点成“张良举”，二十一岁的张良皋即刻大声纠正：“报告！我叫张良皋。”

作为抗战时期美军的翻译官，张良皋说：“我始终认为那是一段光荣的历史。”

抗战胜利后，张良皋回到中央大学完成了建筑学的学业，从此一生从事建筑专业。回忆建筑学的前辈梁思成，张良皋说：“梁先生的古典建筑基本功很好，他受家学影响，国学根底深，知识面广，讲话流畅，有幽默感。我听过他讲课，很有趣味。当年看他放幻灯，多新鲜啊！我们那时候没见过幻灯，这玩意与时俱进，现在再放幻灯已经是很落后的。”张良皋对陈从周也印象深刻：“陈先生的学问也很大。陈从周是不大服人的，但是对刘敦桢先生五体投地，很多地方称颂刘先生。因为他觉得我也是刘敦桢先生的学生，所以他很客气，从来也不把我们当学生看待，只把我们当小兄弟看待。他画画也来得几笔，就是文人画。画几根竹子、兰草，画得还很好。”

张良皋喜欢游历，看过世界各地许多建筑。有一次在澳洲，他偶遇一位洋人，两人用英语交流。洋人说：“你们中国没有宗教，怎么过日子，怎么生存啊？”张良皋说：“中国生态良好，北纬三十度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凶险的，在中国却是非常吉祥。中国很早就进入了伦理社会。伦理社会是天然产生的，中国在商朝时，同时代的埃及父女乱伦很普遍，埃及法老雷姆塞斯二世有两百多个子女，因为他有六十多个后妃，当中有四个是他亲生的女儿。这在中国不可思议。伦理社会是中国必然产生的，而且是最高级的最合理的最和谐的社会。这并不是儒家发明的，而是天然的一个高等动物的行为，把伦理规范化。中国很早

就已经有这个约束了。同姓不婚，不能乱伦，所以中国民族的进步是全世界最正常的，最符合伦理道德的。凡是上帝能给予西洋人的东西，伦理社会都能给予中国人，所以我们不需要上帝帮忙。中国应该领先于全世界，但很遗憾我们的历史中断了。我们一直到明朝，都是世界第一大国，第一强国。满洲人入关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历史有偶然性，中国历史的偶然性太厉害了。满洲人入关就纯属历史的偶然性。碰巧满洲前六代帝王，皇帝皇后都是满洲人的英雄。他们却是中华民族的灾星，皇权专制加上民族压迫，结果使中华民族变得‘丑陋’了。清朝统治中国三百年，就是三百年的黑暗时代，这个黑暗时代太可怕了。全世界都在进步，就是中国在开倒车。”谈到历史与现实，张良皋认为“清朝阴魂不散”。

张良皋关心时事，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开头也觉得要么是莫言的运气好，要么就是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别有用心。后来他看了对莫言作品的介绍，发现莫言并没有喊什么口号，但是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一个时代。“他讲母亲偷了公社的猪食，结果被吊打。婶娘向人讨饭的时候，一个麻风病人没有吃完的一碗面，送给她了，她吃了以后感恩不尽。看得我都掉泪了，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时代。那段时间的苦难，可不是人人能想象的。能够如此写出来，不容易，他不得奖谁得奖啊？”

张良皋极为喜欢《红楼梦》，虽然本业是建筑学，却是一位学术水平并不业余的“红学家”，著有《曹雪芹佚诗辨》一书。

李怀宇：你从重庆的中央大学去报名参加远征军的经历，现在回顾起来非常特别？

张良皋：现在看来稀罕，活着的抗战军人不多了。日本鬼子在最后一年的时候疯狂进攻，日本也知道不可能打赢太平洋战争，他们就要取得这些胜利，然后求和要价可以高一点。当年我们可以选择参加驻印度的远征军，我们中央大学的同学就一起都选择了这个驻印远征军。但是，我们在重庆教导第三团等候了一个多月，他们那边回信：员额已满，不需要人了。重庆的教导第三团就遣散，首先可以回校，就不必再参加军队了，到其他军事部门也行，那时候有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招考翻译官。我说：好，我们可以用一技之长，我们说点英语，能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沟通。所以，我就参加了军委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经过六个礼拜的强化训练之后，分配我们到云南炮兵训练中心，参加了军队。到第二年的7月份，差不多所有的部队该装备的都装备了，美国在欧洲战场步步进攻，欧洲战场上意大利老早在1943年就投降了。欧洲已经不需要他们在意大利打仗了，就都调到亚洲来了，所以当年意大利战场上的武器都送到中国来。就在这炮兵训练中心装备中国军队，我们帮他们翻译。1944年10月，我跟大家参加军队，到1945年10月回到重庆，整整一年。抗战胜利了，我们在云南的军队里面就被遣散。我是二年级学生，回学校继续读书。

李怀宇：你在军队里面主要做什么？

张良皋：做翻译，帮美国教官来教我们中国兵如何使用

用大炮。那是美国的一种标准野战炮，一百零五毫米口径。

李怀宇：你上过战场吗？

张良皋：没有，我们大家摩拳擦掌都准备上战场了，结果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也算是扫兴了。搞了半天，两个原子弹解决了问题。大家就没仗好打了，回学校，我们10月份就回到学校了。

李怀宇：你在学校的时候对整个战局了解吗？

张良皋：那时候的战局，就是最后关头了。日本人做了一些垂死挣扎，战线太长，他们的补给都有问题，他们也停兵不动，后来也退了。中国军队在那里守得铁桶一般，绝对寸步不让。双方都知道这个仗打不下去了，不必大开杀戒斩尽杀绝。日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在湖南撤退以后，一直退到连岳阳都放弃了。中国军队在后边追，追到武汉周边，马上可以收复武汉了。所以最后一年日本也知道打不下去了。

李怀宇：你在军队的时候跟美国大兵接触还蛮多的吧，那些美国兵给你的印象如何？

张良皋：每天都接触。对我的思想影响可以说很大，我感觉民主无敌。我跟美国军队接触，感觉到现代化、民主化，就是官兵一体，没有什么官随便打人的。官打兵，在中国军队里是很普通的事；美国军队里绝对不允许，官跟兵的确都是互相理解。兵向官敬个礼，歪头歪脑的，那些长官也都不计较。军队当然是军队，有纪律，但是官兵一体，生活差不多，都吃得很好，兵强马壮。美国军队的文化素质，我们中国是没有办法相比的；我们的士兵营养

不良，浑身是病。美国军队吃的完全是美国给养。我们这些翻译官吃的饭，也照美国人标准，每顿一磅牛肉。开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吃法，一磅牛肉一块，摆在碗里；吃了几个月，长得已经够壮了。我一辈子也只有两次营养良好，一次是我在重庆打工，我进了农本局，农本局的伙食是全城最有名的，吃了一年的，我的身体算是有一年的好营养，要不我还能活到现在呢？再一个就是在军队大半年的时间，我吃的翻译官伙食。美国人干预，要让我们吃好，所以牛肉都是一磅一块，再就是几个馒头、包子、饭，吃下来真灵光，身体肌肉也发达，走路也精神。我能够活到现在，就是那两次的伙食营养良好。我也有收获，见到大世面，看到别人的军队，所以后来我们回到学校去啊，就巴不得中国搞点民主化。

我们是在云南昆明，在日本放下枪杆以后，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在那里经常听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我们炮兵中心演讲。大家关心时事，那时候仗打赢了，战后应该怎么样？西南联大那些教授天天在讨论。那些教授差不多都是民主派，民主同盟的主力在云南，因为有龙云保护，那个时候言论还相当自由。后来蒋介石就把龙云收拾了，把龙云“请”到重庆去，直接把他扣押起来，把他的兵派到越南。我们觉得蒋介石这样做有点过头了，仗才打完，各路诸侯没有什么对不起蒋介石的，大家对得起中华民族的。但是蒋介石第一个收拾的就是龙云。我们正在昆明，我觉得蒋介石老先生有点过头了，战争过去了，应该和平建国，应该民主，因为我感觉是民主无敌。哪个法西斯都

不行，德国法西斯不行，日本法西斯不行，要不是英美两害相权取其轻，不能让希特勒政府打垮苏联，那就没有力量能够制衡希特勒了。所以这两害相权，不能让希特勒得手，最终法西斯世界还是没能敌得过民主的世界。而中国当年采取了倾向民主世界的策略，还是对的。重要的是民主社会，民主了不起，力量大。

我们都听过西南联大的潘光旦、雷海宗等教授高谈阔论。有一天潘光旦到军队去，他是民盟在昆明实际上的头号人物，他讲完了，说：“我也不能不谈点政治，中国不能不实行民主。从现在世界大势来看，不管是什么心态的法西斯主义总是不久长的。希特勒也叫社会主义，但是这种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什么玩意儿？不解决问题。民主社会了不起，我们要是不实行民主制度，我们这个国家的进度不一定能够赶得上时代。”当时我们有个副总队长说：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潘先生，如果你是蒋委员长，你会怎么办呢？”他的问话我们当时也大吃一惊。潘光旦说：

“我要是蒋委员长，我就功成身退了。我出国考察，去看看世界，这个地方谁来都可以管，反正要这个政权交给人民。我再要为人民立功，不可能超过抗日战争这个神圣的战争。我总算是把这个仗打完了，我把一个完整的中国交给人民，我对得起人民了。其他的事我不管了。”潘光旦教授走了以后，那个副总队长就说：“潘先生的话不实在啊。我们这个社会离了蒋委员长，谁还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啊，这个局面谁能够收拾啊。”当时我们都为这个国家的前途捏把汗。

李怀宇：你从做翻译官回到中央大学继续读书后，思想上出现了变化？

张良皋：我回到学校以后，思想就倾向于民主。我们中央大学是一个在国民政府眼皮底下的大学，蒋中正还当过两年校长。他到中央大学也去过两次，总算象征性地到了。但是，他也没管事。那两年当中，我们有个老学长，他连毕业证书都没要。他说：这个蒋介石的证书谁要啊？学生一有民主思想，对蒋介石那一套就不赞成。但是蒋介石没有投降日本，他跑不赢溥仪，跑不赢汪精卫，跑不赢那些北洋军阀的残渣余孽。他没有退路了，所以也算是时势推他打到底。

我们慢慢七搞八搞，就搞成对立了。进步学生和保守学生，或者左派学生和右派学生，我也不知不觉地跟左派学生打成一片。在学生的议会里面，我也算作一个舌辩之士吧。那时候开起会来讨论，慢慢就壁垒分明了，后来学校也有地下党在那里煽风点火。我二年级当兵，三年级读过了，到四年级毕业的时候，政见分明，非此即彼，战场上，共产党从弱势到后来变成强势了。国民党看样子支持不下去了，蒋介石把法西斯统治的本性露出来，抓人。学校有学校的保护伞，人抓去以后，我们的校长吴有训就会去找蒋介石，帮大家说情：我的学生不懂事，我没管好。有时候蒋介石会把校长找去：“你管的什么学生？”吴有训先生，我们永远纪念他，他就是民国后期的蔡元培。我们在闹事，我们的校长为难，他在台上，我们大家觉得他脸上发光，不晓得是泪光还是汗光，好像那天老校

长掉泪了。蒋介石事前把他找去，对他大发雷霆。如果那个台词由我编，那就是：“吴先生，我请你管中央大学，你管的什么？你的学生上街游行，你别怪我蒋某人拉下面子来。”所以吴校长回来以后立刻找学生，我们正在开大会，他上去，一直讲：“你们游行示威是你们的民主权利，我作为校长，不能干预你们，但是我希望你们明天不要去。你们给我一点面子，我给蒋介石一点面子，别在街上闹出大事来。”学生们一下子失掉理智，控制不住，第二天还是游行，很多人都说：“他欺负我们的校长，这个不能容忍，我们就是要游行，你了不起开枪打死人，打啊，你敢开枪吗？”第二天真去游行。我就挨过打，水龙打上身，我感觉有水龙对付学生其实足够了，水龙横扫过来，一下在我胸前扫过，幸亏不是顶着打，不然马上打穿肚子。水龙可以开矿的，最强的水龙遇到里面的屋子失火，它在外面打可以把墙打穿。水从我这边扫过去，我马上喘不过气来，太厉害了。很多同学都挨打了。那天抓了几十个人，但是到晚上都放了。我们再看看满街宪兵、军警、国民兵团……起码动员十万人，就是用拳头都把我们打成肉饼了。我们同学号称一万人，实际哪有一万人，在街上稀稀拉拉，国民政府没有开枪，只是当场抓了一些人，但抓的人晚上都放了。

李怀宇：你觉得这段经历对你个人影响大吗？

张良皋：这影响了我最根本的思想，所以我后来不能与时俱进。到了解放以后马上要改造思想，我说：我还改造什么，我已经是个左派了。我那时候不会对革命持什么不

同见解。没过几年我居然被划成右派，未免太意外。我总觉得我这个左派改造不改造思想无所谓的，我已经改造好了。我生长在无产阶级家庭，我是穷光蛋，我能够读大学完全碰运气的，我家里没有田没有地，没有做生意的也没有海外关系，是时代把我推进了大学。

我从小就穷得要死，从中学的二年级起就是全省为数不多的公费生。到抗战时期，湖北省三万学生成立一个联合中学。当时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后来在台湾当了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他发了一篇致湖北省父老的信：你们把子女交给我，我一定看好他们，让他们受到教育，不能让日本鬼子来欺负，要保存湖北省的精英。我们对他们毫无感恩心理，因为这是政府应该办的事。所以解放以后一天到晚要感恩，别人习惯了，我们看不惯，总觉得我们开口闭口都要感谢，那是哪个大救星来了，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就是政府该做的。我们不感恩的，民主社会谁还感恩呢？谁听到美国人整天开口闭口：我们华盛顿怎么了不起，奥巴马了不起，是大救星。别人不说这个话。谁让你当公仆的？你抢当公仆应该做得像样嘛。我原来在湖北省会考，考了全省第二名，我报中央大学水利系。我说：水利伟大，大禹治水，救国救民。

李怀宇：后来选择转读建筑学，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张良皋：我能画，从前我同学说：你能画几笔，为什么不去学建筑呢？我到建筑系一看课表，哎哟，这个系有趣，还画画，还有建筑设计，我喜欢这个系。此前我到中

央博物院看了一次全国美术展览，有徐悲鸿等人的很多名画，我看到其中最好的一张画，后来才知道是我的开蒙老师戴念慈先生的作品。我新到学校，学校也办了一个小规模展览欢迎新学生，有一幅仿罗马式教堂的画，一问就知道是戴先生画的，这种画是工作需要，讲究美术手头功夫好，我就是被他那张画吸引去学建筑。

李怀宇：研究建筑学以后，你认为中国的传统建筑放在世界上看，有什么独到之处？

张良皋：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中的地位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当然不是哪一个人的原因，是时代的原因，中国的建筑跟整个中国的文化，曾经遭到灾难。我们中国文化进步的历史曾经遭到不应该有的挫折。台湾有些人说“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说中国人丑陋。而且我们现在大陆同样也有人，我叫他“贬低中国专业户”。他也不知道读了多少书，不知天高地厚，口一开就说中国不行。你对中国的知识特别是对中国建筑有些什么了解，凭什么贬低中国？所以，我为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没得到应有的认识感到遗憾。有人把西洋的建筑作为一个主干，把中国的建筑作为一个旁枝，这是不公道的。中国的体系最完整。有人问：埃及用石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用石头呢？石头多经久啊，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罗马建筑都大量用石头。有人就贬低中国了，说我们中国人傻瓜。我说：我们跟埃及人换边发球，我中国人到埃及去，让埃及人到中国来，结果还是这样。埃及的生态坏透了，它有几棵树好用啊？几天就用光了，芦苇都上阵了，也用光了。

只有石头好用，所以不得不用石头。希腊、罗马也有同样的问题，生态不好，有白大理石，只有挖石头。中国是一个天堂，生态是最好的。古建筑六材并用，从木水土金，甚至于还用草、皮革、兽，所有的材料，只要拿到手的都能用。欧洲只能用石头，所以我们不能说放着木材不用，我们的木材一直用到清朝。中国要不是“大跃进”把木材都砍光了，现在还可以大用木材筑屋。“大跃进”哪是自然灾害？风调雨顺，但是国不泰，民不安，那是不足为训的，把全国的树苗砍光了。清朝光绪年间建天坛祈年殿，用的是美国木料，因为建庙堂的大木料渐渐稀缺了。美国人记得，中国人就不记得，不愿意宣传这些事。中国木料到清朝渐渐匮乏，生态已经变坏，但是坏不到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大跃进”简直是愚蠢到那个地步，很多林子原来都是被砍光了的，后来，二十多年以前，退耕还林，树长了二十多年成参天大树，就成了旅游点。

中国得天独厚，所以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最完善的建筑体系。我们以木材为主，木材适合人类居住。猴子就是树栖动物，天然地亲木，树木对人是友好的，石头对人不友好的，黄土对人也是不友好的。有些地方的黄土对人有害，氡超标了，人住进去不吉利。像中国这样有木料可用的地区，世界上不多，印度就有限得很，波斯也非常有限。巴比伦有泥土，他们比较爱砌墙，因为泥巴好用。埃及连泥巴也稀缺，只能玩石头。所以，有人说埃及人先进，有先知先觉，那是笑话，它只有石头好用。中国始终是一个“人”的社会。

李怀宇：近三十年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现的一些建筑还有中国的味道吗？像北京奥运的主会场鸟巢或者是央视的“大裤衩”这样的建筑，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你总在思考中国古代建筑文艺复兴的问题，如何看这种现象？

张良皋：我对这种现象的评价是：六神无主，群魔乱舞，百花竞放，芳菲渐吐。世界上的建筑进步到今天，早就六神无主：新材料，新做法，新的计算，新的理论，太多了。大家一下还消化不了，发现不了它的正当用处。都是六神无主，我们中国更是六神无主。群魔乱舞，有些搞妖魔化，他们的本事就是把这些东西做得越丑越好，所以我们现在害审美疲劳，还不是审美疲劳。百花竞放，就是大家可以做很多方案。芳菲渐吐，逐渐有些好的东西出来了。譬如西安的张锦秋院士，她设计的建筑是目前中国仿古完善的一个例子。杭州的程泰宁院士是一个严谨的建筑师，而且他愿意做出新的中国建筑来，这个人才气高，不甘心仅仅是模仿古代的和再现古代的，他要加上他的解读。他热心解读，热心表现自己，所以他变成可望不可即，不容易学他。我也很喜欢他，不担心程郎才尽。他的作品，别人要赶上也不知道要赶到猴年马月。正因为他才气太高，又很热心表现自己对中国建筑的解读，我们大家跟不上他。他不像张锦秋，全部是最精致的虔诚的模仿古建筑，她做得好。她带的弟子很多，跟她有同样本事的人更多，大家都做得好，这些用的是遗产。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就是艺术的、美学的、民主时代的精神。古的东

西，我抄，你也能抄，我抄得好不好，有比较。我的不好我服你，我的好你服我，还在一个理性层面上，有共同语言、共同判据，这就是文艺复兴精神。

中国从明朝就是一个伟大的文艺复兴的时代，它的标志性的建筑在哪里呢？武当山。那是了不起，全世界如果有哪个不服气，请他到中国的武当山来看看，他不能不说这是举世无双。今年武当山六百周年纪念，我正好宣传这个事。

李怀宇：你觉得武当山的建筑是很了不起的？

张良皋：举世无双！我跑的地方不多，但已敢断言要找到一个建筑群比武当山建筑群更宏伟，更能够发扬环境美学，发扬天人和谐，有那种空间美，那很难。我认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标志是1412年武当山古建筑群之开工。欧洲也是以建筑出现来标志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主教堂的穹顶是1420年开始兴建。1412年，永乐皇帝下旨意要兴建武当山。武当山在唐朝就开始建，规模没有明朝大。但是它是永远建不完的，没有办法完成。欧洲的规模只有那么大，那个主教堂完成了就完成了。中国武当山的建筑群1412年开工，两个建筑几乎就是同时，前后相差八年。如果要作比较，把罗马拿出来比，我不怕，罗马全城圈起来剩下多少废墟是了不起的，但是，罗马没办法跟武当山相比。

李怀宇：武当山建筑有什么特点？

张良皋：它代表中国。以前中国老是用木头，为什么不砖石化呢？武当山就是大量的砖石化，而且它还金属化，

有金殿，还不止一个金殿。元朝就有一个金殿在那里，但是很小，整个像一个模型；后来还真是建了一个金殿，全部是铜的，镀金，到现在还金晃晃。武当山真正做到了六材并用，它的琉璃用得非常广泛，砖用得非常广泛，石用得非常广泛，已经在砖石化，也考虑了生态的问题。在武当山不允许砍一棵树，所以一直保持原始森林。但是“大跃进”在武当山就砍树，把这些树砍得一塌糊涂，那个愚蠢，开倒车，到了极点。所以武当山的树木都砍成那副鬼相，现在都惨不忍睹。总算逐渐在恢复吧，改革开放以后退耕还林，才真正注意这个事情。

李怀宇：你觉得中国有没有可能再来一次文艺复兴？

张良皋：文艺复兴，我持乐观态度。我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还是有希望的。我拼命提些稍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不哀叹我划不来，我就拼命找光明吧。

李怀宇：你为什么会研究巴文化？

张良皋：我认为中国民族文明的来源，绝不是黄土高原产生这个民族的文明。

李怀宇：你认为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

张良皋：是，照我看是毫无问题。现在南水北调工程的考古发现，就有人认为已经找到楚文化的源头了。楚文化的源头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其他的都不是。现在，我的生命力还相当地强。为什么呢？我老是觉得我死不得，我死了这些东西没人谈，我于心不甘。中华文化的源头干吗一定是黄土高原？像李学勤他们现在一直在主持中华文明探源，谈来谈去离不开黄河中下游。我说黄河中下游的古

文化都是从西北方向的氐羌和从东南方向的百越去汇聚的，也更有从西南方向去的。从西南的百濮文化，汇聚三大族群，汇聚到中央。这个文化的流传路线，我坚信不疑。楚文化的根基是巴文化，巴文化的源头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埃及有努比亚文化为先驱，中国恰恰有巴文化，是华夏文化的先驱。说中国的黄土高原是文化源头，没这回事，找不到文献根据。持此说最早者都是西洋学人，未可遽信。南水北调这个工程使中国文化因祸得福，至少是提前让我知道楚文化的源头，也可以说中华文化的源头找到了。因为找到楚文化源头的地方很接近盐源，猴子没有盐巴不能由猿变人，大脑不完善，十四种微量元素就要靠盐。非洲猿人，它的维多利亚湖附近，很多的盐湖在跟前。中国的元谋猿人正好碰到从元谋到巫山这一条线上都是产盐的，所以这一带的老猴子都有机会变人。中国有女娲补天的神话，女娲补天当然是代表古代有个洪水时代。中国有洪水时代，所以我研究蒿排。这本书的稿子基本写完了，但我现在也不能死。这本书如果我不交卷，全世界暂时也没有第二个人写。

李怀宇：蒿排也是巴文化中重要的一环吗？

张良皋：太重要了。蒿排是天然形成的，遇到大水会浮起来，这个上头可以住人，直到解放后还有些穷人住这个。贺老总在洪湖闹革命的时候，被逼急了就上蒿排，陆地上再也找不到一个“共匪”了，中央军就好赶快报功去了。世界现存的最大的蒿排有两百米宽，七百米长，相当于十四个足球场那么大，可以住一千人，住一个部落。中国

五经四书里面，有关蒿排的记载还是相当多的，可惜我们大家没看懂。我是把《诗经》检查了一遍，“诗三百”里面起码有三十篇谈到蒿排。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什么洲啊？是沙洲呢，还是另外一种洲？如果是沙洲，那个雎鸠又是什么鸟啊？是鱼鹰嘛。到沙洲上能找到鱼鹰吗？白沙一片，一条鱼都不会游上去，鱼鹰在上面找不到食啊。我说上面讲的是一个排洲，那就是古代住人的地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个地方的女孩嫁到另外一个排洲上。所以，对于学术界过去没触及的问题，我要触及一下。

李怀宇：你认为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证据够不够？

张良皋：无限量，过硬的。我写了一本《巴史别观》，听凭批判。我参加三峡文物保护的专家考察团，从宜昌开船开到重庆，然后在重庆开会。我们经过三峡地区，每一家文化馆博物馆都有一种罐子，这种罐子我一看就知道是盐罐子。当我看见忠州甘溪河口的盐罐子堆时，我的感觉绝不亚于看见秦俑。我甚至觉得这个罐子堆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秦俑。秦俑不过是个艺术品，我们说秦俑的艺术性超过希腊的石雕，但是这个盐罐子堆，它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堆起，这难道不引起我们大吃一惊吗？这难道不是我中华文化的源头吗？我感到震撼，可是四平八稳的考古学家不敢发表什么新意见。我不怕，我无台可垮嘛，我怕什么？他们的台高得很，都是专家。我说这个就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没有盐就没有农业，没有文明。有盐就表示人类进入文明了。首先跨越从猿到人的门槛，然后兴起农

业，没有盐就没有农业。农业生产淀粉，光吃淀粉的人没有办法生存，必须要跟盐一起吃。所以中国古代的盐到哪里，农业就到哪里，这跟农业是如影随形。

李怀宇：你提出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起源，会不会引起一些争议？

张良皋：我不怕，没有人敢跟我对阵。敢对阵的人都死光了，再要等他后代长出来，难成熟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仗，他怕，我不怕：你来啊，较量较量。如果有人对我的哪些地方赞成，哪些地方不赞成，可以勇敢一点，写出来。如果他对我提出不同的见解，我欢迎，他打倒了我，他取而代之；中国一宗重要的学术之争被我撩出来了，我开心啊。



章汝夔

字再小也有大气象

章汝爽

江苏苏州人，1927年生于北京。外贸与广告学专家，兼擅诗词、古文、书法及鉴赏。父亲章佩乙为民国时期著名收藏家。出版有《晚晴阁诗文集》、《章汝爽书作集》等。

章汝奭先生家是简朴的两居室，室外有一个小院，几株青竹引人幽思，顿有“大隐隐于市”之境。章汝奭每天凌晨两三点就起床，泡茶、读书、写经，他用蝇头小楷写的佛经，清雅而别具一格。

章家祖上是大家。章汝奭的祖父曾经入选太医，后来告老还乡，是苏州四大名医之一，章太炎是他的小堂弟。章汝奭的父亲章佩乙曾中苏州府长洲县第一名秀才（“案首”，即第一名入学），二十岁出头就是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的主笔，后来参加国民议会，在北京做过财政部次长兼泉币司司长。章汝奭回忆：“我父亲救过徐树铮的命。他们那时候全都是反对张勋复辟的。张勋在北京对我父亲还是很器重的，管他叫小老弟。财政总长李思浩和我父亲是结拜弟兄。张勋要复辟，李思浩就反对，不给钱。同时，徐树铮也是极力反对的，那么，张勋必欲除掉这两个人而后快。我父亲知道了，就去向张勋求情，他一进去就给张勋下跪，说：我替那俩人求情，希望大帅还是放过他们。张勋说：我知道李思浩是你结拜弟兄，这就算了，我也不一定非要他给钱不可。徐树铮不行，此人非除掉不可。后来，我父亲讪讪而退，徐树铮就藏在我们家里，他就给徐树铮化装。那时候北京一共有三辆小汽车，

我父亲有一辆，还有特别通行证，他就陪着徐树铮一起到了天津租界六国饭店。徐树铮从袋子里掏出两张银行本票，说：老弟，你少打两把麻将，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这两张银行本票多少钱？五十万大洋。”

章佩乙有了那笔钱以后，既不买房也不买地，就玩玩字画。那时候北京很多古代珍贵字画都散出来了。章父花了三千六百两银子买了王晋卿的《烟江叠嶂图》，此画有苏东坡题字，现在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章佩乙收藏甚丰，还写得一手欧字，四十岁才生了章汝夷，最喜欢这个排行第四的孩子，偶尔也教他写字读诗观赏古书画。章汝夷小时候喜欢赵孟頫，家里有一本旧的《寿春堂》，几乎翻破了。后来，父亲说：“赵孟頫有习气。你多学了他，会染上习气，终身难以摆脱，还是改学李北海的《云麾将军碑》。”章汝夷晚上做完功课总要写一两张字。章汝夷所学经史古文，则是他母亲特别聘请北京孔教学校教务长王君珮亲授的。

章汝夷早年过眼的名画无数，父亲的收藏后来在动乱时代中多已流散。香港收藏家、书画家黄君实收藏的钱舜举《锦灰堆》手卷，就是章父曾经收藏过的，后来专门请章汝夷题字：“辛卯五月十一，君实先生贲临寒舍，以宋末钱舜举《锦灰堆》手卷属题。盖是卷曾于抗战初为家君所收，其所作之第二题识，时在丁丑夏六月，即战事爆发伊始，避燹沪上。直至抗战胜利，是卷仍存沪寓，此证诸张仕鋈之观款。按张仕鋈字仲青，常州人，书学米，擅山水，得四王遗韵，为家君至交，故每收得珍品必邀仲青

世伯共赏。犹忆癸未春，予负笈赴川前在沪寓小住，适收得南宋夏禹玉《蜀江晚泊图卷》。是卷见《壮陶阁书画录》，仲青世伯曾手书著录全文并作题识于卷后。其时距今忽忽近七十年矣。世事沧桑，故第所藏荡然无存。予今已八十又五，得见家君手泽，曷禁感叹嘘唏。得知此稀世珍今归黄氏，可谓物得其主，深为欣慰。至于是卷命画之主旨，正如家君所言：退藏于密与放弥六合归于一理，老庄荣悴、佛家色空同一机轴，解此自能领得其中妙谛也。是为记。”

章汝夷在北京接受良好的美国教会学校教育，中英文俱佳，一度立志在外交上有作为，后来觉得并不现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接收了美国教会学校，章汝夷不愿当亡国奴，想到内地念书。他母亲1942年在北京故世，就到上海找父亲。“我父亲如夫人很多，有好几个。（我大哥二哥是原配生的。原配故世了，继配就是我母亲。所以我大哥二哥对我母亲还是很尊重的，她也对他们很好。）我到上海不久，去找我母亲结拜的小姐妹——我的干妈。我的干爹在重庆是实业家，有好几个厂。我干妈说：你的一切我包了，念书没问题。后来我就到重庆去。但是跟人家拿钱总不大方便，而且我这个干妈也是如夫人，当然大夫人也故世了，但是经济权掌握在她那几个大儿子手里。他们也肯给她面子，要什么钱尽管和他们要。但我总觉得跟人家拿钱不大舒服，后来交不上饭费了，大二的时候我就不念了。”章汝夷本来是考上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外国文学系，退学后去考飞机场的美军翻译。后来转到交通部的

战事运输管理局。

章汝夷十八岁在成都空运物资接转处负责管机场卡车，曾经揭发当时主管贪污。抗战胜利后章汝夷回到北京，1946年底，海关招考，北京考区两千多人报名，录取六人，章汝夷考上了。章汝夷回忆：“我借助两篇文章，写得还好。考英文很简单，就一个白本子，摆着纸，考官在黑板上出个英文的题目，论文就是海关关税是国家财政来源之一，我对这方面熟悉。中文是用文言文‘论仁’，我想起了汉朝董仲舒的《对贤良策》里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就引经据典，写成一篇像样的文章。”后来章汝夷被派到上海海关，1949年重逢了他小学同学的妹妹，这一年，他二十三岁，她十九岁，情定终身。

章汝夷二十六岁时得了开放性肺结核，他的妻子变卖家里所有东西救他，东奔西走，给他治疗。半年后治愈，章汝夷被派到外贸公司，亲历了一场场运动，他说：“反正那几十年就是折腾。”“文革”时，他下放到梅山十年当炊事员。下放结束后，上级要调他回外贸公司。他说：“你砍我头，我也不去了。我又没有犯一点毛病，你们这样对待我，我是真的没法说了。”后来外贸学院复校，章汝夷1979年就到学院教外贸实务和市场调研。

在上海外贸学院，章汝夷1981年评讲师，1985年评副教授，1990年评正教授，1992年领国务院特殊津贴，带研究生。期间专业译著九本书，并首先用英语讲授专业课。国际营销学是他和北外贸的罗真崑、上海的黄燕三人率先引进的学科，并在后来开了广告学的课。他写过一篇

专题论文《广告的责任规定与管理》，提出广告要承担四项责任。第一要承担职业道德的责任。第二要承担社会的责任，因为它是向公众发布的。第三要承担经济的责任。第四要承担法律的责任。“现在还讲什么责任，广告骗人有的是。现在也没怎么罚，而且越演越烈，所以我没话说。”章汝夷用英文写的教材曾经在联合国的世界贸易中心演示。对当下社会变迁，章汝夷认为：“改革开放当然是对的，否则怎么跟世界互补？一部分人富起来，这是客观规律，不可能使全部人富起来。但是如何富起来，靠什么手段富起来？不能权钱交易。实际上，一个社会要稳定，人口最富的应该是极少数，最穷的也应该是少数。中间的中产阶级应该多，这个社会才稳定。”

一生的工作都与经济相关，章汝夷却淡泊名利，以写字求学问为乐。章汝夷的书法起初全是送人。“《金剛经》五千多字，我送了一百多通。我到现在还送人，老朋友要，我就送。但是大老板要，对不起，你要就是这个价钱，不要算了，我还不求你。我这脾气很怪，人家说高官要字，对不起，我不写。我也没有求你什么，何苦呢？人要讲究气格。”他的书法各体皆精，尤以蝇头小楷名世，他说：“字要讲功力，讲气格，讲韵味。”

临行时，我问：“您觉得自己是这个时代的隐士吗？”章汝夷淡淡一笑：“我也谈不上什么隐，我就是小小老百姓，我就有这么点臭脾气，我和他们合不来，我信奉达则兼济，穷则独善。他们飞黄腾达，我心甘情愿身居斗室，过我自己的穷日子。”

李怀宇：“文革”十年你在乡下干什么？

章汝爽：“文化大革命”，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把我给揪出来，又批又斗，又打又抄家又劳动改造。放到梅山十年当炊事员，每天淘八百斤米，那我就看书写写字吧。

李怀宇：看书写写字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断？

章汝爽：我年轻的时候字写得还不错，从海关支援外贸公司，人家全都夸我毛笔字写得好，这个找我写把扇子，那个找我写把扇子，如此而已。我平时忙得不得了，哪有时间写字？早上六点多钟就从家里走了，到晚上十点钟甚至于赶末班车回到家里，我很少待在家里吃晚饭。结果还落得一个“反动学术权威”。

李怀宇：“文革”时反而看书、写字多？

章汝爽：多。我后来到梅山，除了淘米烧饭，没别的事了。我老伴心脏病很严重，在上海养病，她说：你看看书，写写字吧。那我就看看书、写写字。也没有写字台，就一个小方凳，上海叫骨牌凳，小方凳上头铺一块板，我自己再打一个小矮凳，所以只能写小楷。老天爷照顾我，我没有浪费时间。老天爷给我一副好眼睛。

李怀宇：启功先生说他的字是大字报体，“文革”被人家逼着天天写大字报。当然是开玩笑。法学家江平在“文革”时也是天天写大字报，把书法练出来了。

章汝爽：因为人总要有所抒发。老实讲，中国的文化传承是多方面的，我不觉得废除文言文是一大功绩。五四的旗帜是反帝反封建，帝国主义反得怎么样？我认为是不彻底的，首先日本的罪行没有很好地清算。第二，什么

叫封建？我小时候念《三字经》里有六个字“夏传子，家天下”，这是封建主义开始，试问现在这个封建反掉了多少？

李怀宇：你对古文与白话文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

章汝夷：我认为古文有不可磨灭、特别了不起的好处，就是短文字写大文章，言简意赅，可以高度概括。白话文像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当然是了不起。现在，洋人研究拜伦、狄更斯的古典文学还少吗？我们有多少人在研究《离骚》？研究两汉乃至唐宋文？何况古人著书，有些传说也不一定完全对，这要靠后人很好地分析、理解。比方说《滕王阁序》非常有名的句子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其实前面全是铺叙，全是讲景致，讲缘由，为什么作《滕王阁序》？主旨是“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他旨意高远，远远不是辞藻的堆砌，精彩是在后头。

李怀宇：我们看古人的书法，有时候就是非常好的文章，比如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章汝夷：对啊，这是了不起的好文章。三百多字，他把人事、世事的动荡无常说得感慨万千、淋漓尽致。王羲之是书圣，但是王羲之的字也有参差，不是所有的字全是那么好。跌宕起伏变化那么大，还是有高低的，所以古人的这些论断很值得我们去分析、考虑。

李怀宇：在书法与古文之间，你认为书法要依托在古文之上？

章汝夷：当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光写字的话是写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一定要把

古文读通。我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杜牧的《阿房宫赋》、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我认为这十篇文章是至文。我这篇八九百字的文章，把这些事情全概括在里面，我的一生也有所述的。我觉得做人一辈子，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回过头来看看，也不过是一瞬。现在回忆梅山十年岁月，1970到1979年，也只是一瞬，过去了。我现在剩这身老骨头，要好好珍惜它，要回报这个社会。我信佛，我写了三百通《金刚经》，成品，写坏的不算，写坏的比写成的多。错一个字就是大不敬了。

李怀宇：为什么信佛？

章汝夷：我觉得人对宇宙间的事情了解太少，如果没有冥冥中的安排的话，那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巧合，在我身上已经感觉到这种巧合。比如我跟我老伴，小时候我九岁，她五岁，我到她家去玩就碰到她。我十四岁的时候，我母亲在上海病了，我从北京临时停学赶到上海来看母亲，因为很危险了。后来我竟然在街上碰到我岳母，又联系上了，本来已经断了来往了。那时兵荒马乱的，日本人一占领北京，我岳父就把车子卖了，把房子卖了，一家人搬到上海来了。我那年就碰到我岳母，而且那个时候岳父还好好好的，我在上海待了一个月，忽然之间在后半个月的一天他竟暴病而亡。他得的是伤寒，诊错了当感冒，吃错了药，结果连话都说不出来。本来是很富有

的，他开放贷公司，结果暴病而亡，人家全赖账了，家境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

李怀宇：你觉得冥冥之中有天意？

章汝夷：有天意。老实讲，我觉得做人一辈子不可以有败笔。所以，我认为人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有的事情刀斧加身不可为。“文化大革命”胡说八道，那不行的，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打死你也是这么回事。人在做，天在看。所以，我常常说知识分子要讲究气节，砍头不要紧，气节不能糟蹋。

李怀宇：但是在近百年的时局动荡当中，老百姓的生活往往像是狂风暴雨中的一叶孤舟在大海中出没。

章汝夷：对。人生就这么一段时间，看你怎么对待它。有人说，这个人有了钱、有了地位了，就功成名就了，我说这个说法不对。我认为人要有所追求，追求道德、文章上达到更高的境界。比方说我喜欢写字，我写字就追求怎么样有突破古人之处。

李怀宇：古人之中你喜欢哪几家？

章汝夷：有的东西视久愈无穷尽，可是有些东西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比如说董其昌，当然他有个别的精品，我看他有个别行草书还是了不起的，但是有些东西实在是不像话。首先他不尊重古人，自以为了不起。沈鹏编的《中国草书名帖精华》里收了董其昌的《琵琶行》，其中有六大错误。怎么编的，这种东西值得传世吗？

李怀宇：我特别喜欢苏东坡。他文章之外，书法看起来也非常舒服。

章汝爽：对。但是我以为“件件精品，则无精品”，不是所有的都是精的。《黄州寒食诗帖》是特别好，前小后大，前头很严谨，后头很豪放。“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那几个字一下子放大，说明他的心情，尽管身处苦境，还是很洒脱。两赋也是在黄州做的啊。

李怀宇：黄州时期是苏东坡最不得意的时候，却是人生艺术里鼎盛的时期，前后《赤壁赋》是千古名篇。

章汝爽：对，当时最苦啊。前后《赤壁赋》是了不起，而且，现在好像句读都是错的。如：“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错的，这个句读不对，应该是：“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你细读就觉得这才是对的。所以我说既然读书，怎么样读通？苏东坡很多诗文有点禅意在里头。苏东坡是远远高于李白的，对吧？

李怀宇：近代的书法家里面，你觉得谁特别突出？

章汝爽：翁同龢比较好。清代写颜字的人不少，刘墉是写颜字的，但他只是加了一点机巧在里头。钱南园是写颜字的，写得太死板了。何绍基也是写颜字的，但是有习气。

李怀宇：后世学何绍基的人比较多，散文家董桥也说他小时候学的是何绍基。

章汝爽：对，像新加坡的潘受就是学何绍基。比较起来，翁同龢的字就要比他们的格调高。所以字要讲格调、气格。

李怀宇：清末民初以后呢？

章汝爽：有一个人叫何隼，名不见经传，很了不起，我看见过他写的小楷。我看了以后觉得不只是清雅，耐人寻味，真是美不胜收，了不起。我在小楷上探讨，也是走过很多路，在大字上也是探讨过，走过很多路。我到这个年纪了，几乎每天都写，我却经常否定自己。

李怀宇：百年书家里，于右任和沈尹默非常有名。你怎么看他们的作品？

章汝爽：于右任好，沈尹默不行。沈尹默堂庑小，气格不高，字写不大，他只是秀而已，陈独秀说他“字外无字”是很值得思考的。所以，古人说不一定名气大就好。赵孟頫是宋代宗室，投降了元朝，而且成了元朝的宠臣，一品大员，皇帝算是喜欢了，认为他的字美。甚至是到清朝康熙乾隆全都是对赵孟頫顶礼膜拜，这里面有政治原因，宋宗室投降元朝，满族入主中原，汉人也应该这样。赵孟頫就是气格不够，骨子里俗。

李怀宇：不喜欢赵孟頫的人，说他的字里面有媚骨。他的字的确写得漂亮。

章汝爽：对，我小的时候就喜欢赵孟頫，最早的时候写字就学赵孟頫，那是漂亮。但是就禁不住细看。我父亲给我一个赵孟頫的真迹，了不起，《奉敕书玉台新咏序》！那是精得不得了，后来荡然无存。

李怀宇：我非常喜欢弘一法师的字，觉得他是不食烟火气。

章汝爽：这当之无愧。但是作为书法来说，究竟是一种变体，所以他的字不可学，画虎不成反类犬。他的字应

该说是了无俗韵，不食烟火，可以给人宁静的感觉。

李怀宇：在耶鲁有张充和，她的小字很清雅。

章汝爽：张充和是很雅的，但是实际上究竟就是那一块小天地，对不对？

李怀宇：白谦慎是不是跟你学过？

章汝爽：是啊。有些人追求书法的境界不对。白谦慎一直把我当老师的，最近《东方早报》采访他，他说书法主要是自娱。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对。

李怀宇：为什么呢？

章汝爽：这是把书法意义贬低了，只是玩玩的，你以为玩玩随便啊。人家杜甫写诗说：诗是吾家事。写诗也好，练字也好，是感情的抒发。有人以为所谓功成名就是钱也有了，权力也有了，地位也高了，以为这就是功成名就。人不应该这样，人应该有追求。追求什么？追求学问也好，艺术也好，就是要达到更高的境界。而且你重视的不应该是怎样一个结果，应该重视的是那个过程。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李怀宇：你觉得书法里面文化的修养是不是更重要？

章汝爽：对，如果没有这个，是无本之木，不可能达到很高的境界。你写东西的时候要倾注感情，感情要净化，不能说：我写出来让人家吓一跳，好像真了不起，那没用的，做作。气魄是自然产生的。

李怀宇：所以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

章汝爽：白居易《与元九书》那篇文章，我觉得应该好好读一读，他对诗的本质讲得很透：诗者，根情，苗

言，华声，实义。

李怀宇：书法在你生命中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东西。

章汝爽：非常自然的一种东西。我晚上八点钟就睡了，凌晨两三点就起来了。我每天写很多经，佛事功课。这张是清朝的旧纸，写这几行觉得不好，裁掉，写得不好，裁掉。裁得只剩这点，我一直在算纸还够不够，总算还够。这么小，写五千一百零四个字，一字不错，一字不漏。我全是目测的，没有格子，天地行距全是目测的。我这里头一行一行没有说一行歪了嫁接过去。人家说心正所以笔正。最近人家发现说：章老的大字也非常了不起啊。人写字怎么会不写大字。他说是我的蝇头小楷不得了，当然他们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现在八十多岁了，手一点不抖，我戴上五百度的老花镜，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给朋友写的一个匾叫“只眼堂”，一只眼看世界，用孟子的“只眼能辨秋毫之微”，只眼见诸相非相，这是佛经里的话。他高兴得不得了，拿浓浓的金字写，写得很漂亮。我就是有这样的想法，我跟人家两样，我写得好的才送给人，写得不好经常自己扯掉。我不要人家说当宝贝。我当然自己留几件，我存给后人的也有。我现在还有精力，还好的，写写送给知己，留个纪念。

李怀宇：古人书法吟诗唱和是一种情感的交流。

章汝爽：但是我跟现在这帮名流显然是不合拍的。

李怀宇：苏东坡也说自己一辈子不合时宜。

章汝爽：对。我看得很清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这钱花掉了才是我的。花不完，留着

这些破纸在那干什么。我是晚年了，身体又不好，多少种毛病，我一天要吃十几种药。抗血凝的、心脏病的有好几种药，心脏换过瓣膜，搭过桥，装过支架。我有心肌梗塞加心衰，我还有糖尿病、前列腺等等这些病，加起来十几种药。

李怀宇：写书法对身体有没有好处？

章汝爽：我觉得有好处，至少凝神静气，全抛开就好，早上点一支香，写经。

李怀宇：这其实也是锻炼自己的身心。

章汝爽：这是对呼吸有好处。我写了三百多通的经文，经已经很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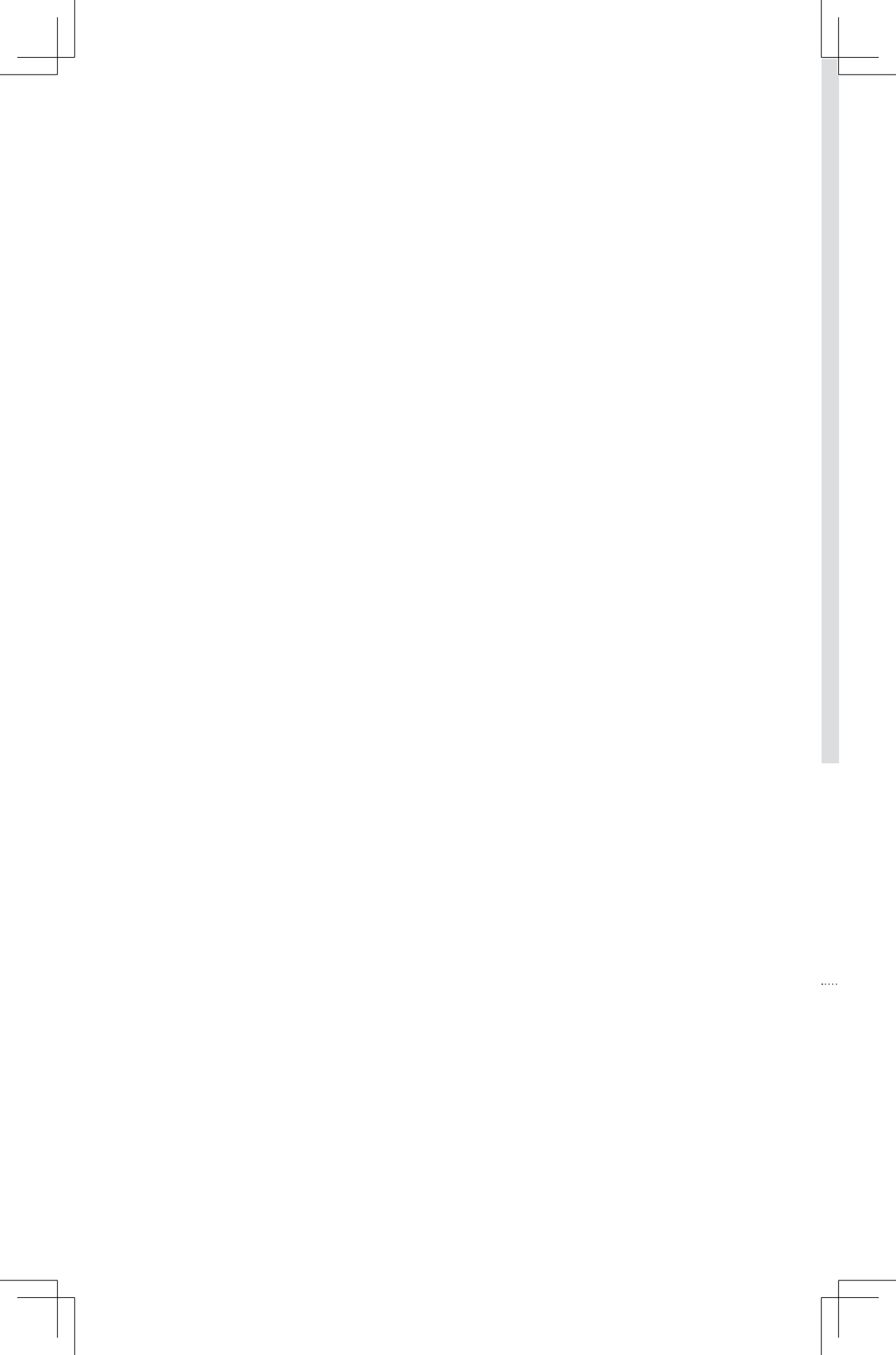
李怀宇：书法还是要讲究传统。中国还有一个文人字的传统。我很喜欢一些学者写的字，比如以前复旦大学有一些教授写的字，像朱东润先生、王遽常先生当然是以学问为主，但他们平时写的书法很有意思。

章汝爽：王遽常小章草，小字好，大字不好，像描出来一样，板板的，没意思。小行书，小章草，写封信或者写个题跋，确实很好。朱东润的字很好，行书很不错，可惜流传得太少了。

李怀宇：像沈从文，写小说、做学问很好，他写章草很好。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业余写的字，画的画都很有味道。你觉得自己是文人字还是书家？

章汝爽：我不是什么书家，我也不要当什么书家，我就是这么个人。我觉得首先是做人，然后是做学问，我在书法上有所追求，追求更高的境界。我的小字，人家细

看，说：你这是二王的。对，我这是有二王的气势，我既有他们的挺拔，我还有恣肆纵放的地方，再小我也有大气象。我觉得我是突破古人的。文徵明八十二岁写出《归去来兮辞》，没有多高，四百多字，十九行。我这五千多字是直的，一行二百多字。我老师说：世之所贵，必贵其难。我岁数活得比较长，老天给我时间了。至少这方面，我可以对古人说：你们没有达到的，我达到了。我既有秀润，又有娴雅，又有挺拔，又有纵放，还有恣肆。我小字还是规矩严谨得很，点画上没有一点交代不清楚的地方，那就是我要达到的一个境界。古人没有做到的，我做到了。





董 健

思考当代知识者的命运

董 健

1936年生，山东寿光人。1956年考入北京俄语学院，次年转入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合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合编）、《陈白尘创作历程论》、《田汉传》、《文学与历史》、《戏剧艺术十五讲》等。

南京大学三年级学生温方伊在创作话剧《蒋公的面子》时，专门去访问前副校长董健先生。董健建议戏中融入“钱学森之问”，探索当代知识者追求独立、自由的思想。《蒋公的面子》果然一鸣惊人，董健看后有长篇感想发表：“用这样一个戏来回忆南大校史，确实做到了史中有戏，戏中有史。”

董健亲历过南京大学建国后的风云变幻。回顾学思历程，他说：“我受的高等教育是残缺的，读书太少，思力薄弱，被煮成了一碗‘夹生饭’。如今在余年残照之中，只有三个字：读、思、写。”

1956年，董健考大学时，俄文热超过现在的英文热，当时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董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俄语学院。读完一年级后，发现中苏关系开始变冷，学俄文的人找不到工作，董健转到了南京大学中文系。董健深受俄国文艺思想的影响，他画了一张别林斯基的头像，挂在宿舍床头。他回忆：“俄国19世纪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我影响很大。另外，我那时候的文学批评受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也很深，现在尽管我已经很厌恶那种东西，但往往还不自觉地流露出那种文风、思维模式。”

在南京大学读完本科，董健成为陈中凡教授的中国戏剧史研究生，毕业后留校。1966年初，南京大学搬到乡下一个农场去办学。当时匡亚明校长正在试验“半工半读”的教育模式。匡亚明对董健颇信任，把他调到学校里编小报《劳动与学习》。不久“文革”爆发，董健是地主家庭出身，过去走“白专”道路，写过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文章，又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陈中凡的研究生，因此就靠边站了。到了“文革”后期，江苏省革委会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把董健调到写作班子的文艺组。当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贺敬之到江苏约稿，要求写作班子写一篇批判田汉的“人性论”的文章。文艺组成员忙了将近一年，把田汉的书都调出来细细翻阅，终于写成一篇大文章，由董健和作家滕凤章送到北京去找贺敬之。结果文章过不了关，一句话都登不出来。而董健读遍有关田汉的资料，阴错阳差地为后来写《田汉传》一书打下了基础。

董健经历了愚昧、迷乱而又荒诞的“过渡期”后，在1978年才进入比较正常的学术发展期。过去缺了的课要补。“我在80年代开始恶补。这个恶补是伤身体的，太累了，是短期地补。我写《田汉传》，田汉讲他在日本读过的书，我就赶紧拿来读。他读西方的戏剧、小说、理论那么多，我都来不及读，但是完全不读，是没法写的。我们这一代被耽误得特别厉害。”董健说，“我们这一代文化人都是过渡性的人物，不可能出现很有成就的学者。当一个好的过渡性人物，能够把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记忆和体验不打折扣地说出来，讲点真话就不容易了。”

在开放时代，董健迎来了学术的高峰期，重点研究戏剧艺术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两个领域，留下了《田汉传》、《陈白尘创作历程论》、《戏剧艺术十五讲》、《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等著作。他是教授、博导，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等职，树人无数。

近年董健眼睛不好，生活还能自理，但读书很困难，写作也受影响。他关注和研究中国知识人的命运：“我们进入老年期，要活得健康、活得明白、活得愉快。活得明白特别重要，必须深刻反思我们这一生做过的蠢事、错事，把历史和现实看得更明白一点。”董健还想写一些学术文章，比如有一个题目是《从〈红旗谱〉到〈白鹿原〉》：“从红到白，这一段当代文学史还没有人说得清楚。两本书都是写中国农村的那个时代，价值观和艺术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当代文学还没有完成从《红旗谱》到《白鹿原》式的蜕变。《白鹿原》是一个特例，我更看重它对中国那一段时期农村的描写的真实性，《红旗谱》是反过来。哪个更接近真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管文艺的周扬等人把《红旗谱》捧为写中国农民的第一部好作品，以为它写出了真正的现代的革命的农民，说朱老忠是现代新农民之代表。我自己也写过文章吹捧这个观点。后来王彬彬写过一篇比较激烈的文章《〈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我基本上认同王彬彬对《红旗谱》的否定，朱老忠的形象绝不是中国农民的典型，这是用意识形态来伪造一个农民的形象。中国农民受了压迫就

造反，当了皇帝以后再压迫人，然后有人再造反。这是鲁迅讲过多次的中国农民的循环圈。而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大特点是结束一个皇帝的统治，建立一个使统治权受到监督的制度。”

反思人生的曲折经历，董健热切地呼唤现代意识与启蒙理性。“现在好多问题最后都归结到文化价值观念的问题。本来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要经过一个启蒙期。启蒙就是确立以自由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念，把人从前现代的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在民主、法制下发展人的个性，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就是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作恶，只有受到监督以后，才能为善。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不管曲折多大，这一转型是不可避免的。现代政治的特点是用理性、民主协商的办法解决矛盾，尽可能减少暴力。这已经被世界历史证明，谁也改变不了。”

李怀宇：“文革”期间，你在江苏写作班子文艺组接受批判田汉的任务，看了许多田汉的资料，为后来写《田汉传》做了准备，这是怎么一回事？

董 健：当时是接受《人民日报》的任务，要写一篇批判田汉的大文章。那时一般人看不到田汉的资料，我们这个组却能把南京图书馆所有田汉的资料都拿出来查阅。我不仅看，还喜欢做笔记，把每个剧本哪一年写的、主要剧情等都考证一番。我做了好几本笔记。那篇批田汉的大

文章写完了，也没发出去，我们编写组也解散了，可是我的笔记、卡片一大堆都带回家。到了“文革”结束，要为田汉平反的时候还得拿这些材料来看。后来我写《田汉传》，就用上了这些材料。本是为了打倒田汉结果却为田汉立了传。历史就是这样荒诞而又真实！

李怀宇：关于《田汉传》，宋词先生跟我讲过一段吴祖光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董健：《田汉传》刚出版的时候，宋词问吴祖光：董健的《田汉传》，你看了没有？吴祖光说：我没看。田汉当年批我右派，我很讨厌他。宋词说：你要看，别的不看，一定要看看董健写你被批判的那一段。结果，吴祖光就找来看了。后来正好我到北京参加戏剧家代表大会，见到吴祖光，他很天真地对我说：董健，1957年反右派，你在批判我的现场吗？我说：反右的时候我已经不在北京了。他说：批判我的大会你是不是参加的？我说没有。他说：那怎么写得那么真实？批判吴祖光的七八次大会都是由田汉亲自主持的，因为田汉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我说：我要写出田汉的复杂、矛盾的心情。他必须来主持大会批判吴祖光，但是他跟吴祖光在解放前的关系非常好，他们一起在上海参加反对蒋介石的民主运动。田汉特别记得1946年，他到吴祖光编的《清明》杂志编辑部去看他们，吴祖光就拉着他说：现在马上要发稿，还缺一点文字，给我写一篇补白。田汉坐下来很快就动笔写了一篇补白。吴祖光说：我给你发，但你写得太多了，补白是有限制的，对不起，给你排最小号的字。两人相对大笑。当时

笑声那么爽朗，两个人的关系那么好。如今反右，田汉竟然在主持大会批判吴祖光，而且特别荒唐的是，吴祖光被批判的那些“右派”观点，也都是田汉自己讲过的。但是田汉没有被打成右派，因为当时周扬这些人保他，甚至周恩来都说：田汉这个人我了解。就保下来了。但在运动中，他必须批判吴祖光。我是根据我掌握的材料来写他们过去的情况。所以，吴祖光说：你在书中写到田汉批我时，我的眼中放出困惑、痛苦的光，你肯定在场，才会这么真实。

过了一年，吴祖光的夫人新风霞去世了。吴祖光非常悲伤，一面哭，一面在写回忆新风霞的文章。这个时候他又想到新风霞之所以死，与他被打成右派有关系。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当时共产党动员新风霞跟他离婚，新风霞不理，也成了右派，所以吃了很多苦。吴祖光在这种高度的痛苦中对我的《田汉传》有一部分误读，好像是田汉做主把他搞成右派的。书里我有一段心理描写，说田汉批判吴祖光时，要在自己心理上找到吴祖光反党的“依据”。我提出一个观点：有真田汉和假田汉之分。我认为1957年在反右派的战场上那个批吴祖光的田汉是假田汉（与他大半生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完全不同），他要制造一个逻辑安慰自己：我给党提意见，但不反党；你吴祖光既然组织说你反党，那你就是反党，我要批你。政治运动、政治迫害把一个真情实感的田汉变成一个政治工具的假田汉。吴祖光在这件事情上的误解是可以理解的。

李怀宇：但田汉自己晚年过得也不是很痛快。

董 健：那当然，可以说田汉从建国以后就一直没痛快过。他是共产党员，却一直被看成是党内的异己力量。他是文化部的一个局长，可是上面还要派另外一个党员跟着他，实际上就是监视他，按时向党汇报他的表现。田汉到地方上去视察工作，人还没回来，告状的信件就到北京了，说他在哪里讲的和中央的精神不符合。《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作为诗人他叫光未然，作为评论家他叫张光年。张光年是《文艺报》主编，也当过作协党组书记。我专门采访过他，我说：你是党派来专门监视田汉的。他说：是啊，田汉这个人太好了，我越监视他，越喜欢他。田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搞戏剧，他一贯主张搞戏剧就要搞在野的，不要搞在朝的。建国以后他在朝了，但他那种在野的思想没有抛弃，他就不愿意跟政治搞得这么近，可是政治要找他，对他的审查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李怀宇：田汉、老舍在1949年以后写了不少“歌德派”的作品，但是最终的命运都非常不幸。

董 健：是啊。田汉1958年写过两个戏，一个很好，一个很差。《关汉卿》，当时是为了纪念中国的世界文化名人而作，关汉卿那一年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田汉写出了比较真实的历史人物关汉卿，非常好。同年写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就非常糟糕，歌颂“大跃进”、反右。

《关汉卿》写得好是有原因的，关汉卿是剧作家，田汉也是剧作家，关汉卿受到迫害、受到审查，追求创作自由却往往不自由，这种体验田汉很多，所以他确实能写出真实的东西。而《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是紧跟形势，虚夸不

实。我觉得田汉也有非常幼稚的一面，这个人一辈子不懂政治。他从青年时代就交了个好朋友郭沫若，郭沫若就比他懂政治。建国以后郭沫若走了一条“紧跟”的路线，官越做越大，而田汉却越来越倒霉，两个人分道扬镳了。郭沫若最后一封给田汉的信是1958年《关汉卿》发表以后写的，称赞了一番《关汉卿》，从此以后两个人就没有联系了。这很值得研究。到了60年代，田汉写了《谢瑶环》，触犯高层，受到批判。因为《谢瑶环》“为民请命”，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皇帝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可以起来反对。而同时郭沫若写的却是《武则天》、《蔡文姬》，他不写为民请命，写皇帝好。曹操欣赏蔡文姬，把蔡文姬救出来，就是郭沫若的一招：毛泽东欣赏我，我就是蔡文姬，蔡文姬就是我。两个人走的道路不一样，他们早年是非常好的朋友，在日本的时候好得没办法。当然，郭沫若在“文革”后期也挨批，很痛苦。

李怀宇：“文革”结束以后，你为什么要和别人合作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

董 健：我是“文革”后最早介入这个课题的人之一。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一般是指1949年以来的文学史，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是1959年。到了1979年，教育部组织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所院校编写《当代文学史》这本大学教材，我参加了。这本书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很多大学采用为教材，但到了90年代就慢慢地不适用了。2000年，教育部在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我是中心的主任，借这个机会组织

人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80年代那个版本叫“初稿”）。国内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一直很强，历史也要求我们必须重写，时代变了，大家的观点和方法都在变，价值观都很不相同了。现在我觉得这个重写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包括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正在不断被重新认识。但是根本性的重写，我觉得好像时机还没到，因为还有很多限制。像余英时这些在海外的学者，他们往往就比我们先走一步，他们在思维模式、写作方法上受到的限制少得多。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比如说《红旗谱》，在1980年出的那本当代文学史中，评价非常高，专章专节来介绍。我还写过长篇文章来研究《红旗谱》。现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里对《红旗谱》的评价不高了。对“三红一创”：《红旗谱》、《红岩》、《红日》和《创业史》这些所谓“红色经典”，对1949年到“文革”这个时期的历史至今还没有恰当的评价。真正的重写需要根本性的思想革命。

李怀宇：你在《怀念高华》那篇文章里讲到文史不分家，高华治史就是从根本上重写。

董 健：高华那本书，很值得我们学习。他那本书从根本上重写历史，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中国的当代文学史几次改写，都没有达到这种水平。一些小改小动都是局部的，不是根本性的。实际上我们这些改写者，在政治评价、思想评价或者历史评价上没有达到高华那种视角。高华表面很平稳，没有搞一些很刺激的话吓唬人，但是他从根本上把党史面貌扭转了，完全不一样了。可是我们的文

学史“重写”，基本上都还是修修补补、原地踏步，是非本质性的改动。从“文革”结束到现在，政治、文化、思想界出现了李慎之等一些思想家；在经济理论方面的顾准死得比较早，但他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有人说建国以后没有思想家，李慎之纠正说：顾准就是思想家。另外，在美学界，高尔泰够得上思想家水平。很可惜，很多人搞文学史很下功夫，读了很多书，但是在思想水平上没有人赶得上李慎之、顾准、高尔泰等人。这是文学界最大的遗憾，我们怎么重写，都跳不出老佛爷的手心。我也很不满意我自己的文章。说别人不行，我自己也很不行。最近有一些大学教授喜欢“去政治化”、“去历史化”，这更荒唐。一部文学作品如果去了政治化、去了历史化，与人的思想、精神不贴边，最后不就是只剩下一些结构和文字了吗？当然文学史过去的缺点是光谈思想、光谈政治，对其中的结构、语言没有研究，那是一种空洞。现在倒过来，没有精神分析、没有思想深度，只有结构和文字，也是很恐怖的东西，那完全是工具性的东西。

文学界今天缺乏一种精神启蒙。我喜欢讲启蒙，一个学生说：启蒙不就是洗脑吗？我说：从表面来看确实很像，无非是我来影响你的思想，我要改变你的思想状态。你原来的思想是很愚昧的，你相信专制，像鲁迅讲的阿Q相信奴隶主义，我来告诉你：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怎么争取自己的自由、人权，启蒙改变你的思想状态，使你不再做专制下的奴隶。启蒙是与人的文化自觉相联系的，洗脑是与人的文化愚昧相联系的。洗脑是把你变得愚昧，而不

是变成文化自觉者。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要找你明天去做人肉炸弹，必须洗脑，因为要把炸弹放到身上，冲上去自己也要被炸死的。启蒙的话，我告诉你怎么爱惜生命，不珍惜生命就完蛋了，告诉你研究个人主义的特点，那你就不会去当人肉炸弹了。启蒙是与民主自由相联系的，洗脑是与专制愚昧相联系的。启蒙是与文明相联系的，而洗脑是与暴力相联系的。现在中国的一些文艺作品里，包括描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好像一切暴力都是合理的。西方的一些战争小说对暴力的批判很厉害。

李怀宇：李慎之先生晚年也爱讲启蒙的问题。

董 健：李慎之的好处就在于知识渊博、思想深刻，尤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思考得比较深。1979年邓小平访美，要找一个顾问，点名要李慎之。别人告诉他：李慎之右派还没摘帽呢。邓小平说：赶快摘了。李慎之大概在当代中国最早提出全球化，最早公开讲自由主义。经过考验到目前为止，历史证明他是比较正确的。自由主义是对人之本性的承认和追求，与民主社会是相联系的。现在我们的好多概念，比如英文globalization，第一次将其翻译成中文“全球化”的，是李慎之。李慎之是有现代思想的人，很可惜，他去世太早了。

李怀宇：你如何看王元化晚年的思想？

董 健：王元化也是我很敬佩的人，他是一代大学者，但他缺少李慎之那种思想家的气质。王元化有好多政治经历，他在党的部门工作过，当过宣传部长，他还能够埋头学术，他的见解高于那些埋头于书本的人。李慎之是越打

击越坚强，一点都没有后退，而且进一步看到问题的所在，他对改革开放的前途看得更清楚。90年代以后，王元化在学术上有一些发展，在政治上显得退缩。从林毓生跟王元化的对话，已经可以发现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把五四与“文学”联系在一起进行反思。两者文化价值是相反的。我当面与林毓生争论过。我们做学问的人如果对政治没有高见，也不敏感，很可能在学术上就低出一个层次。我觉得王元化虽然比很多学者好多了，但是在政治眼光上不如李慎之。

李怀宇：你如何看“南王北李”之说？

董 健：“南王北李”，我当面问过李慎之，他本人就不同意这样讲，我听他的潜台词就是：我跟王元化不是一个类型的人。

李怀宇：回顾所受的教育和亲历的风云，你觉得自己这一代跟上一代比，有什么特点？

董 健：我们这一代是30年代出生，建国以后受的中学和大学教育，这一代知识者有两大弱点，谁也不能避免。第一大弱点，我们是在“共产主义”乌托邦的鼓舞之下成长的，献身美好理想，投靠“组织”，完全否定“个人”。结果，我们这一代是依靠领导、依靠组织，相信领导、相信组织，有高度的政治依附性和高度的思想依附性。因此，可以说知识分子那种独立的精神一开始是零。我们这一代到了1971年才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种状态。1971年之前，我对共产主义乌托邦非常真诚地信任，对毛泽东是高度地崇拜。1971年林彪突然垮台，我们就感到不大对

头了。多年压抑在自己内心的一种感觉讲不出来，突然被那个《“571工程”纪要》吓了一跳。从此像活水开了个口子，“哗哗”流出来，收不住了。我不再相信那些大话、空话了，我要看看事实了。80年代思想解放，我们就敢讲话了。我在南京大学当副校长的时候，管文科，1990年上面下命令要“清理”文科，批判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我就顶住，坚决不干，结果现在证明我们对了。我们保护了学科，保护了一些教授。

第二大弱点是我们这一代由于长期地参加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没有办法去读书，读书甚少，知识结构严重不合理，使得我们在学术研究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很困难。这是我们这一代两个根本性的弱点，而我们的老师那一代就完全不同。第一，他们从五四时期就开始形成了个人的文化价值追求；第二，他们读书比较多，知识结构比较合理。我们很多西方的现代化知识是在“文革”之后补课学来的，有时都来不及补。我到俄罗斯跑了一年，到美国也去短期访问过，但是已经来不及补上所缺的东西。我的老师那一代，总结自己的一生是分为三个阶段：五四以后找到自我，1949年以后失去自我，到了80年代以后重新回归自我。而我们没有这三个阶段，一开始就没有自我，一直到了林彪垮台以后我们才慢慢开始觉醒，到现在还在寻找自我。我们这一代应该讲差不多都废掉了，我们就是在矮子里面选将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两大弱点是历史给我们的，是谁也逃避不了的。我们这一代做牺牲品的比较多，高尔泰成为大家是一个特例，他是在扼

杀中偶然成长起来的一棵树。大部分被打成右派的人被扼杀了，劳改死、饿死或者耽误了读书……我们这一代基本上不行，当然我们也做了我们该做的工作，起了一些“铺路石”的作用。我们老师那一代比较好，到了我们这一代断了。

李怀宇：恢复高考之后受高等教育，现在五六十岁的一代学人，你如何评价？

董 健：这一代的人，条件比我们好多了。我们的那两个弱点他们可以避免。不过“文革”结束之后的这几十年，教育仍然存在严重问题，他们遇到的困难仍然不少。能跟我们上面那一代的优秀者相媲美的优秀学者，还没有看到。目前基础好、头脑清醒、还没有放弃追求的学者，应该有一批。这些人在学校可能被边缘化，在学术界也不一定很出风头，但他们在思考问题、研究问题。记得那一年我跟李慎之见面，他当时比较看好的是秦晖、徐友渔、朱学勤、刘军宁、高华等。而摩罗一类人也有不少，则代表着堕落的一代，他的《中国站起来》表明了这种堕落。五四退潮以后，当时文化人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落荒而逃。遇到历史的转折期、过渡期，文人分化得很厉害。有些人教授、博导一当，项目一做，小车、房子一有，“幸福生活”一过，就成了“做稳了奴隶”的知识者。物质诱惑是很厉害的。

李怀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全球化的浪潮对中国大学教育有什么样的影响？

董 健：教育是牵涉到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自觉和

精神高度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教育问题多多，可以说一直没有搞过真正的改革。随着不健全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越来越腐败，大学成了商场和官场，实用主义压倒了文化品位和人格提升的追求。实际上，我们的教育遭到破坏并不是从“文革”开始的，当代教育从1949年开始就受到破坏。建国以后，我们的教育遭到了五次大破坏。第一次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主要是把苏联的那一套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搬过来，把原来结构比较合理的学科打破，而在打破合理的学科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苏联那一套。这一破坏的文化背景是当时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50年代对《武训传》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告诉人们：在中国要搞真正的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启蒙教育是不允许的，当局要搞的是工具性教育——所谓“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当时的思想是：兴国靠暴力，而不是靠文化。第二次是1957年的反右，大家对此前的教育有意见，教授们提出批评，上面不但不接受这些批评，反而进一步强化左的教育路线，接着1958年“大跃进”，把大学的秩序基本破坏掉了。第三次破坏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彻底地把大学砸烂了。第四次就是1989年，大学首当其冲。从“风波”开始对大学的摧残，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才被制止，纠正了1989年以来的左，有些收缩，但经济大潮一来，第五次教育的破坏也来了。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很健康，跟权力结合在一起，权钱一勾结，教育就没有规矩了。现在大学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官僚化、商品化，就是权和钱交相为恶。经过这五次破坏，中国的大

学教育基本上已经蜕变了，我概括为“从人格教育蜕化成工具制造”。中国现代大学的兴起，它的使命不是制造工具，不是装配机器，而是培养人、提升人格的。学生要学各种学科，但是学到最后不是变成一个供别人使用的机器，而是要变成一个和谐发展的人，有独立人格的人。从北大蔡元培先生开始强调：大学是为了帮助学生在人格上的完成和提升，以便对国家、民族尽其责任，而不是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工具”，叫某一党派来利用。爱因斯坦说：大学不应该把人培养成有用的机器，而是培养和谐发展的人。一个人学了一套本事，可以造汽车，可以造原子弹，是有用。那还是个机器，因为是别人来用他的，他是工具。爱因斯坦认为和谐发展的人就是要有头脑，要懂得“人”，有是非之心，能够区分真善美及其反面，有健康的价值观念，那是比较高级的人才。我们建国以后的大学基本上沿着制造有用的机器这条路走，当然“大跃进”、“文革”的时候，有用的机器也培养不出来，培养的是无用的机器。“文革”之后慢慢地还是培养了一些有用的机器。

目前还看不出教育有大的改革苗头。朱清时搞了个南方科技大学。他本人不错，我很佩服他。他本来是有改革精神的。他作为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敢顶教育部，对那些形式主义的“检查”不买账。他下台后在深圳办了南方科技大学，搞改革，单独招生，按照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搞了几年，后被教育部收编，现已完全失败。朱清时这个遭遇印证了一句很刻薄的话：“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

安。”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教育不可能有大的改革。

李怀宇：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你以前有没有想到？

董健：没想到。商品经济来了之后，权与钱结合，就没有什么国际通则可讲了。西方承认人性之恶，但是在现代启蒙理性之下，人性之善就可发挥出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它就不能作恶了。权力要限制，要加以监督。有一位西方政治家讲：如果文化和语言需要审查的话，首先应该由老百姓审查为官者，而不是当官的人审查老百姓。归根结底还是文明程度的问题：人类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由恶向善；文明不到一定程度，由善向恶。不健全的商品经济发展以后，中国还出现了民族主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盲目崇拜。我们对中国传统不应盲目崇拜，传统文化一定要经过批判以后才有用，不经过批判没有用，是有害的。李慎之有一个观点特别好：要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李慎之认为传统文化就是指我们之前传下来的，包括思想、书籍、人物，经、史、子、集都保留了好多的文化。这些东西里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可以分析，有的也有用。而文化传统用英文讲就是 Cultural tradition，这是指从秦始皇以来一直传到现在还活在我们生活中的一种意识形态（有人称之为普遍的潜意识），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这个传统不能要，必须通过现代化彻底消灭之。

李怀宇：为什么民族主义会抬头？

董健：第一，老百姓很难区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

义，一谈祖国哪个不爱，把民族主义当成爱国。第二，有些当权者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民族主义作为凝聚人心的口号。有人喜欢讲大国崛起、中国模式。一些海外的华人因为在国外生活，中国强大，他们就不受欺负了，中国要是弱小，他们受欺负。他们天生有民族主义倾向，中国人抱成团。所以，民族主义很有市场，官方欢迎，老百姓也欢迎。从鲁迅开始提出国民性改造，这任务没有完成。现在提到国民性，有些人很反感，好像中国人就差。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形成的国民性，当然有弱点、有问题。为什么好多好事情到了中国就变坏了呢？当然是我们传统文化有毛病，国民性有毛病，最本质的一点是奴性很强。中国的老百姓有了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只要不饿死，就不会有反抗意识。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粮仓就在隔壁，都不敢造反。我并不认为现在中国一搞民主就乱，老百姓还是很讲规矩的。

李怀宇：你这一代走过非常曲折的历程后，对未来有何展望？

董 健：未来一个自由、富强、民主的中国，我可能看不到，但你们会看到。共产主义乌托邦在中国的实践已经失败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是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中国通过体制改革走出瓶颈，前景还是比较光明的。中国的文学、文化、教育走出这个瓶颈之后都会有很好的前景。从世界的走向看，现代化、民主化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潮流，用孙中山的话来讲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绝

不是逆着这个潮流，而是跟着缓慢地前进的。现在我们的文化环境尽管比较差，但是比80年代自由的空间还是扩大了。我们不必太悲观。



黄天骥

文章中冷暖自知

黄天骢

1935年生于广州。195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纳兰性德和他的词》、《诗词创作发凡》、《情解西厢：〈西厢记〉创作论》、《岭南感旧》、《中大往事：一位学人半个世纪的随忆》等。

黄天骥教授的书房名为“冷暖室”，取自他在1982年出版的文集《冷暖集》。那一年，黄天骥同时出版了《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一书，而纳兰性德的著作《饮水词》便源于“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成语。黄天骥说：“人生在世，包括写文章，也如饮水一样，冷暖自知。我是1952年进中山大学读书的，1956年毕业留校。从1956年到80年代，这二十多年里经过了很多风雨，也冷也暖。”

从父亲起，黄天骥一家三代都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他的父亲留下不少书籍，其中《十三经注疏》是大开木刻本，可谓珍本。在大学三年级期间，黄天骥在《文学遗产》发表了一篇论文，他的祖父专门买了一本杜甫诗注本《杜诗镜铨》奖励他。黄天骥家住西关，珍藏了一些好版本，却在“文革”中散光了，当时对他打击很大。不过，他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读书后，也受到一些时代思潮的影响，接受了完整的苏联式教育。他说：“苏联的教育体系，我的理解是受老欧洲的教育思想影响，主导是严谨的英国、德国的思想，除了受计划经济以及政治影响外，也有很值得借鉴的地方，不应视为是斯大林式的东西。我们这一辈人在学科锻炼上，比较注重学术的系统性、逻辑性。”时风所及，读书是为了用的，便没有藏书的念

头。因此，黄天骥购书都尽可能选平装本，也没有兴趣专门收罗珍贵版本，如今在他的书房里，多半是平装书。

在中山大学中文系，黄天骥发现，系主任王季思教授的藏书也不是很多。不过，当年黄天骥醉心研究戏剧，王季思为了鼓励他，送了《西厢记》和《长生殿》两套书给他，都是好的版本。在研究中，黄天骥认同一点：中国戏曲往往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像关汉卿、马致远等名家的作品可能有完整的剧本，但是演出的时候，剧团会增减，又变成一个新的本子。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黄天骥深受王季思的影响，研究版本是“择善而从”，不迷信最原始的版本。他说：“我理解的‘善’就是从中研究作家创作的技巧，从中研究不同时代的创作思想和发展规律。我不是追求版本多么珍贵。”黄天骥毕业以后，王季思觉得他的性格比较好动，整天蹦蹦跳跳，就磨练他，让他花三年工夫，对不同的版本进行校注和考证，为日后的研究打下基本功。

黄天骥的另一位老师董每戡既是戏曲史家，又是编剧、导演，曾和田汉、夏衍同时成名。董每戡上课时告诉学生：“赵丹是我的学生。”赵丹演的第一出戏《C夫人肖像》，便是董先生的剧本。董每戡讲课以舞台为中心，仔细分析每场戏，跟一般文学家分析作品不同，这对黄天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来黄天骥在三年级的论文是研究陶渊明的诗，后来选择以古代戏剧作为专业研究方向，纯属偶然。当时，他是班长，有一天下雨，董每戡来迟了，黄天骥就跑到课室门口，学着董先生走路的样子，怎么摆

动手，怎么摸胡子，一连串有趣的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同学们哈哈大笑。当黄天骥猛一回头时，发现原来董先生就站在后面看着他胡闹。黄天骥吓了一跳，谁知下课后，董先生告诉他：“你的模仿力很强，不如跟我一起研究戏剧。”从此，黄天骥对戏曲下了功夫，四年级时写了关于《桃花扇》的论文。黄天骥毕业以后，董每戡还让他到剧团去实习，看人家怎么排戏、演戏，怎么导演，怎么改剧本。有一段时期，黄天骥有空就往剧团跑。

1956年毕业后，黄天骥留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当助教。王季思和董每戡的言传身教，奠定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另一位教授詹安泰先生，则影响了他对诗词的研究和创作。黄天骥说：“我当然无法跟几位老师相比，但从老师们身上吸收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我后来写研究古代戏剧、诗词方面的论文和专著，自己都感觉到哪些方面是得益于王先生，哪些方面是得益于董先生，哪些方面是得益于詹先生。”

黄天骥的老师王季思、董每戡和詹安泰，在历史巨变中都深受打击。黄天骥回忆：“董每戡先生和我接触的时间不算长，我读本科生的时候，他既讲莎士比亚、契诃夫等外国文学作品，同时也教戏剧史。那几年，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可是董先生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了，离开了中山大学。王季思先生是系主任，当时比较严肃，跟董先生不一样。王先生是‘左派’，是反右领导小组里的成员，他内心怎么考虑，思想上有什么矛盾，我们以前不知道，只知道他是领导反右的。本来，他们两人的交情是很好

的，董先生来中山大学，还是由王先生引荐的，而且他们是同乡，都是温州人。”

从1957到1966年，黄天骢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助教做到讲师，经常下乡，跟王季思接触并不算多，感情也不算密切。但是在“文革”时，王季思被红卫兵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多次被批斗，也受了很大的冲击，还被打断了骨头，黄天骢很同情他。“我觉得王先生在政治上比较幼稚。我当时也直言不讳地说他是‘左倾幼稚病’。跟王先生接触多了以后，感觉到王先生是‘真诚的左’。他绝不是因为董先生在学术上成就很高，才想出一个方法要压倒董先生。我觉得王先生绝对是相信毛主席说一句等于一万句。王先生吃尽苦头，我真的很同情他。他对我也非常好，后来他病重，他太太去世，乃至王先生在1996年仙逝，后事就是我一手领着师兄弟们操办。”

1979年，“落实政策”，董每戡从长沙回到中山大学，住在一个只有二十八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有一天晚上，黄天骢在董家和老师闲谈，王季思夫妇专门过访，黄天骢当面听到王季思诚恳的道歉：“每戡，我错了。以后好好合作。”董每戡说：“过去了，过去了。”黄天骢回忆：

“我想董先生内心也未必完全释然，从1957到1979年，整整二十多年，由于被错判了右派，他的家庭多么艰苦，他的儿子受了多大的牵累，真使闻者心酸。后来，我在1998年编了董先生的文集，花了一年的工夫，有一些漫漶不清的书稿看起来很吃力，以致把眼睛也搞出毛病了，但是我觉得值得。”

回首中大往事，黄天骥相信，即使风雨飘摇，也磨灭不了学术传承。他说：“陈寅恪先生在历史学方面有那么大的成就，除了对中国历史精熟、还精通很多国家的语言之外，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做法是很多历史学家所没有的。比如他研究唐代的政治史，就把唐代宫廷内部的斗争，理解为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门阀之间的斗争，这跟中国过去写帝王将相的历史不一样。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对明清之交的知识分子都有触及，也可能包含他自己的一些感受。他是从考证入手，但不光是考证柳如是。我的理解，如果光写柳如是就没有意义了。尽管我不在历史系，陈先生也没有直接教过我，但是作为中大学生，我很仰慕陈先生，并且很自豪在自己的学校中有这样的大学者。在看他的书时，感受是不一样的，受到的影响也会更深刻。我记得我三年级做学年论文的时候，研究陶渊明，当时就找陈先生研究桃花源的文章来看，尽管没有直接受教，但也受到陈先生各方面的熏陶了。陈先生开风气，其实他对理论问题也很是重视。中大的传统，既重视微观，又重视宏观；既注重实证，又注重理论。我在中大学习那么多年，受老师的影响，乃至受整个学风的影响，无论到哪个地方去都摆脱不了。”

黄天骥在大学期间读了许多外国小说，爱听古典音乐，学交谊舞，觉得这是苏联文化的影响。“我绝不是认为计划经济有什么好处。苏联文化有很多思想是属于老欧洲的思想，包括教育体系。苏联很多老教授，强调学生要看经典小说。那时候，我们学的交谊舞，也是西方很典

雅的东西。如果从思想深度来讲，我觉得欧洲的东西好，这方面我可能受了董每戡先生影响，董先生很赞赏欧洲文学。我这一辈，其间接接受老欧洲的教育比较多，所以不太接受实用主义的东西。”

在中山大学中文系，黄天骢培养了许多英才。目前，他仍在第一线工作，依然致力于以中国古代戏剧为主的研究。他说：“我觉得中国戏剧的发展，是永远在变的，明代就不同于元代那种表演的形式，唱腔、角色都在变。按照我们的统计，中国大概有三百六十多种的地方戏，有些已消亡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抢救，有些抢救不过来了。”白先勇力推昆曲艺术时，到广州曾和黄天骢探讨学术问题。黄天骢笑道：“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粤剧更好听，其实粤语有八九个声调，粤曲相应显得更婉转，旋律更高低抑扬，我认为比昆曲还要好听。民国初年，粤曲的音乐还受到西方标题音乐的影响，所以出现了像吕文成那批的粤曲作家，写出了《雨打芭蕉》、《赛龙夺锦》那类非常经典的作品。岭南文化跟东南文化还不完全相同，它善于把中西交融。但是到了现在，戏曲包括粤剧，已经没有办法像过去那么繁荣了。有了电视，谁还跑去看大戏？有一个时期，连电影都不行，话剧也是跟戏曲同一个命运。在欧洲，那些中产阶级去听交响乐，是作为一种礼仪和身份的象征的，也许我国以后可能会发展到这一步。”

黄天骢把岭南文化比喻为“及第粥”：什么东西都放进去，再产生一种新的东西。现在一般说广东人务实、

包容、创新，他认为这种说法不容易显示出岭南文化的特点：“因为说包容，现在哪个地方不包容？北京有故宫，现在有大裤衩、鸟巢，也容下去了。国家大剧院是一个大鸭蛋，慢慢看惯了也行。而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则最能够表现岭南文化，外面看来是中国式的，里边的建筑艺术完全是西方的，五千多个座位的大厅，没有一根柱子，把中国和西方的建筑特点融合起来。岭南文化所谓的包容，不仅是低层次的容纳，以我的理解，岭南文化是能把不同的文化交融在一起，从而演化为新的品种、品质。就是说，自古以来，岭南就接受了中原文化传统，而本土的广府文化、潮州文化、客家文化，互相在广州交汇，互相影响，融合为一体，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在这基础上，广州又较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广州人不排外，在这里，什么人都能够和平共处。共处以后，文化就交融在一块了。总之，岭南人以我为主，对外来的东西，拿过来，融进去。所以我说岭南文化是‘不中不西，有中有西’的。”

李怀宇：昆曲在明代鼎盛，有什么样的原因？

黄天骥：从明代中叶以后，昆剧在东南这一带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剧种。东南的演员、作家，在明代中后期，对中国的戏剧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昆曲很雅，明代的戏曲后来越来越雅化了。但是《牡丹亭》未必是用昆曲来谱写的，所以当时一些东南的文人、作家就反对《牡丹亭》。汤显祖是江西人，江西那边更多的是参考弋阳腔的腔调，所以

他对昆曲不熟悉。结果他不满意人家改他的作品：你要用音乐腔调来框我，是框不住的。在明代，有以昆曲为主的五个唱腔，昆曲影响最大，那些作家用昆腔来写剧本最多。昆曲除文字上典雅之外，还讲究演，动作优雅，考虑到身段。我觉得《牡丹亭》很特别，青春版《牡丹亭》尤为成功，所以跟白先勇先生能够谈得来。我当时跟白先勇先生说，柳梦梅是岭南人，而且是广州人，他具有岭南人的性格。

李怀宇：中国戏曲经历无数变迁，你在变化之中发现有许多有趣的问题？

黄天骢：如果从剧本的文学性来讲，元代的剧本应该算是精华的比较多；如果从整个演出即包括唱念做打来说，就应该是清末的成就最高。可以说，清末是戏曲发展的最高峰，到清末以后，这个高峰就下来了。一般来说，中国的戏曲在宋金就形成了，但我更喜欢元剧，例如《西厢记》。这故事原来取材于唐代小说《莺莺传》，后来金代的董解元又写了《西厢记诸宫调》，我们简称“董西厢”。以前，大家都没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唐代的《莺莺传》里，莺莺跟张生相见的年龄是十五岁。金代董解元改成唱本也是十五岁，可是等到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时候，她的年龄改成十九岁。在唐代，十五岁是法定结婚的年龄，可以出嫁了，十九岁就是大龄青年。所以《牡丹亭》的杜丽娘也叹息：“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二八，即十六岁。十六岁还没有结婚，还未碰到好的对象，已经是发神经，患上忧郁症了。“王西厢”把

崔莺莺改为十九岁，今天来讲，是“剩女”了。王实甫这样改，便突出地表明崔莺莺主动追求爱情，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我从这里面不仅仅看出是反封建婚姻制度的问题，还有王实甫对人性的追求。

李怀宇：你在研究戏曲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说“四大名剧”是中国人性解放的一个表现，在戏曲里面，人的身份突出了。

黄天骢：这也许是“大胆”的想法。在“文革”以前，界定作品是精华还是糟粕，往往根据它是不是反映现实，特别是能不能反映人民对封建势力的反抗。为什么当时人们老把《窦娥冤》排在前面呢？因为它体现了主人公敢于反抗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当然这方面也是受苏联或者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影响，有其合理性、革命性。但文学是人学，一个作品的成败，在于能不能写出生动的人。能够如实地刻画人的内心感情，就是成功的。

什么是“人”？在这里，我们接触到如何看待人、人性以及人道主义的问题。我们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构成了不同的阶级或阶层，这就是群。不同的“群”，有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阶级属性。但是，不同的“群”，又都是人。凡属是人，就都有“人”的共同点。什么是人的本性、本能？无非一是要生存，二是要发展、繁殖。在世界上，所有生物，概莫能外。所以，“人”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两方面的本质属性，二者缺一，都不是“人”。在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市民社会已经出现，李卓吾等思想家已经对人

性和人的价值有所认识，他们提出要顺从人的自然性，包括对“性”的追求，也应顺其自然。所以汤显祖通过杜丽娘之口说：“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四大名剧的出现，是人们对人性认识的反映，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文学发展的态势已经跟唐代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像《西厢记》，我认为最重要是写出了对人性的追求。《西厢记》谈到“性”，但不算太严重，因为宋代谈“性”已经谈得厉害了，连极文雅的宋词里都谈“性”，李清照的词写到“被翻红浪”，不就涉“性”了吗？到明代，已经有很多摆地摊的“性”书了。《金瓶梅》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所以《西厢记》写到偷情，有些话说得比较出格一些，但不算什么，注意有所批判就行了。我认为，《西厢记》反映了整个中国封建后期的人的思想，而不单单是元代人的想法。

李怀宇：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也非常注重人性的解放，摆脱宗教的束缚，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是这样的产物？

黄天骢：对，就是人性的解放。当然，如果没有清朝的满族从东北打过来，中国的发展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模式。因为明代后期实际上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到清朝顺治年间，忽然搞了经济上的逆转。清代初年，经济上从原来农商并重的政策，回复为重农。本来，明代晚期重商的味道已经越来越浓了。清代一来，儒家正统的重农思想又回潮了，经济政策是倒退的。当然，朝廷的政策并不能够左右整个历史的进展，商业仍有所发展，所以有所谓“康乾盛世”。但是，朝廷主导的思想路线、经济政策，是倒退的。所以当时进步的思想家像方以智等，便跟上层

展开斗争。总的来说，保守的经济政策的复辟，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到了清代中叶，整个社会就走下坡路了。晚清大变局之后，因为中国积贫积弱，所以处处受人家欺负。但是，与此同时，西方先进的东西也开始影响我们。我们被侵略，反过来又促进了民族的觉醒。

李怀宇：为什么很多电视连续剧老是在歌颂康乾时代？

黄天骢：说实在的，一些编剧家不是文学家，更不是思想家，他们关注的恐怕只是市场。如果真是一个有深度思想、搞学问的人，应该知道中国的历史。清官当然比贪官好，但是靠清官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靠好皇帝，这是农民的思想，我们很多编剧家一直还没有跳出好皇帝的这个思想。中国目前群众的思想就只是走到这一步，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不能靠一两个人来解决的。不错，人是有作用的，但是没有制度的保障，就靠一两个好官、清官、好皇帝，能解决问题吗？所以我觉得不能对编剧要求很高，他们到底不是思想家，不能够高瞻远瞩地从世界大局去考虑问题，觉得好看就弄这个。搞多了真有副作用，按他们的想法、手法，社会如果没有清官，不就完了吗？

李怀宇：为什么中国的传统戏剧很多都是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

黄天骢：这是必然的，尽管我说有人性的东西出现了，但的确不是主流。在当时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尽管有商业因素，市场在发育，毕竟不是主流，所以必然是帝王

将相、才子佳人作为主角，必然是他们主宰历史，没有办法以我们的意志来转移。中国的自然经济是男耕女织，重农。尽管在明代后期市场已经发育了，特别是广州这一带，但毕竟没能突破自然经济。包括《西厢记》也好，《牡丹亭》也好，最后还不是皇帝出来说了算吗？清代的金圣叹非常了不起，他批改了《西厢记》，他说他见过一个没有大团圆结局的版本。也许他在说大话，他认为不要后面那个大团圆会更好。不管他看过没看过，反正明代后期就有人认为不一定需要大团圆。金圣叹的思想很先进，他砍了《水浒传》起义军受招安这部分。他有市民思想，当然，儒、道、佛思想也是兼而有之，比较复杂。

李怀宇：莎士比亚的戏剧有很多也讲所谓英国的帝王将相，但是他是凸显人性的，跟中国的汤显祖有没有可比性？

黄天骢：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莎士比亚对中国，或者汤显祖对莎士比亚，其实是互不了解的。杜丽娘对人性的追求跟罗密欧、朱丽叶是不一样的，欧洲亚洲有不同的文化。杜丽娘追求什么呢？就是说，汤显祖追求什么呢？他追求人性自然，“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是他的《牡丹亭》的主题。希望顺从人性的自然，她该嫁就嫁，不要不让她嫁，这是中国在明代对人性的一种看法。但是，当时毕竟自然经济还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汤显祖有异端的思想，朦朦胧胧地知道人性是不能压抑的，却又不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莎士比亚就不同了，西方当时人性解放的思想居

主流地位。如果比较一下，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古代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封建的重农主义，长期压抑着人性。汤显祖追求人性，也只是有限度的人性，跟西方人对个性解放的理解是两回事。正如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跟西方经济相比，也并不一样。在这方面，我还没有成熟的看法。总之，我觉得，太机械地去类比是没有必要的。有些人真的做这样的文章，我觉得没有必要。

李怀宇：在清末民初，广东出了很多影响全国的人物，像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黄天骢：广东人喜欢饮头啖汤，开风气之先。如果说岭南文化的特点在于交融，那么，孙中山、梁启超的思想就是交融的产物。孙中山就把儒家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融在一块变成三民主义；梁启超也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但毕竟骨子里还是儒家的思想，他也保皇，而立宪是西方的东西。广东人没有北方人那么沉稳，他们饮了头啖汤，对第二啖，就兴趣不大了。他们创了新，但开风气不为师，不坚持。广东人有一个满足于现状的弱点，所以做大学问的广东人，往往是去了北方以后，受了北方风气的影响，成就才变得大的，包括梁启超都是这样。因为广东这个地方农业生产发达，比内地缺水的地方好得多。而且经商发财容易，耕田种菜、捕鱼捞虾，容易温饱，这造成了许多广东人没有恒心的弱点。我觉得，广东人的性格，总体来说，是既生猛，又淡定。生猛与淡定是一对矛盾，二者又相互

交融。生猛则灵活机敏，但不易持久；淡定则恬静豁达，但也有好享受和进取心不足的一面。

李怀宇：以前说“省港”，广州文化对香港文化有影响，香港起飞后也对广州文化产生影响？

黄天骢：岭南文化，当然也包括客家、潮州的文化，粤东粤西都不可忽视的。主体是珠三角，因为在近代以来，交通最便利的就是珠三角，而且外国人来广东，首先是从澳门、香港进入。我的理解，香港文化是广东文化的一部分，过去，省港两地是一体的。从前，我们去香港哪里办过通行证啊？早上去了，晚上就可以回来，我们很多亲友，也都住在香港。“文革”前，在北方，如果你有一个香港的亲友，人们会另眼相看，觉得奇怪。而在广州，没有香港亲友，这才奇怪，因为两地本来是一体的。一百多年前，香港还是个小渔村，广州人陆续到那里居住，当然后来上海人也去了。在“文革”以前，香港根本比不上广州那么发达。我小时候曾在澳门读过小学，也去过香港，觉得它和广州没有什么不同。后来香港发展很快，原因很复杂。就文化而言，它固然属于岭南文化，但西方的文化大力渗入。回归前，香港的政治体制是英国的体制。

“文革”时期，我们经济大倒退，香港经济却迅猛飞腾。现在，香港文化跟广州文化确也有所区别了，他们更多地接受西方的东西。有一个现象很有趣，香港很开放，很西化，却在某些方面，比广州还更多地保留了旧的岭南民俗。所以，香港文化与现在的广州文化，发展情况是不一样的。例如香港的粤菜，比广州做的粤菜，显得洋味更

浓。特别是冰淇淋，真好吃，广州是比不上的。所以我认为，也不必强求深圳、广州、香港联合起来搞成一个文化圈。

李怀宇：晚清以来，西方的文化慢慢影响中国人做学问的方式。你在1949年以后又受到苏联文化的影响，西方理论对你研究中国学问产生了什么影响？

黄天骢：人在社会里，总会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我的文艺观点，过去受苏联的影响较深。在董每戡等老师的影响下，也特别喜爱欧洲古典的小说、戏剧、音乐。老实说，我对时下的流行歌曲，老是背不过来。我的学生陈小奇写过《涛声依旧》那么好的作品，我唱了一两句，就忘了。但西方的交响乐、古典音乐我真爱听，而且也都还记得一些。我认为那是高雅的东西，对我这一辈人，一直影响很深，不容易摆脱。传统儒家、道家的思想，对我这一辈人的影响也不容易摆脱。至于时下的一些西方文艺理论，有些我也能够接受。例如弗洛伊德的一些观点，以及符号学等等，我觉得未尝没有可以吸取之处。但是，我没有把它作为思想的主体。比如符号学，我可以运用，但是我在分析研究文学作品的时候，不会从符号学角度去研究它的主体、总体。现在有些搞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朋友，真的就按西方那套东西去做了，我可做不到。比如我讲《牡丹亭》，我可以运用符号学说明为什么汤显祖会用“牡丹亭”作为剧本的名字，因为从唐代以来，已经出现一种提法，把“牡丹亭”看成是男女野合的地方，元代一些剧本也是如此。这相当于我们说梅花代表高洁，松树代表长

寿，梅和松，不就是符号吗？我觉得，参考某些西方新的理论、观点，来分析文学作品的某些细节、某些片段、某些现象，有可取之处，但我不会用符号学或弗洛伊德的理论，指导自己研究《牡丹亭》这整部作品。



郑 重

在业余兴趣中探寻艺术天地

郑 重

1935年生于安徽宿县（今宿州）。1956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61年毕业，次年到达文汇报社，从事采访写作及编辑工作。著有《谢稚柳传》、《唐云传》、《林风眠传》、《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张珩》、《收藏大家》、《海上收藏世家》、《毛泽东与文汇报》等。

新闻江湖里，郑重是上海写书画家和收藏家的第一人。郑先生在住家之外另设一个单元，用来放藏书和写字，时有朋友来品茶论道。郑先生为人豪爽，对文化界的旧闻烂熟于胸，说起掌故如数家珍。

郑重家是农民，父母都不识字。1935年，郑重出生在安徽宿县农村，在游击区长大的。抗日战争后期，郑重已经记事，所读的双庙小学是当时游击区办的，老师大部分是由城市投奔解放区的革命青年。1950年小学毕业，初中二年级转到城里的崇真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早晚可以听到教堂祈祷的钟声。

1956年，郑重高中毕业，考进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王中的名言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郑重听过中文系、历史系的课，经常有绘画、戏曲、音乐等各种讲座。

郑重读新闻系是想当作家。“我学新闻最初有一个误解，觉得当记者就可以当作家。我中学读了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觉得当个记者跑来跑去很舒服。我读瞿秋白的《赤都心史》，是他访问苏联写的游记，以一个记者的眼光看苏联。”郑重说，“实际上，新闻记者和作家完全是两码事。当了记者以后文学都磨光了，不允

许想象，不允许抒发，就是客观地记录。”

1956年秋，郑重刚入学就生了肺病，按道理应该退学。郑重给校长陈望道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状况，几天后，校长办公室的秘书到宿舍来找郑重：校长同意你留下来。1958年正是“大跃进”，同学们到农村去劳动，郑重因病得福留在学校，读了许多书。他的同学现在回忆起来，没能读书，多是怨声载道。

1961年毕业时，郑重的女朋友在山东教书，他的分配第一志愿就填山东，结果把他安排到上海科学电影制片厂当编剧。1962年，郑重调到《文汇报》工作。这一年，郑重和在山东工作的女朋友结婚了，此后两人分居十二年。郑重说，那十二年他赚的钱都花在铁路上。1963年，他们的儿子出生，郑重给他起名海歌。女儿叫海瑶，后来成了著名作家恺蒂。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郑重亲身经历了《文汇报》的一切，看到一些人和事的变幻，自己则当了逍遥派：“什么都不管，上面叫我干活我就干活，但干活还干得不错。为了解决夫妻异地分居，我要调走，上面不让我走，专门派人去把我老婆联调过来。我是逍遥派，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工作上有了更好的发挥。”

在《文汇报》，郑重曾在文艺部当过副主任。文艺记者晚上要看戏，很晚才回报社发稿，郑重就坐在报社等着签字，十点钟还不能回家，他自己的采访又很少。同时，他自觉没有领导才能，要求去当记者。1983年，中国第一颗通讯卫星发射，郑重向总编辑交上一纸辞呈，就跑到西

昌发射现场采访去了。他跑过几年国防尖端科学的新闻，去过导弹、卫星、原子弹研制基地和各个卫星发射场，采访过王淦昌、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等两弹元勋科学家。“钱学森在导弹系统里面是一个战略家，他是很有才气的人，后来政治化了。朱光亚最谨慎，滴水不漏。在原子弹研制上，王淦昌的贡献最大。邓稼先倒是实干的，我觉得这个人是很可敬的。”郑重回忆，“我在这个系统花了很多时间采访，采访不下百人，他们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大学生，你跟他们谈话，各有特点和思想，一个个跟其他人都不一样的，都很精明能干，关心国家大事。这一批人是精英，有的人到现在都隐姓埋名。”

尽管没有专门跑过美术界，郑重却在“文革”期间与许多海上画家成了患难之交，更与谢稚柳、唐云、来楚生、张大壮、刘旦宅等人成为挚友。在谢稚柳家，有时候外边来个朋友，想跟谢稚柳小声说点事，避开郑重。谢稚柳说：“你不要避开他了，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在他面前没有秘密了。”唐云家里有什么问题也来找郑重。郑重是逍遥派，家人又不在上海，每天写完社论就去玩了，星期天上午跑一家，下午跑一家，晚上跑一家，和画家建立起感情，积累资料，后来写了许多画家的传记。上海的老干部收藏四大家是“曹王李白”：曹漫之、王一平、李研吾、白书章。郑重也一天到晚跟他们一起玩。郑重说：

“我那时候得到的画统统都是有上款的。那时有人说：你有这个上款，到时候就不好卖了。我说：将来画还能卖吗？谁还买这些画？我玩玩好了。古代一张画，上款是某

某人，一查能查到这个收藏者是谁。我很开心，这张画有我一个名字就行了。后来人看到这张画，会问：这个郑重是谁啊？人家考证半天，多有趣。所以，我的所有画都有名字。”

在上海，郑重爱结交画家。在北京，他爱结交学者。

“因为我觉得上海学者可谈的不多。北京就住着一批学者，我觉得北京的画家不如上海画得好。在北京，我搞的是科学报道，也没跑过文艺，也没跑过文教。和文化学者打交道，只是我自己的爱好。”郑重跟俞平伯、顾颉刚、冯友兰、张伯驹、夏承焘、朱光潜、周培源、启功都很熟。“除了我的采访对象，我平时交往的就是这么一批人。我年轻的时候喜爱、尊重老年人，我觉得老年人都是宝贝。俞平伯的道德修养，哪里找去？顾颉刚有点锋芒毕露，启功先生倒圆滑一点，但很有风趣，现在到哪里去找启先生这种人啊？像夏承焘词学的研究，像冯友兰那种学问、坚持他的观点，朱光潜那种与世无争，那种大度，找不到了。”但郑重一向不大写作家，沈从文家和《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只隔几栋楼，郑重也没有去采访过。在上海当了几十年记者，他连巴金也不认识。他认为看作品是读者对作家最好的了解方式，不太需要记者再多作介绍。相比之下，画家、收藏家都藏得比较深，更有写头。

2012年，郑重的安徽老家宿州二中盖了一个新校区，图书馆命名为“郑重图书馆”，郑重捐了五千册书，又办了谢稚柳、陈佩秋艺术教育中心。“因为谢先生一直有一个心思，叫我搞书画普及工作。我要实现他这个心愿，就向中小

学生进行书画传统教育，把他们的心陶冶得纯洁一点。”

李怀宇：你起初怎么会认识那么多画家？

郑 重：“文化大革命”时，我是逍遥派，这些老画家都变成“牛鬼蛇神”，原来我跟他们认识，但不熟。我不会画画，但心里有这种爱好，这些老画家最困难的时候，我就和他们在一起玩。他们在牛棚里，我去访问他们。像谢稚柳在扫楼梯，我帮他扫楼梯，跟他聊天。“批林批孔”的时候批判唐云是“复辟”的老头子，没人敢让他回家，我陪他回家，他是酒仙，我就陪他喝酒。我又不会喝酒，喝了酒他就到楼上去了，给我画画。

李怀宇：唐云喜欢喝黄酒和吃大闸蟹？

郑 重：对，喝黄酒，我在这样的情况下跟他们玩。“文革”时他们都关在上海博物馆，我跟他们接触以后，博物馆管文教的工宣队就向文汇报社告状：你们这个郑重，一天到晚专门找我们的“牛鬼蛇神”。我们工宣队也找我谈：你怎么不务正业，专门找这些人采访干什么？我说：我是记者，要了解情况。工宣队不懂，因为当时张春桥规定工宣队不能管业务，只能管运动，他们没有权力管记者的。我就利用这个情况去接触这些老画家，还收集他们的诗词，像谢稚柳的《鱼饮诗稿》，我们每个礼拜四到车间劳动，我学会排字，就把他的诗稿一个字一个字排好印了用订书机订起来。他到处送老朋友，几十个人跟他一起唱和。我也收集唐云的诗，我准备了一张长卷，每搜集几首，就让他抄写在长卷上，成为一个很长的卷子。后

来谢稚柳给我写了《唐云诗稿》的引首，裱成大卷子。另外，我收集他们的文章，这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干的。

李怀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你如何跟他们交往？

郑 重：我和唐云、谢稚柳、王个簃、陆俨少、刘旦宅交往。那时候不怕，刘旦宅已经被打成“反革命”了，我还是照常去看他。因为我是农民的孩子，又没有历史问题，没有任何政治错误。我又是入党很早的人。《文汇报》都知道我玩画，那时候包括一些老干部喜欢的，就让我为他去向画家讨画。我的画多了，放在地上，有朋友来，我说你捡好了。那些老先生确实对我都好，有一天晚上，谢稚柳先生拿出几个卷子来叫我看，我知道他想送一个卷子给我，我说：这张蛮好。他说：这张你拿走吧。当时都已经是这么样的关系，你跟他做一点事情，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跟谢稚柳谈怎么样鉴定，那时候没有录音，我就把他的谈话写成两三万字的文章，送到排字车间去排字，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就看到我写的手稿及排出来的毛样贴在布告栏里，写了按语：“试问这样的文章能发表吗？”我真的出了洋相。可是到晚上，原稿和排的样本不翼而飞了，领导也没有批评我。噢，我就产生一个相反的想法：这玩意还有人欢喜，说明我这个东西还行。所以还继续和他们交往下去。那时候真的玩疯了，一点一点往家里带。另外还可以裱画，河南路有一个裱画店老师傅，跟我很投缘，他看了画说：好，拿来我给你免费裱画。

李怀宇：那时候那些老画家的处境怎么样？

郑 重：当时生活都很困难的。唐云家在曹家渡，我请他吃顿饭一块六毛钱还是几块钱，他吃得很开心。我那时候也没有钱，我老婆来了上海以后，我请唐云到家里来吃饭，一间小屋，他照样来。吃过饭了就画画，他给我女儿画了一张画，画个麻雀。谢稚柳关在家里，想去莘庄梅园看梅花，我有个朋友在医院的，会开汽车。我说：你不能开着汽车，咱们到莘庄观梅去。看了一天梅花，谢先生开心得不得了。谢先生回来以后，拿了一些画给我那朋友，说：你挑吧。那朋友说：我要它干吗，我不要。后来他后悔：谢先生拿了这么多画给我挑，我一张没要，不知道现在这么值钱啊。

后来画家凡是有什么困难的都来找我。我帮助他们到药厂弄药，陪他们在医院看病。尼克松访华前后，文化有点松动，我就趁机出了一版上海画家的画，“文化大革命”中没人敢干的，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今朝更好看》。当时报社党委副书记王成龙是造反派，我就拉着他去看，我说这些画怎么怎么好，向他灌输。这个党委副书记被我说动了，到上海画院去看画，选了几幅画，山水、花鸟、人物都有，经他同意出一个画刊。这些当时都是禁区，好像我就是书画界的代表人物一样。后来又发表了书法的文章，我还以鲍蔚文（“文汇报”的谐音）的笔名写了提倡连环画的文章，为被批判的《山乡巨变》等连环画讲话。我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在书画界真是如鱼得水。后来要批“黑画”了，我知道要批哪些人，就赶紧给他们通风报信，我告诉刘旦宅：你的画赶快收起来，马上要批“黑

画”了。

李怀宇：回顾记者生涯，采访书画家是不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事业？

郑 重：在报社，没有专门分给我采访书画，我完全是自己业余爱好的。我正儿八经的职业是跑医学、科技的记者，没有当过美术记者，但是《文汇报》这个地方宽容，你去搞别的，报社也不管你。报社的其他人也有点怨言，但报社领导不跟我讲，那我当然可以去搞了。美术组没人比我跟这些画家熟，我到任何一个画家的家里，都可以坐下来吃饭。你想想看，任何一个画家的事情，我能办到的都会认真去办。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积累了很多资料，那时候没想到要写书。那时候我还没这么有远见，今天会出现这样的社会：绘画还值钱，画家还吃香。我没有这么个觉悟。我替他们感到惋惜，那时候有一个意识：这些人将来都死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人了，我要帮这些人留点东西。我做了很多笔记，我想自己留点东西玩玩。没想到书画会像今日有这么个市场。那时候如果想到，画还能卖钱，我就不好意思要画了。我会拼命地去找资料，这些老先生都不得了。我很尊敬他们，有学问，人品真好。一个个没有鸡肠狗肚的事，都很大气。在和画家的交往中，也在不断地淘汰，我觉得某位画家不以真诚待我，我就跟他不往来了。凡是和我交往的画家，我都积累了一些材料，当时不知道要写书。我听到什么，回来就记，我很多学问就是从那时候学的。比如谢稚柳跟我讲某张画、某某人，我根本听不懂。我回来就赶快查书，那时候《文

汇报》的书库没有封闭，一直开放，图画书籍很多。过几天我再去他那儿，跟他聊天，就可以把话接上了。谢先生讲：郑重还懂一点嘛。实际上我是现炒现卖的。朋友一世，友情终生，谢先生去世，我还在整理他的东西。后来我写了谢稚柳、唐云、林凡眠的传记。

李怀宇：当年你最熟的画家是哪几家？

郑 重：谢稚柳、陈佩秋、唐云、来楚生、张大壮、刘旦宅，这几个我是最熟的。经过很多的淘汰，最后就只有这几个人了。一个个都像神仙一样。唐先生那种潇洒，谢先生那种学问，谢先生在背后从来不大爱议论人家坏话的。来楚生那种耿直，字也好、印也好、画也好，不得了，可惜死得太早。陈佩秋的艺术精益求精，心地善良。刘旦宅的执著、嫉恶如仇。我跟他们在一起玩，回来以后我就自己用功去读书、研究。

李怀宇：你跟这些人在“文革”中是患难之交，感情毕竟不一样。

郑 重：患难之交。比如说对人生淡薄、宽容，这些都有他们对我的影响。他们都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儿子结婚，我请谢稚柳先生来做主婚人，我父亲来了，白胡子老头，坐在藤椅旁边，像个大学者一样，虽然是个农民，气度真好。谢先生问：“那个白胡子老头是谁啊？”我说：“我父亲。”他说：“你父亲不是农民吗？”我说：“对啊，是个农民。”“哎哟，一身仙气！”谢先生都这样称赞我父亲。

这一段对我艺术上的影响，现在只能讲皮毛，我也

知道一点书画问题，有点发言权。那时候想，这一代消失了，以后肯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人了，要给我们下一代留点东西。从我个人爱好来讲，很喜欢跟他们交往，一直到死。谢先生很喜欢李商隐，我也喜欢李商隐。我就跟谢先生讲，南京吴调公写的不行，我要做一本《李商隐传》。后来一直忙，就没有写，一直到谢先生逝世，我在旁边，他拉着我的手说：李商隐，李商隐。还在念叨李商隐。我用一部李商隐的集子为他陪葬，放在火化的炉子
里面烧掉了。

李怀宇：从晚清以来有所谓“海派”之说，这个传统有没有一直延续下来？

郑 重：晚清以来的海派，就是任伯年、吴昌硕这一个系统，其他的系统不能称为海派。程十发不承认自己是海派，谢稚柳也不承认自己是海派。严格来讲就是任伯年、吴昌硕、虚谷这一路算海派。吴湖帆严格来讲都不属于海派系统的，他是属于苏州“吴门画派”。如果按我的观点，流派要讲风格。过去有京派、海派之争，当时北京的京派对上海是看不起的，因为海派吃饱饭没事干就抱着那些官员拍马屁，不严肃，下九流。从风格流派来讲，齐白石是海派，他是顺着吴昌硕过来的，当然他后来变了，比吴昌硕更通俗化、更引人注意了。像程十发应该是标准的海派，他是从任伯年出身，但他自己不承认他是海派，他认为海派是对他的侮辱。老的观念，海派是不成系统的下九流的艺术，不入正轨，是一种草率的艺术，是个贬义词，现在内容更新了。后来说上海海纳百川，因为诸多流

派形成这么一个流派，到现在我们叫上海“海派”。过去上海收藏家，也跟京派不一样的。

李怀宇：你碰上的那一代画家，到“文革”期间，艺术已经很成熟，但个人的经历很坎坷。

郑 重：很坎坷，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这一段达到高峰。我见到的那些画家，当时他们都六十岁左右，大概都比我大三十岁，都很成熟了。解放前期，他们的画的风格出来了，比较稳定，也有锐气、灵气。唐云先生那时候的画都有灵气。现在大家都说谢稚柳先生对宋元那一路的成就，其实谢先生真正创造性的是落墨法。他的画里面多种风格融合在一起，很漂亮、工细。但是他的风格是落墨法，那种奔放、大度，好的落墨法不是应酬别人的东西，是他的真正的生命力。我觉得人们对谢稚柳没有真正地理解。现在谢稚柳早年的画最值钱，他早年的画模仿较多，画得比较拘谨。

李怀宇：政治运动对这些画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郑 重：伤害非常大。家里的纸张都没有的，谢稚柳先生家就只有一个圆桌子吃饭。在草纸上面作画，没有纸的，抄家很厉害。唐云好一点，家里虽然抄家了，但纸张还有。谢先生“文化大革命”时在家里还悄悄地作画、写字。艺术真的变成了他们的生命，这些人都非常超脱。后来人家叫谢先生给邓小平、叶剑英画，他没画过，厉害吧？

还有一个张大壮，真是人淡如菊，有六朝人物那种仙气。有一次巴金带着茅盾来看他，我到他家去，他说：

他俩来看我，我装病躺在床上，没跟他们多说话。茅盾是他舅舅章太炎的学生。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人家说话？他说：他是大名家，我跟他说什么话呢？他又说：茅盾那个人怎么一会变成国民党，一会变成共产党，变来变去的。这些人都有人格的尊严，一个个对社会、潮流都有一套自己的做人原则。这是在逆境之中不屈不挠，没有低声下气的。在人格上，我从内心里尊敬他们。

他们的脑子里没有什么政治的观念，尽管叫他去学习、发言什么的，他下面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套，对政治之类的东西，他们都是应酬。上面讲那一套，他们就不放在心里。他们有他们的生活规律。叶浅予来上海，谢稚柳请叶浅予吃饭，都是老规老矩的。任何朋友来，谢先生要走到门口拱手相送。张大壮有病都不去医院，他说：医生要把你治死的。他自己会中医，会开药方。他活了七十多岁，那真是有本事。这些人每个人都不一样。老一辈像俞平伯、冯友兰都是我的朋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

李怀宇：我在陆灏家里看过一幅俞平伯写给你的字，录毛主席诗词。是你转送给陆灏的吗？

郑 重：转送陆灏了。俞平伯给我写了毛主席诗词，我说：平老，我不要毛主席的诗词，你写你自己的诗。他说：你别害我。我说：我怎么能害你呢？我又不会揭发你。他说：好，你过两天来拿。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幅。你坐在他旁边，跟他聊天，感到很舒服。他很天真，外面的世界就不知道。冬天，他穿一只袜子，去香港讲学，因飞机晚点滞留在宾馆里，连一只袜子也没有了，我们到处给

他找袜子。就是这么一个平和的老爷子。后来那些搞红学的人还在搞他。我也去访问李希凡，李谈到当年他写的批判文章，他还气得要命，说：那些话能怨我吗？你去查查，那些话都是毛泽东讲的。李希凡心中不平。当然那些话都是毛泽东讲的，毛泽东把他当枪使，也不能怨李希凡。

我跟张伯驹很熟，张伯驹给我题了好多画。有一次我拿着谢稚柳的一个卷子请张伯驹题，张伯驹打开一看：哎，谢稚柳的。马上叫潘素：你过来看，这个是稚柳的东西。他们都是朋友啊。那时候张伯驹的词稿还没有出版，我就从他家里借油印稿或手稿到宾馆里去看，抄好，再还给他。

我跟顾颉刚及他的家人也很熟。我到他家里去，叫他题个卷子，第二天他进医院了，他女儿打电话说：不能给你题了，进医院了。自那以后没出来。一直到他逝世，我去北京医院太平间为他送行。后来我写《送顾先生远行》，陆灏说那篇是经典之作。

李怀宇：顾颉刚一辈子也是不容易，他的日记最近出版了。

郑 重：顾颉刚给我讲，他和俞平伯在一起研究《红楼梦》。我原来想做一本《顾颉刚传》的，后来有人写，我就放弃了。后来朱维铮专门挑他日记的毛病，说他给蒋介石祝寿，我对朱维铮说：那是什么时代，你对人物的评论不能脱离时代！

李怀宇：你有没有想过，改革开放之后画坛变得越来越市场化？

郑 重：没有想过。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画家一旦辉煌起来，我就离开他们。因为给他做事的人太多了，围着他的人太多了，我何必再去凑热闹呢？上世纪80年代我就转向收藏，跟那些还在世的老一辈收藏家打交道了。因为我“文化大革命”中接触了文物清查小组，看到他们抄家，看到繁华的东西，看到博物馆又把它们收进来，看到收藏家命运的辉煌和沦落。我觉得他们跟画家是另外一路，在他们那里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就去搞这一路。结果收藏现在成了这么大的世界了。我认为这些收藏家贡献很大，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东西，如果不是他们收藏，我们哪来这么多东西看呢？我跟那些收藏家原来一点都不认识的，这里找，那里找。我退休了以后，就去写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给我弄了个办公室。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给我出入证，还给我饭卡，说：你来我们这上班，我们给你提供一切方便。我就利用上海博物馆的收藏档案，写了《海上收藏世家》，是抱着对收藏家的一种感恩的心情写的。后来还写了《收藏大家》。开始，我还没有写张伯驹，那时候一直念叨张伯驹。还有张元济，开始时我也没有写，我非常敬佩张元济。我觉得当年中国如果按照张元济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那个思路走，说不定是可行的。张元济不得了，编那么多教材、丛书。

徐森玉是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博学多识，为人低调。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许多书是向他请教的，让他去借什么版本就是什么版本，向他请教哪种书应该出，哪种书不应该出。罗振玉研究甲骨、青铜器文字，也向他请

教，跟他写了几十封信。抗战时中国故宫文物南迁，解放战争时期，故宫文物运台，都是他负责。我写了一本《徐森玉》。后来我写《张珩》，他也是个收藏家，我太喜欢张珩了，其实我不认识张珩。后来，我就一直搞收藏家研究，不完全是做什么学问，也是兴趣所使。

李怀宇：收藏家对中国书画到底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郑 重：流传下来的东西，不就是收藏家起作用吗？古代的官方收藏，一旦战争，改朝换代，统统都要换掉，都没有了。这些东西就靠民间流传下来，故宫的东西就是民间流传到里面的。在中国文化传承方面，收藏家功不可没。那些收藏家的故事确实非常感人，他们也是一种兴趣，一种爱好。后来我又进入了这一领域，画家像谢先生有更多人围着他们了，有的变成他们的学生了，我就很少去了。我做收藏家研究，这些收藏家大部分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做了这么多人物传记，没有一个家庭跟我闹矛盾的，没有一个家庭来说你这个史料是搞错的。我做了很多人物，光书画家、收藏家就几百人，没有一个人因为史实上的问题来跟我打官司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点安慰吧。现在我也老了，新的收藏家我也不接触了，现在收藏变成一个商品了。你说文化传承，谁听你的，他们就考虑能不能卖钱，能卖多少钱。现在的收藏家就是这样了。美国的收藏家不一样，我到美国去探亲，到美国看了几个收藏家，他们还是一个传统理念。

李怀宇：你对现在的画坛和收藏界，了解多吗？

郑 重：不多。我现在基本不接触了。现在这个市场

已经走样了。我觉得现在我们共同语言也少了，我是传统的观念，不能与时俱进。我认为现在画家所追求的不一样了，收藏家的理念和我的理念不一样的，过去收藏家也要买卖的，但好东西在他手上，起码要留上三十年吧。现在三年也不留，进来就出去，完全变成一个商品了，他判断书画价值就看价格高低，完全闹着玩了。我觉得没有共同语言，我说一说，他们就说：你这个老朽，我跟你接触干吗？人家听不进。我跟书画家也接触少了。你现在到人家家里去，他们都要警惕你，觉得你到他家里去有什么目的。我从来都不主动要画的，都是老先生给我的，画好一张画送给我，有的还装裱好，给我送来，这是老朋友，有着共同的语言。现在你去画家家里，他提高警惕，眼睛瞪着你，好像你要去他家要东西一样；谈话也是，除了谈他的一张画卖了多少钱，很少探讨艺术了，不畅快，没有知音的感觉。时代真的不一样了。我觉得老先生可贵。我现在年老了，交的是青年朋友了，我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新的信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补充。新的理念，也可以帮助我改变一下，我不能固步自封。



李 辉

用宽容之心追寻人物与思想

李 辉

1956年生，湖北随州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晚报》、《人民日报》工作，现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著有《萧乾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巴金传》、《黄苗子与郁风》、《传奇黄永玉》、《封面中国》、《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等。

风云散去，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重要的时期。许多亲历者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回忆80年代，怀念那段激荡岁月。李辉的《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一书以翔实的史料和独特的个人视角，重现自己所见的思想世界。他在自序中说：“没有那些旋转不定的苍老身影，80年代不会呈现千姿百态的景象；没有那些高低起伏明暗互现的声音，80年代也不会浑然而成一曲历史交响；没有那些走在前面的跌跌撞撞，不会有后来者头顶上渐次拓展的天空……”

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李辉二十一岁。他自小生活在湖北的乡下和县城，一直向往远处的世界，在填大学志愿时，选择的学校都在湖北省之外。1978年2月初，李辉从家乡来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报到。暑假期间，同班同学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顿时轰动，很快被用来命名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波创作潮流——“伤痕文学”。

1978年底，李辉来到中文系资料室找书，看到靠西边一个角落的书桌旁，坐着一位矮小精瘦的小老头，有人喊他“贾先生”。他是贾植芳，铁骨铮铮的“胡风分子”，一生进过四次监狱。不久，李辉成了贾植芳家的常客，一

起喝酒，一起品茶，听他讲述文坛掌故与作家背景。在贾家，李辉认识了“胡风分子”王戎、耿庸、何满子、顾征南和贾植芳早年的学生施昌东、章培恒。

贾植芳成为影响李辉一生的老师。在读书期间，李辉与同学陈思和开始合作研究巴金，就是在贾植芳的指导下去读最初的版本。1982年毕业时，李辉分配到《北京晚报》工作，带着贾植芳的介绍信，一一登门拜访他的老朋友们，从此开启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2008年秋天，李辉突然接到一个潘家园旧书摊主的电话，那位摊主手上有一封当年贾植芳让李辉面交牛汉的信，李辉买了回来。后来李辉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讲述了这个故事，下面的听众好多是第一次听闻牛汉这个人，第二天早上就传来牛汉去世的消息。当天《钱江晚报》恰恰摘了一篇李辉的《绝响》一书里面的内容，正是李辉拿贾植芳的信去见牛汉这一段故事。李辉说：“人生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像我这种懵懵懂懂就撞上了高考，进了复旦，才能够认识贾先生，改变我的人生。”

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当文化记者，李辉起初接触了两个圈子：一个“巴金圈”，一个“胡风圈”。“我因为研究巴金就去找冰心、沈从文、萧乾、卞之琳，胡风圈就找胡风、牛汉、绿原、路翎。”1987年，李辉从《北京晚报》转到《人民日报》，涉及的领域更广阔。“在两份重要的报纸工作过，作为新闻媒体人还是挺幸运的。而且比较巧的是，开始我在《北京晚报》编副刊，是‘文革’前邓拓《燕山夜话》发表的地方，正好邓拓的儿子也在副

刊。领导我们的主编都是‘文革’前跟邓拓打过很多交道的人，在这样的单位工作感觉还是挺有历史渊源的。后来我到了《人民日报》，恰好邓拓又曾是《人民日报》的总编。我到了北京之后，想象不到有好多东西的关节都能连接得上。作为媒体人，或者作为写作者来说，有这么一些关联是挺有趣的，也有历史感。”

在“巴金圈”中，李辉认识了萧乾，后来写出了《萧乾传》。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李辉写出了多本深有影响的传记与随笔集，这些书关心的重点都是“人”。在文学江湖，难免人的恩恩怨怨，李辉可谓是“阅人无数”，抱的是同情与宽容的态度。他说：“我不愿意渲染作家之间的个人恩怨，我谈文化界的老人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态度。包括沈从文和萧乾、巴金和耿庸的矛盾，我都通过他们的朋友调解，后来解释清楚了也没什么太大事。当时文化界之间互相有矛盾都是正常的，现在也是。包括黄永玉和汪曾祺，我了解之后发现两人的关系从过去的亲密到疏远，再到重新见面，都非常自然。30年代有很多原本很好的朋友关系疏远了，这很正常，因为谁敢说你会和一个好朋友几十年一直到老都是好朋友？这是不可能的。”

李辉和文化人打交道时，有自己一套办法和原则。“有的老人是有些毛病的，但这些毛病不是很坏的毛病，是性格使然。接触不同性格的老人要用不同的方式沟通，对我来说，和老人打交道是一种沟通的过程，有时候要忍辱负重。但关键是自己还要有见解，不能完全附和。有的老人其实也不愿意你完全附和他，你要是敢于提出不同的

观点或建议，他反而会尊重你。”李辉说，“这样的老人真是越来越少了，这也正常，因为那一代人是二三十年代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宁愿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交往，而后来的人，可爱的人不多，有的虚伪，有的自大，一般情况下我会敬而远之。”

郁风在世时，曾对李辉说：“我忽然想到，不久的将来，我们这批老人都将死去，你会觉得很寂寞的。会吗？”现在很多老人真的渐渐离去了，李辉说：“真有这样的感觉。过去到一个城市，至少有两三个人值得我去探望，现在去就觉得没有可探望的人了。这也正常，因为这是历史规律。对我来讲，那座城市就没有过去的吸引力了，没有冲动要去了。但随着时间变化，你会有新的朋友。郁风的意思是你可以聊天的人少了，那些可以带给你想知道的领域的知识的人少了。但时间在变，也需要认识新的朋友，可能是不同领域的朋友，也有可能是同一领域的同事。所以完全寂寞是不可能的，而且回忆与他们的交往，整理来往的书信，包括写《绝响》这本书都不寂寞，是一种让人感到温暖的过程。”

李怀宇：在80年代，贾植芳先生对你的影响大吗？

李 辉：他对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上大学之前，像我们这一代人，尤其像我，在小地方长大，家里又不是读了很多书的人家，所以知识结构和想问题的方式都比较简单，知识面也窄。但是兴趣广泛，比如对历史、文物都有兴趣，小的时候还喜欢和老人聊天。后来遇到贾先

生，他谈话的内容、看问题的方式都对我影响挺深的。贾先生是个很有看法但又很能包容的人，所以他对一些批判过他的人，比如周扬，能看得高一些和深一些。另外，他治学和教育学生的方式可能更接近于过去老一代的方式，重视资料和版本。所以，我搜集资料的能力就是在复旦形成的，因为从二年级开始我与陈思和就在贾先生的指导下研究巴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他邀请我们两个最年轻的学生参加复旦中文系一批老师的整理工作，编一本巴金的研究资料。他建议我们要看巴金最初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我们就到上海图书馆和其他大学的图书馆借当年的旧杂志，借到了20年代的杂志。因为巴金最早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要看很多20年代的政治刊物。这些任务是对资料的搜集、阅读和整理的训练，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喜欢搜集史料，跟这个训练很有关系。我在整理的过程中从不觉得枯燥，每发现一个新的小内容都会兴奋。在大学期间，我看到早期的《良友画报》，还有30年代的《现代》杂志。当年我的本子上抄了很多杂志上的广告，尤其是30年代刊物上的广告，慢慢抄了很多笔记。所以，现代文学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是说做了很深的学问，而是一种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兴趣的培养。这种东西就是贾先生影响我的，因为他说过不要放过资料里的细节，哪怕你觉得很细微的资料，也许能帮助你了解一些作品或作家的状态。当时很多作家都写广告，胡风、施蛰存、巴金、鲁迅、叶圣陶写广告，而且都写得很精彩。根据这些抄录的广告，我写了好几篇关于文学广告

的文章，还把巴金、胡风、施蛰存等人写的广告，请他们一一确认。我曾打算好好编一本关于现代文学广告的书，可惜没有时间做。后来，范用先生编辑一本现代文学广告的书，我便提供给他编入书中。

李怀宇：贾植芳先生《早春三年日记》写得很精彩，他那时还没有正式平反，很多东西写得很睿智，很有见解。

李辉：实际上，贾先生一直坚持写日记直到他去世的前几天，几乎一天不落，除了有几天身体不好落掉了。有时候他到北京出差几天，回来之后就马上补写这几天在北京的见闻。陈思和正在组织出版一套贾先生的作品全集，里面补充了一些他的日记。他的日记中有丰富的资料，史料价值很高，而且反映出他对很多问题的坦率的想法，包括对一些很熟的人的意见都会写出来。所以，这是很私人化的，但也是很有见解的。《早春三年日记》是我帮他出版的，他的日记出版了好几种。我是1978年2月进校，贾先生还没平反，但已经从劳动的印刷厂回到系里。他还不能开课，但可以当资料员。他对社会的一些看法是在日记里体现的，包括同时期他写给朋友的信，也是很坦率、很直接的写法。那一代的人经过了五六十年代的大动荡之后，像贾先生这样性情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变化，还是按照过去时代形成的方式记录自己日常生活和内心感受的人，是不多的。对我来说，能够在大学期间结识这样一位老人，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我到北京工作之后，带了他写的介绍信去。和贾先生在北京的朋友交往，也拓展了我的视野，扩大了人脉关系。有时候历史的偶然性和巧合

性是挺有意思的。

李怀宇：在复旦大学毕业后，你是被分配到北京工作的？

李 辉：我们那会儿分配是这样的，我不去北京还不行。当时我们班只有两个人是湖北的，都分到北京了。但那位同学不想去，因为他是独子，想方设法才回到武汉，等再分配。当时需要新的大学生，所以北京的新闻单位也好，中央单位也好，都要求第一届大学生，当时单位普遍都还不错。我分到《北京晚报》，毕竟比较活，所以可以接触很多的文化人。这样就能把在大学里研究巴金形成的知识圈，还有胡风圈的人都采访了，这两个圈是我在北京最初接触的两个文化领域。

李怀宇：像贾植芳这些前辈有二十年的时光都浪费在政治运动里面，到了80年代初是不是有种重获青春的感觉？

李 辉：对，所以我在《绝响》中就写到，他们那一代人在1978年之后，经常说“第二次政治生命”或者“生命的第二次开始”这种话。对他们来讲，被重新认识或被重新启用，重新开始写作之后，遇到像我这样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那么熟悉他们的故事，对他们的事情那么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他们约稿或者采访，他们其实都挺高兴的。因为那个时候媒体也少，全北京也没几家。他们愿意和我谈那些经历，因为他们过去一直是受到挤压的一代，现在又重新恢复了。所以，那时候能够很容易和老一代建立联系。当时没有电话，就写信，他们有信必回。

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这对我写《绝响》那本书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有很多当年的往来书信、日记、报纸、节目单（戏单）和采访笔记，这对于回忆历史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往往都是轮廓性的，有些细节可能是只凭记忆，是不可靠的。80年代是一个文化突然开放的年代，世界各地的各种演出、电影都是在那几年突然来到中国的，让人眼花缭乱。从文艺评论界来讲，很多概念兴起也是在那几年。从弗洛伊德开始，一直到很多新观念兴起。演出也是，文化的开放也是。过去很多国家是不能到中国演出的，那时全来了，而且来的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好的演出。中国人创作的作品，也是那个时候突然爆发出来的，比如高行健的一批话剧，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李龙云的《小井胡同》，到今天还在演出。所以这些节目单的留存也让叙述更有真实感，比如《绝对信号》最早在节目单上预告的名字叫《在守车上》，正式演出才改为《绝对信号》。如果不是有节目单，我自己肯定早忘记了，有节目单留下来情况就不一样。所以，叙述历史，资料越多越好。史料只有重要不重要，没有好不好，都是有用的。

李怀宇：现在想起来觉得你很幸运，80年代有那么多老前辈还都健在，像沈从文、曹禺、萧乾、朱光潜。

李 辉：80年代的时候，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夏衍和冰心，八十多岁。还有老记者九十岁的，像顾执中老先生，但年纪更大的接触得就少了。幸运的是，对我们来说，至少有三到五年的时间可以与这样一个群体交往。我

在大学研究现代文学，现在是办报纸的，就有意识地把当时六十岁以上的文化人作为一个群体来重点关注。当时我在《北京晚报》有两个专栏，一个是“作家近况”，一个礼拜介绍一位作家，发了半年多，系统采访了冰心、冯至、沈从文、萧乾、胡风、艾青、臧克家、卞之琳、聂绀弩、姚雪垠、曹靖华、秦兆阳等一批人。另一个栏目是编辑的“居京琐记”，主要请六十岁以上的文化人来写在北京生活的各种感受，而且以批评为主。当时很多人写的都是现实的弊病，作者队伍由作家扩展到其他的文化人。这是我无意识中的一大收获，像画家吴冠中，翻译家王佐良、董乐山，像研究中国戏剧史的吴晓铃，还有美术界的常任侠、常书鸿，他们都是作家圈之外的文化人。这个栏目的书信来往最多，我最初大概发出去一百多封信，几乎每个人都回信、写来稿子，包括韦君宜、梅志、陈敬容等。冰心当然更不用说，我请她开了个人专栏，请萧乾写了《北京城杂忆》、《欧战杂忆》、《“文革”杂忆》等系列文章。我喜欢保留资料，这些手稿、来往书信全保留下来了。这些资料对于我回忆这个时代很重要。目前这本《绝响》，主要写到1985年左右，之后的经历我还会写，有很多资料可以用。有些经历我也很珍惜，譬如，我和萧红先后三任丈夫和男友，都有来往：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他们三位曾经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开会。骆宾基给我写了不少信，端木蕻良给我画的画，萧军给我题的词，我都保留着。可能很少有人能有我这样的机遇。我是媒体人，不是在大学里专门做学者，所以对于作品之外的兴趣可能

更大。这可能也是作为媒体人的特点吧，总是要了解得多样一些。老实说，对作品的研究我是不够的，这是我的弱项，虽然说我能谈一些巴金、沈从文、胡风的作品，因为写他们总是要读作品。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作家本人和身边的人的关系、作品写作的过程，以及作家性格造成的历史关联。这可能算是另外一种的文学史吧。

李怀宇：在那些老前辈中，你和哪几位的交往比较深？

李辉：与贾植芳先生的交往当然是一直贯穿始终了，从1978年底认识，一直到他2008年去世，其间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差不多有两百封吧。过去我到上海去，第一件事肯定是去看望他。因为有他，所以也总想去上海。他去世之后，感觉上海可见的老前辈就少了。80年代之后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萧乾，他原来也是做记者出身，又编副刊，又写小说，又做翻译，所以他对我影响挺大的。我1982年去北京就认识他了，后来请他写专栏，我的第一本传记是写他的。原来在大学我与陈思和第一本书写的是《巴金论稿》，属于学术研究。从写《萧乾传》开始，我的写作方向完全改变了，几乎不再写论文，而以传记为主了。萧乾最早是写小说出身，在燕京大学新闻系研究书评，毕业后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二战期间，他在英国成为战地记者，写长篇通讯和社论。另外，他的翻译也特别棒。关于我的英语，两个人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一位是贾先生，一位是萧乾。贾先生说你可以不讲英文，但你一定要会看英文原文，还要能翻译出来。所以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贾先生就指导我们翻译一些外国人写的研究巴金的论文，

当时是配合研究来进行翻译。萧乾和外国作家的来往，像和福斯特（E. M. Forster）、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通信，非常重要。奥威尔还给他英国出版的一本英文书写过书评。所以要写《萧乾传》，英文不好肯定不行。写《萧乾传》的时候，我翻译了福斯特写给萧乾的四十封信，作为传记的补充材料。二战期间，奥威尔当时在BBC做编辑，负责写稿子。萧乾曾到BBC写稿，负责向亚洲广播。他的稿子有时候是奥威尔帮忙修改，所以两人通信来往也不少。要写萧乾的传记，翻译这些东西是少不了的，这对我的英语学习也是一种促进。三十年来，我的英语基本没有放弃，要是放弃，这些年就不可能研究美国《时代》周刊，写《封面中国》系列了。所以说，在80年代萧乾对我的影响最大，包括英语的巩固、传记人物的选择，以及写作的训练、用词用句的琢磨。他给我写了二百多封信，大大小小的事都谈，比如标点符号用错了他也会指出来。尤其是在我心情不好几个月不写东西的时候，他就写信给我：看一个人能不能成事，就看他不能在心情烦躁的时候静下来写东西。他说自己二战的时候在伦敦，上面飞机在轰炸，他躲在地下的防空洞里还在读《尤利西斯》。他就用这种方式让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尤其在1989年的下半年，我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是他写了两封很长的信，语重心长地开导我。因为受到他这两封信的影响，我才静下心来，到图书馆去查阅施蛰存编辑的《现代》杂志，研究丁玲和沈从文的资料。我接受姜德明先生的建议，找到当年的《国闻周报》，看沈从文《记丁

玲》的连载。并且从唐弢和范用两位先生那里借来《记丁玲》的前后两册，与《国闻周报》发表的原文进行校勘。实际上我是借着校勘来使自己的心能够静下来，也由此学会如何沉稳、从容。

李怀宇：萧乾和沈从文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 辉：他们的关系说复杂，其实也不复杂。萧乾是沈从文的学生，萧乾在燕京大学念书的时候，沈从文在《大公报》的副刊做编辑，发表了萧乾的小说处女作，算是一炮打响。萧乾毕业后，是沈从文把他推荐给《大公报》的社长胡霖，让萧乾接替他编副刊。那些年，两人关系一直很好，还一起写过一本致读者的书《废邮存底》，交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40年代后期，萧乾出版讽刺杂文集《红毛长谈》，沈从文也为他写了后记。50年代之后，两人之间出现隔阂，这跟当时政治运动的背景有关，但两人到底谁对谁错，很难做简单判断。我认识沈从文时，他很快中风，讲话不便，张兆和与我谈过很多，萧乾也谈了一些，但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我也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因为在大的政治运动背景下，萧乾肯定有他的问题，比如他胆子小，尤其在1949年之后更是谨小慎微。沈从文与萧乾，还有朱光潜，三个人早在1948年就一起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最有名的当然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这篇文章。1949年之后，他们都不属于很“红”的人，因为都是被骂过的人。1957年萧乾被打成右派，比沈从文还低一等。文洁若老师说当时开批判萧乾大会的时候，让沈从文批判过萧乾，我在报纸上也查到

了批判会议的报道，发言批判的人里面确实有沈从文的名字。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件事要设身处地地看，沈从文当时没有别的选择。萧乾被批判的过程中有委屈，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沈从文批判萧乾总得讲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但这些都不是大不了的事。后来，从60年代到“文革”期间，两人仍旧有来往，沈从文在“干校”期间，还给萧乾写信，而且是长信，但两人关系没过去那么密切了，这也是事实。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两人的交往要永远那么密切也很难，再好的朋友三年五年就闹翻的大有人在，这并不奇怪。我做过一件事，我想恢复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因为沈从文是我研究的对象，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而且我很感激萧乾。我觉得两人之间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矛盾，就想让两人见面。听人说沈从文发过话，“不要让萧乾来看我”，但我觉得来看看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所以我写完《萧乾传》，便给沈从文寄了一本。1988年5月初我要到贵州出差，出发前我去看沈从文。他已经看了《萧乾传》，我问他看了之后感觉怎么样。他说你真能写，意思是我能够把当年的事情写得很丰满。我当时是第一次写人物传记，没什么经验，就想把故事叙述得生动一些，所以加了一些描绘的东西。沈从文对这一点还是肯定的，他就说写得还挺像那么一回事。我就问：你觉得写得对不对？他说：大体上差不多。书里面我没写他们俩的矛盾，只写了1949年之后到反右之前的事。我说：“如果萧乾来看你，你见不见他？”沈从文就说：“他来看我，我怎么不见？”我挺高兴，回来之后就

给萧乾打电话，还写了封信给巴金。因为巴金说过他三个最有才气的朋友——沈从文、萧乾和曹禺。我和沈从文、张兆和两位老人约好，等我从贵州出差回来，就陪萧乾去看他。但我出差还没回来，沈从文就突发心脏病去世。很遗憾，最后他们没有见面。后来巴金写信给张兆和说，接到李辉的信，知道萧乾要来看从文，虽然没见面，毕竟答应要见面，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我身为晚辈，觉得老一辈的矛盾本来是小事，不是原则性的事情，如果非要把它们放得很大没什么必要，无非是谁先主动的问题。如果第三者去激化矛盾，两人肯定很难再见面。萧乾还是感恩沈从文，沈从文去世的当天，他很快写了怀念沈从文的文章，发表在台湾的《联合报》副刊，占了一整版。现在说起这件事，有人站在沈从文的角度，有人站在萧乾的角度，但我都不赞同。我觉得两人之间的矛盾，一定有旁人不知道的原因，而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都可以化解。

李怀宇：黄永玉和汪曾祺当年在上海一起玩，关系简直亲如兄弟，后来却渐渐淡如水。

李 辉：当时他们年轻，还有黄裳，只相差两三岁，都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又很有才情。他们在五六十年代还有来往。黄裳跟汪曾祺也疏远了。汪曾祺60年代参加京剧改革，“文革”的时候负责写样板戏《沙家浜》。黄裳与黄永玉的往来书信我有收集，里面用一种调侃的方式谈到汪曾祺当时忙着要写这些戏。黄裳是京剧专家，对样板戏肯定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文革”期间汪曾祺还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老朋友对此有看法，也属正常。1957年汪

曾祺被打成右派之后，发配张家口，黄永玉对我说过，那时候汪曾祺吃的罐头、点心，都是他从北京寄给他的。60年代初，汪曾祺新写一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羊舍的夜晚》，是请黄永玉设计封面，配木刻插图。所以，并不是因为汪曾祺被打成右派黄永玉就不理他了。正是因为有这些很深的往来，“文革”期间汪曾祺很“红火”的时候，黄永玉的两个孩子找汪曾祺要样板戏的票，汪曾祺没给，两个孩子觉得没面子，回到家里一说，大人肯定也不高兴。情况可能是当时汪曾祺真的弄不到票，或者因为黄永玉属于被打倒的人，他不愿意再联系。如果设身处地地想，汪曾祺这样做有他不得已的原因。但作为黄永玉来说，就觉得朋友不够交情，你最困难的时候我这么帮你，现在孩子想看场戏都看不了。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些琐碎事引起了双方的不快和误会，我觉得都可以理解。毕竟他们也并没有到互相不理睬的程度，只是没有过去那么密切。1996年，离开北京八年的黄永玉回到北京，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朋友欢迎会，我和汪曾祺坐在一起。黄永玉跟每个人见面，也来与汪曾祺寒暄，但只聊了几句。我特后悔没带相机把这个场面拍下来。我和汪曾祺很熟悉，以前请他给“居京琐记”写文章。90年代初，我采访他，请他谈沈从文，后来还请他写了一本《释迦牟尼传》，为他编辑过一本散文集。我觉得矛盾的存在是必然的，人际关系出现隔阂也是无可避免的，我不赞成把事说得很大，尤其是在大的政治运动的背景下。比如萧乾，为什么他身边有的朋友对他有些看法呢？你要分析他的性格。萧乾是遗腹子，

寄人篱下长大，从小形成了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顺利的时候才华横溢，谈笑风生，非常幽默。一旦遇到了外界的压力，他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保护自己。这一点我能理解他。一旦外面没有压力了，他就是个非常可爱的老头，谈话非常有趣。所以我尽量看到他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的东西，比如才华。哪个人没毛病呢？而且，外界的一些议论，也未必完全准确。一个单位，一个系统，历来存在不同朋友圈，或者说不同派别。谈论一个人时，不同的人总是有不同出发点，甚至有历史过节隐藏在背后，对于历史人物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偏听偏信。只有将不同角度的说法综合起来看，放在历史大背景下看，才有可能相对准确。

李怀宇：沈从文和汪曾祺写小说都独具一格，他们给你的印象是不是像小说里的那么潇洒？

李 辉：我见到沈从文不久，他就半身不遂了，去看过他几次，但交谈得很少，他基本上只能讲简单的词语。比较起来，沈从文更“纯”一些，是一个不世故的人，感觉他好像和生活隔得很远。我和他没有很深的交往，但看他的作品和书信，觉得他好像一直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李怀宇：你写沈从文晚年跟张兆和的一些生活细节非常生动。

李 辉：我本来采访张兆和想写一本书《与张兆和谈沈从文》，谈了好多次，也有录音，但老人年纪大了，谈家里的琐碎事情太多。我历来不愿意谈太多别人家里的事情，包括家庭纠纷和沈从文个人的一些事情，后来就没再

继续谈了。

李怀宇：张兆和有没有谈到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和高韵秀的事？

李辉：都谈了。关于高，1985年我写《萧乾传》时已经知道这些事，但我觉得没必要谈这些婚外恋的事。前些年《万象》有了文章，才公布出来。其实，早在1935年前后，沈从文就认识了高，我的传记里引用过沈从文写给萧乾的一封信，里面就提到要萧乾带“高小姐”来玩。

从沈从文的作品也看得出来，他有参与现实的想法，实际上他并不太懂政治，虽然他谈了很多现实中的东西，但他都是从自己的感受来谈，并不是有很深的研究。黄永玉同我说过，有一件事他印象很深。60年代苏联卫星上天，他和刘祖春一起去看沈从文，刘是沈从文的一个学生，后来当过中宣部副部长。沈从文很高兴，说苏联的卫星都上天了，我应该入党做个纪念。他是把入党看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他又把入党和纪念卫星上天联系在一块。他政治上说懂又不懂，只是出于对人性、对社会的看法，只要让他有机会做事情就好。

1949年底，沈从文给在香港的黄永玉写了一封信，信的标题就叫作《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用这个劝黄永玉能离开香港回到北京。不能写小说，对沈从文是一大损失，但他能转过来做服饰研究，也是有贡献的事情。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周恩来批示他研究古代服饰，他就很高兴，很认真地去对待这件事。在“干校”他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件事，所以一从“干校”回到北京，他马上就继续研

究，一直到去世。他不是斗士，也不是思想家，让他们那一批人都成为思想家也是不可能的。有时候，大量的文化人都是这样一种状态：能够给我条件，让我做事就行。王世襄也是这样，只要让他收藏、写文章，他就很高兴。他去世前几年，找到我，要我帮忙联系在《北京晚报》副刊发表一组关于广场鸽子的文章。文章发表后，他寄去温家宝总理看，温家宝给他亲笔回信，他就到处跟人说，非常兴奋，因为他做的事情得到了认可。还有萧乾，被打成右派之后，只要能让他翻译，哪怕用笔名也行。对于文化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能让他的知识得到发挥。那一代人最大的痛苦是在屈辱的状态下做事，这是值得我们同情地、悲悯地去看他们。他们能在各种不利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比如施蛰存，打成右派之后在资料室继续工作。还有贾先生的学生章培恒，被打成右派，也是到资料室才写出《洪昇年谱》，奠定他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的地位。黄苗子也是，他被打成右派之后在人民美术出版社资料室抄卡片，一抄就是几千张，参与校勘中国美术论著丛刊，才能写出研究中国美术史的著作。王世襄后来之所以能够写出《明式家具研究》，都是在逆境的情况下坚持了自己的文化信念。所以，要反过来看这一代人，他们为文化做了贡献，要看到他们身上我们所缺少的东西。

李怀宇：有两个人的例子很典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时代的作品，他们在文学史上恐怕没什么影响，一位是汪曾祺，一位是张中行，厚积薄发，都是在后来的十几二十年中写出了很多重要的作品。

李 辉：汪曾祺60年代的时候也写过小说，但那种小说是为了和时代相靠近，必须要有一种正面的表述，和他早期以及后期的小说是没法比的。现在谈他《羊舍的夜晚》也不多，1979年之后他有了重新创作的机会。黄永玉也是，如果没有1979年之后的作品，大家不会把他当成文学家看。虽然他过去也写过诗，也写过小说，也写过电影剧本，但都无法和1979年之后的诗歌、散文、小说相比。有一些过去曾经接触过文学，但很长时间没有写作的人，1979年成为他们的转折点。一批右派也是，比如宗璞、流沙河、王蒙、从维熙、李国文等，新出来的作家更不用说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肯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但历史走到今天，改革开放对人的精神和文学的解放还是很重要的。没有1978年前后的转折，就没有后来的中国。不能因为新的问题出现，就否定以前的思想解放，包括平反冤假错案，为四类分子摘帽，允许他们的孩子参加高考，走进大学接受教育，让几千万家庭不再是社会“贱民”，以及后来城市流动政策的转变，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我们都觉得1949年沈从文不能写小说是一大遗憾，但反过来想，如果1949年之后他继续写小说，可能还会毁了他，因为他的状态是不适应1949年之后的时代的。1949年之后他还是想写小说，张兆和的一个堂弟是烈士，所以他想写关于红军的长篇小说。他想写有关政治的东西，但他怎么写得呢？他的语言模式、情感、对人性的理解，要是写革命的东西会毁了他。他后来也写过几篇散文和旧体诗，《天安门前》和《井冈山诗草》，和他早期的作品没

法比。相反，他私人化的作品，比如《从文家书》是最棒的，是真正属于沈从文的文学。所以，不写，对他也是一种救赎或补偿。我觉得，有时候，对历史和人物要换个角度看。萧乾也是，长期没有写作，转而做翻译，翻译出了《好兵帅克》、《里柯克幽默小品选》、《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和《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培尔·金特》等，成为优秀的翻译家。在特殊的情况下，人们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李怀宇：和你的《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一样，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怀念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怀念的情感？

李辉：我觉得怀念是分几个层面的。一个层面是真实的怀念。我是真的怀念那个年代的。因为那个年代让二十一岁的我从小县城走到了复旦，视野大大开阔，能接触那么多文化界的人，从事新闻媒体工作，向前走得比较顺利和幸运。当然那个时代对我来说肯定是值得留恋。因为认识了那么多的人，写了那么多东西，留存那么多资料。另一个层面是对青春的留恋。不论青春是什么样的，每个人都是留恋的。有的知青留恋1968年之后的上山下乡，哪怕很艰苦，是时代的一种扭曲产物，他们也很怀念。现在还有不少人在唱红歌，唱五六十年代的歌。他们真的认同那些歌曲表达的内容吗？我是怀疑的。他们真的认同毛泽东时代的那些东西吗？我也是怀疑的。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时代生活，恐怕打死他们也不愿意。但是他们愿意唱歌，因为那是青春的回忆，是一种旋律的

温暖。

现在人们谈论80年代，当然留恋80年代文化多样性的拓展，比如80年代思想的变化，或者激荡岁月的东西，还是令人向往。同时80年代也有很多问题，我们在怀念的过程中并不是对80年代完全肯定。我在80年代就是一个很偏激的人，很多东西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价值，错过了很多。当年我受“左”和“右”的观念影响太深，哪个人保守就不愿意理他。比如丁玲、周扬、曹禺都没直接深入的采访，本来应该好好采访的，而且我是研究巴金的，为什么不采访曹禺呢？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在文坛的名声不好。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是自己的幼稚和年代的不成熟。80年代的情绪太简单化，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现在想一想，其实很多人和事不是简单的好坏，而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以现在怀念80年代，也警示自己不要重犯幼稚的错误。80年代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刚刚从“文革”走过来，人们还是简单的政治斗争的思维，没有摆脱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观念。其实这种观念也延续到了现在。现在也要警惕自己不要犯这种错误。有时候周边熟悉的人谈问题的方式，还是和阶级斗争时候形成的思想方式分不开。现在看待事情，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别人一说我就相信，也不愿意轻易下结论。我一定要琢磨事情背后的东西，以及这件事情是否符合实际，自己心里得有一杆秤。现在有了微博、微信，有的人更愿意接受简单的结论，而不管其中的逻辑关系。只要观念很刺激很新奇，马上就大量传播。所以有些人就抓住读者的这种心理，赢得了读者的关注。偏激不

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用“恶”的心态看待别人，并不利于人性的完善，也不利于客观地总结历史。尤其是，目前我们还不能明确地做出历史总结，对一个时代的灾难制造者有全面、坦率的分析、批判，分清主政者和参与者的不同历史责任；在这种情形下，假如我们只把批判的锋芒对着那些历史受难者，津津乐道于他们身上的弱点、缺陷等，热衷于挖掘人际矛盾与纠纷，无疑是对当年历史弱者的又一次不公正对待。这样做，看似尖锐、深刻，其实是另外一种历史逃避，一种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获得喝彩的“聪明”。如果我们不着眼于历史整体的描述，为今天的读者提供历史的来龙去脉，将个人的遭际与命运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中分析，那么，最应扎扎实实进行的历史反思，就很可能陷入各种八卦的漩涡，在一个娱乐化的时代，成为一时的狂欢。结果，历史真相，只会越走越远。



骆玉明

好的文学作品是对“人”提出问题

骆玉明

1951年生于上海。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任教。著有《道家之言：老庄哲学随谈》、《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诗里特别有禅》等，编有《中国文学史》三卷本（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三卷本（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等。

骆玉明教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课素来是海阔天空，有时简直不着边际，但很受学生欢迎。作家王安忆2004年调入复旦大学时，专门选了骆玉明的课《世说新语》，发现每次都要抢位子，地上都坐满了人。他的文章很漂亮，佩服的人赞叹不已。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北大老资格的名教授许渊冲先生在他的一本随笔中，每篇文章前照例引一句名人格言，大抵如莎士比亚、黑格尔之类，有一篇引的竟然是骆玉明。有人问骆玉明这是怎么回事，他也是一脸茫然。网络上曾经有人从骆玉明的文章气质推测他应有家学渊源，否则不易到此，其实他出身于贫寒的工人家庭，父亲读过三年私塾，大体上能够看书，母亲基本上不识字。

骆玉明说起他的一生，其实就是两个字——读书。小学三四年级认字够多时，就开始到处找书看，上课是不听的，低头或透过桌缝看书是最大的乐趣；下了课在外到处瞎跑，钻旧书店、图书馆，顾不上吃饭很平常。他说：

“我到初中一年级，读过的翻译小说的数量大概超过一个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可能也超过初中的语文老师。”但除了语文、历史，各门成绩都很差。“不过能得六十分。如果低于六十分的话，就会被父母认为出问题了。”

读书有用吗？这没有想过。事后回想，似乎也有点

用：1966年“文革”热潮中，骆玉明和大批中学生一起去北京串联，接受了伟大领袖的检阅。上百万人组成了狂热的海洋，人们疯狂般地呼喊、蹦跳，骆玉明却不知怎么沉静了下来，有几分不明不白的沮丧，感觉到这个世界无法理解。他说：“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事后想起来，大概是和读了很多翻译小说有关系。”

初中读了一年半，“文革”中乱糟糟地又过了两年，然后是“上山下乡”，骆玉明去了崇明的新海农场种地。劳累是难免的，而更严重的是世界的不可理解使人心愈发茫然。骆玉明回忆：“研究自传的人会说，人们对生活的记忆，往往会把某些细节象征化，成为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点。我也不明白是不是这种心理现象，但确实有一个记忆对我来说非常深刻。”他有一段时期因为害怕说梦话会泄露什么，曾经找机会独自住到一个孤零零的草棚里。有一天下大雨，站在门口四下望去，雨像帘幕一样把周围的一切都隔绝开来，所有的东西都看不见了。他忽然产生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被一种不知道的力量放逐在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也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我完全生活在一团迷雾之中。”

骆玉明深深地体会到现实的荒诞，逐渐明白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有可能走出这一荒诞的笼罩。多年后他读到顾准的作品，为其思想的穿透力所震撼。“我很佩服他，他真的很了不起。有人认为放在世界学术的平台上，顾准的水平也很有限，因为他所思考的问题很多西方人都想过

了，但不能这样来看。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在那种封闭状态和蒙昧力量的钳制下，他以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强烈的激情穿透历史，其思想的深刻性是极其可贵的。”

“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当然不能和顾准去比，但是，我们许多人在那个年代里拼命找书读，暗下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试图走出历史蒙昧的意图，至少和顾准是相通的。”骆玉明这样说。他在乡下待了六年多，有机会就找书读。公开可以读的有鲁迅和马克思。这些读物，无论读得懂还是读不懂，对激发思考、培育逻辑思维都有很大的作用。读其他的书，都只能是“地下”状态。完全没有选择的条件，没有任何规则，抓到什么是什么，今天读到一半丢下的东西和明天捡起来的东西，相隔天遥地远。但这也带来一定的好处，骆玉明说：“我觉得自己有个长处，就是能够把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而因为对事物的认识无法依赖他人，也就更容易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在“文革”后期，一度政策松动，个别高校试招了有限的研究生。骆玉明初中没读完，1975年连推荐带“考”成了工农兵研究生——说“考”，是要求在限定的时间里交出两篇文章。骆玉明交了一篇带有杂文气息的大批判，另一篇则是带有文言气息的游记《鼋头渚记》——算不算文言现在也不知道了。也许当时年轻人中鲜有能写近似文言文者，骆玉明得以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的生源混杂，但没有读过高中的只有骆玉明一人，他说：“那是混乱中的侥幸。”

当时高校试招研究生，主要为了缓解科技方面的危机，文科只是捎带的。而骆玉明他们刚进复旦大学不久，“批邓”就来了，政治形势变得混乱，所谓“研究生”更没有人管。在骆玉明看来，这种研究生是“没有任何计划，没有任何目的，实际上那两年也是没有任何人管的”。幸亏当时负责古典文学教研室的王运熙先生是一位严谨而忠厚的学者，他每隔一段时间还尽量找几位研究生谈谈，适当予以指点。这种谈话和指点不是严格的课程，常是随机而发，因材施教，点到为止，但对骆玉明走上学术道路，仍是重要的开端。由于没有课程设置，各人全凭自己的兴趣读书，骆玉明将二十四史一本一本地翻过，仔细看过的并不多。不过这也算是很有系统的阅读了。

1977年春，骆玉明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这种没有学位的“研究生”学历，既不被承认也不被否认，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怪物。但好在复旦的风气还算开明，只要事情做得下来，学历之类也不太当真。事实上，骆玉明留校以后作为“青年教师”的若干年中，一直颇受器重，有些老师甚至对他夸赞过当。最初，朱东润先生还没有恢复系主任职务，教研室就请他“老带新”，做骆玉明的指导教师。朱先生在《诗经》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他指导骆玉明，开始就是读《诗经》，这是一门严格的课程。几年前，骆玉明应出版社之邀为朱先生的名作《诗三百篇探故》写前言，对老师的学术成就作了系统的评价，同时回忆了随朱先生读书的往事。他笑着说：“要是老夫子看到我给他写序，不知道会怎么说。”另外，骆玉明还为朱东

润先生写过一篇传记性的文章，题目《百年万从事，词气浩纵横》用了杜甫的两句诗。朱门弟子满天下，不少人对这篇文章有好评。

不久，朱东润先生重新担任系主任职务，骆玉明转由章培恒先生指导，同时他也担任章先生的助教，开始了长久的相处。1979年，骆玉明开始登上讲台教书，他的很多学生都比他岁数大。他说：“当时工农兵学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转出去重新读研究生再反过来当教师，一种是离开教学到机关去做干部。我大概是极少数的既没有去读研究生也没有离开教学工作的人，因为‘文革’过后师资紧张，而我当时教书反响很好。”骆玉明似乎总是走着跟别人不一样的路。

说到朱东润与章培恒两位先生，骆玉明觉得他们很不相同。朱先生呢，“他人生观念是儒家的，但是思维方式是西方的；他非常严肃，又十分宽厚。《论语》里面讲孔子所谓‘威而不猛’，就是很庄重又很和蔼那样类型的人”。而章先生呢，“虽然一般情形下也是注重礼仪，有旧式文化人的气质，但个性强烈，好好恶恶，颇有鲁迅的味道”。而在思维方式上，他们两位有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怀疑性很强。

虽然跟随过几位著名学者，受到他们的指引，但骆玉明的散漫无拘，似乎并不像其中任何一位。“我尊敬自己的老师，但根本上我还是胡乱读书，胡思乱想。”他说，“我也跟复旦的多数老师不同，他们通常把专业放在前面，我则无所谓专业。我只是一个字面意上的‘读书

人’，也就是读书本身于我已经足够。”

骆玉明与章培恒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2011年，由骆玉明单独撰写《简明中国文学史》被译为英文，由欧洲著名学术出版机构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也受到广泛的关注。

李怀宇：为什么跟章培恒先生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

骆玉明：有好几个原因。一个是私交的关系吧，我有一段时间跟章培恒先生关系非常好。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对很多问题思考的方法有相似的地方，比如他很喜欢鲁迅，我也喜欢鲁迅；章先生比较喜欢马克思、恩格斯的东西，我也曾经比较费劲地读过一些马恩的东西。马恩的逻辑是钻破“文革”时代没有逻辑的迷雾的一种力量。

章先生对文学史的问题思考很久，他也发现我们这些年轻人对以前的文学史很不满意，因此希望我和他一起来做。

李怀宇：章培恒先生谈《中国文学史》时，表示这书是从人性发展的角度来谈中国文学的发展，这是对中国原来的文学史模式的一种突破，不再像原来从阶级斗争、从文学的政治性这些东西来谈，所以这是一种新的视角。增订本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谈怎样逐渐向人性解放目标接近。

骆玉明：我和章先生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过

我们可以找到近似的表述方式。章先生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从现实来看历史。赞扬个性解放和个体精神，对中国来说首先是最大的现实要求，它也是跟社会蒙昧力量的最大冲突。而这一理论，他认为基点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我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修养方面不能够跟章先生比。我觉得文学史首先需要设定一种历史模式，这里面一个基本的理论核心，就是把人类的历史看成是人的自我实现的历史，这个自我实现是通过个人的自由来达成的。试图用这种历史本质来描述人类的精神文化史，也就构成一个文学演化的线索。

李怀宇：你觉得中国文学里面的个性解放，从古到今会慢慢放开吗？

骆玉明：如果说不把它当作一个绝对的标志，那么大体上可以看到：人在生活当中是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情感世界，扩大自己的意志，满足自己的欲望的。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这种要求相关的社会条件也会不断增长。最初被表达出来的可能只是一部分人的要求，比如讲魏晋文化，是一种纯粹贵族的东西，到唐以后，个人的精神意志和情感欲望的满足，这种要求会延展到社会的中下层。当然要把这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核心线索来看，会面临一些复杂的问题，需要处理很多东西。

李怀宇：为什么当代文学的读者会出现越来越少的趋势？

骆玉明：恐怕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也越来越小。

艺术是人们自我表现的途径，是生命创造力的表达。那么，从古代社会来说，音乐、绘画、雕塑之类，需要特殊的材料和技艺，传播范围又很受限制，所以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而文学创造，特别像诗词之类，使用的材料很简单，传播起来却很方便。所以人要把他的创造性体现出来，会比较多地体现在语言中。而语言本身，也就在艺术化的运用中变得越来越精致。

而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内容本来就丰富，人的创造力的表达途径也很多，做生意成功也是创造力的表达。即使在艺术范围内，比语言更方便、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也很多，像影视，像流行歌曲，都是。语言的创造变得既不方便也不重要，同时，语言所内含的智慧和活力也随之降低。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渐渐变得只能理解直接、粗野、夸大的语言表达。

另一方面，上世纪5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的笼罩也导致整个社会的活跃性下降。文学之所以能够获得成长，首先是需要人的创造力和才华。政治压力导致社会本身的创造力和生命活力总量是降低的，大量的人是没有创造性的，创造力在教育的过程中被消灭了，这必然会导致文学委顿。80年代以后，社会变得活跃起来，文学的活力也得到恢复。但是，意识形态没有放弃干涉的意志，同时，随着多数人的生活越来越急促、粗糙和庸俗化，文学的生存空间还是越来越小。

李怀宇：你对当代小说研究得多吗？

骆玉明：谈不上研究，但是还看过一些，像王安忆、

莫言、叶兆言、贾平凹等等。我觉得他们还是在努力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为思想解放，意识形态的控制降低，人的创造的活力就会增大。至于现在的作品最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者评价，那可能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们还是在努力的，比如说我看王安忆的作品，我觉得她就很努力，她总是忠诚于自己对文学的信仰。

李怀宇：你对武侠小说非常感兴趣？

骆玉明：对，看了很多。金庸的看得最多，古龙的也看过不少。金庸的有一段时间看到没法再看，因为看的遍数太多了，一打开来看到这句话就知道下面是哪一句话，就没法再看。

李怀宇：为什么喜欢武侠小说？

骆玉明：纯粹消遣，武侠小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看武侠小说是你觉得烦躁的时候忘记生活的一个方法。特别是198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就是不想说话、不想写文章，什么也不想做，那么忘掉现实的方法就是读武侠小说。

李怀宇：从文学史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上有地位吗？

骆玉明：有一定的地位，但不会很高。因为好的文学作品是对人提出问题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发现生活和给人以压力感的东西。而消遣性、娱乐性的东西，不会给人带来很多压力，纯粹作为文学的创造性的表达，武侠小说也不会很高。有些学者对金庸的小说评价过度，让人觉得智力好像受了情绪的影响。而且武侠小说从写作过程来说

就是一个娱乐性的东西，像金庸这样的作者，也不是对人生、对社会有很大的承担欲望的人。

我很喜欢金庸的小说，但是喜欢读和从一个理性的立场去评价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两回事情。喜欢读，是因为它好玩，很活泼；特别是在经历过长期的沉闷之后，武侠小说进入内地社会，几乎就是一个大惊喜。

李怀宇：后来金庸不停地修改自己的小说，你怎么看？

骆玉明：他改过的东西，我没对照过。邓小平说他喜欢看金庸小说，看的时候是很好的休息，看完了就什么都忘了。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没有一个看完了就忘掉了，它会追着你，它会让你整天不得安宁。因为它是在发掘生活，在质疑生活，在揭示人的不安，那么，它会充满这种不安的情绪，不会让你看完了就忘记的。

李怀宇：你曾经一度到日本去讲学？

骆玉明：对。在1996至1997年，我在日本九州大学教过一年的书，不过是用中文教的。我学日文时有一个非常狭隘的想法，就是日本方面的中国学资料很多。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学了半年的日语就开始翻译，效果还不错，于是我就认为我已经懂日文了，从此就没有学好口语。

李怀宇：你翻译过吉川幸次郎的书，对他研究得比较深？

骆玉明：也谈不上研究，我比较喜欢他的东西。当时在日本学界，有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其中一种类型的人

物是有传统的汉学修养，能够以接近中国人的方式理解中国的学问，这是一种比较老派的人。当然，同时他们也有一些西洋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吉川幸次郎在日本学者当中是一个思路比较开阔而中国学问基础比较扎实的人，他也是一个对中国比较有感情的人。

李怀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学问，他们的视角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会产生启发？

骆玉明：从中日学术关系史来说，当中国学术转向现代方向时，起初几乎是每一个部分都受日本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学术实际上是在一个西方学术的理论框架当中形成的，而在亚洲首先接触和理解这个西方框架的是日本人，首先也是他们运用西方框架来解释东方历史，中国人就通过日本这个中介去掌握西方学术或者说现代学术。如果要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特别是研究它的起源部分，日本的影响不可忽视。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些学者有很强大的创造性，像王国维。

李怀宇：就你所知，中国文学在西方有影响吗？

骆玉明：这个话题我没有多少发言权。就我浅薄的知识来说，中国在西方比较有影响、能够获得有一定深度的理解的东西，恐怕是老子。《道德经》是被西方人格外注意的，而且确实获得一定的理解。然后也许是诗歌。西方一部分人接触到中国诗歌以后，会发现中国诗歌具有跟西方诗歌完全不同的表达方法，这令他们惊奇。

我上课，每年都有外国学生，我还是很关注西方人怎么认识中国的东西，像《红楼梦》。但总体来说，对中国

文学能够系统地理解的西方人非常少。比如说理解《道德经》的话，西方人会注意到里面一些便于发挥的格言，或者跟西方文化本身可以沟通的东西。而一个西方人如果汉语学到一定的水平，他很快会被中国诗歌吸引。因为中国古代人的创造力和才华投入在诗歌当中的特别多，产生的东西非常漂亮。如果试图把中国的诗词翻译成英文或者法文，就没有韵味了。

李怀宇：中国有很多学者研究像莎士比亚这么伟大的作家，但是中国的经典到了西方恐怕没有这种情况？

骆玉明：没有。懂得中国东西的人数量非常少。第一个是所谓世界性的问题，相对而言，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文化更具有世界性。第二个问题就是文化母体的力量问题，就是说中国的现实影响力。中国现在的影响力不断地提高，会导致懂汉语的人多起来。整个西方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会提高，必然带来懂汉语的人的数量提高，那么输入、谈论和欣赏的程度会增加。但是，西方人以固执的理解方式来理解中国的时候，像黑格尔评价孔子，再通过评价孔子来评价中国思想，一方面很傲慢，另外一方面确实格格不入。因为孔子看起来很平淡的生活智慧里面所包含的哲理性，整体上他们是不能够理解的，也没有费力来理解过。如果文化母体本身增强了，会导致交流的密度增加，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东西，就是传输的频率增加，西方对中国的关注增加，那么理解也会深入。

李怀宇：近百年来中国对西方的学习热情，跟西方了解中国的热情好像不相称？

骆玉明：那当然。客观现实是世界有一个现代化进程。这不仅仅是包括工业、科学技术，还包括文化。这个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启动的，中国是被带动的，这导致所谓西方文化的话语权力。现在的科学系统，包括人文科学系统，是一个西方系统。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整个是西方系统，必然就会导致我们现在是接受西方的东西，在西方的学术系统下生活。打开教育部的各种学科的分类，博士点建立的各个学科，简单地说就是一个西方系统。这当然会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扭曲。

我们假定有一个世界性的现代科学系统，有没有可能因为中国文化力量的参与，使这个现代的人文学科系统发生某种意义上的改变？目前还做不到，当然也许仍然可以做出一些努力。

现在我带博士生，会讲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整个现代的中国人文社会学科是依附于西方的现代学科系统的。它的基本系统、基本价值观、核心观念是从西方形成的。那么，它每一个新的研究点也是首先在西方出现。目前我们很难摆脱这个东西，所以它导致在中国要获得一个学术成就，实际上取决于跟进西方学术的速度，这个速度传得越来越快。比如说，托多罗夫1969年提出叙事学的观念，陈平原大概在1986年左右写了中国小说的叙事学，这个速度就是相当快的。作为一个博士生来说，要取得学术成就、学术突破，其实要靠两点：第一，密切地关注西方学术的变化，因为所谓学术的更新，首先在欧美形成；第二，熟悉中国的传统，在使用西方学术的变化时可以不勉强、

不生硬地和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找到比较好的契合点。如果谁有很大的理想，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去看待现代学术，能够从西方的学术体系中去发现问题或者说凌驾于它之上去发现问题，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学者。我们会等待这样的学者的出现，但是目前条件还是不够。

这牵扯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因为整个所谓现代的西方学术是随着西方哲学的改变而改变，核心的问题还是哲学。而中国现在几乎是没有哲学，一个没有哲学的文化要凌驾于西方哲学之上去创造新的学术研究点，难度实在太大。

李怀宇：古代的老庄、孔孟算不算哲学？

骆玉明：当然从广义上来说可以算，但是现代没有。中国现代只有领导人才有思想，非领导人都是学习领导人的思想，所以没有办法从民间产生思想家。而政治权力是一个实用性的力量，从来不考虑学术本身的必要性，所以思想家不可能产生于政治权力之中。如果说统治思想是不能容忍民间产生思想的，并且统治者的教育，根本上是消除思想活力的东西，怎么可能期待思想家？

李怀宇：我最近在翻《世说新语》，再对照他们正史里面的一些记录，发现很多人在《世说新语》里很风流，讲话很风趣，但是在正史记载里却齷齪得很。

骆玉明：这是两回事。当然有记录的立场的问题，记录者采取一个什么态度或者什么看法，选取什么样的材料。比如说像王戎这样的人，在《资治通鉴》里面，他显示出来的是不足道或者可笑的一面特别多，这是因为司马

光这些人对这个人物本身就不喜欢。又比如说一个人政治上很失败，和他在生活上追求一种很高的姿态、情调、风采，也不是直接的矛盾。比如汪精卫政治上很失败，但是汪精卫的风度总还是很好的吧。

李怀宇：汪精卫的诗词写得很好。最近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了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稿》。

骆玉明：我看了余英时先生给它写的序。汪精卫的诗词当然写得很好。这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牵扯的方面会非常多。

李怀宇：你读了这么多中国历史，假如让你选择，你会选择生活在哪个时代？

骆玉明：这个问题带有游戏性。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时代相对来说文明程度比较高，社会比较安定，那么是宋代。宋代的社会管理是文明程度比较高，社会比较活跃，比较有秩序，野蛮性比较少。但是在军事上比较弱一些。

李怀宇：史景迁说他愿意生活在明代的江南。

骆玉明：明代的江南是活跃性很高的社会，但是混乱的东西也比较多。他这么说是没有把自己当成普通人。

李怀宇：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你是悲观还是乐观？

骆玉明：倘若从老庄的眼光来看，历史是处在永远的变化当中的，所以没有什么可以特别悲观或者特别乐观。如果比较具体地来看的话，可能悲观的东西要多一点。因为它处在一个胶着点上，没办法找到一条很安全的路，不

能不改变，但是找不到一条安全的道路去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面的风险会比较大，十年二十年后的风险会比较大。因为整个中国政治历史的模式有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但是为什么这个现代化过程总是完成不了，跟整个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结构有关系，导致谁都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谁都不知道办法在哪里。



陆建德

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有一点自卑情结

陆建德

1954年生于浙江杭州。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90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中国近代文化与政治。著有《麻雀啁啾》、《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思想背后的利益》、《潜行乌贼》、《击中痛处》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讲话温文尔雅，兼有江南才子与英伦绅士的风度。他亲历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变革，也沐浴了剑桥大学春风化雨的学风，既醉心于英美文学的研究，又关注近代历史发展和当下的状况。他说：“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有幸目睹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不敢乐观，因为深知我们的社会面临很多挑战，需要有智慧来应对，需要更为丰富的知识和思想资源。”

陆建德的父亲是30年代交通大学毕业的，还在读交大预科的时候就读过一点莎士比亚。小哥哥“文革”时是杭州大学外文系学生，家里有一些英文原版的著作，另有一些旧书，是祖父和外公留下来的。1966年，陆建德小学毕业，无事可做，就在家里读闲书。1968到1970年读初中，随后就进入社会。学校上课不多，没有正式教材，学生经常开批斗会，或上街庆祝“最高指示”发表。英语一共学了三十八个单词。70年代初，杭州外文书店重新开张，可以凭介绍信、特殊关系进去。陆建德在外文书店买过一些影印的外文书和教材，并学灵格风英语。他的朋友之间有一个流动的图书馆，也能借到各种各样的书，有时候必须在一两天之内归还。他说：“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对世界文

学的兴趣大于外国同龄人。我这个年龄的人读过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这在英美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学习的方式上，批判性的敏感阅读是弱项。”

1978年参加高考时，陆建德想读中文系，最后因英语成绩计入总分比较好，考入了复旦大学外文系。他说：

“‘文革’给中国的青年心理上造成一个很大的阴影，有一种不安全感，我就生怕到大学里会被赶出来，总是有很多焦虑。在复旦读了一个学期后产生了在家的感觉，那是很美妙的。我读的是外文系，也常去听一些中文系的课。”

1983年，陆建德初到剑桥，心中有典型的中国式焦虑：到这里来还吃得到大米吗？他马上得知超市有各种各样的米，有印度米、印尼米、泰国米，如释重负，回想起来颇觉可笑。他说，应该随遇而安才好，与同龄英国人相比，见识实在太少，对自己不大熟悉的东西，有点畏惧。好在他得到学院以及好几位中国学生、访问学者的帮助，熟悉了那里的生活，也觉得西餐很好，慢慢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全新的学术天地。他说学院体制最大的优势是不同学科的人可以住在一起，尤其是共同就餐，交流起来很方便：“吃饭并不是说大家填饱肚子，或尽说一些祝酒的无聊话，而是一个社交的场合。”

陆建德所在的剑桥达尔文学院比较年轻，只收研究生，不像剑桥那些20世纪之前的学院，它没有自己的教堂。

“因为达尔文讲进化论，跟宗教好像有一点对立。剑桥最有名的教堂在国王学院，像精致的石头雕塑，非常美丽，

可能是剑桥最有名的建筑之一，它的唱诗班录过很多宗教方面的声乐作品，享有很高的声誉。徐志摩和萧乾曾经在国王学院待过。我的学院文化氛围比较新，虽然大学是古老的。”西方大学是宗教的产物，一直到19世纪整个社会还是很虔诚的，所以老一点的学院都有教堂和唱诗班。“第一个圣诞前夜的下午，到国王学院教堂听唱诗班演出，那种圣洁崇高的感觉是以前没有经历过的。达尔文学院的餐厅是一个八角形的建筑，周围是玻璃，可见窗外的景色。传统的学院餐厅是老师围着高桌（high table）吃饭，其实长条桌并不高，只是地板高出一截，学生们则在低一点的地方吃饭。但是达尔文学院的餐厅是平地，老师和学生不是分区而食，大家拿着盘子随便坐。所谓的老师是指这个学院的院士（fellows），他们专业不同，午餐后回到自己的系或实验室工作。”剑桥、牛津实行学院制，专业系科直属大学，但是教师和学生分属各个学院（大概各有三十几个），学院给成员提供一个社会背景，跨学科交往的平台。研究生的学业与学院无关，陆建德的导师是克莱尔学院的。学院是个自治程度很高的学术群体，但在大学里又互相合作，学术生活背后体现出广义上的政治能力。

牛津、剑桥的大部分房子都是几百年以前建的，有些即使是新的，材质看起来也跟老建筑比较协调。陆建德说：“在20世纪60年代，剑桥大学历史系造了一个图书馆，完全用几何图形，是玻璃加红砖，当时引起争议。我们关于现代化建设有一些预设的概念，纽约的摩天大楼成了每个人心中现代化的象征。到了欧洲才知道，有历史的

城市首先必须保护传统建筑。像剑桥、牛津，有的路很窄，墙上会有一些汽车剐蹭的痕迹。路面还可能是石块铺就的，不平整。人们喜欢用自行车，停放时往往靠在墙上，墙有点磨损，处处是历史的斑痕，回想起来感觉是很温暖的。”也有些中国学生对古老的建筑非常失望。

更大的冲击是如何去学会一套新的说话方式。陆建德回忆：“我们总是以为中国人说话曲来拐去，洋人说话直来直去，实际上是倒过来。外国人开讨论会，如果有人提出批评意见，会很委婉，你如果不敏感的话还不知道提出来的问题可能是颠覆性的。我们喜欢对错这样的概念。”陆建德到导师家去开讨论会，茶几上放满了红酒，大家以酒为伴，要插话不容易。他说：“人文学科的学生出去读书可能跟工科学生差别很大。后者的研究很快就走上正轨了，因为在实验室里学的东西差不多，但是人文学科表述的方式不一样，可能是另一种话语系统。当时国内信息还不大灵通，熟悉那套话语需要时间。”

陆建德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英国文学批评家F. R. Leavis (利维斯) 的。“他对诗、小说的分析非常细腻，又有一种道德的关怀，但不是道学家的关怀，跟我们文学中的直接说出来的伦理传统不一样，他更关注小说里的角色怎么看自己，怎么看自己和周边人的关系，是不是有无我的习惯。我们重视名义，好坏是预先设定的，史籍里‘进谏’的必是坏人，观察道德内涵的切入点差别很大。这是比较文学的教益。中国文化从大的方面来说是相信‘性善’的，‘好人’都特别自信，贾宝玉生下来嘴里含着一块玉，说

明他很纯洁，自己是光亮的一点，周围是黑暗的。问题总是很多，但是自己不是问题的一部分。”

1990年，陆建德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回到中国。他发现出国的时候正好是一个大的变动阶段，自己虽没有直接参与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一些活动，但是远距离观察，感受可能跟国内的人不一样。“那时候的文化界，一方面很活跃，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充满了躁动不安的情绪，对新的东西有一种特殊的迷恋。举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一艘船，帆张满了，要乘风破浪，但是船身又太轻。中国思想界要张帆远航，自身缺少一种比较平稳的定力。后来90年代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我认为这些变化也是中国知识界成熟的一部分，形成不同观点是完全正常的。任何简单化的思维、寻求灵丹妙药的冲动，都要不得，我们自己要积蓄力量。”

李怀宇：你到剑桥大学留学之前，已对莎士比亚以来的英国文学读得很深？

陆建德：这倒谈不上，一直到现在依然很不够。在读大学之前，我已经读了一点英国文学，包括莎士比亚，主要读翻译。家里的原文剧本也读过一些，读得结结巴巴，语言关没过。“文革”期间读书是好高骛远的，马马虎虎，只图速度。还读过不少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的翻译作品，他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英国对他的评价较低。读得多的还有萧伯纳、哈代、狄更斯等等。到复旦后读书才变得细致了，首先得感谢精读老师。图书馆借书限制极

少，外国老师也很愿意借书给我们，比如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庄园》，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些书是带着扭曲的心理去看的，劳伦斯小说中的性描写激起很大兴趣，记得那本平装本的有些地方屡屡被人翻阅，书页的边缘有点发黑了。后来又看些很可疑的当代美国小说，应该列入黄书的范围。不过很快回到正路。读《一九八四》是非常让人不愉快的，书里有一个超级思维能手，他有犹太人的名字——果尔德施坦因，他大篇地讲无理之理，当时勉强读下去，并未觉得讽刺得巧妙。

《动物庄园》里的马让人特别难过，奥威尔用拟人的笔法来写这匹马的遭遇，勤勤恳恳但是最终还是受欺负、虐待。当时中国人对动物的关心是不够的，我小时候的同伴们都会有一些虐待小动物的劣迹，看到任何鸟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把它打下来，缺少最基本的温情和爱心。我这一辈的中国青少年的心是很坚硬的，身上好像有一层厚厚的铠甲，有些词（如“爱”、“同情”）在我们的心灵上没有印记。我们熟悉仇恨愤激的话语，所以鲁迅在“文革”中还是沉溺于暴力的造反派们的英雄。这是一种损伤。把这层铠甲戳破，激活身上比较温暖、柔弱的东西，是很重要的。拉扯得太远了。复旦读的书还是比较多的，历史、哲学的书也读，这得益于孙骊等老师。

李怀宇：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讲，伯林（Isaiah Berlin）在英国的学术界影响如何？

陆建德：我有时候号称是伯林专家，不好意思。我在80年代就关注他，博士论文的前言还引用他关于浪漫主义

的论述。伯林在英美的影响较大，英国人对他的态度有点复杂。牛津的沃尔夫森学院（Wolfson College）成立于70年代初，专招研究生，与剑桥达尔文学院结为姐妹学院，首任院长就是伯林。两个学院经常有交流活动，我曾经代表达尔文学院到牛津去跟沃尔夫森学院的学生比桥牌。伯林很长时间当那个学院的院长。沃尔夫森学院不是那种光芒四射的老学院，成立时没有各种各样的资助。伯林因为有犹太背景，跟美国的政界关系紧密，拉赞助的渠道比较多。他对启蒙主义的批判，对浪漫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缘起的分析都是蛮有趣的。只有了解他的犹太复国理想，才能发现他的所谓自由主义充满矛盾。他分析19世纪俄罗斯激进知识分子说话不负责任的原因，很到位。

李怀宇：有意思的是伯林写托尔斯泰，后来变成了狐狸与刺猬的形象描述。

陆建德：狐狸是多变，刺猬是不变，他大致上比较两类人物，在知识界影响比较大。但是我相信他50年代时的名气来自冷战。他写的文章英国味道少一些，俄国味道重一些。他喜欢排比句，行文好像是波涛滚滚，有一种巨大的修辞力量，跟地道英国文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李怀宇：你发现英国学界传统的风气跟当今美国学界有什么不同？

陆建德：美国学术界的竞争特别厉害。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些老师其实挺好的，他们没出过什么书，也不是博士，头衔就是“Mr.”，某某先生。现在这一类人物已经少了或者不大有了，我在剑桥的时候还有几

位这样的“先生”，在美国大学看不到，他们是多面手（叫作“generalist”），教书范围广。现在这种人好像已经比较少了。当然述而不作不一定就是优点，可能是牛津、剑桥容易出自视很高的懒人，在学院里做所谓的院士（Fellow）就进入了英国的特权阶层。记得老师中单身的比例较高，大学毕竟是从修道院发展过来的，但愿鲁迅先生不要像批判“寡妇”那样笑话这些独身主义者。无法想象20年代的欧美社会能原谅《寡妇主义》那样的文章。有一位华生先生，书倒是写得很多，单身，从他圣约翰学院古色古香的房间里经常飘出钢琴声。19世纪中后期，剑桥外围开始出现一些住宅，是给那些结了婚的院士住的，结婚的人后来比例越来越高。英国学者一般不大喜欢参加学术会议。

李怀宇：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人物像傅斯年等人，后来成为非常重要的学者，或者是重要的学术管理人才。为什么几十年后在运动中出来的人在学术文化上特别突出的并不多？

陆建德：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学生领袖傅斯年很快就反思了，他认识到学生还是应该厚积实力，就叫学生好好念书。五四运动时间短暂，即使参加，学业上损失不大。罗家伦五四后去美国留学，得益很大。他也是学生领袖转为学术管理人才的例子。五四那一辈人有一些东西是现在永远难以企及的。比如说像鲁迅的古文，现在的大学教授远远不及。到了20年代中期，北京女师大不断闹学潮，少数学生心思静不下来。其实学生不应该干预校长的任命，

不应该打派仗。对年轻人而言，权力大了，自以为什么都敢做，未必是好事。许广平是学生领袖，但是毕业后到广东女子学校当教师，开不了国文方面的专业课，为什么？应该追究段祺瑞、章士钊的责任吗？驱赶校长，无非是做红卫兵的先驱。后来好像没有再出傅斯年、罗家伦那样的人物，可能也不能这样说。胡乔木是30年代初期的学运领袖，改革开放后是第一任中国社科院的院长，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学术管理人才。

李怀宇：我在台北访问白先勇先生，白先生讲到1949年以后大陆政治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台湾相对来讲传统文化还是没有断，又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些冲击，反而延续了五四以来的一些传统。

陆建德：五四的源流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方面是文化激进主义，要全面否定中国文化，因此“文化大革命”也是文化激进主义的再次爆发。但是民国期间有一种自我平衡的机制，有一些人是保守的，比如林琴南公开抵制新文化运动。他用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编了很多古文集子，卖得都很好。再加上胡适他们很快又开始整理国故。我们跟台湾相比，文化断裂要严重一些。“文革”十年学术刊物停刊，大学基本停办，真是难以想象。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即文化自大，自以为是。

李怀宇：中国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学术思想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陆建德：在80年代，思想界有很多人是欢迎市场经济的，但是这跟叶公好龙一样，市场经济真的来了，人们又

不愿做出牺牲。在80年代初期，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毕业生都非常好分配。到了80年代末，这些学科不像原来吃香了，而经济学界的人变成了天之骄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跟市场经济有关系的。市场经济不一定慈眉善目，它从打开的窗户探头进来，眼神里可能还有凶光，对原来欢迎它的人尤其是普通百姓也不一定客气，这样会给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动荡不安。经过一个调适过程人们也许习惯了，但是钟摆运动总是不好的。中国学术界的毛病也暴露出来了，有些人太热爱包治百病的药。中国的计划实际上是做得不够的，看看我们的城市规划、地下管道即可知道，太没有章法了，混乱失序的例子太多。1992年，《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就对中国知识界提出批评，说现在计划更重要了，在金融、生态安全等很多方面需要有政府的参与，但是中国有些学人普遍认为市场能够解决一切。

《经济学人》从来不是主张社会主义的，它的批评就更有分量。我们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明白很多事情不能光靠市场，尤其是对世界了解多一点的话，会看到中国的计划很多方面远不及欧美好。90年代的学术界非常推崇哈耶克，但是在西方的社会现实中，福利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甚至成了基本人权，哈耶克的理论不可能付诸实践。当然国内学术思想界在90年代也呈现出多元的格局，对市场的危险性也有认识。

李怀宇：莫言讲到，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他大胆的创作风格，但是在没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的作品并不算畅销。现在很多人都不看长篇小说或者文学作品，反而在80

年代或者90年代的初期，小说家、诗人的位置显得特别重要？

陆建德：大家要开开心心接受不太重要的位置。不久前看了高行健的《灵山》，小说讲的是历史现实生活中的高行健去内地采风。我注意到一个事实：那时候没有身份证，他每到一个地方联系住宿，拿出来给人看的证件总是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上面有钢印，而不是工作证。这一招非常管用。那个时候的女孩子还特别脆弱，看到带着钢印的作协会员证就容易发晕。看得出来作家、诗人地位之高，后来发生一些正常的变化，应该是欢迎的。会计师、网络写手、物流经理都很重要，为什么只有诗人作家独占风光？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新的开放的空间里面，开开心心地做着自己分内的事情，学会像美国诗人惠特曼那样唱出欢乐之歌，歌唱各行各业的人。90年代学术机构有些人下海了，那就让他们去。留在这些机构的人不为其他所吸引，也很好，他们说自己也做不了其他的事。莫言因为诺贝尔奖而受关注，也留下了一点遗憾。

李怀宇：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变成一个狂欢的盛宴，为什么中国人这种诺贝尔情结一直很深？

陆建德：英国有一位专门翻译中国文学的女士，叫蓝诗玲，她讲过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用的英文是“complex”，听着就特别不舒服，会联想到恋母情结、恋父情结、自卑情结，都是不大正常的。我是希望中国作家和整个社会都能够坦然面对诺奖，莫言本人还是超脱的，但是社会的反应恰恰说明原来确实有一种焦虑，也可

以说是一种情结，这次突然爆发出来。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莫言是很好的作家。全国的狂欢暴露了我们渴望承认的一种焦虑。我相信慢慢地中国还会有其他一些人得诺贝尔奖，我们的心态就会变得平和一些，我真希望这一天早早到来。外文所一位同事到英国去采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找到她住的区域，问路时问人家知不知道莱辛的家，路人不知道。

李怀宇：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得诺贝尔奖不会像我们这么兴奋？

陆建德：美国人好多年没得到了，其实好作家是多的，他们不会抱怨吧。英国21世纪以来有三位得过，奈保尔，哈罗德·品特和莱辛。我想英国当代还有不少好的作家，绝对不在莱辛之下。莫言得奖后，我也希望读者更加关注其他中国作家的创作，把注意点集中在莫言身上是不健康的。大家拼命在买莫言的书，而没考虑到莫言是有着一个群体支撑着的，这个群体互相借力，里面好几位作家的书都值得买。

李怀宇：莫言没得奖之前有点悲观，文学作品不畅销，读的人不多，现在变成一个手艺活了。

陆建德：可能说说而已吧，莫言还是在不断地创作着，他对同辈作家的创作是关心的，对世界文学也是关心的，也参加了国外不少跟读书相关的活动。他并没有对这一行失望。他说的有一段话我觉得是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新境界。他说，我们批判社会的刀锋非常锐利，对自己笔下往往会留情，也应该把锐利的刀锋对准自己，不讲情面。

在《蛙》的人物里面，蝌蚪是个剧作家，有很多反思，他把关注的焦点对准自我，而且是带有批判意识。中国传统文学对自己一般总是很肯定的，古人总是自称“高洁”。莫言脑子是清醒的。他说伟大的小说还在向我们招手，还没写出来，他也没有觉得自己就真的已经到了最高峰，得了奖以后他面临更大的挑战，他心里还有更高的目标。

李怀宇：为什么整个中国社会出现所谓的诺贝尔奖的焦虑？

陆建德：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一点自卑情结，特别想得到认可。要成为一个有自信心的民族是不容易的。我们千万不要相信斯德哥尔摩几位老先生是代表全世界在做出判断。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他们也会失误的。

李怀宇：萨义德提出“东方主义”，他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去了美国，而且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以切肤之痛来思考西方与故国彼此的误解。现在中国跟西方世界会不会还有这种像萨义德“东方主义”所描绘的关系？

陆建德：“东方主义”是萨义德笔下欧美人看东方世界的一种固定模式，在东方可能也会有一种类似的版本，就叫“西方主义”。中国人原来跟西方人接触的时候会把他们叫作“蛮夷”，也会以为他们是一个模子里面出来的，没有个性，可以笼而统之地来描述。萨义德就指出这种笼而统之地来描写一个族群总是不妥当的，他希望看到这个族群里面的人的差异性、个性，要防止这种大的概念。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打破这种思维模式，实际上世界也并不光是西方和东方，西方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信天主教

的国家跟新教国家就不一样，地中海沿岸跟北欧就不一样，东欧跟西欧又不一样。“东方”也是这样，有一些西方人会认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差别，要比中国跟欧洲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印度是一个特别相信形而上的国家，现在还有苦行僧，中国社会是比较世俗的。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有一个多元的格局，不要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萨义德有特殊的巴勒斯坦背景，当今世界上很多问题都是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所造成的。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应该得到世界的关注。怎样能够在承认以色列国的前提下，给巴勒斯坦的难民、移民以充分、正常的人权，这是全世界的难题。我们也可以通过萨义德的写作，一方面对“东方主义”、“西方主义”这种本质性的描述保持一种警惕；另外一方面也在现实世界里关注巴以冲突。

李怀宇：房龙最后用“宽容”来概括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

陆建德：宽容是特别可贵的品德。我们对跟自己态度、观点不一样的人，不必给他贴标签，要能够宽容。胡适先生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恐怖分子也喜爱自由，但是要学会宽容是难的。

李怀宇：你说早年受的教育里面同情、悲悯这种感情比较少，不停地有政治运动，当时的政治话语或者是社会上流行的话往往咄咄逼人，不利于团结、和谐。现在如何反思这些东西稀缺的时代？

陆建德：任何人无形中都会受到伤害。小时候从来没有对什么动物产生一种同情、怜悯的感觉，那么对弱勢

群体的关心也会不够，这是我们教育上的盲点。“文革”后期看《闪闪的红星》这种电影，小孩子都是充满着阶级仇恨的，要把坏人杀掉。可能在某一历史时期这种感情出现过，有其合理性，但是我希望以后再也不要这样。小孩子从小长大，应该有一种比较阳光的心态，不管是谁的生命，都要尊重。大家都这样的话，中国社会才能有一种共同体的感觉，才能善待同胞中的陌生人。古代的中国社会，共同体的感觉是比较稀少的，有很多个人情调。你要看中国传统诗词，孤鹤、孤雁、“天地一沙鸥”这种情调特别重，都强调自我的完整，人之间不是互相依存、携手共进，反倒是保持孤零零的状态才是最美好的，这叫“卓尔不群”。小时候受这种影响很深，自己不会意识到。想人家所想，感人家所感，这才不容易。

李怀宇：你现在对中国的近代史很感兴趣？

陆建德：比较感兴趣，尤其是晚清。晚清是一个面临重大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能够走得比较稳妥就是全国人民的福祉。中华民族的伤痕还没有完全长好，在很多方面还是受制于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内战，这是一件真正最最幸福的事情。民国初期的中国人缺少政治能力，在一起很难共事，总是争得不可开交，赤裸裸的私心让日本人笑话。如果主张民主，那么在竞选失败时坦然地伸出手来向对手表示祝贺，脸上带着愉快的微笑，然后跟他合作，一起为国效力。我们有没有这种文化？看很多人嘴上说得很好，实际上没有这种雅量。这种雅量才是自由的真义。我们的文化喜欢把事情看成黑和白，是非太分明简单。“不

共戴天”、“势不两立”这样的成语无形中决定了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潜意识的反应。

李怀宇：所以鲁迅讲中国是一个“水浒气”和“三国气”非常重的国度。

陆建德：是，但是鲁迅先生也可以有更多的温暖的东西。他说他一个也不宽恕，让人心里很难受，也为他可惜，居然如此。

李怀宇：自由并保持宽容，这种现代文明认同的观念真正实践起来还是比较艰难？

陆建德：抽象地谈自由毫无用处。我觉得亨廷顿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政治思想家。他说，没有法制和秩序，一切东西都谈不上。他用秩序的英文是“Order”，没有一个国家能脱离法制和秩序来谈论自由。你要是在西方社会生活过的话，会觉得规矩特别多，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游行时要听警察指挥，不然警察就逮捕你。中国人在国内散漫惯了，往往是有“己”没有“人”，公共观念缺乏，一出国门之后感到不习惯。今天中午看电视，一辆急救车一路没有人让路，最终车上受重伤的人就死去了。在西方无法想象，前面不让路的人已经犯法了。社科院研究生院前院长访美时租车开，他后面的救护车在嘟嘟响，他让道慢了一些，周围所有的车都在对他按喇叭表示抗议，他很羞愧。中国社会还没这种对共同体的一致认同。我们对其他人是否关心？自己守法的意愿如何？如果将一己的自由凌驾于法律之上或不分群己权界的行为还比较普遍，来自外部的约束就应该强一点。人只是在学会尊重他人的时候才

会变得宽容。

李怀宇：你对晚清特别关心是不是也投射到当下？

陆建德：那当然。渐进、和缓，在法律和秩序的前提下，进行一步一步的社会建设。任何社会都是不断地变的，但是必须是在渐进和稳定的基础上来变。暴风骤雨、摧枯拉朽式的变化也可能对人民和国体造成巨大伤害。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有新的思维模式。我特别喜欢英国18世纪末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他是批判法国大革命的。他说，人非草木，是有生命的。我们处理牵涉到千百万人命运的事情时，一定要非常谨慎小心，一定要怀疑自己，一定要担心有可能会把事情做错。要有这种责任心才可以来谈怎么样进行一个社会的变革。

李怀宇：如果在和平的前提下有一点一滴的改良，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陆建德：非常不容易。梁启超原来就把民国叫“换一块牌子”，社会没有变，换一块牌子意义不大。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治理程度是特别低下的，北京出了四环五环，垃圾就多。我举报了，投诉了，过了一两年都没有动静。并不是说我们信奉什么“主义”了，污水沟或者那一堆堆让人心寒的垃圾就自然消失了。人民有没有讲卫生的习惯？乡政府有没有执法能力？如何教育大量胡乱扔弃垃圾的人？我一时答不上来。中国在很多方面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处理好中国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的垃圾，就是给中国梦画上了最美的一笔。

李怀宇：你现在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

陆建德：我应该说是有信心的，但是这种信心并不是很轻松，是有很多前提的。想到人们心里的漠然，那片看不见的垃圾，陡然有可怖感。很多习惯不改的话，这个国家的面貌也很难改观。还是人要改，耐心细致地改。鲁迅对此体会很深，他是用了“国民性”这个词，我不太愿意用。在70年代的时候我们讲“四个现代化”，讲得很容易，因为对世界了解太少。有很多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现在更需不断地学习、反思，没有资格翘尾巴。

李怀宇：原来这种自卑心理会不会在GDP高速膨胀的时候变成自大心理呢？

陆建德：直面问题就不会自卑，可怕的是无动于衷。中国的GDP要打折扣，一味追求政绩的官员只看GDP。低质量、不均衡、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发展不可持续，甚至是危险的。与此同时，收入却是大大提高了，老百姓普遍受惠，出国旅游购买奢侈品的时候也会产生自大心理。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有点像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但是环境险恶。在这重要的转型期，同心同德是关键。但愿国家平安，祝福我们的祖国。



陈 来

国学研究的视野要面对全世界

陈 来

1952年生于北京。1976年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地质系毕业，1981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师从冯友兰、张岱年先生。1981到2009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9年转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并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著有《朱熹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等。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曾经代表了中国学术的高峰，当年历时仅四载，但“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让后辈学人神往。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浴火重生，院长是陈来。新办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设在清华园立斋，依稀保留旧日风采。

陈来1976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随后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张岱年，1985年获哲学博士。“文革”结束后的北大，老先生们已在政治运动中耗费了多年光阴，仿佛一心想补回来。陈来说：“张岱年先生从七十到九十岁所写的文章、出版的著作数量之大，我还没发现当时在国内有第二个。一般很多老先生到七十岁以后什么作品都没有了，他等于是把二十年时间里心里想写的文章、想做的研究，从1977年开始陆续全写出来了，把二十年补回来。”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起初想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1979年开始研究朱熹，硕士、博士论文都写朱熹。陈来在冯友兰、张岱年的指导下，衔接的是民国时代的学术研究，同时关注海外的研究成果。多年后，陈来认识了旅美学者陈荣捷。陈荣捷一生研究朱熹，成就斐然。1987年，陈荣捷访问朱熹墓时，

“咕咚”一下就跪下磕头了，在场的其他中外学者都很惊讶。

陈来读朱熹越深，越感兴味盎然。他说：“朱熹不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很严谨，所以他年轻时就很喜欢跟人家辩论，他总是抓住一个理论问题，深入分析它。他在跟同时代的人的辩论中建立了权威，主要是通过书信，讨论各种各样的学术问题，别人总讲不过他。朱熹十九岁中进士，七十一岁去世，他只在外面做了九年官。他的学生都是自愿来追随的，向他学习请教。”陈来的研究成果是《朱熹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

陈来后来写出了《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宋明理学》、《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等著作。他认为朱熹、王阳明、王夫之是宋明理学的典型代表。“一流学者代表文化最高的形态，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要看这个时代的文化的最高点达到了什么程度，这要有些人来代表的。二流学者都受到朱熹、王阳明思想的启发引导，甚至在他们的典范下发展，没有这些一流学者，就没有二流学者。朱熹、王阳明对他们的那个时代来讲，有指标性的意义。”

在上世纪80年代，国门打开，中国学界与西方的交流日渐频繁。陈来也常常受邀到美国、台湾、香港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当他与美国学者交流时发现：“我们是在哲学系里面研究中国哲学的，美国的哲学系里面就没有中国哲学，在美国大学里中国哲学的教学研究有时候在历史系，是作为中国思想史来研究的，所以美国的哲学研究受到历

史学的影响很大。美国的汉学研究，对中国哲学来讲是偏重历史。他们的好处是视野有的地方比我们要宽，因为有欧洲的思想史、西方的思想史作为对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社会科学非常发达，有些相应的方法可以影响到他们对中国思想的一些研究。同时，美国学者强调历史、强调社会，这也是因为语言的隔膜，一个西方学者要进入中国哲学的精神世界不是那么容易，要真正能够了解庄子、了解禅宗的精神世界不是那么容易的，不像研究一般的社会、研究人的行为比较容易。”

陈来把基础研究放在宋元明清的思想史，但他说：“我是打通五千年的，不是只做这一千年的。我想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从头到脚做通贯的研究。我的视野是面对全世界的，在一个广大的学术社群里来回应他们的挑战，突出中国学者的学术地位。”

近年，陈来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平台，致力于学术活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设立“梁启超讲座”、“王国维讲座”、“陈寅恪讲座”，各讲座分别邀约哲、文、史诸领域的知名学者，围绕特定的专题，到清华园讲演。陈来认为：“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依然承续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发挥中国学者研究自己文化的优长，凸显中国学者的历史理解、问题意识和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不是闭关自守、自说自话，而是在和世界文化、在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的密切沟通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

我们期望，正是在这样的场域里，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世界学术的范围中，才能不仅为之‘预流’，而且将能够成为‘主流’。”

李怀宇：陈荣捷先生一生研究朱熹，钱穆先生晚年写了《朱子新学案》，余英时先生则写了《朱熹的历史世界》，这三位学者的研究有没有可比性？

陈 来：有一定的可比性。钱穆先生研究朱子，他的取向是以学术思想为中心的，而余英时先生的书是以研究历史世界为中心的，所以可比性就是角度转换了。钱先生是以学术思想史做的研究，而余先生的书不是学术思想史，他是注重政治文化、政治史，就是朱熹所在的政治世界、人物的关系以及朱熹的政治志向和政治参与，还是不一样的。以前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大部分都是从学术思想角度，哲学是思想的一部分。余先生是有独特的角度。

那么，陈荣捷先生的研究，广义上还是学术思想方面，当然他是突出哲学为中心。钱穆先生不是突出哲学为中心，因为他可以说是突出经学的部分，或者作为理学史的眼光，这是钱先生的特点。陈荣捷先生比较突出哲学，他做的研究比较广，他的《朱子新探索》一书这么厚，对朱熹的很多具体问题都进行研究，不管巨细，只要他觉得是个问题，都进行研究。陈荣捷先生跟钱穆先生研究的形态还是比较贴近，基本是传统研究朱熹的方法，可以归结到以思想世界为中心；余英时先生则是以历史世界为中

心，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李怀宇：杜维明的学术研究在美国受到什么样的评价？

陈 来：一般人都知道杜维明先生代表儒家思想，他在美国一般知识界的知名度很大。另外，在美国做纯粹中国哲学研究的人很少，很多人都是做中国思想史，受历史影响比较大，所以对杜先生的认识就有差别。特别关注历史的人会觉得杜先生对历史研究不是很关注，因为杜先生本来的意愿、想法、取向就不是强调历史的，他是强调儒学的价值、意义。杜先生做的工作都是阐发儒学的意义、价值和现代化的关系。

李怀宇：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和谈话中对杜维明先生的一些看法，非常有趣。

陈 来：何炳棣先生是很晚才关注到杜维明先生，但是一般来讲，何先生对杜先生的批评，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的人多认为他不太能站得住脚。何先生对我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也有点怕他，我看他好像对研究思想史的人攻击性很强，批评比较厉害。老先生的脾气就是这样，搞思想史的人不太敢惹他。

李怀宇：你怎么看待“新儒学”这个概念？

陈 来：“新儒学”有好多意义，一个就是宋明理学，那就是新儒学。这个说法有人赞成，也有人不赞成。还有人讲的是“现代新儒学”，即熊十力、梁漱溟等；有人讲的是“当代新儒学”，即唐君毅、牟宗三等。中国现在也有些人高举“新儒家”的口号，这又是一部分。

李怀宇：你怎么看余英时先生写的《钱穆与新儒家》？

陈 来：余先生主要讲钱穆不是新儒家，他认为新儒家有一个限定，就是要懂康德；钱先生又不研究康德，怎么是新儒家？但是从中国大陆的研究角度，现代新儒学里，钱穆算一份，余英时也算一份，因为钱先生、余先生跟唐君毅、牟宗三那一派的新儒学之间有共同的地方，就是肯定中国文化。但在研究的路数、方法、观点上，钱、余与唐、牟都不太一样，

李怀宇：现在中国冒出很多新儒家。

陈 来：听说是越来越多吧。但是我肯定这种现象，表示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同情地了解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不是像以前受批林批孔时代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对儒学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and 了解。儒家文化总体上来讲，还没摆脱一个受压抑的状态。因为西化派、自由主义不喜欢它，老左、老教条主义对它也是痛恨的。孔子像在国家博物馆门口摆一下，就受到那么多攻击。反对的主要是网上的“愤青”，还有老左、老教条主义，甚至包括某些支持邓小平改革的人也煽风点火。西化派、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不用说了，都是不以为然的。

总体来讲，我说现在儒学虽然没有明显地受压，虽然在某些地方好像还受到一些鼓励吧，但是在知识界儒学总体受到压抑的状态并没有根本改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利用儒学本身达到个人目的，是很有限的。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但是今天没有那么突出，大多数对儒学肯定的

人还是出于严肃的学理或文化的思考。

李怀宇：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一度非常辉煌，现在重办，你来做院长的初衷是什么？

陈来：初衷就是清华的资源、金字招牌不能就没有了，所以当然要恢复，因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是整个清华学术声誉的创造者、奠基者。清华在国学院以前没有学术声誉，因为清华只是清华学堂、留美预备学校，哪有学术可言？所有的学术声誉是从1925年转变为大学开始，虽然“清华大学”是1928年才挂这个牌子，但是它作为大学，1925年就开始招收新制四年制大学部的学生，不是为了留美的。旧的学生还在，但是1925年已经开始招收新制的大学生，建立研究院。招收研究院的学生，那就是大学的事情。所以清华大学作为大学的历史真正开始是1925年。清华建立自己的学术声誉，初期就是靠国学研究院。那时候理科和工科都没有，社会科学也都没有能够拿得出来的成果，真正拿得出来的成果就是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代表当时中国最高的学术水平，毫不夸张，胡适也得承认，当初叫胡适来清华国学研究院，胡适说“我不配”。所以，从清华历史上来讲，清华国学院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后来中研院史语所建立，它的骨干都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1930年成立清华大学文学院，文学院是把清华国学院的传统发扬光大。所以，清华真正要恢复文科，当然要恢复国学研究院。

当然今天的国学研究院不一样了，功能各方面都不一

样了。以前的老国学研究院相当于培养研究生的单位，现在因为清华各个院系都有研究生了，我们招不了几个研究生，已经没有意义了。教育部对高等研究院的建制有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就是研究院是作为研究平台来建设的，不是作为招学生来培养的。如果是国学院，不是国学研究院的话，可以招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但是我们一开始用老的名字“国学研究院”，是作为高等研究院的体制，建设一个国际化的研究平台，所以跟老的研究院有所不同。但这个名字的恢复本身就有意义，说明清华对文科发展的态度，对学术历史更深的重视和尊重，所以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对清华大学来讲还是很好的事吧。

李怀宇：这个时代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像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这样的学者？

陈 来：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独立的特点，赵元任的特点完全不可能重复，他对方言有天生的才情，他有模仿方言的能力，这样的人很难复制。王国维是做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的研究，今天产生这样的人物还是可能的。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史研究、古史、古文字研究，整体成就已经远远超过王国维时代了。

李怀宇：但为什么很多人都怀念民国时期的学术气氛？

陈 来：后人总是把前人做一种神话的描述，往往喜欢这样做。比如说胡适，现在地位那么高，可是胡适的学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那点东西，我们要超过他不是很容易吗？但是后世对前世的人总是用一种推崇、抬高、神化的基调，好像前人是不可超越的，其实不是。民国

时代的氛围、情形不同，相对来讲，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管制比较少，言论出版的自由比较多，自由探索的风气还是有。但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陈寅恪为什么写那篇纪念王国维的碑文，就是因为国民党来了以后，学术自由的情况改变了。那时候国民党还没来清华，王国维、梁启超都已经吓了一跳，陈寅恪写了文章，针对的就是国民党要用三民主义来领导学术。应该说，30年代以来已经变化很大了。“文革”前当然很强调政治指导。

李怀宇：你回忆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在政治运动中荒废了二十年的光阴，你这一辈亲历的学术气氛跟那些老先生所处的时代有什么变化？

陈 来：我们的学术道路上基本上没有碰到张先生、冯先生所遇到的那种挫折、走过的弯路，国家也没有大的弯路，个人也没有。百年以来，应该说最近三十年还是最好的时代。军阀时期的战争，国共的几次战争，抗日战争，不同程度地对学术都有影响。后来形式上的军事武力战争没有了，但各种运动还是很多，最后到“文化大革命”，虽然不叫战争，但是这种革命运动更不得了。我们这三十年基本上没有碰到这些。百年以来，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我们进入学术成长的这一段，都没赶上这些事。这三十年中国学术能够大踏步地前进，跟整个时代有关系。

李怀宇：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对研究中国哲学有没有冲击？

陈 来：今天没有很大的冲击，因为我们已经真正

形成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主导传统。当然我们会关注西方的思潮，但是不会轻易地受到影响。我们也会用一个积极的心态来面对西方的学术思潮，看它有没有什么用，但不会很盲目地弄到中国来，然后引起很大的冲击。另外，时代也变了，因为中国现代化已经走上了比较平稳发展的路，所以没有那么一个共同的大的历史背景、大的问题受到全民关注。从现代化来讲，20世纪20年代最大的冲击还是现代化，全民对现代化的憧憬和全民族遭受的现代化挫折，是那个时代最深的心理基础。所以那个时候西方有关的思潮进来，当然特别重要。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比较平稳发展的状态，谁也不能改变这条路，所以现在现代化的这套理论已经不受关注了。最近这些年来，政治哲学的影响比较大，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哲学，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但这些东西也不会出现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因为我们现在对西方理论已经了解很多。如果你一直不了解，突然出现一个东西，对你的冲击就很大。如果你每天看着它在成长，不会对你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从一开始出现你就知道它，所以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李怀宇：你自己读西方哲学方面的著作多吗？

陈 来：多，但是我不會仅仅关注西方的纯哲学，我看的西方的东西很广，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宗教的，我关注的西方的资源比较广。我想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维护儒学传统的知识分子要面对的不是纯粹的哲学问题，很多是要从其他方面来考虑。我们的研究特点不是把中国哲学的思想看成一个纯粹的东

西，我们研究的方式也不是用纯粹的哲学方式进入它，因为它面对的挑战也是多方面的。另外从学科来讲，我们最直接的一个学科叫“中国哲学史”，它本身也带有历史的涵义，中国哲学史跟中国思想史也不能完全分开。所以我们的研究是多维的，我们需要的资源也是多方面的，不是在一个比较狭窄的、纯粹的哲学里面来考虑中国哲学的研究。

李怀宇：你如何回应西方学界对儒学的学术批评？

陈 来：以前美国的社会学家对儒学现代化的批评，要回应它，不懂社会学能行吗？不仅要有社会学的视野，而且西方是把儒学作为一个宗教来看的，那你不懂宗教学也不行。像美国、日本很多研究儒学的学者都是采用历史学或者是社会史，你不懂历史学、不懂人类学研究，怎么回应它的挑战？另外，关于儒学的话题，有很多是属于文化的讨论，你不直接进入文化讨论，怎么回应这些儒学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比如说公共知识分子，儒学跟公共知识分子是什么关系？儒家传统里面有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这些都不是哲学问题。在今天，以促进儒学文化复兴自命的知识分子，你肯定都要回答这些问题，所以注定你的研究要是多方面的，不可能是单一的。在这方面，我的学术责任感比较强，把回应来自各方面的对儒学和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当作自己的责任。

李怀宇：儒家的传统思想里，是治国平天下，跟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没有相同的地方？

陈 来：有相同的地方，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公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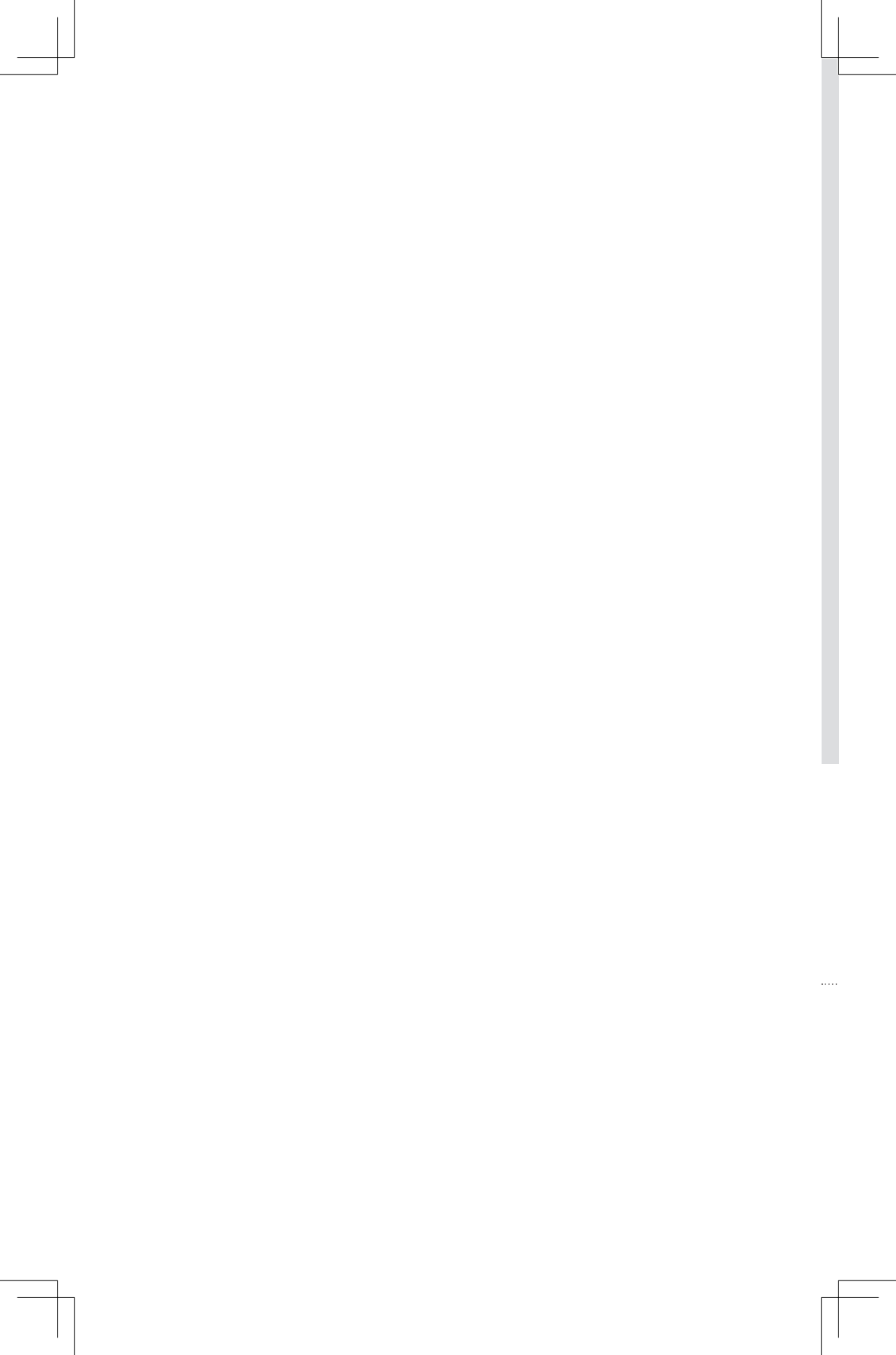
知识分子。我是接着余英时先生的一些讲法，他没有讲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我从他对“士”的一些讲法开始讲起，最后讲到罗尔斯的问题。当代儒学碰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儒学跟人权的问题、跟政治学的问题，你也要面对，要讨论。所以，除了历史、思想史、哲学史的文章，关于儒学、儒家思想在当代的多方面的研究、思想文化的研究，不可能不碰到，这是儒学在当代受到的挑战，我必须要做全面的回应。

今天我们到处都看到儒家文化复兴的迹象，这么多《三字经》，这么多《弟子规》，小学生经典诵读，这些都是儒学复兴。“以人为本”、“以德治国”、“和谐社会”都是典型的儒家观念。不单是儒家，当然佛教、道教也是讲这些，但是佛教、道教不是讲治国的，宗教有出世主义的一面。这都可以看出是儒家文化复兴的因素。

李怀宇：儒家思想对建设现代公民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 来：现代社会应该是多元的，互相有张力、有补充，不能仅有市场经济、个人主义、法制这些现代性的要素，一定需要传统思想和文化。只讲个人主义的价值在现代社会能成立吗？只讲市场经济和理性经济人，不讲道德教化，这样是理想社会吗？任何一个东西不能够覆盖现代社会所有的需要，所以在这样一个多元结构的现代社会里面，儒学应该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价值理性的主要形态，它能抵御或者跟当代过于功利主义的市场冲击形成抗衡吧。在现代社会，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儒学

的意义，并不是说它可以代替其他的一切，它不能代替民主、法制、市场经济。但是这个社会必须有普世的道德价值、对社会的责任、更高的理想追求，更不用说自由、平等、博爱。博爱和平等都是跟儒学有关系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它只有利没有弊，所以我们看一个东西要从一个结构的角度，这个结构里有好几个东西在一起能够互相弥补、互相平衡，这对社会是比较有利的。





尤西林

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危机与重建

尤西林

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祖籍陕西榆林。1966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务农，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文学批评的类型》、《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等。

尤西林的书房挂着王元化先生为他书写的“健笔凌云”。聊起来，尤西林和学界前辈王元化、李泽厚、高尔泰等多有交往，对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流变，尤西林既有切身体会，又有学术思考。他希望结合个人体验，综合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梳理所经历时代的思想脉络。

1947年，尤西林在成都中央黄埔军校出生。他出生于和国共两党均有上层关系的大家族。1954年，母亲把他送到西安市第二保育小学上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延安时期的干部子女学校。保育小学的教育通过人造的小社会把爱与善良提高到绝对的位置，并通过课堂教育与食宿游戏培养学生的道德纯正感：不能容忍压迫与残忍，必须同情与热爱穷苦的人。他走出保小校门，第一次目睹人力车夫上坡的艰难情景，冲动地赶上前俯身推车，这成为他后来民粹情结的少年起点。这也是后来他放弃高考申请去农场、

“文革”中激烈反抗血统论、虔诚插队，以及始终坚持批判特权社会的一个渊源。他认为超出个人思想的一个资源背景是，由于家世与经历，他对时代有着切身的介入经验，这使他不会简单追随那些学理正确或感召力巨大的流行思潮，而保持着更深的独立思考。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尤西林考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并以人道主义哲学与美学为学术依托，深度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他在80年代后期致力于汉语人文学科理论与人文知识分子理论。1996年同时出版的《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与《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均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后一本书，受到大陆与台湾的中青年知识界注意，以四川大学为主体的“成都地区高校面向21世纪学术月会”曾两次研讨此书。今日已是汉语学术思想界骨干的几位学者都曾称此书是他们成长时期精读著作之一。

90年代中期，尤西林将对艺术与美学的人文科学研究又转向现代性理论，在这一研究中注意到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到了90年代末，他又扩展向基督教文化研究。他说：“我一直关心的是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危机及其重建，不断地进入一个又一个的学科。因为我必须依靠学术深化我的思想。”

李怀宇：恢复高考时，你已经三十岁了，当时的学术兴趣很广泛，为什么去读中文系？

尤西林：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不知道这一次高考有什么样的后果以及有什么样的限制，因为我的出身不好，我不可能自由填报我的志愿，当时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西北大学历史系，第二志愿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来被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了。我上大学不久，就发现所学的科目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我基本是在大学图书馆、教

师资料阅览室自学。1979年我以插队时的札记为基础，写出了三万字的一篇论文《人性异化艺术》，将这篇手稿寄给了朱光潜先生，朱先生给我写了四页纸的回复，这篇手稿浓缩后1982年发表在上海的《学术月刊》上。我以一种青年的激进语调直呼其名地批评了国内全体美学权威，蒋孔阳等先生还和我发表了商榷文章。美学对我的吸引力，就在于它赋予我的人生经历一种学理深度与高度的理解，我把经历过的生活看作是一种追求美的生活，这种美的生活不是指对象化的现成艺术品欣赏，而是人自身生存的内在状态。后来才发现，这一思路不仅与马克思相遇，而且通向禅宗与现象学。

李怀宇：在80年代，你完全沉浸在这种美学的氛围里？

尤西林：我的兴趣实质在精神哲学（也就是Geisteswissenschaften，人文科学）。1987年我参加一个德国哲学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康德理性及其现代失落》，受到张世英先生赞赏，作为首篇刊发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德国哲学》。但我后来又转向其他领域。我是跟着我的生存问题，包括我对时代呼应的问题亦即思想史路径去寻找我的学科研究领域的。所以，我往返出入美学、文艺学、中西哲学史、宗教哲学等领域并非随意，其实不仅有个人的思绪意向，也有这些人文学科汇通于人文科学的客观学理逻辑。

李怀宇：李泽厚和高尔泰在80年代学术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尤西林：高尔泰的文笔哲理深刻而且内蕴激情，因而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代青年。我读他《关于人的本质》的时候流了泪，我体会到一种生存深层的激情。他的学术不是那种口耳相传之学，而是人格化的真实、厚重、苦难升华出的精神境界表达。80年代“美学热”表明美学借助其精神哲学特性支撑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变革，而高尔泰则代表了这一变革的激进一翼。李泽厚的思想启蒙影响则是整体性的。我曾这样从思想史角度评价李：“中国改革表面上看是执政党自身的意识形态变革造成的，包括我们熟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等，但是重要的是，在整个讨论和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中，有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出现。这就是人文科学公理。80年代出现了以学术史的方式陈述论证问题的语用，这成为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文化的话语方式。21世纪的今天，中国公共话语已经普遍援引学科学理。这是当代中国公共话语最重大的转变，也是80年代文化讨论的主要贡献之一。此前由于权威意识形态占据着人文科学位置，不仅具体的特定的人文学科（文学、艺术、宗教学、伦理学）不独立，而且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如遗传学、心理科学）也没有独立地位。所有的学科都被意识形态直接或间接支配，作为一种权威的元理论，所有的学科都要回溯到意识形态，以之来说明本学科工作的根据。这种垄断远超过梁启超所说20世纪初叶思想界巨无霸的进化论。当人们以学科专业的方式来谈论社会问题时，就实现了吉登斯所说的专业学科承担社会思考判断与

政府决策根据论证的现代性转变。人文科学公理逐渐取代了意识形态的独断论裁断模式，这一历史转变对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执政党的现代化具有同样根本的意义。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发展生产力，这一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转变固然关系根本，但是，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的转变比意识形态内容的转变更为根本。而人文科学公理并非意识形态的派生物，它比意识形态有更深层的现代渊源。这也可以表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转型。在这一转型中，人文科学学者在一定意义上比意识形态专家起到了更加重大的作用。李泽厚即是一个代表。李泽厚通过美学意义论（情本体）、社会存在论（工具本体）、现代性人性论（主体性）哲学，以及将人文学科的专业性与现实评论融合的思想史研究，深广影响了当代中国人文科学公理的话语方式，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转型的代表性人物。他类似于卢卡奇。”

李怀宇：现在反思1949年以后的教育的文章不少，但是反思得很深刻的文章却不多。为什么会这样呢？

尤西林：谢泳的民国时期的教育史做得很细而且很用心，个人具体的细节呈现出群体性规律。但反思当代教育必须结合深层体验，这需要思想家的睿识。例如李泽厚论鲁迅的文章提及中国五代知识分子，他认为其中最具有创造性的是20年代的知识分子，与之可以对话的是邪恶与崇高交织背景下成长的“文革”一代。他认为最平庸的就是他这一代，即1949年以后培养起来的“老大学生”，无论是人格还是学术，都是被平庸化的一代。这些看法会有争

议，但包含深刻性。

李怀宇：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文史哲作品，对大革命进行深刻的反思。你认为中国在经历反右、“文革”之后，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作品？

尤西林：中国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包括“文革”，但是缺乏哲学与社会史结合的反思。欧洲有最优秀的一批学者从哲学高度反思纳粹。中国人要对自己经历的20世纪的灾难，特别是后半世纪深重的灾难，提升到本质意义上的高度来加以理解。这种理解应超越个人的恩怨利害，同时也不应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所谓的社会学意义的社会变革或者是某种特定的人事评价。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有著名的判断：奥斯维辛之后，不应再有诗。这样的说法是站在哲学高度对欧洲精神变故的反思。研究那些执行毒气刑罚的别动队遗留下来的日记，将非人性的残忍行为仅仅归结为党派之争或者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则远未抵达事件深处。当然，在人文精神哲学与社会学之间有各自合理研究的张力。

今天中国是精神贫乏、肤浅、混杂的时代，全社会的道德处在中国历史上的低落时代，这和经济所达到的空前繁荣，形成了极为奇特的对比。我的外公在1993年曾经看到某报上的一个消息：南方一个大城市晚间的火车站，两个刚下班的女工，其中一个怀孕了，被几个流氓纠缠，发展到当众轮奸，围观的达上百人，持续了四十多分钟才有人去打电话报警。我外公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博士，西北联大的教授，他是19世纪生人，记得老人沉痛感慨“辛

亥以来闻所未闻”。中国历史上曾有人类学意义的退化混乱事情，但有社会风俗背景。当代中国在空前进步的同时也有空前堕落。这一点必须不惜以尖刻的判断提出才有意义。中国伦理与环境的危机是空前的，这两项软指标恰恰可以毁掉中国。所以我不同意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片面提法。

李怀宇：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关于魔幻主义有很多讨论。有人说，莫言所生活的时代已经非常魔幻化，如果把近几十年的历史真实地反映出来，就有非常离奇古怪的情节可融入到小说里面。对此，你有何看法？

尤西林：我没有看过莫言的小说，也没有读过经典的魔幻主义的外国作品，所以不好评价。实际上，迄今中国还没有产生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和伟大的哲学作品。关于中国当代电影的评价，我作为一名观众而不是作为一位学者有不吐不快之感。我看了有限的几部电影，却使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今天的中国电影和所处时代的精神状态是相应的，包括声誉最高的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姜文的电影，都是比较低俗的。电影中有震慑感官的音响与场景、精致的技巧与虚假的时空故事，民族主义吼声下的市井气质，但让人震颤的现实生活细节与境界却阙如。中国当代电影缺乏境界，有一种时代性的俗气，我没有感受到真正的艺术品应该给人的那种震动和崇高提升感。姜文作为有魅力的男性气质演员另当别论，我们今天缺少有气质的演员是并行的严重现象。这也不奇怪，今天中国人的气质已经退化，演员状态是社会乃至种族状态的反映。工作

疲劳之余我偶然打开电脑点击到了《肖申克的救赎》。看完以后的一周时间，我都被一种清新而崇高的追求自由的情感持续涤荡，精神处于一种非常美好的境界。仅仅是一个艺术门类的比较，也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的文化精神处于一种很低下的状态。我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精神危机充满着高度关注，包括它的历史根源以及未来可能的重建。有的朋友口不离孔孟老庄，他们的问题意识也源自中国的现实生活及其精神处境，但是却忽视现代化这个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的历史大环节，因而这种古代范式的提撕缺乏生活基础。今天有两个文化解释的坐标，一个是古今，一个是中西。但是在我看来，古今要优先于中西，这四个维度中最关键的是“今”，也就是现代化和现代性。因为我们所有言说者都是置身在现代化和现代性中的人。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生活世界决定着我们的解释学视野的真实基础。

李怀宇：从80年代走向90年代，你在学术研究和思考上如何发展？

尤西林：中国80年代文化有两个热，一个是异化热，一个是美学热，相互是支持的。美学热是较为安全的一种讨论方式。美学的核心就是作为异化的对立面，美学通过美和异化的对立来讨论人道主义的现实和历史。李泽厚、高尔泰是以美学的方式谈这些，王若水是以哲学的方式直接谈的。1984年我曾参加《经济日报》在北京八大处召开的一个观念变革讨论会。我这一组有周辅成、费孝通等前辈，也有许医农、孙立平、王润生、王伟等，结合现实谈观念、谈文化、谈哲学、谈美学，毫无顾忌。但一个关

于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宣判终结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于是，问题又颠倒过来，本来是为推动制度改革而谈思想，但形势的发展却导致：为了思想观念的解放，也需要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先行条件。从而，1986年后，人文学科类的热点逐渐转为以社会科学为中心，法学、政治学成为真正的中心，至今它们还是中心。这折射出中国的现实问题处境。但正是今日以政治体制为核心的历史性变革呼声急迫之时，包括中国所承接的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传统负面结合的精神危机，更易被排斥于思想界视野之外。这两方面关系即使逻辑理顺也极其复杂。我以为，最近邓晓芒与刘小枫的论争恰恰各自代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意识，都是有重要思想意义的。

李怀宇：后来你为什么对宗教感兴趣？

尤西林：我自己没有能力跨越进入经济学和社会学，因为那要求专门化训练。我的基础实际上是人文科学，我必然要进入精神科学的最高端，也就是从信仰层面加以研究。宗教只是一个典型形态。但还有作为人文科学范畴的信仰。通过对基督教的研究，了解了西方文化根基，不仅从精神哲学的角度知道它的根源，而且我也通过研究基督教特别是它的新教改革，明白了它是现存的几大宗教中唯一受过现代化洗礼的宗教。基督教和现代化的社会科学关联，包括了民主、法治、人权等。1517年马丁·路德改宗，掀起了现代性意义也就是人文科学意义的宗教改革。这个改革的核心，就是超越社会统治层面的宗教教会而赋予每一个个体与上帝无中介的直接关系，从而使现代人获

得最高的一个元点。这种最高的关系会从信仰层面逐层下降，而成为后来的洛克政府论以及卢梭的契约论，也就是现代民主和人权的来源。包括大学，实际上起源于修道院，因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大学的人文精神信仰渊源》。现代化实际上是要以精神团契为基础的。这个团契在西方就是基督教团体，中国辛亥革命则是文学社这些团体直接起作用。但是“文革”结束以后，计划经济以及社会组织形式单位所有制的解体，中国人已经没有自己的团体了，中国主要的现行活动几乎都已失去内在的信仰支撑而交付利益驱动，这才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缺失（而不是什么“教育”缺失）。拜金主义统治下寻求人性呼吸的民众，宗教自然成为一个替代品。教会天然会接纳这些无信仰同时有精神团体需要的民众，这就是几大宗教都蓬勃发展的原因。但是宗教不是人性精神团契的唯一选择，它更普遍的选择是人文团契。我们要区分宗教和信仰，要看到信仰是一个更大的人文科学范畴。我对宗教的研究，是沿着美学、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人的解放这些相关论域展开的。宗教及其更为普遍的信仰必然要还原到现实的社会与历史，因而必然要联系到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的意义。

李怀宇：你认为自己的研究对当下中国以及未来中国有什么启示？

尤西林：这么讲我不敢当。我近十年很悲观，关于知识分子那本书，2006年增订版后记中我就提到隐逸的现实意义。我房间悬挂的李商隐的诗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表露了我这样一个追求自由却始终以

边缘为故乡的知识分子的最深层的宿命感。但愿后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再生存在这样的悲凉情调中。我会越来越重视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即努力让个人生活方式趣味化甚至意义化。但我始终对那些关注并投身社会公共建设的人深怀敬意，若有机会，我当然还会面对公共问题。我是在中国三十年以来的思想解放以及精神探索中成长起来的，我晚年要结合我的“文革”经历，对中国1949年以来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核心方面做研究。这不是一般的历史研究，也不是简单的思想史研究，它既以个人现象学式的实在体验为基础，同时又是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性的研究。我要运用几十年的学术训练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做新的研究。当然这个社会将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我希望用这样的工作更清晰地认识它。



杨小彦

视觉时代的探索者与实践者

杨小彦

1957年生于广州。1978至1982年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1984至1987年于广州美术学院攻读美术史硕士，1999至2004年于华南理工大学攻读建筑理论与历史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著有《艺术史的意义》（合著）、《尚扬评传》、《纂图》、《新中国摄影60年》等。

杨小彦很跨界。他本科读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师从艺术史家和翻译家迟轲教授学习西方美术史和艺术理论。四十岁以后又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攻读建筑学院建筑理论与历史博士，导师是以研究中国古代城市防洪制度出名的吴庆洲教授。杨小彦先在花城出版社，后到岭南美术出版社，从普通编辑做到常务副社长。20世纪末随家人出国，到加拿大温哥华住了五年，一方面在一家研究机构做文化史研究，一方面担任当地一家中文电台的时事评论员，用广东话评论时政。2004年，杨小彦担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系主任。

如今，杨小彦是中大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主管学院科研，并兼任媒体创意设计系的主任。他的研究方向是整合了视觉理论、传播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的“视觉传播学”。与此同时，杨小彦还受聘于母校广州美术学院，在人文学院带研究生。受聘期间，杨小彦帮助广州美术学院建立了艺术管理系，有力地推动了艺术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

杨小彦的父母是老报人。父亲杨家文解放前是《湖北日报》中共地下党的一员，解放后在《长江日报》工作，担任副刊编辑，并用“周敏”笔名发表诗文。1954年南调

广州，到《南方日报》任职。1957年参与《羊城晚报》创刊，成为“花地”副刊主编，一直干到退休。“文革”前的《羊城晚报》副刊“花地”，以每天一页的版面，成为那个年代中国文学重要的作品园地之一，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杨家文与后来成为“胡风集团”四员大将之一的绿原交往密切。1954年“胡风集团”案发，杨家文受到牵连。幸好其时他已南调，《南方日报》社长黄文俞对外来干部特别爱护，以不了解情况为由，让杨家文回《长江日报》接受审查。半年以后，审查大致告一段落，《长江日报》以“编辑与作者的普通关系”为由，让杨家文脱离“胡风集团”案，重回《南方日报》。这一经历对中年杨家文不啻是一个重大打击，让他突然之间明白了许多，以至于沉默成为这位老编辑的人生取向，不再胡乱说话，躲过了此后的各种运动，直到“文革”初期，才再次受到打击。当年杨家文曾用旧诗记下了对此事的复杂感受：“一别经旬路几千，几回转侧不成眠。恶梦纠缠如恶鬼，度日艰难似度年。杯酒岂堪抒积郁，片言未肯瞎胡编。中宵默默灯前座，遥想南州月正圆。”这首“反诗”长期留在杨家文的脑海中，直到“文革”结束以后，环境有所改变，他才用笔记在纸上。

1957年《羊城晚报》创刊时，杨小彦在广州出生。“文革”前的日子，在儿时的杨小彦看来是平静的，中国社会的紧张，暂时没有降临到他身上。“文革”前夕，北京重点批判“三家村”，向媒体人开刀问斩。广州则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羊城晚报》，尤其是刊登了大量“文艺

黑线”文学作品的“花地”。这一次杨家文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牛鬼蛇神”。

“文革”中的杨家文常常沉默，偶尔会有旧诗，只存留在脑海里。家中无书可看，小儿子杨小彦也不用上学，杨家文对他的学习有了某种担心。一天，他拿了一张白纸，在纸上写了一首苏轼的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让杨小彦去背诵。从那天开始，在一段时间里，杨家文断断续续地给小儿子讲解了部分旧体诗词和个别古代散文。没想到这成了杨小彦在革命年代的“旧学”教育，不成系统，但多少填补了无知年代的无知。

1973年杨小彦高中毕业，同年11月下放到广州郊区的从化民乐茶场。虽然是广州郊区，但农村的贫穷与困乏仍然给年轻的杨小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时的生活很单调，但幸好杨小彦喜爱绘画，中学就已拜师学习，老师是当年《广州日报》的美术编辑单柏钦，算是有一技之长。来到农场不久，杨小彦才开始意识到“一技之长”的好处。那个年代重视宣传工作，因此也就需要适应宣传的美术人才。杨小彦的美术特长让他获益良多，首先就是不用那么频繁地到茶山劳动。这让杨小彦兴奋，比在高中时更起劲地学习美术，提高技艺。不久，他就被抽调到场部，参加了工作队，出墙报和写“运动简报”。半年后，工作队任务结束，因为有美术和写作的双重能力，杨小彦很快给调到场部，在“运动办公室”干起职业宣传工作。很多年以后，杨小彦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时说：“幸好下乡了，否则怎么可能会起劲地去学画？不起劲地学画，又怎么能

幸运地考上广州美术学院？而且还是最难考的油画系！”大概从那时开始，杨小彦就选择了自己的终生职业，一个是画家，一个是作家。

1978年恢复高考，在激烈的竞争中，杨小彦幸运地从几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从此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毕业后，分配到广州花城出版社，到文学期刊《花城》当编辑。两年后，杨小彦考上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成为美学家迟轲教授第一代的研究生，学习西方美术史与艺术理论。研究生期间的成绩是丰满的，他发表的论文有几十万字之多，除了发表在《美术》杂志上以外，主要发表在浙江美术学院的学报《新美术》上。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杨小彦私底下一直认为，他的学术脉络是和江南联系在一起的，是属于浙江美术学院艺术史的一路。他在研究生期间结识了浙江美术学院的范景中，通过范景中的介绍，杨小彦开始接触英国瓦尔堡学派，尤其是贡布里希的理论，并由贡氏延伸到科学哲学，研讨波普、拉卡托斯、库恩和拉斯斐尔德的著作。这一系列的研究，奠定了杨小彦日后从事艺术研究的理论基础。

读研期间，杨小彦结识了湖北艺术界的一批朋友，有皮道坚、彭德等，以及哲学家张志扬等人。杨小彦不仅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还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八五美术”运动中。

1987年，杨小彦研究生毕业，到岭南美术出版社任职，一待就是十一年，从编辑一直做到常务副社长。

1998年，他决定再次读书，并离开出版社。这一次

他选择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师从著名建筑史家吴庆洲，攻读博士学位。与此同时，他也从出版社调到了暨南大学新闻系，成为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

1999年，杨小彦随夫人和孩子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这时他已经四十二岁了，突然想起了父亲杨家文，“文革”开始时他也是这个年龄。也许这是一种父子间的命运，人到中年时碰到重大变化，导致了人生的转折。

温哥华的日子是平淡的。杨小彦把一块“老彦工作室”的牌子挂到住家的大门外，让客厅变成了工作室，开始对外招收学画的学生。一晃眼间，杨小彦成了一个教画谋生的人。这和国内的状况形成了巨大反差。

2004年，杨小彦终于完成了博士学习。又因为一个机缘，杨小彦认识了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常务副院长邓启耀教授。在邓启耀的盛情邀请下，杨小彦决定回国，担任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传播与设计学院的新闻系主任。

没想到杨小彦回国工作不到几天，杨家文就离开了人世，终年八十一岁。杨小彦撰文纪念父亲，文章题目叫《父亲最后的日子》，发表在当年的《羊城晚报》上。不久就收到了一批报社子弟的短信，其中，不少人读后流下了眼泪。

有一次，杨小彦和中大黄天骥教授聊天，黄教授笑着对杨小彦说：“我曾经是《羊城晚报》‘花地’的年轻作者，是你父亲杨家文的组稿对象。”又有一次，杨小彦和中大历史系的刘志伟老师闲聊，刘志伟说：“我知道你要到中大来，很高兴。你要知道，我当年是读《羊城晚报》

‘花地’长大的。你是杨家文的儿子，我先知道你父亲，然后才知道你。”这次聊天之后，杨小彦一个人悄悄来到父母的坟前，插上香，默默地做着祷告。墓碑上写着杨小彦当年亲自为父亲撰写的对联：“诗心乃大，歌罢方寸柔肠，三江波涌荆楚客；尺幅虽小，说尽天下世事，一代风流晚报人。”

李怀宇：你在中山大学教新闻，又受聘于广州美院，从事艺术教育。现在很少有人能在美术和新闻之间找到平衡点，这跟你的教育背景和家庭有关系吗？

杨小彦：都有关系。进中大是一个历史缘分。80年代时，广州的报纸要过我，但我却选择了出版，因为我看父母做了一辈子的报纸，其中的无奈，我很了解。我对报纸的运作和新闻的写作有敏感，当然，我也在出版社工作了十几年。这大概是我能够在中大担任新闻系主任的“资历”吧。后来我的这个人脉果然有用，我请了很多业界的人来教课。当然，我也在中大教新闻方面的课程。我教过新闻写作、新闻摄影、深度报道、出版与编辑，而新闻学概论这一门课，我居然教了有七年之久。至于我现在的学术方向，准确说是视觉传播学，结合视觉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研究信息视觉化的现象。回想起来，我教这么多新闻方面的课程，事后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当然，说得过去的是，我所教过的课，基本保证了质量，这背后还是有相当的阅读量做基础的。

李怀宇：视觉传播学的观念如何理解？

杨小彦：信息视觉化是一种趋势，这说明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传播的时代，一个视觉的时代。今天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视觉传播。这就叫作信息视觉化。随着数字媒体和互联网的兴起，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兴起，传播的方式越来越视觉化。面对这样一个传播与视觉的现实，对信息的视觉化研究，对视觉的传播特征的研究，势必成为显学。今天，已经有学者提出：传统媒体内容为王，今天则是体验为王。今天，我们不仅像阅读文字那样去阅读信息，我们甚至是在“看”信息，在“看”新闻。像法国的居伊·德波，他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景观社会”这个概念。就我而言，现在结合传播学，把视觉放在政治传播的角度加以研究，就构成了视觉传播学。也就是说，我是在研究广义的视觉现象。早在1997年，我就提出了文图的关系问题，写了一篇文章《站在文图之间》，收进鲁萌主编的《1999独白》文丛当中。接着，我给《天涯》杂志撰写了《读图时代》，一下子使这个概念流行起来。其实，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是对这个概念提出一种批判性的判断。2001年我为《读书》杂志撰写了《镜头中的性别现实》，讨论观看当中的文化立场问题。当然，我主要谈的是摄影。之后，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对西方的视觉研究进行一些梳理。我为《读书》写的《性感的自然》，就是这一梳理的结果。前些年我为《文艺研究》撰写的《视觉的全球化与图像的去魅化：观察主体的建构及其历史性变化》，算是我对视觉研究的一个总体概括，包括“偶像与反偶像”的交替运动，图像与信仰的内部联

系，以及1839年以摄影发明为节点的人类视觉史的划分，都在这篇论文中得到了概括性的说明。其实，这篇文章是我一直在准备中的有关视觉理论研究的提纲，其中包括了我对视觉传播学的总体认识。

李怀宇：西方学界早就开始研究影像时代了？

杨小彦：二战之前有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在视觉研究领域的先知，二战以前就在讨论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问题。二战以后，西方在这方面的讨论持续深化。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景观主义的社会运动，这一运动和60年代法国的激进运动密切相关。福柯（Michel Foucault）则在《词与物》的开篇讨论到委拉斯贵兹（Diego Velazquez）的《自画像》，从中引申出对人类观看立场的认识。英国的文化批判学派也包含了对日常视觉现象的广泛研究，其背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依托，而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日益泛滥的视觉生产。美国视觉研究的重镇是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切尔（W. J. T. Mitchell）正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研究视觉理论的大家，当年他主编过一本视觉杂志，认为视觉的力量来自于一种恐惧感。另一个教授克拉里则从艺术与科学的角度，深入地讨论了观察主体的历史性变迁。他的第一本著作《观察的技术》已经有台湾译本，另外一本著作《知觉的悬置》，浙江大学的沈语冰教授正在翻译当中。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艺术学和美学这两个领域。我把以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为代表的贡布里希学派视为艺术学研究的主要代表。范景中教授从上世纪80年

代中期开始系统翻译瓦尔堡学派的贡布里希的著作，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彻底改变了以往艺术史研究方面的理论贫乏的状况，成为影响中国艺术理论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至于从美学角度对视觉现象进行研究的，则有南京大学的周宪教授，他所主编的翻译丛书，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视觉研究的眼界。近年来，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教授巫鸿研究中国中古时期艺术史的成果被引进了中国，从他的研究看，除了明显的考古学背景和人类学视野外，我觉得其中也包含了他对视觉理论的认识。比如在《重屏》中，他在研究中国绘画的物理性的时候，特别注意到观看者以及观看角度的存在。显然，这是他对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这样的一种倾向，在他的文集《时空中的美术》中也有相当重要的体现。对比起来，我的研究更着重于现象方面，目前则主要是对近三十年继而是六十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摄影的研究与写作。未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开设艺术传播这个方向。在我看来，20世纪的艺术，尤其是近三十年的艺术，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广义的传播现象，从传播学角度对这一现象予以研究，可能会得出令人兴奋的结论。

李怀宇：传播形式的改变对学界的思想冲击是怎样的？

杨小彦：美国有一个媒介环境论的代表人物波兹曼（Neil Postman），他写了两本书，在中国影响非常大，一本叫《娱乐至死》，一本叫《童年的消逝》，所讨论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冲击”。按照波兹曼的看法，阅读代表

思考，观看代表娱乐。当然，今天传播学界已经不再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了，因为阅读并不完全等同于思考，观看也并不就是完全的娱乐。波兹曼的观点和上世纪50年代的电视大普及有关。随着电视的普及，观看电视成为一个重要的获取信息的方式。但人们也看到，电视是以娱乐为主的一个传播平台，观看成为主要方式后，人们就不再读书。针对这一点，波兹曼说“娱乐至死”，他批判电视的盲目普及导致了一个不阅读不思考的时代的降临，一个没有思想、娱乐至死的时代的降临。至于“童年的消逝”，波兹曼认为“童年”有生理定义，也有文化定义。在印刷时代，所谓童年指的是不认字，因为印刷时代意味着：一、有一个书写阶层；二、有一个阅读阶层。书写和阅读构成了一个广泛的文化现象，并使信息得以交流，影响得以产生。在印刷时代，一个人要成为社会的主体，首先就要进入阅读层次，之后进入写作层次。只有你阅读了，你才会受到影响；同样，只有你写作了，你才有可能去影响社会。这里有一个认字的问题。波兹曼指出，是否认字成为区分“童年”和“成年”的一个标准，童年就是要去认字。而在观看时代，观看不存在着辨认的问题，认不认字都不重要。于是，从认字这个层面所定义的“童年”也就消逝了，因为观看代替了阅读，认字不再成为需要。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个相反的观点，它来自加拿大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麦克卢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位先知先觉者，他在60年代就提到了未来电子时代的发展，提出了“地球村”这个概念，并且对传播现象做

了一些有趣的预言。在他看来，随着信息的广泛流布，地球将会变成一个村落。“地球村”就是对信息时代大规模到来的一种预言。更重要的是，他预言了信息时代传媒的特征，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媒介即人，媒介即是人的延伸，媒介就是人本身。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在纸媒体时代，人们对媒介即人这一点感受并不太强烈，但当我们真的身处信息时代时，当媒介成为过于方便的一种工具，比如眼下的智能手机时，我们才会亲身体验到媒介即人的全部意思，才会体验到地球村的真正意义。今天，互联网真正把地球联结为一个整体，发生在地球另外一端的新闻，几乎同时就会传到我们这里。60年代麦克卢汉这样说的时候，是一种预见，当年在传播学界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

李怀宇：在中山大学新闻系任教的同时，你受聘在广州美术学院做客座教授，教一些什么呢？

杨小彦：我在广州美院做客座教授，带研究生，方向是艺术管理和艺术批评。从任何角度看，我大概都不是一个纯做学问的学者，我的研究有一部分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是面向现实的。就我个人来说，我有一个矛盾：我希望我在美院带的研究生主要做历史研究。我不太主张他们做纯理论研究，我个人对纯理论本身一直有强烈的怀疑，而宁愿他们做一些具有统计意义的量化研究。当然这只就艺术市场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尝试。我做了多年的艺术批评，我在艺术批评当中，提倡作品分析，提倡面对作品，联系与作品有关的背景以及相关文献，来做具体研究，而

不是抽象研究。我对学生的要求是：要了解美术史，阅读美术史的基本著作，还要懂作品。美术史是由具体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共同构成的，而不是由理论构成的，更不是由概念构成的。在我看来，即使是美术批评界，真正看懂画的人也不多。结果我们的很多美术批评，完全离开了作品，成为一种概念的游戏，一种生吞活剥的思维游戏。所以，我提倡作品分析，就是提倡面对作品和阅读作品，从作品出发来谈问题，而不是相反。

同时，我还提倡现场批评，提倡批评介入到艺术现场之中，面对事实说话。这一点可能与我从事新闻传播学的教学有某种关系。把艺术和传播学联系在一起，我知道有一个学科方向会很有意思，那就是艺术传播。也就是从传播的角度来看艺术现象，尤其是当代的艺术现象。今天的艺术已经不再完全是一个物理化的艺术、一个实体的艺术，而可能只是一个观念的特殊表达；艺术家也不再、至少不完全凭借个人的技艺来获取名声，相反，完全没有多少所谓技巧，却在表达上独有创意的艺术家已经越来越多。这说明今天的艺术已经和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不管在形态、表达和物理上都不一样。今天的艺术更多是一种传播现象，或者是借助传播技术进行表达的现象。表达甚于实体，观念超过技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又如何传统起来呢？除非我们对艺术现实视而不见，一概拒绝。这倒说明，今天的艺术是一种名声传播，其获得方式可以命名为“名声经济”，靠出名和出场获取回报。这就是艺术传播所要面对的事实。我对艺术传播有明确的定义：就是

研究艺术家如何通过传播而获得名声，然后又如何通过名声而获得利益的现实。今天，在我看来，我们几乎无法讨论艺术作品纯粹的好与不好。古典时期的作品也许不可以进行画品类的讨论，但今天讨论画品，恐怕无法进行下去。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某些可能被认为是胡乱去搞的艺术家，却获得了极大的名气。在这当中，传播起到了莫大的作用，艺术家正是通过各种媒介而获得名声的。所以，我相信，艺术和传播有着隐密和公开的联系。基于这一点，当代艺术，我以为应该叫作“名声”艺术；当代艺术市场，可以叫作“名声经济学”。也就是说，一个越是出名的艺术家，其获利的可能性就越大。这说明关键是出名，出名才是硬道理。今天人们已经没有耐心去研讨艺术作品到底好还是不好。而对于艺术家来说，重要的是获得名声，而不是创作出符合物理要求、有很好品质的艺术品。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消费的是艺术家的名声，而不是所谓的艺术品。

这样一来，我所倡导的两种批评，现场批评和作品分析，本身就有矛盾。现场批评讨论传播本身，我们可以得出某些结论吧。我想可以尝试一下。

李怀宇：现在的艺术主要是靠名声和炒作？

杨小彦：不能绝对这样说，但大部分情况是如此。在艺术界，出名才是硬道理，大家对此心照不宣，都在想方设法让自己如何更出名。也许我们可以在道德上谴责这一现象，但我觉得仅仅谴责没有什么用，那些搞炒作和运作出大名的人，他们也在不断地作类似的谴责，这说明这是

一个社会现象。我们从传统的角度应该谴责今天这个靠名声搞得闹哄哄的艺术市场，但谴责不等于研究。重要的是，我们还要研究它，其中的规律、可能的模式以及社会效应。传播学大概可以提供某种工具，让我们对此有完全不同于艺术学或美学的认识。

李怀宇：怎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杨小彦：炒作，资本市场的炒作，艺术炒作是资本发展运营的一部分内容。只要资本在运营，只要艺术市场存在，艺术就要被炒作。

李怀宇：炒作有什么特别的手法？炒作也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对象吗？

杨小彦：炒作当然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对象，因为炒作本身就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在今天这个传播时代，炒作肯定离不开媒体。媒体其实成就了很多，当然也毁掉了很多。我打个比方，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三个画家：徐悲鸿、齐白石和毕加索。但是，如此出名的三个艺术家，大家真的了解吗？艺术史界都知道，我们对徐悲鸿的研究就很初级。也就是说，人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三个艺术家，人们只是大概知道，徐悲鸿等于写实艺术，齐白石等于民族艺术，毕加索等于创新艺术。为什么会这样？毫无疑问，这是媒体炒出来的。媒体只要谈到写实，就一定举徐悲鸿，谈到民族风格，就必然是齐白石，而毕加索代表创新。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媒体长期以来对这三个人的报道，来看看媒体是如何加入制造名声的运动。今天的确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应该去研究媒体对于艺术的影响与作用。

我想启动这个研究方向，让学生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说起来，我的短处就是庞杂，有时跨越的领域太多，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对我来说，这种跨越获得一种长处，就是寻找一种中间的状态，在不同的学术之间寻找可能性，寻找学术的空档。

李怀宇：在中国，这种艺术的炒作和媒体的关系是不是由来已久？

杨小彦：应该是由来已久。自从媒体出现以后，关于艺术的炒作就同时开始了。

李怀宇：西方有没有什么典型的例子？

杨小彦：毕加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艺术市场流传这样一句名言：凡是毕加索手捏过的就是黄金。为什么他的手捏过就成为黄金？因为他是毕加索，他捏过以后，那就成为他的作品，就有收藏价值。毕加索终生都在制造名声，因为他知道名声的重要性，只要他出了名，他的画不管你理解不理解，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是值钱的。毕加索是不是每一张画都画得很好呢？如果从传统艺术的角度看，他也画了很多鬼画符式的东西。毕加索自己说得很清楚：再也没有比将军手上的指挥刀和画家手中的画笔更让世人感到害怕的了，但是人们却没有勇气把画家驱逐出他们的视野之外，因为他们需要附庸风雅。美国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是另一个有名的例子，他最重要的宗旨是：制造十五分钟的名声。结果他的名声延续到今天，以至于现在正在中国巡展的他的展览，所用的题目就是“永恒的十五分钟”。这充分说明

艺术借助于媒体的价值，说明当代艺术是一种名声经济学的产物。对此已经有人给出了清晰的判断，他就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正是布迪厄提出了象征交换这个概念，揭示了艺术交换背后的秘密。在布迪厄看来，我们不仅有经济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以其所拥有的财富为衡量单位；我们还有象征资本家，他们的象征就是他们的名声。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交换模式，就是象征性交换，名声可以交换金钱。布迪厄说：资本主义只有通过审美的纯粹性才能实现象征性交换。不过，如果对中国今天的艺术市场做一番研究的话，我们马上发现，布迪厄的说法在中国不太灵，在中国，艺术明确就是以交换为目的，并不需要审美这一层“纯粹价值”的皮来作掩饰。

李怀宇：张大千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杨小彦：严格来讲，中国很多出名的艺术家多多少少都涉及这方面，包括徐悲鸿在内。很少人会去研究其中的运作，人们很容易相信他们是大师，这就够了，就足以使他们的作品持续升值。所以我最不喜欢讨论所谓大师，有谁跟我说这个人是大师，我就一定会笑。徐悲鸿显然是大师，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对徐悲鸿的作品做过深入的分析？徐悲鸿的作品其实有很多问题存在，只是少有人去追问。比如，他创作的《愚公移山》，作品已经做成浮雕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堂墙壁上，说明了此画的重要性。一般人都相信这幅画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救亡的坚强信心，而且，“愚公移山”更因为用于“七大”闭幕词的题目而喻示了中国人的不屈性格。但是，事实果然如此吗？如果

真是如此，为什么徐悲鸿作品中的主角画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几个印度人？难道他不知道印度人无法转换为中国人吗？他们在体型和面相上就差别很大，又如何达成他的“创作目的”？就风格而言，我曾经说过徐悲鸿的作品有三个分裂：他的中国传统绘画的涵养和他的写实画之间的分裂，他的独特的书法手法和不免呆板的写实人物画法之间的分裂，以及素描与油画之间的分裂。这三个分裂当然不能说明徐悲鸿不重要，恰恰相反，徐悲鸿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确很重要。也正因为重要，上面所提到的三个分裂，就值得好好地分析一下，可惜这样做的人仍然很少。

你提到的张大千我认为大概也有这个问题。关键是，上边只是提到作品分析，还有另外的问题也值得研究，就是画家的交往能力方面。我想，如果深入到画家的交往上，研究一下他们的社会网络，以及他们是如何编织出这一张网络的，就会有很多发现。近百年来，几乎所有出名的画家，在人际交往上无不具有非凡的才能，无不建立起牢固的有利于他们名声的社会关系。我们同样很少去研究这一类问题。徐悲鸿如此，张大千如此，解放以后的许多画家，尤其是今天那些声名显赫的画家，难道不也是如此吗？

李怀宇：像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那样？

杨小彦：我想应该是的。这是一种社会学的方法，而不是艺术的方法。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从人际交往的角度去研究张大千，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张大千是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走，来获取他的最大利益。对此我不能说

得太绝对。今天，有很多爆得大名的艺术家，他们都有非同寻常的公关能力。用世俗的话来讲就是，他们的情商都很高，很会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今天大概再也没有哪一位艺术家会像梵高那样，在与人交往上如此失败。更何况梵高的故事本身可能会有些许传说色彩，人们热爱梵高的故事也许更甚于他的艺术。也许他的经历是真实的，充满了真实的苦难。今天，我们津津乐道于一个落难天才的遭遇，因为他的遭遇能够唤起我们的向往之情，如此而已。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充分地说明了所谓名声经济学的内涵。恰恰在这一点上，传播学界曾经有过研究的成果。有一位研究戏剧情节发展的学者高夫曼（Goffman），他提出一个框架理论，从戏剧情节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人际关系。在他看来，人生的确就是一场戏，每个人在这场戏里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某个角色。这个角色其实和个体的社会地位是有关系的。一个人一旦成为这样一个角色，他就同时获得了与这个角色相关的社会利益。而就观者来说，这个角色本身就具有真实性，让我们相信，这个人就是这个角色，或者反过来，这个角色就是这个人。真实性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产生的。把框架理论运用到新闻写作上，我们就发现了关于新闻真实也存在着一个框架，只要符合这个框架，真实性就会成为事实。新闻从根本上来是一种内容生产，通俗一点说就是，新闻向大众提供生动的故事，只不过这个故事有时效性。如何使这个故事更丰富、更生动、更吸引人？框架理论就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回到艺术家的知名度这个问题上，透过框架理论，我们

也就发现，一个艺术家的成名必须具备某些特点，必须有某种运作，必须符合大众的名声的期待，而且，传播还在放大这一期待。我们很少关心隐藏在艺术家背后的社会关系，更无法真正了解为了达成这些社会关系艺术家所花费的功夫。这一点在新闻当中也得到了有趣的印证。任何新闻都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隐蔽的脚本，另一个是公开的文本。我们阅读公开的文本，获得了关于真实的意义，而在这阅读当中，隐蔽的脚本就悄然进入阅读者的视野，影响他们对事实的认识。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公开的文本去寻找背后的隐蔽的脚本，来确定新闻真实后面的倾向性。艺术家也一样，他嘴巴公开说的和他隐藏着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艺术家通过运作获得了名声，然后在公开的宣示中，他总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已的名声解释为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把运作掩盖起来。艺术家不会告诉你他的社交能力，他在你面前展示的只是他愿意展示的部分，而不愿意展示的部分，则隐藏在名声的阴影中，暗暗发挥着精妙的作用。

李怀宇：看来你的研究综合了不同学科的一些理论，你自己有没有思考出一套自己的体系？

杨小彦：体系说不上，但我的研究的确是综合了一些学科的叙述。同时，事实上我的确也有自己研究的主要内容。我一直在研究广义的革命艺术，以及隐藏在这一革命艺术背后的社会动员方式。而这一社会动员方式又根植于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之中，其中包括对新中国美术与摄影的分析。当然，我的研究是倾向于个案化的。也就是说，

我需要寻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个案，来说明我的研究。比如我研究著名画家杨之光，在他漫长的绘画实践中，他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实例：他从1959年画第一张《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直到1974年，前后画了六稿，四个正稿，两个半正稿。新中国的水墨写实人物画家当中，目前还没有哪一位画家就一个题材画了这么多年，画了这么多不同的版本。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杨之光就同一题材要画这么多不同的版本？从1959到1974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他就在这一变化当中，以一个主题为题材，创作出前后略为不同的六个版本，这究竟说明了什么？这个案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说明一个向往革命的画家，是如何应对变化的政治的，而这个政治又是画家所无法控制甚至无法预测的。我就这个问题写了《水墨革命与革命水墨》论文，讨论了这样一个涉及画家与革命的关系的具体实践问题，其中包括绘画中的叙事策略的改变。在我看来，目前还很少有人认真地讨论过绘画中的叙事策略问题。而我对杨之光的研究，其实涉及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写实主义在中国的状况。写实主义是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美术史的核心主题，是中西艺术冲突与交融的最大结果。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写实主义，是一个中国艺术的概念，而不是西方艺术的概念。写实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艺术界被纳入整体的社会动员之后，对西方艺术的一种风格的自觉反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谈这个问题，也一直在研究个案，除了杨之光以外，还有黎雄才研究、王肇民研究和李宗津研究，以

及六十年来中国摄影发展的研究。

艺术被纳入到社会动员的范畴，说明政治家需要用艺术来做群众动员。在这样一种政治的诉求中，他们一定要求艺术是通俗的、写实的和易懂的，他们一定要排斥那种精英化的、过分高雅的、缺乏群众性的当代艺术。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现代性就是群众性，就是大众化，就是写实主义。我在这里不涉及好与坏的判断，我说的是事实判断。作为写实主义的概念，它有很多具体的内容。我在讨论杨之光的时候，所谈到的绘画中的叙事策略及其应用，和这个写实主义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我讨论了在杨之光的人物主题化的创作中，他所运用的叙事策略中，如何呈现时代所要求的特定的政治动员的内容。

我曾经做过一个比较宏观的研究，把社会动员的不同阶段和艺术形式发展的不同阶段——做某种历史性的对应。这些阶段分别是：舆论动员、社会动员与政党动员，分别对应于艺术革命、革命艺术与党派艺术。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一百年来艺术发展的阶段分期的基本状况，从最早的艺术革命，到后来的革命艺术，再到后来的党派艺术。今天，则是对前两个阶段的回归。具体来说，艺术革命的阶段对应于舆论动员的阶段，具有某种百家争鸣的特征。革命艺术这一阶段则可以对应于社会动员阶段。最后是党派艺术的阶段对应于政党动员阶段，艺术在获得“崇高地位”的同时，具体的艺术个体却遭受愈演愈烈的批判。同时，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代表性的人物。如果社会发展到后一个阶段，而前一阶段的代表性人物不能及时转

型的话，那么，他在下一个阶段中的处境与地位就会出现某种危机，弄不好还会被“打倒”。

李怀宇：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背后有着更为广阔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杨小彦：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我还会把研究落实到图像分类的分析上。比如，我一直在研究视觉的仇恨概念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视觉怎么样和仇恨挂上了钩并发挥了巨大的情感力量。对新中国六十年的摄影发展的研究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不过，摄影和艺术的发展有所不同。我发现，新中国六十年的摄影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从1949到1976年为第一个阶段，从1976年到今天则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在前一阶段中，没有摄影家，只有摄影。或者说摄影大过摄影家，摄影家是群体被掩藏起来的工具，而让摄影这种具有整体风格的图像宣传，构成这一阶段的摄影主流。1976年以后则相反，是一个逐步出现摄影家的阶段，是个人观看开始成为事实的阶段。而在这一分类背后，是我对观看控制和视觉秩序的整体观察。如果我的研究是有道理的话，那么，我们就恰好看到一个相反的发展，在第一个阶段，依靠逐步建立的视觉秩序，观看控制得以完全实现，整体观看成为一种牢固的制度，左右了我们的观看。而到了后一个阶段，情形则相反，原有的视觉秩序开始崩溃，摄影家及其所选择的个人观看日益成为摄影的主流。这说明在一个大时代里面，当观看被彻底控制的时候，个人观看是没有意义的，人们所表达的只是一种集体观点，摄影家所做的也

只是去完善已经高度一统的视觉制度。然而，1976年改变了中国，在历史的曲折进程中，某种视觉制度在逐渐瓦解，摄影家从原来高度一统化的观看控制中逐步脱身出来，并尝试建立个人观看的可能性，并通过个人观看来表达一种属于个人的社会立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摄影家开始超越摄影而成为摄影史的主体，中国摄影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李怀宇：这个历史阶段意味着个人的地位开始慢慢凸显？

杨小彦：对，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新中国的摄影发展做一个宏观的观察。也就是说，讨论1976年以前的摄影家的个人风格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能讨论为什么这个时期会是一个没有摄影家的年代。这里就凸显了我的两个关键词：观看控制和视觉秩序。我们的眼睛究竟是如何去观看的，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视觉秩序里？在这样一个阶段，哪怕相机在你手上，你也只能看可以看的对象与景观，而不会去看不允许看的对象。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在这个案例里，如果观看拥有某种个性的时候，究竟会遭遇到怎样的一种待遇。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这部纪录片在当年为什么会受到疯狂的批判。事实上，安东尼奥尼的观看和当时我们的视觉秩序是有激烈冲突的。今天我们当然知道，安东尼奥尼并不反华，他对中国人民仍然抱有友好和同情的态度，同时也包含了冲破严密封锁进入中国进行窥探的个人企图。另外一个例子是法

国著名摄影家马克·吕布（Marc Riboud）。我最早介绍马克·吕布给中国读者，他在50至70年代来中国所拍的照片，让我们今天感受到某种震动。在那个年代，全中国没有一个人会像他那样去拍照。严格来说，马克·吕布的中国照片在那个年代是不允许公开出现的，其中的构成方式和镜头感是严重违反既定的视觉秩序的。幸好马克·吕布没有受到中国的批判，仍然顺利地进来拍照，一直拍到21世纪。90年代当我第一次看到马克·吕布的中国照片时，我的惊讶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通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居然“找到”了中国五六十年代的视觉现实。于是我们会问，为什么是老外而不是我们？原因很清楚，我们的观看已经被控制，我们只能这样而不是那样去面对现实，我们的观看在大规模地对眼前景观做有意识的排斥，而无法通过我们的眼睛去寻找那个现实。所以，90年代以后马克·吕布对中国摄影的影响非常大。这就是我研究摄影的基点，对我来说，我不愿意做“二道贩子”去介绍外国的理论，我坚持做中国研究，坚持面对我们的现实。

李怀宇：如何坚持中国研究？

杨小彦：坚持研究中国现实，不搞洋人哲学。在我看来，中国的现实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作为中国学者，我觉得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我们的现实，这才是最重要的。



曹锦清

对社会复杂性心存高度的敬畏

曹锦清

1949年生，浙江兰溪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19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学院，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著有《平等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中国七问》（合著）、《黄河边的中国》、《如何研究中国》等。

曹锦清先生以研究农村闻名，言谈中自然流露出中国传统农民纯朴的气息。晚饭后，在曹锦清位于上海近郊的家里畅谈。他感慨：“我越来越变成老庄之徒，越来越接近佛教徒的味道。对介入什么争论，我一点都没有兴趣。我对社会生活总的来讲是无知，至少感受到复杂性，下一些局部的判断我是敢的，下全局的判断我不敢。”

作为华东理工大学的教授，曹锦清讲课之精彩让学生念念不忘，私下聊天口才也甚好。但曹锦清对自己的定位看得很明白：“现代知识分子要对社会复杂性心存高度的敬畏，在中国下全面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专家越来越多，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现在社会生活太复杂了，公共知识分子要对大的公共事件进行判断，要把公共事件的来龙去脉写清楚，需要很多专业知识，不同的公共事件需要不同的专业知识，一般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可能具备这么多的专业知识。现代的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少，要不就是在网上瞎说。比如要讲一个金融现象，我们怎么敢讲？对一个高铁事件发发牢骚可以，很多专业的来龙去脉都不清楚，要发议论怎么敢？”

曹锦清认为学界的变化主要源于社会生活复杂性的增加，一个人不可能对复杂性进行全面的判断，所以学科

的分化是必然的。经济发展以后，分工越来越精细，经济分工和学术分工是走同一条道路的。如果整个社会生活相对简单，一般知识分子可以对整体、对历史做大而化之的判断，但是现在非常精细，知识分子要对整体做判断非常困难。就他所见，现在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专业化了。“一部分分离出去变成了理工科，属于专家，除了专业领域，对社会生活不发生影响。而人文知识分子大部分也专业化了，细分成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里面还分金融、外贸。在某一个领域里面，他可能会写点文章，发表点意见。要是每个领域里都发表意见，平心而论，知识储备根本就不够。要不就变成意识形态的东西：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就套入那个套路里面去讲，对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并不是很关注，而对事件的价值判断非常敏感。因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的差异很大，另外变数很快，研究中国所有的变化大概跟国际都接轨的，国际上任何重大的变化都会传导到中国来，要研究一国的事情就要研究全球的事情。比如像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表面上说来道理还很简单：用得多了，产出少了，借得多了，借到一定程度借不下去了，就是主权债务危机，就要开始紧缩。这都是表面的。所以，欧洲有那么多聪明人都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就算想出来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也不一致，也很难进行处理。一般来讲，要对不断的公共事件写文章的话，基本上就是做出情绪判断，而做出科学性的判断非常困难。”

曹锦清的研究与中国社会密切相关。《当代浙北乡村的

社会文化变迁》一书是他与同事花了四年时间，在浙北的一个乡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在当年引起学术界的热烈反响，成为观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翔实资料。近年曹锦清则致力于梳理中国近代史，但是发现这种梳理很难。“现在东西方变动太快，目前我们都无法定下来。东西方关系的判断是梳理古今判断的先决条件。这个判断不稳定的话，中国人对自己的近代叙事就不能稳定下来，对未来的预计也会动荡。所以，国内思潮的混乱都跟这有关系，东西判断不清，古今叙事不明，大判断不明，很多微观研究无法进行。”曹锦清现在发表欲很弱，他一直对复杂性有一种敬畏，自认在复杂性面前没有什么高论可以跟读者去分享，而对喧嚣的声音也不屑一顾。他笑道：“可能跟年龄增长也有关系，年岁上去以后，心比较平和。对于文字能不能够影响别人，我越来越怀疑了，看来很难。通过文字去认识中国，去改造中国，那是五四那一代学人的抱负，至少我是彻底没有了。文字是连周边的人都改变不了。”

曹锦清现在的生活有点像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而他十四岁开始就记日记，除了动乱时代断过几年，他到现在有三十几本的日记。“很多人劝我拿出来出版，我说，到我死了以后再说吧。”

对前路，曹锦清觉得不必悲观，也不必乐观。“与其悲观，还不如乐观点好，整天愁眉苦脸，忧心忡忡，做出乌鸦般的预言，没有必要。总的来讲，对于一个民族的未

来，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比较好。”

李怀宇：就你的生活经历来讲，小时候对农村生活还是很熟悉？

曹锦清：五到十岁的时候，我在外婆家，是农村；十岁以后到读高中，基本上每年或者隔一年我就会到农村去，那时候还是公社时期。我对农村、农民、土地、山山水水、田野还是保有一种亲切感。所以，我十岁以后到上海来，对高楼、马路、陌生人挤来挤去，反而不是很适应。这种亲切感好像长期保留着，所以对稍大一点的城市就有一种陌生感。如果要找一个研究对象，一般来讲，县城就不行。要研究，乡镇还可以，自然村这一级还可以，那里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如果像上海这样一个几千万人的大都市，几千万人怎么生活，怎么组织起来？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想什么，从事什么职业。城市就有一种巨大的陌生的流动的感觉，要从理性的层面驾驭它，就觉得力不从心。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提出“社区研究”，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一个社区。他对社区的界定是比较自由的，比如自然村级的社区，再大一点，乡级的自由社区，县也是一个社区，最大的社区是都市。都市作为一个社区，怎么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根本不可能。用他的方法研究社区，大概是自然村的范畴。原来他的姐姐那个江村——开弦弓村，最多也就几百户人家，后来云南三村，户数也不是很多的。这样可以直接参与研究，况且这个村的土地、人口、劳动力、家庭结构、收入来源、怎么

消费、各种阶级关系，这里面可能引出一些结论。他从来没有把县作为一个社区来研究。

李怀宇：你小时候生活的那个村有多大？

曹锦清：二三十户人家吧，所以都互相很熟悉的。我们那个村算是一个生产小队吧，浙江龙游一个丘陵山洼里面的一个小村。那里的村落的规模都不是很大。因为从小在那里长大，到上海来了以后，就不是很适应，要讲上海话，融入到上海的社区里面也是有点困难。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阻碍，上海人会欺负乡下人。

李怀宇：你后来能讲上海话吗？

曹锦清：上海话能讲。但我对什么是上海人，感觉比别人敏锐一些。对农村有一种亲和感，研究的时候还是以农村为基础，到农村去好像觉得自己可以理解透彻这样一个村落、一个乡镇，那里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城市到处是秘密，满街陌生的人来来往往，你知道他们想什么吗？但是在农村，信息相对来讲是比较公开的，你只要有一种亲和力，老百姓信任你，一般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乡村研究跟城市研究不是一回事，城市研究更多地依赖于各种统计。所以城市对于研究者来讲，它的巨大、流动和陌生，要从理性上、概念上去把握是很困难的，会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李怀宇：“文革”十年，读书有没有间断？

曹锦清：“文革”十年，我本人是没有间断的。我们是1968年12月上山下乡，我被安排到崇明农场，当时叫东方红农村，现在改名为长江农场。一个班的人，一部分搬

到那里去。我那时已经读到高二了，读书的习惯基本养成了。在农场里，下雨天就不干活了，所以闲暇时间还是不少的。我在农村待了四年，基本上都在读书。后来我做了连队副指导员，在场部的时间可能多一点。在农村，一下雨就不劳动了，就待在家里，没事就打牌，有些人爱学习，还组织了学习小组。

李怀宇：那时候能读什么书？

曹锦清：当时估计到农村去最多两年，我们还相信上山下乡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认为是短期的锻炼，将来总是会起用的，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当时也读了一些书，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积累知识总是有用的。当时也安慰自己：有才能有知识，国家不用是国家的错，没有才能是我自己的错。所以，当时在这种心理之下，在那里还是继续读书，至于读什么书，是有所变动的。因为当时看来看去也没什么出路，想搞一些文学创作，写点古诗、小说之类的东西。那时候就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先把中国文学史看了，然后把里面重要的人的重要著作，能够收集到的，也拿来读了，从《离骚》开始，读得比较多的就是唐诗宋词，还有小说。也把俄罗斯文学史看了，然后把里面重要的人都记录下来，能够拿到的重要著作也看下来，从普希金看到肖洛霍夫。

后来有两个原因，我没有走上小说创作之路。一来我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不行，缺乏形象思维，写出来的小说干巴巴的，不好。另外，隔壁农场有一个人，写了一部反映农场的小说，寄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据说反映了太多的

农场生活阴暗面，他被打成反革命。这个消息传来之后，我们原来的读书小组就散了，大家都有点怕。我对文学的兴趣渐渐淡了，转向了读历史。读的第一部就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所以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倒很冷静。因为我把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理解为大唐时期的武则天和几个酷吏来俊臣、周兴之间的关系，武则天是利用这两个酷吏来收拾那些不服从她的李氏集团，收拾得差不多之后，她要平息怨愤，要平反冤假错案，用那些打服了的老家伙来清算周兴和来俊臣，“请君入瓮”就是讲这个故事。我当时就觉得历史很有用，历史还活着，历史不会消失。这就成为我研究当代社会的主导想法，因为近代以来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历史进程不断地被切断。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切断了，推翻了帝制，实行共和制；1949年也切断了，认为是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阶段；到了“文化大革命”也切断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也被切断了。总而言之，近代一百多年被切断了好几次，而且都是自觉地要切断。在“文革”当中，我觉得历史在延续，历史当中的很多内容可能就改换了名称，甚至是制度包装，但是实际内容一直在延续。

1972年，上调我去做中学老师。我们这一届培训了一年半，当时我就觉得要读历史系，所以我就进入华东师大历史系。1972到1974年，我大量地阅读历史书，我的历史知识基本上是在这一年半储备起来的。一年半差不多都没回家，把中国的五六种通史断代史都看了，如《史记》、

《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但是《汉书》、《后汉书》比较深，当时有没有读懂很难讲，算是翻过了。同时也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哲学，马恩的二十几卷通信我都看了，后来就教书。所以，我基本没有中断读书，凡是有助于理解社会的书我都找来看，杂七杂八的书看了不少。

李怀宇：原来的兴趣是文学，后来是史学。

曹锦清：读历史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当时问了一些老师，老师也解答不出来。历史本身是永久地消失了，我们谈的历史是当事人和后人的追忆，就是保留在典籍里面的，这是历史本身和历史史料之间的关系。后人通过史料来复原当时的史实，这里就牵涉到哲学的问题。我认为史学本身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当时以为哲学可以解决这类问题，所以考上复旦大学以后，我就转到了哲学系。

李怀宇：原来读历史是在哪个学校？

曹锦清：华东师大，读了一年半，1972年9月到1974年，结束后就分到蓬莱中学做历史老师。那一段时间是我读书最用功的时期。在蓬莱中学教了两年书，到1976年有机会到西藏去援藏教学，在西藏拉萨待了两年。1977年恢复高考，我还在西藏，1978年我就赶回来参加高考，这一次就考复旦哲学系。读哲学另外一个原因，我不仅对社会问题感兴趣，也对自己的人生问题感兴趣。这跟梁漱溟有点接近，因为他早期也对人生问题发问，后来就对社会问题感兴趣。

我的情况也是这样，首先思考的是人生问题，“文

化大革命”来了就考虑社会问题，从社会问题就切入到想从历史里面寻找答案，又从历史返回到哲学。到了后来很晚才知道，人生问题是一切哲学问题里面最具哲学意义的问题。当我写完了《现代西方人生哲学》这本书之后，才看到普列汉诺夫的美学著作中谈到，一切形而上学的问题当中最形而上的问题就是意义问题。当时看了，我就想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他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虽然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引出社会学的解释，这也引导我转向社会学领域。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我十几岁的时候一直认为是有答案的，当时我还决心要在二十五岁以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意义问题解决了，把人活着干吗、怎么活着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可以直接地去生活了。后来才知道实际上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看到有些人谈意义问题、人生问题，就觉得好笑。

李怀宇：读哲学系没有办法解决你的人生问题？

曹锦清：因为哲学里有N种回答，有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有一种认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佛家整个认为人生就是无意义的。有意义的也有各种回答，吃喝比较有意义，还是为人民服务比较有意义，还是光宗耀祖比较有意义，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答案。哪个是绝对的真理？谁能够判断？

李怀宇：所以就从哲学转到社会学？

曹锦清：当时我本科就在复旦毕业，但是后来都要回流，就到华东师大读助教进修班，读硕士的课程。

李怀宇：那时候已经开始对社会学感兴趣了吗？

曹锦清：1985年、1986年我已经基本上转向广义的社会学领域了，就看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一些著作，主要是理解当时已经变化了的中国社会，尤其1982年公社体制解体，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以后，整个农村社会就开始变动起来了。到80年代中，城市改革开始提上议程，城市也开始变动起来。成立了文化研究所，当时还是讨论文化问题，但整个研究要转向国情，转向实证，转向历史，就等于倾向于社会学研究。《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刚写完，就转向社会学研究。所以，社会学我也是半路出家，我的本行应该是史学和哲学，哲学我相对比较熟悉一点，自以为对哲学好像有点悟性吧。

李怀宇：后来怎么做起“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个课题？

曹锦清：1988年末，我们文化研究所十几个人，分成四个小组：一个组搞农村研究；一个组搞小城镇研究，当时费孝通在提“小城镇，大问题”；一个组搞国企研究，当时国企改革；第四个组打算搞比较现代化研究，通过各国的比较来加以研究。当时真正付诸实施的就是我们这个组，我和张乐天跑到他老家浙北海宁去做调研，原来估计是一年，后来实际上搞了四年。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有的人就下海了。这个所，跑的跑，散的散，我们还是继续在搞。有些人出国了，我们觉得出国了也没有什么意思，年龄也不小了，跑到美国去干吗；搞美元的话我也没有这么大的兴趣，到美国去求知的话，

我关注的是中国的问题，美国的教授也不可能给我什么教导。1992年，他们原来有一个组搞国企研究的，搞了一半没有做下去，我就接过来搞了，但发现国企用实证研究非常困难，到农村可以做调研，企业里面几乎无法调研。第一，接受采访度很低；第二，企业里面的情况很复杂，企业里面各种核算等等也不会对你开放，企业里面的厂长经理也不会把你当回事。总而言之，在企业里做调研成本太高，所以后来就转为半理论的研究，写了一本《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也花了几年时间。到了1995、1996年，打算到中部去搞研究，后来就有《黄河边的中国》这本书。之后我打算到西部去搞研究，当时我想把县作为一个社区，县是非常古老的，而且有的县是一个语言区、经济区，又是政治区、文化区等等，比较完备。而县以下的乡镇，乡镇以下的村是不独立的。这样就要求这个县的信息直接对我开放，各乡镇对我开放，各村对我开放，各农户对我开放，一年为期。我写好了材料交给他们审，他们不同意的就不发，同意的就发。花了半个月的时问，想进这样一个县，通过很多努力，都说你调研的话，来啊，欢迎啊，就是一个礼拜，最多十天。这已经是90年代晚期，那个时候正是农民计划生育搞得鸡飞狗跳的时候，又是中西部这种地方，充满着不能够对社会开放的信息。

李怀宇：《黄河边的中国》的写法很多都是用日记，为什么用这样的形式？

曹锦清：出版这本书我也是犹豫不决的，原来书前

还有十个报告，按计划生育、农民负担等十个主题，每个主题我大概写了三四千字，放在前面作为总括的；后面想附一章，叫“历史与理论”，最终加以概括。后来写了半年都觉得力不从心：把现在的农村放到百年进程中来概括一点东西，觉得非常苦。后来朋友建议，用不着替读者想那么周到，你就把事实呈现出来就可以了。因为中部农村的事实，在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基本上被媒体、学术界遮蔽了。当时沿海城市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只看到美国、与国际接轨的东西，认为农村问题基本解决了，分田到户以后，情况比较好。被媒体、学术界遮蔽的事实，呈现出来本身是有意义的，引起公众对这一领域的注意。我的意思是，与国际接轨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与中西部脱轨。快速与西方接轨的同时，与国内整个中西部脱轨，这样改革开放是会翻车的。通过这样一种直观的、扫描式的东西，基本上把它反映出来了。让这些被研究者直接出场，让他们自己来陈述，我只不过提供一个平台而已，或者在具体里面就可以呈现一般。有的农户家庭的经济我都反复呈现，包括农民负担都反复出现，通过家庭的会计反复出现。当时编辑部是不接受的，说我重复太多，我说为什么要重复，这种研究方法有一个自然的缺陷，不可能按原来统计的方法来。我要反映整个中部的一般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的话，要通过东西南北中的不同的个案，而反映出一般的情况，反映出农民负担情况是怎么样。用这个方法是反复考虑过的，这样来表达更好一些。稿子到了出版社去校对，初稿出来以后，印了十本，是大字本，是到上海党

委的印红头文件的印刷所，所以校对就特别认真，一校，二校，三校，四校。我的字写得比较潦草，最后一校叫我去看了，我看了看，字不多，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就完了。好了之后交给他们，几个校对就站起来了，我很奇怪，其中一个就跟我讲：真的谢谢你。我说：谢我什么？他说：我们这里都是印红头文件的，红头文件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中国，你告诉我们的是那样一个中国，那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当时我很感动地说：有你这一句话，我就有胆量把它出版。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要比用学术语言概括更好一些。

通过这个研究，可以知道社会情绪是作为一个社会事实而存在的，看到的当然是社会事实，听到的，感受到的，他们表达的那种社会情绪，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某种社会情绪，也是事实。书是可以这样写的，书出版以后也被更多的人认可。但是习惯上社会学著作一般不这样表述，比较接近于《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这本书。当然这本书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它没有一个理论的框架。西方近代的著作习惯，一般来讲有演绎性质，材料组织起一个框架，然后解释，最后得出某种结论来。我还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对如此复杂的社会加以概括，现在越来越做不到。跑的地方越多，越不敢对中国做概括性的判断。

李怀宇：到下面去调研，你的生活都习惯吗？

曹锦清：我本来是农村出来的，再说原来在上海条件也一般，不是特别富贵的人家，只是一般的工人家庭；又到农场里待过几年，在西藏也待过两年，什么样的环境不

能适应呢？当然现在年纪大了，上海这些年的条件好了，每天要洗澡，不洗澡就受不了，如果晚上睡不好的话，就不大行。四十岁以前都没有问题，都很习惯。

李怀宇：中国的农村生活在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这三十几年变化非常快？

曹锦清：首先，1982、1983年分田到户，农民就获得了支配土地、劳动力和一定农产品的自由，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二，从1972、1973年开始，从日本引进了大量的生产化肥的设备，还有直接进口的化肥，所以从1974、1975年以后化肥投入量持续增加，一直到1984、1985年。化肥投入量跟粮食产量是同步增加的。另外，前三十年农田水利建设基本完成，灌溉面积增加了，种子改良，加上1978、1979这几年，国家第一次对农民大规模让步，提高了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翻了一倍多。这几个要素加起来，我们就看到1992至1995年，粮食产量还有其他的农副产品有较大规模的提升，1976年的粮食产量大概是五千九百亿斤，到了1984年已经上了一个大台阶了，就有八千亿斤了。这样，中国人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摆脱了一百多年以来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粮食供给问题，饥荒问题、饥饿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李怀宇：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科研，是不是对中国农村改变很大？

曹锦清：是。改良种子是解放以后一直在做的事情，上海原来有很多好的品种，像老来青，有N种，各个地方、各省都来搞。一直到了袁隆平，有了重大的突破，和

野生稻的杂交。但是，并不是袁隆平一个人，而是袁隆平们，像这样的研究机构非常之多，像小麦、玉米还有其他杂粮都在改良粮种。所以90年代粮食产量的提高，粮种起主要作用。所以袁隆平的功劳是不可没的，这三十年如果有最大的功劳的话，第一就是袁隆平。地上是袁隆平，天上就是航天事业。

李怀宇：现在农业技术的发展非常快，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曹锦清：世界各地良种的引进，包括原来我们吃的葡萄都是酸酸的葡萄，现在从日本引进了巨峰葡萄，这是全球化的好处。至于化肥用得太多了，物极必反。农药应该是属于污染了，还有除草剂。农药施了以后，一下雨，大部分肥料和农药都通过沟渠冲到湖泊里，整个江流湖泊的富营养化，农药起主要作用。第二是城市洗衣服的肥皂粉，冲下去了，也要经过江流湖泊，里面也是富营养的。这样就引起了所谓蓝藻现象，都是和湖泊的富营养化有关的。

李怀宇：我们小时候，乡下都是山清水秀的，现在水都是臭的。

曹锦清：以前山区里面就是穷，依靠原始的生产力，那种农业是可循环的。传统的农业是无垃圾农业，没有一种被称为垃圾而扔掉的。南方每个家里面都养一头猪，吃剩的东西都由猪吃了，还有菜皮剥下来都是猪吃了。所以，一般猪的生产周期很长，要十个月。而动物粪便是循环使用的。中国传统农业是一种循环农业。第二，传统农

业是种植业、手工业和饲养业三业合一的，就保证了劳动力一年当中的合理使用。现在，虽然农户的种植面积非常狭小，我们俗称一亩三分地，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是现代化了，依靠的是除草剂、化肥、农药，这样农村的粪便不再还田了，它成为垃圾了。现在农村大量的养猪场，也成了污染源。过去整个上海的粪便都是化成近郊的肥料，现在农村产生出来的废物变成垃圾了。另外，农村人学会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城市的大量消费品进入到农村，它的包装品、塑料袋等等，也变成垃圾。这样规模狭小的农业，化肥、除草剂一用以后，这个土壤怎么可持续使用？单位面积要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必须利用化肥、农药乃至将来的转基因。从田头到仓中，食品加工业有大量的添加剂。所以，现代农业就内含着不安全，因为都有化学物品，而化学物品是人类创造的物品，它不是自然的物品，当然不安全。真的要实现有机农业，就是我们的产量也恢复到解放前，但粮食一少城市震动、恐慌，是个政治问题啊。到了2004年，中央给农民让步，农民负担开始减轻，种粮开始给补贴。

李怀宇：《潜规则》的作者吴思先生说，2004年是中国农村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曹锦清：是。从农民负担的角度来讲，我们征收了几千年皇粮国税，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农业税降低一个百分点，五年内取消完毕。结果到2006年就取消完毕了。原来八亿农民要向地方政府交大概一千五百亿左右，就不用交了。中国2002年加入WTO，2002到2004年那几年

中国的GDP和财政上去了，那一千五百亿不要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自古以来国家、官僚、军队，是建立在农业税赋之上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也是建立在更沉重的农业税赋之上。2004到2006年，这个过程就完了，应该说2004年是标志年份。

李怀宇：农业税的取消有什么重要的背景？

曹锦清：整个税收高度依赖于工商业，工商业能够交的税越来越多了，不要农业税来养了。一般的国家，第一个发展阶段是由农业来养工业，以乡村帮助城市的。到第二阶段，是工业可以反哺农业了，城市可以引领乡村了。所以2004到2006年是一个转折点，当然和加入WTO是有关系的。当然可以再往前追溯到1997、1998年，当时朱镕基提出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耕还草，因为1995、1996年粮食丰收，又进口了大量粮食，国家兜里有粮食了，所以不怕了。

李怀宇：你到各地去走，发现农村不安的因素潜伏严重吗？

曹锦清：有点被夸大了，只要说为了国家，中国农民非常通情达理。比如过去为了修公路征用土地，征用就征用了，没补偿的。实际上，现在整个价值观念变化了，过去从国家利益来考虑，现在以个人为本位来思考问题。按照个人来计算利弊得失，要补偿。

总体来讲，生活水平在上升和提高，尤其近十几年提高比较快一些。只要回顾这十年生活，大部分人对目前的处境是满意的。如果把他和别人比，就开始发牢骚了，

牢骚发了以后，回去还睡得着觉的。如果睡觉的时候也愤怒，那就证明事情来了。农村的情况是：第一，自由了。第二，富裕了。然而，有的老人会怀念过去：第一，没有偷盗，社会道德比较好，安全感好。第二，官吏比较廉洁，不腐败。第三，贫富对立没有那么厉害。现在左翼感兴趣的也是这三个问题的解决。

李怀宇：你觉得自己一直都在研究中国？

曹锦清：我想观察和思考中国。我还以此为乐，我也没有其他的乐趣，它是我的生活乐趣。我走走看看，阅读、思考，有点感想就写一点，谁要听就听，不听拉倒。

李怀宇：费孝通先生的一些著作和治学方法对你有启发或者影响吗？

曹锦清：我在1988年以前是不是读过他的书，记不得了。如果读过的话，印象也不是很深刻，因为当时我看了其他一些人类学、社会学著作，我想理解中国的农村。怎么去理解，都需要带着一点框架，因为我本来有历史的偏好，正好是那些历史资料保留比较完备，《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是写从1949年起的各项制度的变动过程。我本来偏好把一个当下的事件、现象放在历史过程里加以理解。而且，那些人还活着，我们可以通过访谈来复原当时的一些历史场景，所以我们的叙事分章立节，每一个现象我们都有历史的梳理过程。我接触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等等，是比较晚了。

1988年，我好像已经自觉地告别了这些城市知识分子的喧嚣。所以，我们提出：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

证，试图回答中国是什么。1988年以后，我发现这些争论的调门越拉越高，意识形态的色彩越来越浓，他们老讲中国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这种讨论毫无意义，因为首先要回答中国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所以我从来不参加什么左右之争。

李怀宇：左右之争有意义吗？

曹锦清：没有意义。但是研究左右之争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毕竟反映了各种思潮，值得研究。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思潮，这个时候为什么用这样的语言来加以表达？大概多少人会信奉这个东西，原因何在？这本身是社会研究的对象。如果自己介入这种争论里面，我觉得毫无意义。反正所有的主义，我觉得都片面。

李怀宇：梁漱溟先生晚年口述的一本书叫《这个世界会好吗》，你觉得这个世界会好吗？

曹锦清：这个世界不会好，不会坏。如果人性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会好的。人性既不能改好，也不能改坏，就是这个样子。既有善，又有恶，有时想作恶，有时又想行善。恶多了难受，要行善了。善多了，也难受，就想作恶了。所以，很难把恶除尽而变成神圣，不可能。如果从物质生活来讲，可能会比过去丰富。

李怀宇：精神生活呢？

曹锦清：精神未必。更极端的是原来章太炎讲的俱分进化，就是好也更好，坏也更坏，都是两面走的。如果人类的能力增强了，那么作恶的能力也强，行善能力也强。所以，现在讲要提高幸福指数，我说胡扯。因为幸福是特

别主观的感受，如果说是人均GDP、人类发展指数，用生命，用消费，这些客观指标都达成了，就幸福了吗？不是。幸福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你对自己的欲望是有控制的。第二，周边所有的关系你能够处理好。没有这两个条件怎么叫幸福呢？人类对痛苦有持久的感觉，对幸福没有的，身在福中绝对不知福的。身在苦中，他永远知苦。人类对苦、乐的感觉不一样，对苦的感觉强烈而持续，对乐的感觉短促而易忘。所以，这样的人性，要改造成为更好的或更坏的，我觉得毫无可能。

梁漱溟晚年蛮乐观的，但所谓乐观，后边一部分他和艾恺关于现代化的讨论，那是驴头不对马嘴。有西方现代化经历的艾恺提出的问题，作为拒绝现代化的东方人物梁漱溟无法回答，没感觉。上世纪80年代市场没有像现在一样大规模展开，如果梁漱溟活到现在，他也有感觉的。他和艾恺的对话，可能就会更深刻一点。艾恺讨论现代化，他认为现代化是整个人类、人性堕落的一个过程。现在我们就看到了，个人主义不断地张扬，你说谁活着幸福？古人讲要克己复礼，现在谁克己呢？谁要三省吾身呢？谁还修身呢？谁不把自己的身看作一个标准啊，谁还理性地暗中监护着自己呀？所以，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不能指望人类更好，当然也不会指望人类更坏。所以悲观主义没有道理，乐观主义更浅薄。

李怀宇：你研究农村这么多年，觉得农村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好吗？

曹锦清：从物质的标准来看，总会发展一点的。三十

年来，大量地造房子，泥墙都改成钢筋水泥了。家里面抽水马桶、空调、冰箱、电风扇、电视机都有了。从物质指标来看，应该说是比过去好多了。总的来讲生产力会发展起来，人均享有的物质水平会逐步地提高，这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人际关系会更和谐吗？不敢说。人民会变得更自足和更满足吗？不敢说。一般来讲，人都是忘恩负义的，能记仇、记恨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指望人类的整个道德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这是谎言，不现实。道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归根到底每个人要有一个自我约束。道德流失以后，只能走向法治国家。法治国家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的一个国家。第一，它是一个高成本国家；第二，它是人与人之间高度利益化和冷漠的国家。所以要一切依法，法制铁面无私。美国基本上还是一个法治国家，它的成本很高，要养活多少律师。印度就养不起那么多的律师，养不起那么多的法官。

李怀宇：你的研究涉及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你觉得这几门学科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吗？

曹锦清：应该有，社会学跟历史学最密切，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学就是史学，就是最近的史学。因为社会都跟时间有关系，时间是最玄妙的，空间可以想象，但时间就无法想象。我们为了想象时间，就把时间画在一个轴里面，一条折线，现在，过去，将来，这是1949年，1980年，就是把时间空间化了，我们以为可以想象时间，把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古希腊那里也思考过时间，佛教那里也思考过时间，最后都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个

意义上讲，社会学好像是研究当下的，其实还是研究历史。所以，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史学研究。

哲学要研究就需要概念，哲学最大的功能就是帮助你概念进行澄清，尤其是逻辑学，就是帮你澄清概念。总而言之，对你的思维或许有好处。哲学帮助你思考。像有些问题根本没有答案，那你不必去追问。比如说意义问题，因为它没有答案，或者说有好多答案，没有一个答案是绝对准确的，就个人而言，不同的时期，可以选择不同的答案。最后的结论就是宽容。

李怀宇：读史阅世之后，房龙写了一本书叫《宽容》。

曹锦清：因为欧洲打得一塌糊涂，尤其是新教起来以后，就发生宗教战争，死了多少人！宗教与政治结合，动用政治力量来杀戮，宗教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打了多少年！1618到1648年，三十年宗教战争，把整个德国打得分崩离析。由于这样，就提出：第一，政教分离；第二，各种宗教都合理存在；而后才有宽容。是因为不宽容得太过分了，所以才要宽容。其实现在还不宽容，还有传教的热情，过去有上帝的使命，后来是人权民主。总的来讲，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只要互不侵犯就可以了。每个民族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如果你有好的东西，我们也觉得好，我们自然会学，不用你灌。我们又不是孩子，像灌药一样灌下去，孩子因为不懂事，这个药对身体好的，你不喝我都要捏着鼻子灌下去。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能这么干吗？

中国文化之宽容，佛教、道教都可以接受，庙里面

什么菩萨都有，这不是一种宽容吗？中国一直确实是比较宽容的，包括先秦的百家争鸣，也没有打起来，就是儒家独尊之后，其他家也还在。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前也没有动乱，儒道佛三教都有，宋代比较严格，各种教不是也有吗？所以儒家没有什么独尊的问题。家里面你拜这个菩萨，他拜那个神，也是相安无事的。有的老百姓是什么神也拜一下。所以，中国一般来讲还比较宽容。当然不好就是没原则，没信仰。